

无须资本家 打造资本主义

后共产主义中欧的阶级形成和精英斗争

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

Class Formation and Elite Struggles in Post-Communist Central Europe



- 通过用“把文化资本视为革命性的历史力量”这一观点取代“卡里斯玛”理论，我们“超越了韦伯化的韦伯”。
- 将进化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新制度主义路径依赖理论，与关于轨道调整的观点进行综合。
- 我们重建了布迪厄的理论，将之变成一个动态的，能够解释社会变迁的比较历史理论。
- 我们正在发起一种新的社会学范式，也就是新古典社会学。

吉 尔·伊亚尔 (Gil Eyal)

伊 万·塞勒尼 (Iván Szelényi) / 著

艾莉诺·汤斯利 (Eleanor Townsley)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导 言

通过讲述共产主义之后的中欧如何在没有资本家的情况下建立资本主义的故事，本书提供了一个关于向资本主义转型的新理论。我们把在市场机制被引入之前没有私有财产阶级存在的社会里，技术专家—知识精英（technocratic-intellectual elites）所采取的这种独特的新转型策略，理论化为“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然而，要注意的是，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并不必定是“一个资产阶级分子都没有”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without a bourgeoisie）。如果有人将资产阶级分子（bourgeoisie）看成多元的，例如，如果将资产阶级（bourgeoisies）看做一个既由物质财产所有者（经济资产阶级分子），又由文化或知识所有者（文化资产阶级分子）所构成的社会群体的话，那么，他就可以宣称——我们在这本书里就是这么做的——共产主义之后的资本主义是由一个定义宽泛的知识阶层（intelligentsia）所发起的，他们将资产阶级社会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分析中欧向资本主义转变的方法，必定既不同于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古典经济和社会理论，也不同于那些关于法团的、管理的，或其他类型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的20世纪的观点，比如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伯利（Berle）和米恩斯（Means），或是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所提出的理论。一方面，古典理论家们假设，在资本主义之前必定先有资本家（capitalists before capitalism）。由于这个原因，这些理论家们耗费了大量的学术精力去探究资本“起源”或“原始积累”的过程。推理的过程是，无论从逻辑上还是历史上来说，亦即私人资本的积累必定发生在市场制度能够运作



之前。^①另一方面，在对现存资本主义体制的研究中，特别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个周期性出现的论题是：个体性私人财产所有者的重要性正在衰弱。由于观察到大型法团组织的成长、金融机构的角色日趋重要，或是科学/知识的重要性正在增长，各种关于“晚期”资本主义的理论家们主张：资本作为经济增长之主要源泉的角色正在终结。^②在这一群体内部，几乎没有人怀疑资本主义体制本身仍然强健；他们所争论的只是资本家之后的资本主义的存在方式（the shape of capitalism after capitalists）。我们关于中欧向资本主义转变的理论对这两个理论传统都有所借鉴，但在想象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这一历史可能性方面，我们的理论与它们不同，并建立在它们的基础上。

首先，就像“资本家先于资本主义”一样，我们的理论首先是一个关于转型的理论。我们的核心目标，是理解和解释资本主义如何能够在并不存在有产资产阶级分子（propertied bourgeoisie）的经济体制中出现。我们想知道，是哪些执行者（agents）正在建造共产主义之后的资本主义，以及他们为了谁的利益、出于什么目的而行动。一种可能性是，前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的技术专家精英可能把自己转变成一个新的有产资产阶级，因而满足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古典条件。实际上，某些分析者就宣称——在我们看来相当仓促——这种转变（transformation）已经发生。另一种可能性则在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将扮演“经济资产阶级分子的知识先锋”，从执行者而非他们自己当中，创造出一个新的有产者阶级（class of proprietors）。在完成这个历史使命之后，知识阶层就会重新返回到创造性的写作、研究或是教学中，或者继续管理那些别人拥有的资本主义企业。

然而，在这些可能性的范围内，在没有个体性有产者的情况下，资本主义被建造起来，并非是不可思议的。在此种情形下，我们就有可能期望

① Karl Marx (1919)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Hamburg: Meissner; Adam Smith ([1779] 1976) *An E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② 关于大的法团组织的成长及其后果的经典论述，可参见 Adolf Berle and Gardiner Means ([1931] 1968)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以及 Ralf Dahrendorf (1959) *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对于金融机构愈来愈重要的角色的讨论，参见 Neil Fligstein (1990)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rporate Control*.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关于“资本”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中作为主要动力的角色已经终结的论证，可参见 Daniel Bell ([1973] 1967)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这样一种经济体制，它与那些论述“资本家之后的资本主义”的20世纪理论家所展望的体制颇为类似。如果资本主义经济的未来真的变成私人有产者不再扮演主要角色的一种体制〔这一论点已经遭到蔡特林（Zeitlin）、多姆霍夫（Domhoff）以及其他学者的有力挑战^①〕，那么，中欧社会就有可能在没有“大资产阶级分子”（a grande bourgeoisie）的历史干预的情况下，作为法团的或后资本主义的社会而出现。换句话说，共产主义结束后的精英，将有可能走出一条历史的捷径，直接进入法团资本主义最为“发达”的阶段，不再与私人有产阶级分享他们的管理权力（即便只是暂时的）。

在目前的时段上，所有这些可能性仍是开放的。事实上，引发我们进行分析的前提是，中欧激烈变迁的产权世界乃是一个充满竞争的地带，在那里，发生了紧张的社会斗争，其后果尚未可知。这种观察在方兴未艾的比较资本主义（comparative capitalism）领域中处于核心地位，而自后共产主义出现以来，比较资本主义已将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比较研究纳入版图。^② 我们的雄心，是要对这个正在出现的社会科学领域有所贡献；因此，我们希望本书不要仅仅被当作“转轨学说”（transitology），或成为只是引起“东欧区域专家”注意的某种著作来阅读。事实上，我们相信，作为一个研究基点（research site），中欧为探索整个世界以及进入21世纪以后新资本主义各种可能性的发展，提供了关键的研究素材。甚至可以更大胆地说：共产主义的瓦解可以被理解成发给社会学家的请柬，邀请他们重访那些曾被诸如马克思和韦伯这样的古典社会学理论家所探讨过的旧研究基点。正如新古典经济学随着福利国家的衰落而兴起一样，共产主义的垮台为启动新的研究项目提供了机会，亦即为新古典社会学（neoclassical sociology）设定了研究议程。在理论建设中形成的新古典社会学——它与社会学理论的经典著作颇为相像——将主要关注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与特点。但是，随着共产主义的垮台，重点有了重要的转移。对马克思及韦伯来说，

① 例如，可参见 Maurice Zeitlin (1974) "Corporate Ownership and Control: The Large Corporation and the Capitalist Cla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9 (5): 1073-1119; G. William Domhoff (1967) *Who Rules America?*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G. William Domhoff (1970) *The Higher Circles: The Governing Class in America*. New York: Random House; and G. William Domhoff (1986) *Who Rules America Now? A View from the 1980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② Neil Fligstein (1995) "Networks of Power or the Finance Conception of Control?"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0 (4): 500-503.



问题是：导致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前提条件是什么？他们假设，终点（destination）已是给定的，唯一的问题是这些前提条件是否会得到满足？然而今天，资本主义却在社会主义的废墟中建立起来，转型也由前共产党员领导。既然正在建造资本主义的人们恰恰是那些看起来最不可能的行动者，他们起步于最不可思议的出发点，那么，新古典社会学就较少关注这些前提条件。新古典社会学强调的是正在出现的资本主义的多样性——简言之，新古典社会学的主题内容就是比较资本主义。

在不用承受固有理论观点的重负而来探索这些可能性的尝试中，我们采取了三重分析策略。第一，我们的观察从这里开始：存在不同的路径可以导向资本主义。因此，我们对不同时空中，各个国家向资本主义的转型进行比较，以求发现中欧案例的独特性（如果有的话）。第二，我们主张，资本主义从来就没有、也永远不会只有单一的终点。资本主义将一直是一个总称性术语（generic term），用来描述社会行动者和制度的多样性组合。出于这一理由，我们对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进行比较，试图探究能够维系正在运转的资本主义体制（包括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体制）的可能的行动者和制度的范围。第三，我们相信，对于解释正在中欧建造的那种特殊类型的资本主义来说，行动者的社会属性、他们的阶级能力，以及他们在历史上的斗争所导致的偶然性后果，可能是决定性的。因此，我们的兴趣在于对各种类型的资本家或资产阶级进行比较研究。

将关于中欧的研究基点和其他基点（亦即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其他条件）进行对比，我们发现了两个特征。我们相信，它们对这一地区要建造的资本主义类型，将产生深远影响。第一，我们发现，与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古典转型相比，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型有着非常不同的动力机制。尽管封建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度和资本主义相比有很大不同，但在这两个体制内产权却是相当类似的；并且，向资本主义的转型期也足够长久，从而允许握有恒产的资本家阶级（capitalist class）成长起来，并使贵族与资产阶级逐渐“融合”。^① 在从社会主义到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剧变中，这是不可想象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财产被完全社会化，即使在那些改革最自由化的共产主义国家里，私人财产所有权也都是边缘的。因此，当共产主义体制瓦解时，以前第二经济（second economy）中的从业人

^① Perry Anderson ([1976] 1992) "The Notion of Bourgeois Revolution". pp. 105 - 18 in *English Questions* by Perry Anderson. London: Verso.

员并没有掌握政治或经济权力，并不令人感到吃惊。实际上，权力被那些前共产主义红色贵族中的技术专家部门，或者前异议知识分子，或是这两者之间的松散联盟攫取。这并非暗示第二经济中的从业人员在使国家社会主义体制失去合法性，或被逐渐腐蚀方面不曾扮演重要角色；他们确实起过重要作用。^① 不过，这并不必然意味着，那些曾在第二经济中享受成功的人确实不是体制崩溃最主要的受惠者。事实上，更多的近期分析表明，以往第二经济中的行动者有很大比例成为后共产主义转型中最大的输家之一。^② 在这种情况下，中欧向资本主义的转型显然不可能追寻古典的、“资本家先于资本主义”的西欧道路。

我们研究基点的第二个辨别性特征是，尽管中欧缺乏一个有产阶级，但向资本主义的转型却是在一个“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发展相对较好的背景下进行的。资本主义的建造，在知识阶层的领导下展开，在经历一段中断期之后，这个阶层仍然相信其历史的、伦理的使命，就是在民选议会戒备的目光下，创造资本主义制度，并使之接受自由媒体的监督。在这样的情况下，私有财产阶级的形成似乎已经远远落后于新市场制度的成长。为了进一步对此进行探讨，并且研究为什么在体制瓦解之后，有产阶级的成长要比古典或新古典理论家的预期来得缓慢，我们注意到，“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似乎仅为中欧所特有。这种情形和对这一地区内“政治资本主义”（political capitalism）的理论预见正好相反，而且它似乎也无法概括东欧/俄罗斯社会体制的特征。

大约从1988年年中以来，当旧的共产党精英正为他们知道将要来临的体制瓦解预做准备的时候，一大批评论者却还在怀疑这些共产党人是否会颁布私有化法律，以便他们自己能够把官员职位转换成后共产主义的新形式特权。^③ 在本书中，我们的证据表明，与俄罗斯的案例相反，在中欧，

① Iván Szélenyi (1988b) *Socialist Entrepreneur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Iván Szélenyi and Szonja Szélenyi (1995) "Circula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Elites in Post-Communist Transformation." *Theory and Society* 24 (5): 615-638; Ákos Rona-Tas (1997) *The Great Surprise of the Small Transformation: The Demise of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the Private Sector in Hungar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② Eric Hanley and Iván Szélenyi (1996) "Changing Social Structure during Market Transition: The Case of Central Europe." Paper presented to the workshop on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the Reform of the State*.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③ Jadwiga Staniszkis (1991a) *The Dynamics of Breakthroug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Elemér Hankiss (1990) *East European Alternativ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几乎没有什么证据支持这类政治资本主义的理论。尽管在所有中欧国家，把政治资本成功转化成私人财富的例子都已经出现，但这些似乎更像是例外而非通则。相比之下，来自俄罗斯的证据表明，政治资本主义的假设对这些案例的解释力比中欧更大。^① 在中欧，市场制度的演进看上去已经比私有财产的发展速度更快，但在俄罗斯，财富在私人手中的积累速度却远远超过了市场制度的建立。因此，与中欧“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不同，俄罗斯或可被引证为“没有资本主义的资本家”（capitalists without capitalism）。

可能是由于市民社会的成长，尤其是议会与自由媒体早先的发展，中欧较少有可能出现俄罗斯那样制度化的普遍腐败。有些分析家甚至将这种差异归功于中欧精英更高的道德整合（moral integrity）。当然，这不过是一种臆测。它受到如下事实的挑战：许多公众认为，中欧的党政官员正在进行一场“大掠夺”，这种看法得到了广泛的坊间传闻式证据，甚至统计数据的支持。^② 事实上，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当我们开始关于后共产主义中欧资本主义的调查时，也是从政治资本主义这一假设出发的。不过，随着我们开始收集和分析更加系统的数据，我们被迫重新构思最初的假设。^③ 让我们深感震惊的是，我们发现，在中欧，有如此之多的前共产党精英失去他们的权力；他们现在生活得如此拘谨；他们说自己几乎不参加商业活动，经理人的所有权似乎也受到了限制；财产向私人手中的集中也很少。当然，关于这些高度政治化的议题，我们的被访者也有可能并没有说实话，因此，我们已经试图对自己数据的有效性（validity）持一种开放的心态。不过，与此同时，我们却注意到，用来支持政治资本主义命题的证据甚至更缺乏系统的收集。因此，几乎没有理由去怀疑我们的数据更不可靠；而大量充分的理由促使我们相信，我们数据的代表性和系统性程度要高得多。这里的关键在于，需要对俄罗斯（以及中欧）做更加系统的研究。

因此，尽管有这些限制，但我们仍然相信：中欧案例的独特性以及我们数据的质量，对一般性的资本主义转型理论，以及对理解中欧当代资本

① 例如，可以参见 Roman Frydman, Kenneth Murphy and Andrzej Rapaczynski (1996) "Capitalism with a Comrade's Face". *Transition* 2 (2): 5-11。

② Ákos Rona-Tas (1994) "The First Shall Be The Last? Entrepreneurship and Communist Cadre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0 (1): 40-69。

③ 关于本书使用的数据的描述，参见 Iván Szelényi and Donald Treiman (1993-1994)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Eastern Europe after 1989" 附录 I 以下。

主义发展的各种可能性而言，都有很大贡献。我们已有的证据支持如下明显的事实（prima facie case），两个后共产主义地区之间存在差别：在中欧，是“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而在俄罗斯，则是“没有资本主义的资本家”。此外，对资本主义组织而言，“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暗示了一系列颇有吸引力的可能性，同时也挑战了关于向资本主义转型中，许多我们深信不疑的假设。出于这一原因，接下来，在对这种新奇的资本主义转型策略中的行动者和制度做出进一步分析之前，请先让我们更加详细地勾勒出“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这一理论的细节。

命题1：后共产主义的社会可以被描述为一种独一无二的社会结构，其中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是权力、声望与特权的主要来源。对经济资本（economic capital）的掌握，只能使行动者处于社会等级制（social hierarchy）的中间位置，而将前政治资本（political capital）转换成私人财富更多只是特例而非通则。实际上，只有当社会行动者掌握了正确的资本类型并成功兑换时，前共产主义的特权转换成后共产主义的等价物才会发生。所以，对那些曾在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等级制中占据高位的人来说，只有当他们有能力“调整轨道”（trajectory adjustment）时，才可能保持原位；在目前情况下，这意味着他们很好地掌握了文化资本。相反，那些完全依赖来自共产主义时代而眼下业已贬值的政治资本的人，却没有能力把这种资本转换成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并且很有可能向下流动。

第一章对中欧的后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以及前共产主义社会进行了比较分析。在这一分析里，我们的目的是发展出一种结构主义理论，它不仅是动态的，而且能够应用于历史上特定的、紧要的关系上。我们的出发点是布迪厄（Bourdieu）的社会结构理论，但我们利用韦伯关于等级社会与阶级社会的区分对它进行了重构。^① 通过这一方式，我们希望为布迪厄的框架带来一个比较历史的维度（comparative historical dimension），因为那个

① Pierre Bourdieu ([1983] 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Pp. 241 - 258 in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ed. John G. Richardson.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Pierre Bourdieu (1984) *Distinction: A Sociologic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ax Weber ([1915 - 1921] 1978) *Economy and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926 - 938.



框架起初更多是为了解释再生产而非社会变迁而设计出来的（这里并非暗示什么批判：布迪厄的研究基点是当代法国社会，在那里，“再生产”是压倒一切的趋势；我们研究的是中欧近期的社会历史，在这里，动荡不安及大规模的社会变迁占据支配地位）。从布迪厄那里，我们借用了下列思想：资本的三种形式（three forms of capital）、社会空间（social space）以及惯习（habitus）。在此基础上，我们区分了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并且将各种社会结构概念化为各种“空间”，它通过这些类型的资本的各种各样的分布而被分为不同的层。个人在这些空间中“穿行”（travel），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如果他们的一种或另一种资本的相对重要性发生变化，他们会试图重组不同类型资本的结构，把业已贬值的资本类型变换为重新增值的类型，以便继续停留在“轨道”上。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几个独特的新观点，用来解释中欧社会变迁的性质。

（1）我们把前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概念化为三个不同的分层政体（stratification regimes），它们通过不同类型资本的支配而得以界定。虽然布迪厄用三种类型的资本来描述当代法国社会，在那里经济资本是支配性的，而其他类型的资本则是从属的；但是，面对过去50年来中欧不断变迁的图景，我们区分出三种性质不同的社会空间，每一种空间都通过不同类型资本的支配而得以界定。

（2）我们宣称，后共产主义是一个在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分层体系，其中文化资本处于支配地位。这使得我们能够发展出一套关于后共产主义社会结构的新理论，它和我们的下列主张相一致：专家治国论者和前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在从社会主义到后共产主义的转型中扮演关键角色。我们将资本主义界定为一个阶级层化体系（class-stratified system），其中经济资本是支配性的；而在共产主义体系中，社会资本（它被制度化成为政治资本）才是权力与特权的主要来源。随着国家社会主义的衰退和后共产主义的兴起，政治资本的重要性正在下降，文化资本的作用逐渐增多，而经济资本充其量只能使它的占有者位居社会等级制的中层。

（3）向后共产主义的转型是一种从社会主义等级秩序（rank order）向资本主义阶级分层（class stratification）的转移。沿着韦伯的脉络，我们把共产主义概念化为建立在等级秩序基础上的社会。社会资本是支配性的，并且导致一种社会主义形态的庇护关系（patron-client relations）。与经济资本占据支配位置的社会——依据韦伯，我们将之理解为阶级层化的社会——相比，共产主义社会是现代等级秩序的范例。在这一理解基础上，我

们可以主张：从共产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型，原则上乃是从等级秩序向阶级社会的转型，并由此将韦伯历史社会学的动态论（dynamism）导入布迪厄的结构分析中。然而，实际上现存的后共产主义作为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体系，只是在从“等级”到“阶级”的谱系上占据了中间的位置。文化资产者（Bildungsbürgertum）既不是一种等级，也不是一种阶级。毋宁说，它结合了这些特征，而且将这两种社会分层逻辑的可能性包含了进来。

（4）将贬值形态的资本转换成新的、更有价值的形式，是个人为应对社会结构变迁而优先采取的方式。在分析社会变迁时，我们希望把行动者放到分析的中心；因此，我们求助于布迪厄，以充实韦伯的分析。我们从下列观察开始着手：当个人或由个人组成的群体面对大规模社会变迁时，他们会尽力停留在（原有的）轨道上，并维持他们的相对社会位置。每个人都拥有不同资本形式的“证券”（stocks）组合，当面对社会变迁时，他们会尽力重组这一组合，试图摆脱那些正在贬值的资本形式，并把它们变成更有价值的资本形式。把资本从一种形式转换为另一种形式是一件微妙的事情。当事人要抓准时机，而且，如果一个人已经充分拥有一种重新增值的资本，那么，对转换贬值的资本形式来说，他通常就处于更加有利的环境中。例如，在后共产主义转型中，那些已经充分拥有文化资本的人，就有能力将前政治资本转换成非正式的社会网络，然后对之加以有利配置，以便在新的市场机会中获得好处。相反，那些没有很多文化资本的人会发现，对他们而言，他们的前政治资本反而是一种不利条件。

（5）惯习和制度性位置（institutional position）之间有一种辩证的互动：新位置改变任职者，但新任职者却依赖他们的惯习去诠释一个制度应该如何运作。当社会空间的客观特征改变时，某一类型资本的价值会降低，另一类型资本的价值会增加，而补充到新位置或保留在老位置的标准也会改变。面对这种压力，那些试图留在原来轨道的人——试图保留原来的位置，或得到一个与他们丢失的位置具有同等权力、声望及特权的新位置——就会寻求一种双重策略（dual strategy）。其一是适应新的挑战。个人将会重组其资本结构，以抛弃那些已经失去价值的“证券”，并试图获得增值了的其他类型资本。其二，人们也会尝试着学习新的游戏规则并调整他们的惯习，以便适应新制度中的新位置。但是，惯习具有某种程度的“黏性”（stickiness），而且在每一种社会里，尤其是在像中欧那样的小型社会里，只有少得可怜的人才可能占据关键职位。其结果就是个体特征——这些人被吸收到或保留在各种各样的制度位置中——和位置特征之



间的一种创造性的互动关系。这是一个为社会变迁奠立基础的基本过程：新位置改变了个人的惯习，但被吸收到那些位置上的个人同时也影响了这些制度的运作方式。

(6) 社会变迁可以被理解为一个“轨道调整”过程。这意味着，针对新挑战的进化性适应和针对先前“制度/行为”的路径依赖转变 (path-dependent transformation) 是同步发生的。此外，那些他们的惯习在社会变迁时期不足以充当可靠指南的个人，或许也会求助于“考古学” (archeology) ——也就是说，在轨道调整的过程中，在共产主义时代被压迫成集体无意识的前共产主义的社会经验，也会被重新唤起。这后一个创见突显出“考古学知识”在个人惯习与他们所占据的位置特征之间进行互动时的价值。在这个观察的基础上，我们为两个彼此竞争的社会变迁理论提供了一个综合。头一个是进化论，它构成了新古典经济学及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 (rational choice Marxism) 的根基。这两个思想学派的假设是：如果你创造出合适的制度，它们就会形塑那些占据此制度的个人，从而使得个人行为遵从制度上的约束和规则。在后共产主义转型的情境中，这就是“设计资本主义” (capitalism-by-design) 的理念：你摧毁了旧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代之以业已知晓的在发达市场经济中运作良好的制度。照此而行，行动者将学习如何在新的约束内运作：干部 (cadre) 将变成企业家，受庇护者 (clients) 则被转变成工薪劳动者。^① 第二种关于社会变迁的理论是内卷理论 (involutionary theory)，或曰关于路径依赖转变的理论 (theory of path-dependent transformation)，它支配了当前针对中欧的学术研究。^② 这一研究进路假定，后共产主义的制度是在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废墟上建造起来的。转型不是从计划 (plan) 到市场 (market)，而是从计划 (plan) 到宗族 (clan)。我们的“轨道调整”理论提出三个论点，我们相信这些论点将会对这些竞争的理论提供一个综合，同时将它们之间的矛盾最小化。第一，在变迁时代，那些能够保留在原有轨道上的人，是有能力学习 (learning) 的人；那些有能力重组他们的“证券”结构，并改变他们惯习的人确实是

① 这方面的讨论参见 Jeffrey Sachs (1995) "Postcommunist Parties and the Politics of Entitlements". *Transitions* 6 (3); 以及 Anders Aslund (1985) *Private Enterprise in Eastern Europe—The Non-Agricultural Private Sector in Poland and the G. D. R., 1945 - 1983*.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② David Stark (1992) "Path Dependence and Privatization Strategies in East Central Europe".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6 (1): 17 - 51.

社会进化过程的一部分，他们适应了社会变迁。然而，第二，这种学习并非拷贝。当个人调整他们的社会轨道时，他们是用一种路径依赖的方式进行的。他们集体性地重新诠释他们不得不扮演的角色，而且在这样做时，他们靠的是共享的经验、认知方式，以及共同的理解。第三，当个人面对突如其来的剧变时——就像中欧在1989年所发生的那样——他们认识到，从不久的过去承袭而来的惯习并不适应业已改变的环境，并且开始寻找他们能接受的其他行为和社会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否定之否定”（negation of negation）的逻辑经常发挥作用：前共产主义的做事方式被援引进来。它的逻辑是：如果共产主义把事情搞砸了，那我们就应当回到共产主义之前的做事方式，尤其是如果那些思想及行为方式曾被共产主义排斥过。

命题2：由于在中欧，国家社会主义限制了私有财产阶级的展，所以，文化资产者分子（“第二代文化资产者”，the Second Bildungsbürgertum）承担起创造资产阶级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历史使命。然而到目前为止，与创造一个个人私有财产阶级相比，他们似乎在确立现代资本主义市场制度，尤其是公司部门方面，要更为成功。

第二章将“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策略追溯至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在中欧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社会的关系中，分析它的根基。受德国社会史学者于尔根·柯卡（Jürgen Kocka）著作的启发，我们发现，中欧知识分子已经被各种雄心勃勃的重塑他们社会的历史规划吸引，而且我们主张，不论这些规划是怎样的，统治当代后共产主义的权力集团都是这些规划的继承人。至少已经有三个这样的历史规划存在。

在第一个规划里，19世纪的中欧知识分子将自己界定为文化资产者（Bildungsbürgertum）。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自己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并且相信他们的历史任务就是鼓吹资产阶级社会的理念，以及抚育中欧脆弱的有产阶级成长。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在那个时代，易北河以东、处于德意志势力范围内的各国，经济落后，商业阶级的发展也较慢。但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却自诩有一个较大且受过西方教育的中间阶级，他们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而且他们自己也这么看待自己。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人主张，现代化任务也许不仅是由有产阶级（经济资产者，用德文来说就是Wirtschaftsbürgertum）来承担的，而且也由受过教育的中间阶级（或称文化



资产者，德文为 Bildungsbürgertum）来承担。因此，在 19 世纪大半的时间里，中欧知识阶层自视为文化资产者，他们与被启蒙了的文职官僚体制结盟，实施被视为资产阶级社会的乌托邦规划。^①

中欧知识阶层的第二个规划，就大部分而言，是对该地区现代化步伐缓慢的一种反应。由于从资产阶级社会的理想中逐渐挣脱出来，知识阶层中核心的意见领袖们开始对反资产阶级的思想产生兴趣。或许受到利他主义的促动而推进现代化，或许出于自身利益而意欲提升自己的社会位置，知识阶层的核心部分开始搜寻能够超越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实现现代化的捷径。^② 到 20 世纪初期，文化资产者的规划已完全被抛弃。知识分子不再把自己视为应当促进资产阶级价值观传播的历史行动者，他们日益转向右翼或左翼的激进主义，而且对“布尔乔亚”这个名词充满了敌意。事实上，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的时候，“文化公民”（Bildungsbürger）一词已被讽刺性地用来意指资产阶级庸人。^③ 知识阶层的核心部分开始将自己标榜成“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或者，至少也是理性的拥有者，这种理性将会取代资本主义市场“看不见的手”的非理性。尽管此种思想在知识阶层中并未获得一致支持，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就像众所周知的那样，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中欧已居于统治地位。

中欧知识阶层承担的第三个知识规划诞生于共产主义时期。随着右翼激进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挫败，以及面对斯大林主义的书报审查制度和逆向选择（counter selection），异议知识分子慢慢地重新发现了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到了共产主义末期，持不同政见者与共产党统治集团中的专家治国论者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转变社会主义经济并建造资本主义。他们的目标是抛弃共产主义秩序，并且试图在没有资本家的情况下建设资本主义。虽然中欧知识分子中的反资产阶级规划（anti-bourgeois project）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60 年代，而且，尽管事实上那些起初是左翼激进主义

① 在德语中，这一术语是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参见 Jürgen Kocka (1987b) "Einleitung". pp. 7-20 in *Bürger und Bürgerlichkeit im 19. Jahrhundert*.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以及 Lutz Niethammer (1990) "Einführung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als Projekt". pp. 17-41 in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in Deutschland*, ed. Lutz Niethammer. Munich: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② 关于文化生产领域对这一过程的精彩描述，参见 Ivan Berend (1998) *Decades of Crisis: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before World War II*.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③ 参见 Ulrich Engelhardt (1986) "Bildungsbürgertum". *Begriffs- und Dogmengeschichte eines Etiketts*. Stuttgart: Klett-Cotta, p. 191.

的异议知识分子至少花了十多年的时间才开始将自己视为新的文化资产者，但直到共产主义时代终结，这第三个规划——我们将之诠释为第二代文化资产者规划——仍然正在进行之中。

然而，在某些方面，与200年前受过良好教育的布尔乔亚中等阶级相比，第二代文化资本家所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他们必须在一个有产阶级的条件比前共产主义时更为弱小的情况下，来推动建立资产阶级社会的乌托邦规划。此外，随着共产主义的崩溃，很明显，任何一个知识阶层部门都不可能独自承担这个规划。知识阶层间的不同部分开始学着跨越知识精英内部旧的隔阂来组织结盟。第二代文化资本家作为与前异议分子和前共产党技术专家的不稳定联盟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反映出了这一点。乍看之下，这种结合是出于“方便”而非“爱情”，但是，正如第二章所展现的那样，在中欧知识阶层的集体传记（collective biography）里，这一试图建设资本主义的后共产主义规划却有非常深刻的历史根源。

命题3：后共产主义的精神可以追溯到第二代文化资产者形成的时期，例如共产党改革派和反共产主义异议分子形成的时期。由于第二代文化资产者是以异议知识分子和共产党改革派技术专家同盟者的面貌出现的，所以，这种精神一方面在关于市民社会的观念，另一方面在经济理性主义（economic rationalism）那里找到了它的根基。通过这一方式，管理主义（managerialism）变成了新权力集团的意识形态。管理主义并不仅仅或主要指的是管理者或技术专家统治。毋宁说，管理主义是一种心智，或曰一种治理心智（govern-mentality），它将后共产主义精英的不同部门粘接成一个霸权性的权力集团（a hegemonic power bloc）。

第三章开始于对后共产党技术专家意识形态的分析。我们宣称，这一意识形态的核心是货币主义（monetarism）。然而，面对后共产主义制度重构的挑战，技术专家却不得不重新诠释他们的货币主义理念。后共产主义经济政策的现实是预算约束（budgetary restraint），它不再通过那只看不见的手在远处引导，相反，它要求的是对经济过程施以严密的、事必躬亲的管理。我们指出，这样一种将货币主义重新诠释为削减预算政策的做法，对前共产党技术专家来说，易如反掌。他们习惯了用此种方式运作经济。它所衍生出来的暗箱式再分配体制（system of subterranean redistribution），



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

也为企业经理同技术专家就预算进行讨价还价的实践创造了空间，而这令人再次想起共产主义时代对计划的讨价还价。对建立技术专家和企业经理人之间的合作来说，这类讨价还价是重要的，因为公司层次上的管理层通常对货币主义持怀疑或者仇恨的态度，而对提供补贴，以及拥有工业、就业和外贸政策的政府最感到舒心。

前持不同政见者——他们已经将自己建构成后共产主义塑造民意的知识阶层——从他们的起点，走到与技术专家及经理人就共同的奋斗目标（common cause）讨价还价，也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路程。对前持不同政见者来说，他们的出发点是市民社会的理念。和专家治国论者一样，异议知识分子相信看不见的手能够调节经济。除了这一信念之外，他们还认为，社会控制可以远距离地加以实施，而无需像在共产主义体制下那样严密监视。但是，由于治理的现实已经塑造他们，前异议分子也发展出一系列社会控制的实用策略（hands-on strategy）。尤其是，因为公民个人和公民文化都必定是从被污染的共产主义现实中创造出来的，于是，后共产主义革命的知识先锋就发展出各种仪式（rituals），用来作为转型过程中管理社会和文化事务的工具。在第四章中，我们辨认出三类这种仪式：“净化”（purification）、“牺牲”（sacrifice）和“忏悔”（confession）。这些仪式起初使用的是反共产主义的措辞：共产主义体制是肮脏的，它必须得到净化，才能创造出文明的个体；这就需要全体的牺牲，而且，只有当那些生活在共产主义下的人们在仪式或公开忏悔中来面对他们的集体罪恶时，（这种净化）才会有效。可以理解的是，对于处于新权力集团核心中的前共产党人来说，后一个仪式没有什么吸引力。结果，在后共产主义社会管理的实践中，这些礼仪的反共产主义基调销声匿迹了，它们被专家政治重新利用，作为追求预算约束政策获得正当性的工具。这些重造的仪式不再呼吁共产党官员的“净化”，反而强调清除大众行为中的非市场模式，例如对政府补助的依赖。“牺牲”也按经济学的术语被重新诠释。前持不同政见者现在布道说，市场转型需要延迟满足欲望：共产主义是一种使人们入不敷出的体制，而现在人们必须学习量入为出。这种被经济学重新塑造过的“净化”和“牺牲”仪式，也有利于使得关于市民社会的异议话语符合前共产党技术专家的口味。事实上，这些被重新塑造过的礼仪现在服务于技术专家的目的。因此，后共产主义的管理主义意识形态，正是来源于转型过程中再造社会和个人的矛盾性社会实践。最终，它被具有多元利益的行动者接受。这些行动者的知识起源非常不同，而且在经历了非常不同的知识轨

迹之后，才到达后共产主义。不过，“管理主义”却非常有效，这是因为转型中的社会“治理心智”要求那些重建前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及文化制度的人，都必须共享事必躬亲的管理气质（the ethos of close hands-on management）。

命题4：关于后共产主义转型的阶级动态，政治资本主义的一般理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political capitalism）并没有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与其预测的相反，在后共产主义的转型中，许多前共产党精英成员并没有保住他们的位置。如果他们只是握有政治资本而没有文化资本，他们就会失去特权、权力与声望。不过，与此同时，如果前干部（former cadres）拥有文化资本，他们就有可能跻身转型赢家的行列。事实上，在大部分后共产主义的公司部门中，经济领导职位都被前共产党技术专家把持，与那些年长的干部相比，他们更年轻，受过的教育更好。然而，即便是这个群体，也尚未追求政治资本主义：前共产党技术专家确实是在行使管理威权，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已经攫取了大量的私人财富。此外，这个由前共产党人组成的群体不可能独立行使权力；因此，他们已经与新政治官僚及塑造民意的知识精英组成同盟，而后面两个群体中，许多人都是前异议知识分子。

与我们起初的预期以及政治资本主义的预见相反，我们展示了大量前共产党精英向下流动的证据。许多在共产党时代身居高位的人都已提早退休，而且在年满60或65岁之前就辞去工作。此外，前政治资本（亦即共产党员的身份）似乎对“党管干部”成员的生存机会产生了负面影响，而那些不是共产党员的人，在转型阶段反而更有可能保住工作。要证明那些提早退休的干部大多进入私营企业的言论也是困难重重。事实上，我们发现，与那些选择提早退休的人相比，那些能够保住工作的人，反而更多地承认自己的厂商所有权。简言之，大量前党政官员成为转型阶段的输家；将政治资本转换成经济财富也并非自动发生。这些发现，对斯坦尼茨基斯（Staniszki）和汉基什（Hankiss）所论述的“政治资本主义假设”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这一假设主张，共产党的红色贵族正在把自己确立为一种新的大资产阶级。

在某个方面，第四章所提出的下一个发现与第一个研究发现相矛盾：虽然在前红色贵族中不乏输家，但在后共产主义转型中的大赢家也是前共



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

产党员，尤其是共产党统治集团中的技术专家部门，却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这个矛盾更多是表面上的而不是现实。我们的数据为晚期国家社会主义精英的分裂性质（fragmented nature）——亦即最早由厄吉贝特·萨莱伊（Erzsébet Szalai）加以理论概括的晚期共产主义的特征^①——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的确，或许最好把1989年理解为共产党统治集团中的技术专家部门对行政官僚部门的一次成功的革命，亦即“专”（experts）对“红”（reds）的胜利。后共产主义时代经济领导位置上绝大多数任职者都来自前管理层，尤其是中层管理人员。这些管理者中的大多数不仅占有政治资本，而且也被很好地赋予了文化资本。

然而，在一个方面，我们的发现和萨莱伊的预测有差异。斯坦尼茨基斯和汉基什预言，前共产党人将会利用权力，试图变成共产主义之后新的公司所有者；而萨莱伊则更明确地宣称，技术专家—管理精英是最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的候选人。然而，我们的数据显示，这两种预见都偏离了靶心。管理者所有权，或是国有企业的管理层收购，都并非后共产主义的主要叙事。实际上，绝大部分企业和工业的管理者根本就不要求获得企业的所有权。此外，足有一半以上的拥有产业的管理者，他们所拥有的股份并非属于自己所管理的企业，而是一些小型的转包合同公司。最后，我们发现，那些在自己管理的企业拥有股份的管理者，可能是一些小企业的经理人，而且通常他们也只拥有这些企业的一小部分资产。换句话说，前共产党专家治国论者并没有如萨莱伊所预言的那样，掌握和所有者一样的最终经济决策权；相反，他们是作为专家和经理人来行使权力的。

虽然我们能得到的关于大型企业所有权关系的数据相当粗略，而且可能没有充分的代表性，但我们手边的证据却能够支持戴维·斯塔克（David Stark）和拉里·金（Larry King）基于民族志观察而提出的假设。^②斯塔克发现中欧公司的所有权是“重组的”（recombinant），也就是说，它既非私有亦非公有。金也发现了具有“混合”产权的企业，但他也识别出一系列

^① Erzsébet Szalai (1989a) *Gazdasági mechanizmus, reformtörések és nagyvállalati érdekek* (Economic mechanism, reform scenarios and the interests of large firms).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② David Stark (1996) "Recombinant Property in East European Capital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4): 993–1027; Larry King (1997) *Pathways from Socialism: The Transformation of Firms in Hungary, the Czech Republic and Slovakia*,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CLA.

私有化替代策略 (alternative strategies of privatization), 其中的大多数并未导致由明晰可辨的个人所拥有的所有权。我们有关资产的数据也证明, 除了外资企业 (这只有在匈牙利才有现实意义), 后共产主义中欧的所有权模式十分散乱, 很难说出谁是真正的所有者。直接或间接的公有制、制度性的交叉所有权 (institutional cross-ownership)、由政府或国家私有化管理局所拥有的银行所有权, 以及自我所有权 (self-ownership, 即甲企业拥有乙企业, 而乙企业又拥有甲企业) 都很普遍。它们共同为无恒产的技术专家及管理者行使实质性的自主性和权力创造了物质基础。

最后, 虽然后共产主义转型的大赢家是前共产党技术专家, 但我们发现, 他们也不能独自统治。他们被迫与新的政治官僚及塑造民意的知识精英一起创建一个霸权性的权力集团, 而这后两个群体主要是由前异议知识分子组成的。^① 共产主义政权刚刚瓦解, 新的政治官僚及塑造民意的知识精英就企图把前共产党技术专家排挤在权力之外。然而, 他们很快就认识到, 知识精英中的任何一个派系都不可能单独进行统治。在共产主义之后的第二次普选期间, 许多前异议分子被抛出政治圈, 而晚期共产主义的务实主义者反而跻身于新政治精英之列。这些人确实是些奇怪的同居者, 他们组成了后共产主义的“非神圣同盟” (unholy alliance)。

命题5: 后共产主义下的阶级形成是一个高度竞争的过程。有各种各样的候选人可以组成新的有产阶级, 他们是: 技术专家—管理精英、外国投资者及其买办知识分子同伙、从小本生意起家但希望能发展壮大新企业家。

很可能后共产主义将在一个私有财产阶级得以形成的体制中达到其顶峰。然而, 目前这种阶级的形成却是充满了竞争。它的成员最终可能来源于前共产党技术专家及管理者。或者是, 要么新私营企业主为了自己的利益给予前官员 (apparatchiks) 一个机会, 要么从长远来看, 这些社会经济体制也许与位于边缘的本土资产阶级, 以及掌握关键生产性资产的外国投

^① Erzsébet Szalai (1994a) "The Power Structure in Hungary after the Political Transition". pp. 120 - 143 in *The New Great Transformation*, ed. Christopher C. A. Bryant and Edmund Mokrzycki.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Erzsébet Szalai (1994b) *Uteltagás. Hatalom és értelmiség az államszocializmus után* (At the crossroads: power and intellectuals after state socialism). Budapest: Pesti Szalon Kiadó.



资者一道运作。正如我们所主张的那样，也可以想象到的是，在没有所有权的情况下，技术专家和管理者将成功地再生产出混合的产权关系，并保持对经济的控制。至少，我们预期，这个正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bourgeoisie-in-the-making）的性质，将会受到下列事实的深远影响：转型的规划是由“后共产主义权力集团”来设计和执行的，这一权力集团深深植根于历史上知识分子精英各个派系之间的斗争中。然而，这种为了所有权及控制权而进行的持续斗争，其结果究竟如何，到目前为止尚不清楚。

曾有一次在闲谈之际，我们试着对一位老朋友，一名“澳大利亚工党”（Australian Labor Party）的忠实支持者，解释本书的精髓。他很注意地聆听了这个前共产党人眼下正忙于建造资本主义的故事。他疑惑地摇着头问道：“你们是在告诉我，那些在东欧把社会主义弄糟的家伙，现在又要来把资本主义搞垮吗？”赶时髦的社会学家最近流行说：能动作用至关重要（agency matters）。这正是我那个朋友要表达的意思。你无需先接受暗含的左翼工党的政治信息（社会主义之所以被弄糟，乃是因为错误的人试图执行它），然后才接纳以下实质性观点：不仅仅是制度形塑了行动者，而且那些创造历史的行动者的集体传记，也将在迫使行动者加以运作的制度上留下它们的印记。

第五章提供的结论是，资本主义最好应该被理解为各种可能目标的一种变体。苏东社会主义垮台后的世界现实，并不像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区教科书所写的那样，是一个单一体制的形成。相反，它是一个由各种资本主义组成的世界——也就是说，一个由各种各样阶级关系和制度安排的社会经济体制所组成的世界。

这一总结性章节是对资本主义比较研究的呼唤。它也是对一种可以被称之为“新古典社会学”的研究的呼吁。就像“古典社会学”一样，这是一个研究纲领，它将自己的主要任务视为探寻资本主义的起源与性质。古典社会理论将它的焦点放在现代资本主义形成的前提之上。由于这些前提为数众多且并不确定，资本主义被设想为一个奇迹——一个所有这些条件能够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得以满足的奇迹。然而，通过观察资本主义何以竟由一群最不可能的执行者、在一个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基点被创造出来，新古典规划开始了它的分析。在我们的案例中，资本主义是由前共产党官员和他们的前左翼批判者，在社会主义的废墟上建造出来的。从马克思到韦伯的古典社会学家，将资本主义概念化为单一的目标，虽然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这并非最终点。然而，随着任何可行的替代经济体制的消失，

对新古典社会学的评论家来说，突然之间变得再清楚不过的事情是，实际现存的资本主义其实是由最多样化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所组成的“马赛克”。所以，我们的任务不是去解释为什么在“起初的地方”资本主义会出现。相反，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资本主义转变的初始条件究竟会如何影响到将要被打造的资本主义的种类？它将在哪里打造？由谁来打造？

第一章 20 世纪中欧社会结构 变迁中的阶级与精英

本章提出了一个概念框架，用以研究快速变迁的社会中，社会结构的动力机制。以中欧为研究个案，我们重新发展了布迪厄关于“资本”（capital）和“惯习”（habitus）的思想，用它们来分析人们如何应对快速、剧烈的社会结构变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方法颇具反讽意味，因为布迪厄经常被看做一位关于社会再生产的理论家，他的思想以其得以建构的稳定的社会背景为特征，即资本主义的法国。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认为，布迪厄的理论对我们的研究很有帮助，因为尽管有大规模的社会变迁，但越是变迁，事情越成了同一回事（plus ça change, plus c'est la même chose）。

接下来，通过批判性地援引惯习这一概念——它被布迪厄定义为“实践的生成性规则”——我们试图揭开一个普通的智慧，那就是“事情越是变化，它们就越是维持原样”（the more things change, the more they stay the same）。我们将惯习理解为“关于游戏规则的知识”，它使得处在各种关系中的形形色色的行动者能够应对他们所面临的剧烈变化的社会空间。因此，尽管可以有很多种方式来解读惯习这一思想，但我们想让自己与下面这一理解保持距离，后者认为惯习只有通过行动者（actors）在稳定的社会空间中所占据的位置才可以形成。相反，我们要强调的，是执行者（agents）（他们的性情倾向、习惯、生活史、集体记忆）与他们（在制度、阶级关系和网络中）所处位置之间的辩证的互动。通过对这一理解的应用，我们建立了一个关于社会变迁的理论，其中行动者和他们的生活策略位于分析的中心。我们关注的是，当中欧的人民面对社会剧变时，他们是如何努力地保持原来的位置（stay on course）——也就是说，他们是如何重新解释

他们的经历，以及如何调整他们的世界观，从而弄懂和顺从正在激烈变化的社会逻辑的。

然而，在转向社会变迁的理论之前，我们先要了解中欧的行动者在过去的六七十年间所面对的社会“空间”或社会结构。在仅仅一代人的一生中，用来界定在社会结构中什么是“上”和什么是“下”的标准，已经被彻底地修改了多次。为了解这些变化，我们提出一个框架，它将韦伯关于“等级”（rank）和“阶级”（class）的区分与布迪厄关于“资本形式”的理论联系起来；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比较了中欧前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社会的“空间结构”。

当然，与分析这些结构的总体特征相比，本书的目的要朴实很多。这本书关注的是社会等级制的顶端。套用新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我们并不关注阶级之间的斗争，而是阶级内部，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精英内部的斗争。这并非暗示阶级之间的冲突在形塑这些社会的特征时将无足轻重。毋宁说，在这种历史性的关节点上，旧阶级和精英格局正在消失，而新的阶级还没有形成，所以关注这些精英内部的斗争才具有理论和历史的正当性。实际上，本书的一个基本点是，后共产主义的权力精英正忙于打造新的阶级——他们正在寻找新的资产阶级（而且，严格说来，还涉及新的无产阶级）。然而，塑造这些斗争的主要动力并不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主要的动力，是对他们最终试图去代表的那些阶级形成的争夺，亦即那些希望成为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的阶级。

这一对社会结构进行比较分析的中心论点是，“后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空间”与先前的分层政体是不同的，这是因为对获取精英地位、权力和特权来说，“后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是一个文化资本（教育、技能、文凭）比经济资本（财产所有制）或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的联系）更为重要的体系。然而，我们还要强调的是，后共产主义的社会关系在不同国家中的特殊形式仍然是一个开放的历史问题。统治着这些社会的精英，主要由这些执行者组成：他们生活策略的历程和全部技能，都是作为持不同政见者，或者社会主义技术官僚和管理者而发展出来的；并且我们认为，这可能会对后共产主义的执行者将要建造的资本主义类型产生深远影响。

一 延续和变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中欧，拥有财富、虔信基督，或是贵族血统，



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

都可以为一个人带来荣耀和特权。那时，如果人们想要羞辱一个人，就会叫他“臭农民”或者是“腐朽堕落的无产者”。如果你是共产主义者，那么你也只是一个罪犯。一个社会主义者、左翼分子，或是无神论者，足以引起别人的不信任和猜疑。然而，到了20世纪40年代晚期，原来的家族财富或是贵族血统却成了一种障碍。如果你来自一个错误的家庭，也就是原先的富有家庭的话，你就会遭到他人的歧视。正如某些主义者将其拒之千里之外一样，你就是“一个从错误的篮子里取出的臭鸡蛋”。你很有可能丢了工作，或者需要付出双倍于别人的努力才能获得提升。有人会劝告你从祖父母中找出或是捏造出穷苦的农民亲戚，并且把你做牧师的叔叔的照片从卧室里移走。贫农或者无产者的出身，和你共产党员的身份与对党的忠诚一起，都是通向权力与特权顶端的快速通道。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斯大林时代，即便成为一名“专家”也要受到怀疑：你所拥有的专家技术，只有在毫无疑问的“红色”出身的前提下才是可以宽恕的。

虽然20世纪60年代之后，斯大林主义松动成改良共产主义（reform communism），但地位等级制却变得更加稳固。现在，卑微的出身和共产党员的身份已经不够用了。如果你想保住那份在革命时期获得提升的工作，就需要重新回到学校，去修得一张适当的文凭。同时，对党以及党的领袖的忠诚也仍然相当重要。你会为认识党内的重要人物而自豪，也会去炫耀你们之间有着很好的关系。然而，随着国家社会主义江河日下，教育和个人的勤奋变得越来越重要，而政治因素则日渐衰微。人们开始看到，似乎他们的背景和往事——甚至是人们目前的行为——不再成为阻碍他们的因素。如果你信仰宗教，那么当你发现同事看到你进教堂时，你不再会感到窘迫不安；并且，和其他有关资产阶级的大事记一道，你做牧师的叔叔的照片可以被重新挂在卧室里。

随后到了1989年，世界又一次发生了转向。现在是“否定之否定”（negation of negation），前共产主义的强弱等级次序看起来发生了一次极为猛烈的反转。“共产主义”又一次成为一个受诅咒的词语。你要在极短的时间里忘掉你曾经参加过（共产）党，或者你会被提醒需要这样做，你要以比罗马教皇更加信仰天主教的方式作为补偿。你不再记得党委中你朋友的名字，但你要清晰地回忆起所有反共产主义的英雄行动，而你正是因为这些活动而受到处罚。如果你没能很好地掩饰起自己曾是党员的历史，或者你发现这样做事不符合你的性格，那么你会又一次受到歧

视。此外，你很有可能会丢掉工作，尤其当那是一份很重要的工作时，并且/或者你的政治经历很值得怀疑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而且，你将无法获得那些只是授予未曾入过党的同事（或者是他们更善于隐藏自己的过去）的升迁机会。还有，做富人要比做穷人更让人尊敬、更管用。再者，你可以炫耀你显赫的家庭出身。所有过去几十年间的动乱都变得徒然：历史被复原；过去的半个世纪只不过是绕了一个弯路而已。革命与反革命只是造成了表面上的巨浪，而在个人和集体经验的更深层，寂静和沉默则一直占据着支配地位。

所以，的确，“越是发生大规模的变迁，越是成了同一回事”。正如上文给出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解释那样，在中欧，没有改变的是在面对剧烈的社会变迁时社会出身的持续重要性。特别是政治纠偏和政治怀疑在范畴上的区分，仍然影响着行动者感知和划分社会世界的方式。但是同时，人们在行为和信仰上所发生的这场根本性的轮换（这已作为轶事载入历史）也表明，人类社会的弹性是无边无际的：随着人们身边游戏制度和规则的变化，绝大多数人都会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生活策略。

本章的布局就反映了这种存在于执行者和结构之间的辩证互动。在第一部分我们主要关注社会结构，通过详细阐述布迪厄关于“社会空间”和“资本类型”的思想，我们试图考察在过去的六七十年间，中欧的“社会逻辑”或“游戏规则”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尽管布迪厄本人从未在历史比较的视野下，用资本的不同类型来系统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但我们在阅读中发现，这一分析隐含在他的进路当中。我们认为，在不同的社会构成中，资本的三种主要类型——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都为塑造社会结构扮演了不同角色。我们提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资本是决定性的；在前资本主义经济中，社会资本更为重要；而在“政治指挥一切”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资本的一种特殊类型（即政治资本）是占支配地位的资本类型。运用这一逻辑，我们给中欧的社会结构拍出一组“快照”，对前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以及后共产主义社会做了比较。在本章的第二部分，当讨论发生在中欧这些不同空间结构之间的历史性转型时，我们主要关注的是行动者。正是在这一部分，我们提出了自己的向资本主义转型的理论，它是对布迪厄惯习理论的一个延伸，反对新古典经济学与当前中欧社会变迁的路径依赖解释之中存在的自相矛盾之处。



二 资本的不同类型

布迪厄对“资本”^①形式所做的概念化，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处在变化中的社会结构与中欧的行动者所采取的策略和选择之间的关联。尽管我们可以依据韦伯对等级（rank）和阶级（class）进行的区分来看待中欧发生的一些变化，^②但实际上我们认为，这些变化比这种二维的隐喻所能传达的内容要更加复杂。布迪厄对不同类型资本的区分，可以帮助我们对中欧社会逻辑中更加细致的区别进行概念化。^③

我们的分析从布迪厄对不同类型“资本”的理解开始；首先是经济资本，（然后是）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尽管偶尔地，他会使用更多的类型，比如“艺术资本”或“学术资本”等等）。当我们对社会结构这一概念进行详细说明的时候，“资本”这一概念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所谓社会结构，指的是被布迪厄称为“社会空间”（social space）的一系列社会关系：这如同在一个磁场中，空间中的定位（位置和中介）通过“电荷”，也就是通过资本的数量以及构成而得以界定。在一种比较简化处理的情况下，我们认为，经济资本可以通过财产的所有权，文化资本通过教育文凭，社会资本通过网络的密度与集中性来衡量，最后，符号资本是通过不同形式的资本可以转化为其他方面优势条件的便利程度来测量的（例如，一个“专家”的身份转化为经济财富的容易程度，或者一个人是否可以用钱来“买到”精英的地位）。

在这样一个模型下，诸如法国这样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就可以根据经济和文化这两类资本的占有情况来概括它的特征。尽管要想占据法国社会等级的前列，这两种资本都很有助益，但拥有经济资本仍然更为重要。

① Pierre Bourdieu (1984) *Distinction: A Sociologic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 114.

② Max Weber ([1915 - 1921] 1978) *Economy and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936 - 937.

③ 在第二章中，我们对韦伯有关等级与阶级的历史性做出了一个扩展性的重建。这里我们只是简单看到，如果我们赋予关于资本形式的理论以历史意义，那么，它与韦伯的历史社会学的相似之处就会变得非常明显。韦伯对社会分层的两种体系做出了严格区分：一种是通过阶级，另一种则是等级。阶级分层很明显建立在经济资本的基础之上，而等级分层的基础，要么可以被看做泛泛而言的社会资本（因此是“身份荣誉”），要么是更狭义的社会资本，例如政治资本。

在法国社会的最顶端，可以发现那些掌握大量经济资本的人，他们是有产的大资产阶级分子（grand bourgeoisie）和大公司管理者所组成的富豪。相反，那些相对于经济资本而言，获得了更多文化资本的人——比如医生、学者或者高级专业人员——根据布迪厄的理论，都属于“支配阶级的被支配部分”（dominated fraction of the dominant class）。通过对这一假设进行推演，我们可以想象一幅完整的当代法国社会的阶级图谱。在支配阶级（他们掌握了充分的经济和文化资本）下面，人们可以看到“中间阶级”，他们由那些或者拥有文化资本而缺乏经济资本（例如，那些普通的专业人士和白领工人），或者拥有经济资本却没有文化资本的人（自雇的小资产阶级）所构成。最后，在社会等级的底端，可以看到大众阶级同时被剥夺了经济和文化资本。

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反，在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经济资本的重要性最低（实际上，在社会主义早期，一个人在前共产主义时期对经济资本的所有权是一种累赘，而非资本）。作为对经济资本的替代，社会资本占据了主导地位，它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为形式，被高度制度化了。考虑到这种高度制度化的形式，我们打算引入适合于中欧前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资本”概念，来详细说明有关“社会资本”的观念。尽管在对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研究中，党员身份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但我们并不打算暗示说“政治资本”就可以被化约为党员身份。毋宁说，政治资本在这里可以被解释为社会资本的一种特定情形，亦即一种可以通过共产党的实践将其制度化的社会资本类型。在接下来的分析中，党员身份意味着获取了一个极其强大有力并且有影响的网络的成员资格。在国家社会主义的环境中，代表正式或非正式纽带的正规官方支持都特别管用。一个人甚至可以用这种网络联系来弥补其不是党员的缺陷。举例来说，干部子弟（cadre-kids）更容易被纵容，那些与情报服务机构合作的人即便不是党员，也可以在其事业上获得成功。警方认为没有必要吸收共产党员作为“线人”。并且，虽然党员可以通过党内渠道“举报”他们的同事，但当地的情报服务部门只允许招募非党员。在政治资本这方面，作为警察部门的“线人”，在功能上与党员是相同的。另外，社会资本更加一般化的形式还有可能影响中欧的分层但是毫无疑问，在整个共产主义时期，政治资本是最重要的资本形式。

接下来，我们会用这个修改了有关资本分布的理解来描述中欧社会，以及这种分布是如何随时间发生变化的。我们的核心主张是，在面对变迁



时，那些保持了其相对社会轨迹的人都拥有不止一种类型的社会资本，并且有能力在社会资产所界定的“成功”发生变化时，转化自己所拥有的资源。回顾起来，中欧社会分层的逻辑与规则在这一个世纪中已经发生了深远的变化。现在那些年纪上了五六十岁的人，都经历过至少三种不同的社会分层结构：前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以及自1989年——或者俄罗斯是自1991年——至今的后共产主义。这三种不同的“空间结构”以截然不同的升降标准为特征，因此，一个人要拥有各种类型的资本才可能在不同的时代中都保持成功。实际上，一个人要想在向上爬的道路中保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学会应对并顺利度过这些处于变动中的“空间结构”：他们要学着处置那些贬值的资本类型，获取那些增值了的资本；他们还要会如何将旧的、现在已经贬值的资本转换成新的、更富价值的资本。因此，尽管将三个时代区分开来的是截然不同的社会组织原则，但它们绝不是没有联系的。每一个多维的“空间结构”都在历史上与转型发生着关联，其中原有社会结构的要素被保留，新的游戏规则得以引入，并且人们通过努力在新的社会空间中保持自己原来的位置而连接起了新旧两个时代。

表1-1归纳出了社会结构逻辑中的差异。追随韦伯的传统，我们认为前共产主义社会是二元分层体系（dual stratification systems），它以传统封建等级秩序和现代经济阶级这两种竞争的逻辑为特征。^① 共产主义者在20世纪的40年代末期和50年代彻底消灭了这一体系，但他们制定的规则却受到这样一个事实的深刻影响，那就是发生革命的社会并没有充分发展起现代的阶级关系。实际上，虽然共产主义革命摧毁了建立在地位效忠基础上的封建庇护关系，但与此同时，国家社会主义体制却以不同性质的方式，重新援用了等级的逻辑。在这种现代等级秩序的情况之下，^② 社会主义

① 韦伯关于等级与阶级的理论包含两方面内容。其一，是他广为人知的有关社会结构的多维度观点。其二，他提出了一个关于历史发展的特殊假设。二元分层体系的概念是在他用欠发达发展议题的观点来分析19世纪晚期的普鲁士社会这一背景下提出的。在这一因果关系中，韦伯最为关注的是容克的持续支配有可能会扭曲或者阻碍普鲁士阶级关系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韦伯将普鲁士社会看做一个二元分层体系：分层的支配形式——等级——阻碍了现代阶级关系的发展。当提到二元分层体系，我们所运用的是韦伯有关等级和阶级理论的第二个意义。

② 初看起来，“现代等级秩序”似乎是一个矛盾的术语。但是，我们在这里只是想通过等级秩序表示一种社会资本占据支配地位的分层体系，因此它是现代的。换言之，我们是想将韦伯有关等级和阶级之间做出的区分与其历史框架分开，这样我们就可以将它与布迪厄对于资本类型的理解联系起来。

表 1-1 不同类型社会中社会结构的决定因素

社会类型	资本类型		
	经济资本	文化资本	社会资本
底线：现代资本主义的“理想类型”	+++	++	+ (理性的社会网络)
共产主义之前的东欧 (截止于 1948 年)	++	++	+++ (传统的地位荣誉)
社会主义的经典类型 (斯大林主义) (1949 ~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	- ⋮	+	+++ (政治资本作为 制度化的社会资本)
社会主义的改良模式 (20 世纪 60 年代中 期 ~ 1989 年)	▼ +	++	+++ (政治资本作为 制度化的社会资本)
后共产主义：管理式 社会 (1989 ~)	++	+++	++ (社会网络作为 去制度化的和 理性化的社会资本)

的庇护体系通过政治资本，以共产党员身份的形式被制度化了。同时，经济和文化资本的相对地位则急剧下跌。然而，随着 20 世纪 50 年代的斯大林主义松动为 20 世纪 60 年代的改良共产主义，文化资本作为一种次属的资本形式，其重要性在不断增加。这意味着一个人首先要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象征性道德标准，其次要有在社会主义中实现科学和技术卓越的目标。国家社会主义体制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改革也使经济资本的重要性得以复苏，但是毫无疑问，它的意义仍然排在第三位，在文化资本之后。直到 1989 年“革命”之前，政治都在中欧保持了“领导”地位，而到了 1989 年，社会结构的逻辑则又一次被改写。与先前中欧的社会结构相反，后共产主义社会是由文化资本的逻辑支配的。政治资本开始被去制度化并贬值，而大规模持有恒产的资产阶级则既没有从国家社会主义的企业中，也没有从原来的干部中涌现出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提出，那些拥有文化资本的人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后共产主义呈现一种新奇的社会关系模式，而这其中所蕴含的潜力，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



三 20 世纪中欧社会结构的变迁

(一) 前共产主义中欧的社会结构：等级与阶级的二重性

关于前共产主义中欧的社会结构，我们的核心假设是，它是以两个相互竞争的关于社会分层的逻辑为基础而组织起来的，这个社会分层就是阶级和等级秩序。这种秩序不仅和财富有关，而且教育、血统和贵族的生活方式也在起作用。尤其特别的是，我们认为，虽然权力和特权以占有传统的社会资本为基础，但这种情形又不断受到新生产资产阶级分子（他们通过对经济资本的占有而得到界定）以及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知识阶层（根据对文化资本的占有来定义）的挑战。发生在这些社会行动者各方之间的斗争和讨价还价，其后果就是在不同的国家之间，造成了现代化水平以及“开放”程度的差异。

表 1-2 描述了我们对不同国家所做的假设，突出了在前共产主义时期，中欧的不同社会受到等级和阶级的社会逻辑控制的差异程度。我们认为，在这一时期，阶级的逻辑有可能在捷克共和国最为强势，它以发育良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为特征。并且，由于捷克的知识分子有时将他们自己看做文化资产者（Bildungsbürgertum），他们作为专业人员的组织就比匈牙利或波兰更为先进。^① 在这个连续统的另一端，前共产主义的波兰则以弥散渗透性的等级逻辑，以及传统封建关系的持续为特征，这在农村地区尤为突出。相反，匈牙利最接近韦伯所说的二元分层秩序。在所有这些国家都存在形成资本家阶级的尝试，而在每一个国家，他们又都遭遇了强大贵族组织的势力。在这样的条件下，等级社会的封闭逻辑就继续在阻碍向上流动以及阶级的形成，尤其在农村，由于那里有一个相对封闭的知识分子阶层，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自身进行再生产，从而在受过教育的中间阶级中形成了文化资产阶级规划（Bildungsbürgert project）得以产生的环境。

^① 在第二章中，我们深入讨论了文化资产者的概念。在这里，请注意它是指一个中欧社会实现现代化的规划，这个规划一般是由西化了的、受过教育的中间阶级提出并实施的。

表 1-2 “一战”后中欧三个国家中的社会结构特征和
经济发展：各种假设

国 家	分层体系的特征	经济发展程度
捷克共和国	弱等级秩序；组织良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正在进行的职业化	高
匈 牙 利	特征明显的二元分层体系；弱小的有产阶级；知识阶层构成文化有产者	低/中等
波 兰	弱有产阶级；传统封建关系的持续（尤其在农村），在波兰并未建成民族国家的情况下，文化资产者的规模更小、力量更弱	低

尽管在整个这一地区，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有所发展，但传统社会资本的一些形式在中欧所有前共产主义社会中仍然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匈牙利和波兰——并且，我们希望提出，在更广泛的程度上，还有革命前的俄国——社会资本以其传统的形式建立在封建的社会等级基础上，并且在整个前共产主义时期，贵族的权力都被完整保持下来。结果在这些国家，资产阶级出现的过程都受到阻碍、侵蚀，或是进程减缓。一帮大规模的传统农民在社会边缘被再生产出来，他们基本无望实现向上流动。在政治和经济事务中，贵族占据了一些关键的支配性位置，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将受过教育的中间阶级成员和初生的持有恒产的资产阶级培养为贵族，吸引他们接近贵族的生活方式，并且将他们吸纳进传统的庇护体系。一种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独立之前的捷克社会，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奥地利和德国的贵族却被剥夺了特权，随之，现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开始形成。然而，即便在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共和国时期，等级逻辑（亦即庇护主义逻辑）也可能仍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被保留下来。

出于这些原因，我们强调，在世界上的这一地区，前共产主义的分层体系不能仅仅根据韦伯意义上的传统权威来对其进行描述。就阶级逻辑的运行这一方面来说，两次大战期间的社会空间是以经济和文化资本的重要性不断增长为特征的，这可以根据布迪厄运用的分析当代法国社会分层的理论纲要来描述。然而，这两种类型的资本，其相对重要性在欧洲的不同地方也不尽相同：在德国——以及更大范围的非德国中欧地区——经济资本扮演了一种更为温和、节制的角色，而文化资本则发挥了相比于西欧而言更为重要的作用。根据布迪厄的理论，这可以被解释为经济资本和文化



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

资本在重要性上的差异。在英国和法国，经济资本明显占据决定性的位置，而文化资本只是补充性的。相反，在德国和中欧，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重要性大致等同，并且它们得以运作的背景都是以传统的社会资本仍在持续发挥重要作用为标志。至于等级的逻辑——或者韦伯意义上的等级（Stand）的逻辑——则在继续塑造中欧社会不平等的动力机制，也就是说，传统的基于贵族生活方式的半封建社会网络仍是支配性的。总而言之，在共产主义到来之前，这些社会都以其各自的方式迈向了法理型的支配类型，但它们的现代阶级形成的过程却被大大推迟了，并且其等级的逻辑十分强势，这也证明了这些社会存在二元分层体系的论断是正确的。图 1-1 展示了我们关于前共产主义社会之社会结构的理想类型，它们根据等级与阶级逻辑的竞争而划分出不同的层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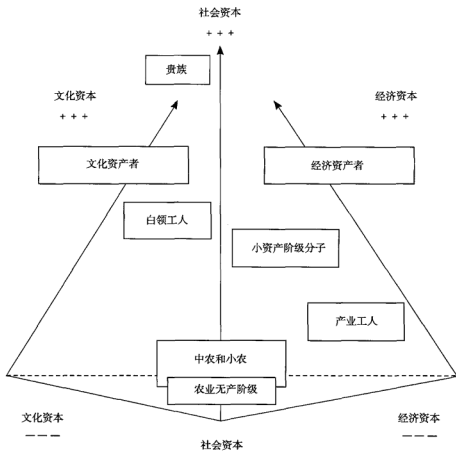


图 1-1 前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空间

（二）共产主义的社会结构：政治资本的优先性，以及文化资本不断增长的重要性

20 世纪 40 年代末期的共产主义革命废除了封建等级秩序，中断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形成的过程，而在中欧，这两个过程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开始进行了。在出现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新的分层体系中，经济资本失去了它的重要性并开始成为一个累赘。先前的有产资产阶级成员成为“阶级敌人”。与此相似，共产主义消灭了封建地主阶级，打破了贵族的政治和文化霸权。^① 甚至那些其文化资本来自前共产主义时期的人，在国家社会主义早期也受到了怀疑，尽管事实上这些知识分子站在共产主义转变的最前沿。只有那些加入共产党的人才有机会爬到社会等级的最顶端，只有那些忠诚于政治老板（political boss）的人才不被怀疑；毫无疑问，也只有那些献身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人，才可以成功地登上社会的最上层。简而言之，那些有着政治资本的人处于共产主义等级的顶端。如果那些拥有其他形式资本的人要想在新的体制中保住其原有的位置，或者在高层坐稳（或者，甚至是维持生存），他们都必须获得一些新的、增值的资本形式——这就是政治资本，亦即（在强有力的共产主义网络中）党员的身份和位置。对于那些先前掌有经济资本，或者来自显赫贵族家庭的人来说，这显得尤为正确。

在这种背景下，文化资本所扮演的角色就十分重要。由于对党及其魅力型领袖的忠诚是一种相当难捉摸的现象，所以教育文凭就成为政治价值和从属关系的一个重要指标。教育文凭（大学学位，或者在没有这一学位的情况下，完成马克思—列宁主义大学党校的学习）即便不是必需的，也是有帮助的。它们所显示的，不仅是拥有人力资本（特殊的技能与技术知识），同时也是掌握了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霸权性的象征符号。对于那些在共产主义早期没有受过足够教育却被提拔到权威位置上的人而言，至少在党校，或者专为“工人阶级骨干”设计的夜校里完成一个学位，对于他们保持自己的政治地位是必需的。但是，那些仅仅拥有前共产主义类别文化资本的人，在斯大林时代几乎没有到达顶层的机会。这鲜有例外。直到

^① 出于这个原因，国家社会主义——即便是在斯大林时代——也必须被看做迈向现代化的一个主要步骤，因为正是共产主义者发起了戏剧性的运动以废除中欧的封建等级秩序。



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

20世纪60年代中期或末期，即便是最好的医生也不会被任命为医院的领导，除非他们准备入党。这个现象，被称作逆向选择（counterselection），意思是说有能力的那些人如果不是党员，就很少会被任命到领导岗位上。总的来说，尽管文化资本在共产主义早期是有用的资产，它也是附属于政治资本的：只有在一个人拥有政治资本——通常是具有党员身份——的情况下，文化资本的价值才可以被衡量（即它的价值才可以体现出来）。

因此我们认为，早期的共产主义社会，和中欧的前共产主义社会一样，都是建立在等级秩序的基础上的。事实上，早期的共产主义体系已经被称为“封建的社会主义”，这是因为对庇护人的忠诚和对特有的世界观的信仰，都是对封建等级秩序的逻辑和对庇护主义的恢复。尽管事实上，共产主义是一种彻底的现代意识形态，而且“党国精英”（nomenklatura）的体系也渗透着那种意识形态的合理性。（但）这种类比是有帮助的，因为它突显出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等级的顶端何以更像一个“统治集团”（ruling estate），而不是“统治阶级”（ruling class）。实际上，古典斯大林主义的社会结构大概可以用二分法进行精确描述，它包括一个支配性的、类似于种姓制度下的统治集团，面对着一个与之对抗的相对固定的、被动的“大多数”。吉拉斯（Djilas）关于斯大林主义的政治官僚作为一个“新阶级”的分析极富创新性，因为他第一次抓住了在“党治国家”政治官僚和其余人民大众之间存在的这一根本利益冲突。^①然而，他在“阶级”这一表达的使用上有一些不严密的地方。斯大林主义的政治官僚在不止一个意义上不适合被称作“阶级”。它并不以一种完全“理性”的方式建立起来；它的团结和权威都建立在支持一庇护关系的基础上，所以相比于阶级，它更接近于等级，或“政治集团”（estate）——至少在韦伯主义理解这个概念的意义上来说是这样。

此外，和中世纪的神职人员一样，这个政治集团从中欧社会的各个等级中广泛招募成员，而且他们似乎在代际实现自身的再生产上存在困难。在非理性关系普遍盛行的背景之下，代际再生产的议题凸显了斯大林主义统治集团无法在理性基础，亦即社会主义规划的科学基础上建立霸权这一问题。这些再生产的问题成为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秩序不稳定的一个重要根源。很多干部子女自己并不想再成为干部：有些人成为持不同政见者，很

^① Milovan Djilas (1957) *The New Class: 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多人则选择了专业性的职业；而绝大部分人这样做都得到了他们父母的准许。因此，在大部分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干部都是从社会的较低等级中不断吸收新成员。其结果就是形成帕累托主义意义上的持续不断的“共产主义精英的循环”。苏联大概是这个规则的一个例外，“党国精英”成功地将其官僚特权传递给他们的子女。利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运用官僚主义种姓制（bureaucratic caste）这一概念，十分精确地抓住了苏联“党国精英”的这个特征。当然我们不必接受托洛茨基的整个意识形态包袱，但是我们承认，在苏维埃俄国，官僚主义的统治集团通过类似于种姓制的壁垒，将他们与社会上的其他部分分割开来。但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这种封闭的官僚主义种姓制对其自身进行再生产的能力，在中欧是有限的。

统治集团的性质，尤其是它能够实现的社会闭合的程度，由于它们从斯大林主义转变过来的方式不同，在不同的国家存在差异。在一些国家，比如在匈牙利，斯大林主义的统治集团就仿佛中世纪的教士：个人实现向上流动相对比较开放。这种相对的开放性拥有两方面的优点：一是通过保持统治集团“来自于人民，为人民服务”的形象，来维持其合法性；二是通过刺激新成员的不安全感——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依靠政治资本而迅速升迁，但他们缺乏严格的教育资历或是训练——来确保内部纪律的实施。庇护人的身份所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统治集团与“大众”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包括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在其他国家，例如斯大林主义的俄国，以及某种程度上的罗马尼亚和朝鲜，占据统治地位的官僚开始再生产自身。“党国精英”的子女们开始填补“党国精英”的位置，因此社会闭合（social closure）在官僚和大众之间不断深化。然而，作为一个自我再生产的统治集团，这种官僚制会遭遇到合法化的问题，并且在维持内部的纪律与普遍的合法性方面，会面临诸多困难。^①

（三）改良共产主义（reform communism）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后，斯大林主义的等级秩序开始在中欧的大部分地区弱化，而且随着分层体系的现代化，阶级关系继而逐渐出现。这里

^① 关于中欧社会上层阶级屏蔽的程度，更进一步的分析，可参见 Gil Eyal, Eleanor Townsley, (1995) "The Social Composition of the Communist Nomenklatura: A Comparison of Russia, Poland, and Hungary". *Theory and Society* 24 (5): 723 - 750.



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

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存在于主导性的等级秩序和新生的阶级分层力量之间的紧张。这种紧张使我们回忆起关于前共产主义二元分层体系的讨论，以及韦伯主义有关冲突的等级与阶级逻辑的分析：在前共产主义以及改良共产主义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等级秩序，和朝向阶级形成的各种力量，以及分层体系的理性化，都是对立的。然而，这种相似性不应该被过分夸大。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官僚，不同于容克，不能够吸收或者扭曲市场的力量。毋宁说，它在法律上限制了第二经济的活动，又为政治合法化而利用了第二经济的存在。回顾过去，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当社会主义的政治官僚面临理性化的挑战时，比起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中欧贵族，它遇到的抵抗要小得多。贵族的统治仅仅在两次世界大战和革命之后就被颠覆了，而社会主义政治官僚的统治到 1989 年才刚刚消失。

晚期斯大林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其新阶级的形成遵循两种不同的轨迹：第一，从 1960 年的早期到中期，从享有盛誉的和强势的职业中间招募精英分子的原则已经普及开来。尽管政治资本仍然是向上流动的支配资源，但文化资本或人力资本所具有的重要性大大超过了从前，并且其价值在成比例地增长；第二，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到晚期，新获得的经济资本在制造社会不平等方面，开始发挥作用。

在匈牙利，这两个变化的过程都十分明显。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后，卡达尔（Kádár）政权有意识地为党和国家的官僚体系招募最有才能的年轻大学毕业生。在社会地位的提升上，共产党的党员身份、相关联的社会网络，以及忠诚，这些都依然重要；但没有政治资本却获得提升的情况，在这个时候开始变得可能。一个人即便不入党，也可以成为主任或是正教授，并且在共产党的干部中，资历优秀的专业人员所占的比例也在增加。

发生在其他国家的变化都与匈牙利模式有着相似之处。波兰——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的南斯拉夫——是最接近于匈牙利模式的，而罗马尼亚和苏联是最不同的。在爱德华·格瑞克（Edward Gierek）统治的早年，亦即 20 世纪 70 年代，波兰的体制就最接近于匈牙利的模式。这时持专家治国论的知识分子，正通过“另一个波兰”（second Poland）或者“第二次波兰工业化”的意识形态，而在选举中大获成功。捷克斯洛伐克在 20 世纪 60 年代也转到了匈牙利的方向，但是在 1968 年，捷克持专家治国论的改良知识阶层被镇压，并且再也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在俄罗斯，党曾经多次尝试与持专家治国论的知识阶层合作。第一次发生在 20 世纪 20 年代早期和中期，

亦即十月革命后不久。赫鲁晓夫的改良措施打开了旨在争取知识阶层的新篇章，而当这些措施最终都被勃列日涅夫抛弃的时候，改革又在戈尔巴乔夫的带领下重新生气勃勃地开展起来。那么中欧的这些后斯大林主义的改革，其结果如何呢？

第一个结果就是社会主义等级秩序的弱化。虽然社会主义的政治官僚和新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之间达成了一种暂时的妥协（modus vivendi），但在处理由文化资本的持有者（即知识阶层）所带来的挑战时，他们却遇到了更多的困难。斯大林主义的官僚阶层严重依赖纯粹的高压政治和领袖的卡里斯玛魅力，以此来维持他们的权力。随着后斯大林时期的改革带来文化资本价值的上升，政治官僚权威的这两个来源开始被削弱。在寻求合法性的过程中，后斯大林主义的政治官僚靠向日益强大的持专家治国论的知识阶层，其方式很多都与阿尔文·古尔德纳（Alvin Gouldner）在《知识分子的未来自新阶级的兴起》一书中曾预言的一样。^①官僚主义的统治集团试图招募技术专家知识分子——实际上，试图吸引整个知识阶层——来寻找有能力的干部，他们可以证明社会主义社会规划的理性、科学性，并且依靠自身的能力来实现这个目标。就知识分子接受官僚制的破灭这一点来说，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到晚期的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曾形成过一个新阶级。然而，正如吉拉斯所预期的那样，这一新阶级并不只是孤立地扎根于斯大林主义的政治官僚中。实际上，新阶级开始形成于政治官僚和专家治国论者的融合之中，并且开始重新定义“科学社会主义”的规划。新阶级的目标在于，通过“科学技术革命”，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的理性化”。新阶级在努力建立一个“有着人道主义面孔的社会主义”，以其取代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专制。在 20 世纪 60 年代晚期及 70 年代早期，这种思想都是不切实际的，但随后不久，从社会主义的等级秩序到社会主义的阶级分层的转变就开始进行了。^②

指向这一新阶级形成的各种力量，以及从社会主义等级秩序到阶级分层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都曾真实存在，但最终，这个计划却失败了。政治官僚于 20 世纪 60 年代晚期和 70 年代早期发动的一场反对专家治国论的

① Alvin Gouldner (1979) *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Class*. New York: The Continuum Publishing Corporation.

② Konrád, George and Iván Szelényi (1979) *The Intellectuals on the Road to Class Power*. New York and 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反击，封锁、破坏了中欧所有地方的新阶级规划。这在1968年8月之后的捷克斯洛伐克最为明显，不过类似的趋势也在东德和波兰蔓延，并且最终扩散到了匈牙利。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新斯大林主义等级秩序的刻板僵硬大概要为新阶级规划在整个地区遭受失败负根本责任。不过，这些失败的规划也留下了它们的痕迹，因为官僚制不得不依靠文凭来作为他们招募精英职位的标准。因此，在一些方面，官僚主义的胜利被证明是一种付出了极大代价而获得的惨胜，因为国家社会主义的精英正在日益变得“知识分子化”（intellectualized）。

其他的前斯大林主义改革度过了新阶级规划失败的难关而继续存活下来。1963~1964年，匈牙利的卡达尔政权不仅尝试招募知识阶层，而且还对工人阶级做出了让步。对工人做出的最重要让步，就是容忍政权朝“第二经济”扩展。政府职员被允许在规定的工作时间之外，参与到类似于市场的商业交易中，他们还被准许在私营的家庭组织中工作。结果，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出现了两种可供选择的提升社会地位的方法：一个人可以通过在官僚主义的阶梯中努力向上爬而出人头地，但是还有另一种，就是学会掌握新生的市场规则。布达佩斯的中上层阶级地区最好的别墅，和这一时期建造在郊区里的那些最漂亮的住宅里面，住的都是两类人：一类是干部，尤其是高级官僚和成功的专业人士；另一类就是小的兼职私营企业主。一个新的社会“阶级”正在形成。位于传统的自雇佣小资产阶级和古典的无产阶级之间的新行动者，已经登上舞台。这些人一般都在公共部门拥有一份全职工作，但同时又又在私营企业中担任兼职以赚得可观的收入。人们也可以在军事管制法（Martial Law）颁布之后的波兰观察到类似的趋势：当雅鲁泽尔斯基（Jaruzelski）试图与进入权力精英行列中的技术专家知识分子合作时，这就成功地催生出了一个半私有部门，并且容忍了一个大规模的第二经济（或者说地下经济）的发展。

1968年之后的捷克斯洛伐克，则与匈牙利和波兰相反，它以新斯大林主义的社会秩序为特征。^①在“布拉格之春”——它类似于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的匈牙利和波兰的改良共产主义运动——遭到镇压之后，官僚集团又强有力地重建了他们的霸权。很显然，政治官僚无意对知识阶层做

^① Victor Zaslavsky (1982) *The Neo-Stalinist State: Class, Ethnicity and Consensus in Soviet Society*. Armonk, NY: M. E. Sharpe.

出妥协，而当时的捷克政体，也不同于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并没有通过放开第二经济而对工人阶级做出让步。实际上，从 1968 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晚期之间，捷克斯洛伐克的支配体制一直以“新斯大林主义的家长作风”为特征。社会和平一方面通过高压政治，另一方面则通过由国家保障的完全就业、物价稳定和对基本消费品的合理供应来实现。批评者通常会强调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在这一时期的强制特性，并且的确，相对于匈牙利和波兰的政权，它对持不同政见者要苛刻得多，也很少关注受到侵犯的公民权利。然而，胡萨克（Husak）政权所能够提供的稳定、安全和相对平等，确实为新斯大林主义权威相对合法的行为提供了基础。相反，随着匈牙利和波兰体制改革中市场改革的深入，它们的社会不平等加剧、通货膨胀显著、贫困开始蔓延。反观他们的邻居，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认为自己在经济上的境况要更好一些，但在有些方面，则是邻居们要更好。

因此，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与经典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相比，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的结构变得更加复杂。在大多数国家，占有政治资源仍然是享有权力和特权的主要来源，但文化资本的相对重要性在增加，逆向选择明显减少，而且经济资本的所有权在塑造生活机会方面开始扮演重要角色。需要注意的是，经济资本与政治权力的分配之间，仍然只是存在微弱的关联，并且在改良共产主义中社会地位的升降方面，就诸多因素的重要性而言，很明显，经济资本依然位居“老三”。然而，尽管存在这种复杂性，这些社会仍然是二元分层体系，有一个占据了支配性地位的等级秩序的逻辑，和一个处于从属地位的阶级分层的逻辑。图 1-2 展示的就是我们提出的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类型。

（四）后共产主义的社会结构：政治资本的贬值，以及文化资本成为最重要的资本形式

有很多的理论流派都在讨论，在共产主义垮台之后，哪些社会群体将会处在从市场转型中获益的最有利位置上。“市场转型理论”^①以及对社会主义企业家的研究^②提出，在向资本主义的转轨中，共产主义晚期的第二

^① Victor Nee (1989)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 (5): 663-681.

^② Iván Szelényi (1988b) *Socialist Entrepreneur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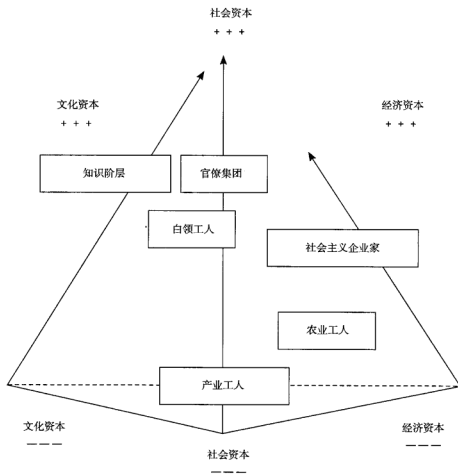


图 1-2 改良共产主义的社会空间

经济中的那些成功者或许获得了最大的收益。相反，政治资本主义理论质疑道，原来的干部最成功地将国家社会主义的特权转变成为经济资本。^①与这两种理论都不同，我们主张的是，文化资本成为后共产主义时期占支配地位的资本形式。统治后共产主义社会的是一个联盟，它由专家治国论者和管理者（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占据了较高位置），以及那些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为共产主义垮台做出贡献的前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所构成。

^① Ákos, Rona-Tas (1994) "The First Shall Be The Last? Entrepreneurship and Communist Cadre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0 (1): 40 - 69.

图 1-3 展示了我们提出的有关后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类型。它表明，尽管在 1989 年共产主义垮台之后，经济资本的重要性已然上升，但就决定谁将在新的后共产主义社会形成过程中掌握权力和特权这一方面而言，它的重要性依然无法与文化资本相提并论。另外，我们发现，政治资本在这一转型的过程中，明显地贬值了。尽管形成于共产主义时期的、去制度化（de-institutionalized）的政治网络可以帮助一个人上升到后共产主义社会结构的顶端，但这些网络也只有在这个人同时掌有文化资本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换言之，在后共产主义的网络中，原先在共产主义网络中的位置只是一种附属和依附性的资本形式，这和共产主义时期，文化资本作为政治资本之补充的情况非常相像：一个人只有在被很好地赋予了根本、首要的资本形式时，其附属的资本形式所具有的价值才可以被衡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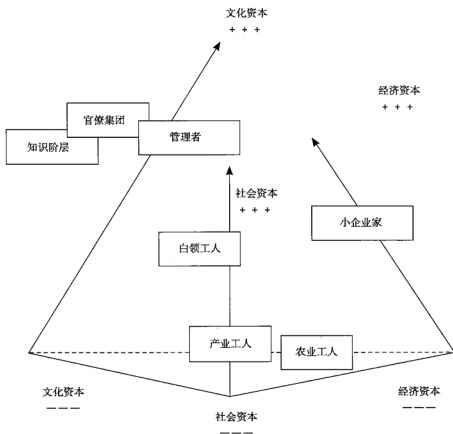


图 1-3 后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空间



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

这些变化——政治资本的去制度化和对文化与经济资本的重新评价——成为这些社会的特征。在这些社会中，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实质性调整，以满足一个按照市场原则来整合的经济体所必需的条件。^① 迄今为止，这一转变过程中的主要赢家就是那些受过优质教育的中年男性。这个群体中的成员最不可能失业，并最有可能成为自雇佣者。而且，如果这些人来自在前社会主义时期就做买卖的家庭，或者如果他们在1988年的官僚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那么，他们就很有可能经营有雇工的小规模交易，从而成为那些有着高收入并进行资本积累的自雇佣者中的一员。另外，在收入最高的群体中，受过教育的中年男性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尽管他们在1989年之前就已经做得很不错，但在后共产主义的转型增加了社会不平等的情况下，就意味着这一群体的相对优势也同样得到了加强。

在这一背景下，本书最有争议的论点之一就是，我们几乎找不到证据来支持“政治资本”的命题。原先的共产党员似乎已不再那样举足轻重，而且，如果一个人控制了成功所需的其他决定性因素，比如教育，那么原先的党员身份就不再重要，或者对于那些希望成功的人来讲，它也不再是劣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观察到，转型中的主要失利者就是那些在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下，依赖他人的受庇护者。那些到了50岁左右受过较少教育的人，尤其是那些在国家社会主义之下严重依赖国家补贴的经济部门中工作的人，到1993年的时候，都面临着严峻的危机。在后共产主义情况下，40多岁的人收入最高——这与市场资本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经济不同，在那里，个人的工资收入会再晚十年才能达到最高——很多男人和女人在他们50岁的时候发现，他们已经很难，或者是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换句话说，这些国家社会主义的受庇护者没有接受过什么教育，他们很难将自己先前有价值的政治资本转化为在当下有价值的文化和经济资本。这些人的确是共产党员，但却没受到什么特殊照顾；他们党内的同志们只有在他们具备了市场环境下有用的技能时才会援助他们，这都是因为原先的党员身份在实质上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

除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受庇护者之外，国家社会主义的“中间阶

^① 有关变化中的雇佣模式、从自雇者中招募新人以及社会不平等结构变化的不同模式，这些方面的数据，可参见 Eric Hanley and Iván Szélenyi (1996) "Changing Social Structure during Market Transition: The Case of Central Europe". Paper presented to the workshop on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the Reform of the State*.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级”——那些因为参与第二经济而获益的人——也在 1989 年之后的转型中失去了相对优势。他们在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在 1989 年之后实质上是降低的。而且，中间阶层和底层之间的差距在缩小，而中间阶层和顶层之间的鸿沟却在扩大。穷人变得更加贫穷，但后共产主义最令人吃惊的新情况却是，原先并不那么穷的人现在也变成了穷人。^①

最后，来看那些在共产主义时期掌握了最多权力和特权的人，我们发现他们也在转型过程中分化成了胜利者和失败者。最大的赢家就是那些拥有高水平文化资本的人。如果这些人恰巧在共产主义时期占据了精英的位置，如果他们年轻，尤其是如果他们从未加入任何政党，那么的确，他们就很有可能做得非常好。即便原来是党员，如果他们受过很好的培训，那么党员身份现在所制造的阴影也可以被抵消。但与此相反的是，共产主义时代精英中那些更为年长的成员，却有可能成为最大的失败者中的一员。这并不是说他们会变得贫穷，而是他们的影响力会大为减弱并且特权也会减少。他们是（旧时代）精英中那些不具备适当教育文凭的人。他们以工人阶级的背景被提拔到干部队伍中，在专门的党校中拿到“软”文凭。到 1989 年时，这个群体中的大多数人都已经到了退休年龄，而即便他们没有，很多人也都被打发、或是自愿提出退休，尽管事实上，如果共产主义不垮台的话，他们还可以再继续工作更长的时间。

① 对于女性而言，故事会更为复杂，因为性别与后共产主义机遇交叉的方式，与其在成熟资本主义之下不同。一般来说，在国家社会主义之下，妇女会获得比在成熟资本主义之下更好的教育，而且其平均受教育水平也会优于男性。妇女同样也较少加入共产党。但是目前，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人力资本开始升值，而政治资本影响骤降。在这种背景下，似乎妇女因转型而受到的痛苦比起其他原因带来的伤害，还是要轻一些 [可参见 Éva Fodor (1997a) "Gender in Transition: Unemployment in Hungary, Poland and Slovakia",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11 (3): 470-500; Éva Fodor (1997b) *Power, Patriarchy and Paternalism: An Examination of the Gendered Nature of State Socialist Authority*. Ph. 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CLA]。比如在匈牙利，1993 年时，女性与男性相比，失业的可能性要低，或者不像男性那样不得不选择提前退休。而且，性别因素似乎也并没有影响到捷克共和国或斯洛伐克的女性选择继续工作。波兰是唯一的例外。在那里，对于在转型期继续保持工作而言，妇女的身份具有负面影响。这大概是由于天主教徒所宣扬的保守的家庭价值观，导致妇女被排挤出劳工队伍。但是，尽管现实是男性继续保持优势，但女性在后共产主义时期并没有轻易放弃。几乎是在偶然间，她们发现自己拥有的资源——教育，以及不曾作为党员的历史——具有很高的价值，似乎这能帮助妇女相对容易地在后共产主义转型中生存；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整个中东欧地区，女性带薪工作活动 (women's paid work activity) 的其他物质支持都受到了威胁。这其中包括由国家提供的儿童看护服务，以及得到可靠的避孕、生育和堕胎服务的途径。



总之，文化资本在后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中占据了支配地位。大体上，胜利者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年男性，尤其是那些在工程学和经济学方面受过训练的人。当然，最大的胜利者还是旧共产主义统治集团中那些专家治国论者，尤其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被提升到干部队伍中的那些人。20 世纪 80 年代，在安排行政管理人员时，技术能力的重要性就已经超过了对党的忠诚。这些人拥有后共产主义的支配性资本——文化资本——并且因此，他们有能力将原来的政治资本转换为后共产主义时期有价值的资源。与他们形成于共产主义时期的、已经被去制度化（但是仍强有力）的社会网络相结合，这些人得以极其成功地维持了他们的社会位置。与此相反，最大的失败者则是国家社会主义秩序下的那些受庇护者，他们既没有培养起适应市场的技能，也没能钻在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由于公共部门的软预算约束而产生的漏洞（并借此获益）。这些人在新的市场环境下处境艰难。他们在官僚制下的庇护人也同样遭受了失败。这些官僚或许没有滑落到社会等级的最底端，因为似乎还有一个安全的网络在保护他们，它的主要形式就是政党网络、共产主义时期合法或非法的财富积累，以及偶尔会有的、可观的退休金。但是很明显，随着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的解体，很多人发现，将旧的政治资本转化为新的、更具价值的资本的难度正在不断加大。

至此，我们已经对不同时间点上，中欧社会结构的各个“快照”进行了比较。现在我们将转向对转型的讨论，我们会提出一个关于社会变迁的理论，来捕捉在跨越了不同时段的中欧，在完全不同的社会空间中多样化的转型过程。

四 关于社会变迁的理论

面对发生在中欧的社会转型，连续与变迁的社会事实向我们提出了基本的历史问题，这些问题至今仍在寻求令人满意的答案。哪些个人和群体成功地度过了不同时期社会结构间的转换？他们得以成功度过的方法和原因是什么？特别是，谁在经历过这段时期之后跃升到了社会等级的顶端，而谁又经历了向下流动？这些问题对于后共产主义的转型具有很深的政治重要性：它们揭示的是（这些个人和群体）将采取什么样的途径；将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和决定；以及，在这场于共产主义废墟之上建立资本主义的战斗中，谁将会成为赢家，而谁又会败北。而且，作为社会学家，我们相

信，除非我们了解这个世纪的中欧社会变迁何以发生，以及为何发生，否则我们对未来将要发生什么会一无所知。

正如我们一开始所说的那样，尽管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但仍然有一个连续性的因素在这些变化中贯穿始终。我们的出发点，是认识到人们想要保持其“原有轨迹”。这意味着，在快速的社会变迁这一背景下，人们热衷于使其投资变得多样化，并且将他们的资本转化为新的、更具价值的资本形式。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会调用他们有关什么是游戏规则的理解——也就是说，当他们试图理解变化中的社会结构时，会受到其惯习的引导。正如我们前面的“快照”所表明的那样，中欧社会结构最持久的特征就在于，一直到后共产主义时期，社会资本以其所有不同的各个形式占据了相对优势。用此可以解释中欧社会起源的困扰。尽管游戏规则会因人而异，但在每一个接替的社会结构中，有关社会起源的问题——过去的联盟，过去的同谋，以及经常不可言说的理解——都会以一种突出的方式出现，目的在于“弄明白变迁的意义”，亦即理解特权的新标准，并在新近变化着的环境中设计出最安全的轨迹。

（一）进化或者内卷：关于社会变迁的理论

现有的关于中欧社会变迁的理论并不能抓住我们上面所讨论的独特悖论，那就是，在大规模社会变迁中存在的奇怪连续性。事实上我们发现，中欧社会变迁的动力机制要么被看做是进化，要么被看做是内卷，但从来没人认为二者都有道理。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家——以及很多为西方报纸工作的记者——和很多（如果不是大多数）后共产主义的政治家认为，这一地区处在一个进化的轨道上，是在从落后的共产主义通向进步的资本主义。这种观念来自这样的观察，即国家财产已私有化，劳工和资本市场已经建立，并且中欧的经济也已经向外国市场开放。支持者声称，资本主义正在被有意识地建立，并且也不再会有社会“实验”。现在的事情很简单，就是认真拷贝西方市场资本主义运转良好的各项制度。中欧或许还没有到达所有社会的共同终点，但是通向自由资本主义的这趟列车已经驶上正轨。随着“正确”的制度一一落实，将不再有什么障碍阻挡通向西方模式的市场社会的进程。这一论点的前提是，人类会学习和适应，他们是理性的，并且他们在进化。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有了“正确”的激励结构，人们就会成为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市场行动者。尽管社会转型产生的震动有可能会使一些社会指标（比如就业、工资等等）暂时走低，但这一转

型过程肯定会很快结束；中欧很快就会享有健康、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具备的所有好处和优势。历史的终结已然近在眼前。

其他后共产主义转型的观察家则强调了连续性。仇外的民族主义者，例如楚尔高（Csurka）、米洛舍维奇（Milosevic），或是麦恰尔（Meciar）^①，都对此满怀自豪。他们主张，中欧能够抵挡住世界大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毒害，他们赞成保存自己的文化，这种文化优于西方的商业文明。而其他人——那些被步伐迟缓的变迁唤醒的自由主义者——则与暗含怀疑的论调保持了相同的观点。在提摩西·贾顿-阿什（Timothy Garton-Ash）看来，1989年只是一场“慢速革命”（refolution）^②；或者，用戴维·斯塔克的话来说，中欧并非处于从再分配向市场过渡的途中，而是正在经历一个“从计划向宗族”（from plan to clan）的转变。^③旧的权力结构同样被复制。“通常的可疑分子”（usual suspects），亦即那些老共产主义者，依然将权力和特权带入了后共产主义的转型中。关于干部而不是资本主义企业家成为私有化主要受益者的分析支持了上述论点，^④尽管先前有理论指出，第二经济中的企业家占据了利用市场改革优势的最佳位置。^⑤后共产主义社会并不是“在社会主义的废墟上”建立资本主义，而是“利用社会主义的废墟”来建立资本主义。这正是斯塔克所提出的，后共产主义的转型是路径依赖的含义所在。^⑥他认为，如果我们的分析始于目的论的假设，即“向市场资本主义的转型”正在发生，那么，我们可能会对转型的动力机制提出错误的问题。他提出，要分析各个国家不同的私有化进程，确定哪些来自旧的所有制结构和制度安排的因素被整合进了新的结构和制度中，而不是寻找一个新生的资本家阶级。简而言之，斯塔克强调，尽管共产主义

① 楚尔高是匈牙利极右翼政党“匈牙利真理与生活党”领导人，米洛舍维奇系原南联盟总统，麦恰尔是斯洛伐克民主运动党领导人，曾任该国总理。——译者注

② refolution = revolution + reform，按照朱学勤先生的说法，该词可译为“快速改革”或“慢速革命”。——译者注

③ David Stark (1990) "Privatization in Hungary: From Plan to Market or from Plan to Clan?"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4 (3): 351-392.

④ Elemér Hankiss (1990) *East European Alternativ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Jadwiga Staniszkis (1991a) *The Dynamics of Breakthroug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Iván Szelényi and Szonja Szelényi (1990) "Az elitek cirkuációja?" (Circulation of elites?) *Kritika* 10 (October): 8-10.

⑤ Nee,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Szelényi, *Socialist Entrepreneurs*.

⑥ David Stark (1992) "Path Dependence and Privatization Strategies in East Central Europe".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6 (1): 17-51.

在中欧仍留有遗迹，但主要的制度变迁也已经发生。中欧社会遵循的是一条路径依赖的内卷道路，而不是一条直接的、朝向共同和既定终点的进化路线。^①内卷，并不意味着就不存在变迁。它只是说明，与其说社会和社会行动者是在经历进步或者进化，不如说他们运用旧的观念、行为和社会逻辑来适应新的环境。

后共产主义社会变迁是进化还是内卷？我们对这一场正在进行的争论的观察，来自斯塔克的结论。他认为，对后共产主义转型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实是，资本主义正在一个刚刚经历过共产主义统治的社会中被打造。在新古典进化论和路径依赖的辩论中，我们更倾向于后者的立场，但我们也试图在一些方面超越它。尤其是，我们想要通过将行动者置于分析的中心，来综合新古典和路径依赖关于变迁的解释。我们对个人和集体行动者（例如阶级或精英成员）进行概念化，作为行动者，其行动受到制度特征的影响，他们习惯在制度体制下做事（因此变迁是路径依赖的），但他们同时也在学习适应由外部变迁所带来的挑战（因此这些行动者也承受着进化的压力）。塑造这些行动者生命轨迹的，是他们将自己放到与其他行动者竞争的位置上的能力，他们的这些竞争者，其位置也许唾手可得，也可能出钱购买一个渴望已久的新社会位置或是刚刚被腾出来的职位。所以我们建议，研究社会变迁需要分析我们所说的“轨迹调整”（trajectory adjustment）或者是“轨迹校正”（trajectory correction）的过程。我们认为在这个联系中，那些最有能力调整自己的轨迹，从而成功满足社会变迁需要的人，就是那些拥有最多样化资本形式的人。因而，连同新古典理论一道，我们认为的确存在进化的压力：存在各种制度或行为的模型，在新的后共产主义情境下，它们被人们复制或采用。我们同样也认可路径依赖理论的基本观点：过去制度与行为的遗迹可以影响后来的制度。社会行动者在面临新的情境时，会受到过去“他们所知道”的东西的诱导。简而言之，人们会适应路径依赖的方式。因此，轨迹调整的观点，看到了同时在起作用的两种力量，并且在这其中强调了行动者，或说能动作用（agency）在沟通这两种力量上的重要性。我们认为，行动者已然面临新的挑战，他们正

① 关于内卷化的概念，可参见 Clifford Geertz (1963) *Agriculture Involvement: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hange in Indonesia*.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hilip Huang (1990) *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350 - 1988*.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在旧的制度约束中行动，并会提出富有创新性的答案。

由此可知，从后共产主义社会中将会产生什么样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这仍是一个未有定论的问题。它将取决于社会行动者在历史上偶然性的斗争，而这些行动者做事的方式，都深深地扎根在社会主义当中。出于这个原因，我们认为，即便是最为普通的假设——即一个由私人有产者构成的阶级必然会在中欧出现，并且它将与西方的对应角色发挥相同的功能——都应该受到批判性的详细考察。实际上，（中欧）私有化的进程不同于早期资本主义的形成，它或许是一个独一无二（*sui generis*）的现象，与发生在1989年之前的强势社会行动者之间的讨价还价和斗争有着更为密切的关联。以此为基础，我们发现，那些关注后共产主义制度发展的路径依赖取向的文献，几乎不探究转型的执行人如何完成建造后共产主义社会的任务。正是这些执行人而不是资本家打造了中欧的资本主义，他们曾是共产主义时期的管理者和技术专家，或者是原来的异议分子。^①我们相信，这对于他们如何引导后共产主义的转型，有着深远的影响。除了分析财产权并且将当前的安排回溯到国家社会主义的制度上之外，我们建议，同样还要研究这些转型的执行人，以及他们如何协调共产主义的衰落和后共产主义制度的兴起。简而言之，我们分析的中心就是要对后共产主义转型中，发生在行动者与结构之间的互动给予历史性的强调：执行者和制度都同样重要。

从这个立场出发，我们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及其理性选择基础的主要缺陷，就是它对人类行动的非历史性理解。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人们可以被剥去他们的生命历程和从前的经验，他们被假定是自利的人，并且自动发挥理性；他们收集关于成本和收益的信息，在付出最小代价的情况下追求利益最大化。如果你想以此为前提来建设资本主义，那么政策处方就是改变行动者所面对的机会设置，让它变成支持人们创业、以市场为导向

^① 由于这个原因，有关中欧转型过程中的私有化的核心问题或许就不是由谁占有了什么？而是由谁控制了什么？如果经济资本确实并非后共产主义社会关系中的决定性资本，那么上述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实际上，在大资产阶级缺席，而人们对共产主义者和政治又失去信任的情况下，文化资本——表现为特殊的技能或人力资本，以及掌握了有关市民社会和货币主义的新话语——就有可能成为后共产主义的支配性资本。在早先的著作中，我们给出了这方面的证据：在当前，正是管理者阶层使用的文化资本，而不是资本家阶级使用的经济资本，控制了后共产主义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制度。可参见 Gil Eyal, Iván Szelenyi and Eleanor Townsley (1997)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 The Theory of Post-Communist Managerialism". *New Left Review* 222 (March-April): 60-92.

并且受利益驱动。这一理论模式并没有被考虑过，在后共产主义转型中，个人的选择也有可能是受非理性认识驱动的，它由历史塑造，并嵌入在社会当中。^①

至于依据路径依赖的模型，问题又有很大不同。这一传统中的理论和研究对国家社会主义和后共产主义社会结构之间的连续性比较敏感。然而，路径依赖理论在对制度的连续与变化进行强调的同时，却有一种低估行动者角色的倾向，而恰恰是行动者在以新颖且具有历史偶然性的方式塑造着制度变迁的过程。政治资本主义的理论在这个倾向上甚至走得更远：将腐败和欺骗作为界定转型的特征。^② 尽管腐败毫无疑问已经孳生，但我们很怀疑它是否就是关于后共产主义转型的主要叙事。人们在关注社会再生产时所忽视掉的东西，恰恰就是问题所在：对共产主义特权转化成后共产主义特权来说，它得以发生的制度和历史条件是什么？不管是政治资本主义理论，还是路径依赖模型，都没有在分析中注意到行动者和社会结构之间互动的动力机制。所以，尽管我们在大轮廓上同意斯塔克对“转轨学说”（transitology）的批判，但我们想要在路径依赖的思想上加一个维度，这个维度认为人们的世界观、生命历程和社会结构在根本上是相互联系的。

接下来，我们会用布迪厄有关惯习和资本的概念来发展这一理论，从而试图抓住实践、世界观和社会结构之间的根本联系。我们想用图表说明，在意识形态上宣传的中欧“革命”其在“底层”所展开的那种“延续性”（continuity）；我们想讲述一个在快速变迁的社会空间中，人们如何挣扎着保持他们原有位置的故事。

（二）惯习

在 20 世纪后半叶的中欧生存，就好比在外层空间旅游，要试着标出一个安全的位置；你常常会对起伏之处无从知晓，也对终点一无所知，甚至到底是否有一个终点存在都不确定。学习如何应对、顺利度过这陌生且变

① 理性选择理论或许会这样回应：如果一个理性选择的基础，是这样一种历史体验，它涉及制定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决策，或者追求利益最大化这方面的最优选择，那么，它就是理性的。这里我们希望强调的是，对行为最大化的行动者来说，国家社会主义人生经历所产生的效果，有可能给他们留下非理性的、不必立刻获得回报的深刻烙印。换言之，也许有一个强大的文化烙印，使得单纯的算计过程落空。

② Roman Frydman, Kenneth Murphy and Andrzej Rapaczynski (1996) "Capitalism with a Comrade's Face". *Transition* 2 (2): 5-11.



动不居的环境，最后会加强你的自信。你以不变应万变。如果有可能，你会重写你的生命传记，就和“好兵帅克”（Schweik）卖的，他所撰写的混血儿的家谱一样。^①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重新解释那些由社会评价（social judgment）组成的、约束了他们生活的客观类别。当我们试图在概念上对中欧的这一过程进行解释的时候，我们发现布迪厄解决客观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悖论的进路颇有吸引力。布迪厄有关社会结构是一个“移动空间”（traveling space）的观点与我们想要描述的经验现象非常吻合。在这个空间中，社会行动者并不需要一定对他们的终点（命运）有着“正确”的预测，也可以顺利通过并努力保住其原有的位置。^②

一方面，布迪厄将社会结构概念化为一个多维的空间，拥有各种不同类型资本的个体在其间不同的轨道上活动，参与到其中的分类斗争中去，从而就位置、边界以及集体认同的社会意义进行讨论还价。^③由此可以断定，被社会学家称为阶级的，往往只是“纸上的阶级”（paper classes），其边界都是由社会学家在阶级地图上划定的：它们最多也只是关于集体行动者或者认同有可能在哪里形成的一些假设。通过这一方式，布迪厄试图超越传统思考阶级的“客观主义”方法，在他看来，那种思路带着典型的马克思主义的特征。但另一方面，布迪厄也要避免陷入“建构主义”的泥潭，在那种思路下，诸如阶级这样的社会现象只存在于“旁观者的眼中”。尽管布迪厄强调由社会学家划定的社会阶级只是纸上谈兵，但他也主张，我们所研究的社会空间是真实存在的：围绕实际的位置和性情倾向，阶级得以形成。社会行动者（social agents）和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ships）之间的互动既彼此建构（constitue）又互相对抗（confront），这一思想正是布迪厄吸引我们的地方所在；面对中欧那些走过了这个喧嚣世纪的人们，我们尝试着将他们一生中变化着的社会结构的动力机制概念化。

在布迪厄力图避开客观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的陷阱方面，关于惯习（habitus）的思想非常关键。并且我们认为，对于我们以一种新颖且富有经

① “好兵帅克”是捷克作家雅·哈谢克创作的一个著名小说人物，帅克生活在“一战”时期的捷克，但被奥匈帝国强征入伍。在那样一个动乱的年代，由于处在劣势，他表面上唯唯诺诺，屈从效忠，甚至口呼“万岁”，内心却充满了鄙夷和憎恨，从而采取种种使反动统治者哭笑不得的方式进行抵抗，经历了一系列荒唐可笑的故事（参见雅·哈谢克，2001，《好兵帅克》，萧乾译，译林出版社）。——译者注

② Bourdieu, *Distinction*, pp. 169, 244.

③ Bourdieu, *Distinction*, pp. 169 - 170, 244 - 245.

验的方式来思考行动者和结构之间的相互依赖，它也是特别有帮助的。布迪厄将惯习定义为“结构形塑中的结构”（structuring structure）。^①一方面，它是客观的社会关系在身体上的内化，对它的体验来自在社会空间中占据的一个特定位置。另一方面，这些关系又成为“实践的生成性法则”（generative grammar of practices）——也就是说，是阶级和群体间生活方式及观点一致性的来源。^②通过让人们含蓄地掌握“游戏规则”，惯习从而引导着个人的生活方式。一个人惯习的形成始于其幼年时期，是随着他将其家庭在社会空间中的“客观”位置，以及他的“阶级出身”进行内化而实现的。随着其性情倾向的不断稳固，惯习就可以帮助人们以一种无意识，或者是非理性的方式来应对社会生活：当我们对选择不假思索的时候，当我们只是听从“内心的声音”（inner voice）来辨别是非的时候，我们恰恰是受到了惯习的引导。

关于惯习的理论代表了对“理性选择”理论关于社会行动的解释最重要的挑战之一。理性选择理论假设，当个人面临选择的时候，他们会进行理性的计算。但如果在日常实践中，我们是受到惯习的引导，可能并不会去尝试收集所有对做出理性选择有必要的信息。我们可能只是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我们与自己的婚姻伴侣相爱；我们买一幢房子是出于喜好；我们要找一份工作是因为抵抗不了它的诱惑。所有这些例子都表明社会行动中的非理性（但不同于无理性）因素。当我决定要和谁结婚，我肯定不会去试着估计一下，看谁在婚姻市场上是更容易到手的。我相信自己的惯习，会引导着我做出正确的选择。在买房子的时候，我有可能像一个理性的行动者那样去行动，但往往我会买一套与我父亲或是祖父的居所相类似的房子，我愿意和他们保持这种相似。问题的重点在于，我们不可能像人们常常以为的那样，来判断各种替代性后果的成本和收益。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最重要的选择都遵从了我们的“本能”（亦即我们的“惯习”），而不是以一种冷漠和理性的方式来评估我们的选择。但从一种可能的观点来看，这些选择合计起来反映了这样的事实：我们都是被限定了的社会性动物（social creatures），我们的选择常常是对我们出生时社会环境的再创造，或者往往再创造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逻辑给我们“命中注定”了的环境。

^① Bourdieu, *Distinction*, p. 170.

^② Bourdieu, *Distinction*, p. 172.



出于这个原因，惯习不应该被简单视为主观性的。社会博弈中“玩家”的布局具有层次性：如何行事，如何摆脱困扰，喜好什么厌恶什么，以及回避什么渴望什么——所有这些都因为一个人在博弈中“起点”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并且与其家族的职业和教育出身密切相关；也就是说，惯习是由阶级结构形塑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惯习就一成不变或者完全僵死。尽管作为一个人早期社会化的产物，它是相对稳定的，但惯习也可以随着制度环境、阶级关系，或者一个人社会立场的改变而发生变化。简言之，关于惯习的概念将社会结构和个人的动机、世界观，以及在一个具有决定性但又相对自主的关系中的行动，都联系起来。

在这个条件下，很明显，在社会空间中占据一定位置的行动者，其惯习也是一种生成性规则；依据这个规则，行动者再生产或改变他们的客观关系，而正是这些客观关系构成他们居住于其中的社会空间。在相对稳定的社会背景下，这个观念有助于我们捕捉这样一种关系：执行者的性情倾向和他们所处社会位置与关系之间是相互强化的。的确，在某些情况下这个互动关系可以生产出一个几乎牢不可破的循环：如果具有反现代主义倾向的执行者在一个前现代的社会结构中占据一席之地，那么社会变迁就几乎不可能。

然而，变迁一般都的确发生了，只不过没有“按计划进行”。我们认为在正经历着社会结构变迁的社会中，惯习的概念或许更为有用，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分析性的方法，来检验当人们试图保持原有状态并且维持他们的社会轨迹时，发生在执行者的性情倾向和变化着的社会逻辑之间的互动如何在历史上造就了他们的生活策略和选择。既然如此，发生在惯习和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或多或少是一种“零敲碎打”（bricolage）（借用列维-斯特劳斯的著名隐喻）。建造“新”社会结构的材料取决于行动者手上能使得上的资源，也就是说，运用的是所有“来自行动者那里”（out there）的材料，以及深深积淀在他们惯习之中的理念和实践。这并不是简单地说制度化的形式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被再生产出来，就像路径依赖模型所认为的那样，而是说在一个快速变迁的社会空间中，社会行动者努力地继续保持其社会轨迹，在这其中他们建构并且/或者改变了制度与社会关系——这既是为了遵从其惯习，也是为了尽可能多地保留他们的身份。

这一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些问题。举例来说，为什么社会主义等级秩序苦心经营的成果会受到如下事实的影响：社会主义是在那些从未经历过资产阶级霸权，并且仍然很深地嵌入在庇护体制中的社会里被尝试

建立起来的。一些共产主义干部的行为完全类似于前共产主义的贵族，因为这是那易于仿效的为数不多的行为模式之一。以这个逻辑为基础，我们认为后共产主义的企业家在某些方面类似于共产主义时期的官员也就显得不足为奇了。因为很明显，资产阶级化（bourgeoisification）已经在这样一种来自社会主义时期庇护主义的社会中起步，并以知识分子新阶级规划的瓦解为特征。同时，惯习的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后共产主义的行动者会利用前共产主义的见解和世界观来领会、熟悉制度的建构过程。

从我们的论点可以得知，我们和那些认为只要实施“正确”的制度就会自然而然出现“正确”行为的人有着明显不同。^①相反，我们认为，制度和制度位置上的在职者，这二者以一种不可预知的方式彼此相互塑造。举例来说，我们知道，当共产主义革命者坚信他们可以通过消除私有财产、建立一个“正确”的财产关系来创造集体主义者时，共产主义革命便误入歧途了。旧的行为模式和从前的观念会继续塑造一个人在新集体中的行动。如果承认这样一种历史先例，那么为什么当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鼓吹者宣称，他们通过制度化明确的财产所有者就可以直接建立起市民阶层（Bürgers），亦即资本主义的企业家和市民时，我们还会相信他们呢？后共产主义执行者的惯习可能会暗中破坏、约束或者阻碍激进的制度变迁。这里的要点在于，惯习将个体性的行动者和社会结构的决定性因素联系起来，并且在这个互动的过程中，双方都可能被改变。^②我们关于社会变迁的理论（我们将其称为轨迹校正）与图 1-4 中列出的路径依赖理论以及新古典模型所理解的社会变迁模式形成了对照。

（三）社会变迁与资本主义转型

本书所讲述的，是以一种轨迹校正形态出现的后共产主义转型。与此同时，这也是一部讨论向资本主义转型的著作。因此，我们很清楚，由于

^① Anders Aslund (1985) *Private Enterprise in Eastern Europe—The Non-Agricultural Private Sector in Poland and the G. D. R., 1945–1983*.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② 最近，有理论要求成功的中欧要获得“企业家的技能”——在西方的经济学家那里，这指的就是他们在西方的商学院中所教授的东西。但是在中欧，由“市场社会主义”的客观经验而灌输形成的性情倾向，清楚地揭示出另一种不同类型的“富有事业心的品格”。尽管与自己在西方的对应者相比，它们有可能缺少活力和算计，但中欧的企业家遵循了一条不同的轨道，并且赋予“企业家”以一种特有的含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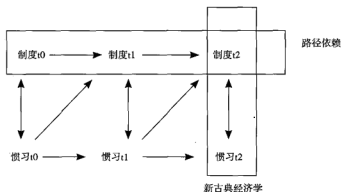


图 1-4 社会变迁的轨道校正模型

我们又回到了古典社会学一些伟大的原初问题（originating questions）上，所以这一理论化的过程承接了一个悠久的历史学传统。与马克思和韦伯一样，我们也在问：资本主义的起源是什么？资本主义转型的动力有哪些？但与他们相比，我们站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有着历史优势的角度来回答这些问题；而且我们所运用的分析工具，与这些杰出的古典理论的前辈也迥然相异。

尽管韦伯也注意到了行动者和他们的意识形态，并且他也进行了资本主义的比较分析，对古典和现代的形式做了对比，但他仍然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只有一种单一的终点，它奇迹般地诞生于一个独特的历史条件集合中，那里有着“正确”的参与者，他们拥有“正确”的世界观，在一个有助于产生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环境中。韦伯并没有设想在全球现代性的条件下，有可能形成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s）的多样性。而且，我们也并不认为，无论从哪种古典视角出发，韦伯能够想象出我们的研究基点。这个研究基点处在一个截然不同的历史连接点上，由带有“错误”性情倾向的“错误”参与者所构成。穷尽了所有的可能性，韦伯也无法想象出一个在共产主义的废墟上建立资本主义的计划。但我们依然追随韦伯的足迹，因为我们相信行动者以及他们观念的重要性。我们只是并不相信在 20 世纪晚期建立资本主义是一个奇迹，尽管它的确是一个关于最初秩序（first order）的理论和经验谜团。

本书最重要的关注点在于，在一个不存在私有制的社会经济体制以及一个没有私人有产者阶级的社会结构中，如何打造资本主义的问题。由于是从这个立场出发，所以我们使社会学的一些经典问题变得更加激进。我

们不仅仅要问：“何为资本主义的起源？”我们还要问：“资本主义的不同类型有哪些？”换言之，我们所要分析的全新的历史环境，需要一种新的理解方式。首先，我们必须用比较的思维来考虑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类型，并且必须将对转型过程中执行者的分析置于一个比较的框架之中。不谦虚地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自己看做新古典社会学家（neoclassical sociologist），在将社会学传统中的核心问题激进化的同时，我们在对它们进行重新思考。以这一思想为指导，下一章我们会转向对资产阶级的比较分析，将中欧的知识分子阶层置于一个比较和历史的视野之中。

第二章 第二代文化资产者： 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 转型中的中欧知识分子

中东欧目前正在进行的“大转变”，其核心悖论在于，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是在有产阶级分子缺席的情况下发生的。到如今，我们不可能不去承认，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制度——即，劳动力和资本市场——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同时，财产所有者阶级（class of property owners），这一所有顾问和分析家认定在大转变过程中应扮演不可替代角色的“主要人物”，却无处可寻。本章的目的就在于化解这个明显的悖论。我们提出，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在第一章中，我们将其概念化为从社会主义“二元分层体系”向阶级社会的过渡——是由一个“文化资产阶级”来协调和领导的。这个资产阶级就是“第二代文化资产者”（second Bildungsbürgertum），它由最不可能结盟的人所组成——前异议知识分子，以及前共产党的技术专家—管理精英。的确，他们是很奇怪的盟友，但知识分子阶层的这两个派系却承担起了资产阶级的历史任务：使他们的社会变得开化，并且创立市场制度。他们与大的国有或半私有企业的管理者一道，成功地将自己组成一个“权力集团”，在后共产主义社会里占据了所有主要的支配性位置。

这样一个命题，自然要求我们回答：到底在什么意义上，一个有产阶级缺席的资本主义是可信的？这个悖论如何才能够被化解？在本章的第一部分，我们会尝试着为这个观念确立合法性。我们的中心论点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一般性分析在概念上应该始终与对资本主义行动者和阶级的一般性分析区分开来。我们考察了一些在历史上对全局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性研究基点”（strategic research site），它们与中欧当前的时代和区域不同，

在这些地方，资本主义制度是通过代理人，而不是有产阶级来建立或者经营的。

本章的第二部分提出了一个历史社会学的概念框架，它所针对的，是资本主义执行者，亦即资产阶级（bourgeois class）和阶级部门（class fractions）。与这种社会学有关的各种要素，在中欧社会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大量存在，特别是在于尔根·柯卡（Jürgen Kocka）对有产的中间阶级和受过教育的中间阶级，亦即经济资产者（Wirtschaftsbürgertum）和文化资产者（Bildungsbürgertum）的区分中可以看到。根据韦伯和布迪厄的理论，我们希望本书能够提出一个有关资产阶级的更为严密的概念类型学。我们将文化资产阶级定义为一些群体和阶级部门的历史性联合，他们的权力和特权以其所拥有的文化资本为基础，他们的计划就在于推动社会从等级秩序向阶级分层体系过渡。这个定义就可以让我们比较和对照“第一代”文化资产者和“第二代”文化资产者之间的不同，前者由19世纪受过教育的中间阶级组成，后者则由异议人士、专家治国论者与管理者所形成的后共产主义联盟构成。

在第三部分，我们追溯了后共产主义权力集团以及他们打造资本主义所用策略的历史性起源。在这里，我们离开了对“第一代”和“第二代”文化资产者类型学的比较，而转向对他们相似性以及差异性的历史分析。尽管我们认为，后共产主义的权力集团是19世纪知识阶层直接并且有意识的继承者（这一事实解释了为什么在这两个群体之间存在诸多相似），但我们同时也强调二者之间一个关键的历史性差异：第二代文化资产者诞生于“新阶级”规划的废墟之中。所谓“新阶级”规划的废墟，指的是中欧的知识阶层在其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次努力之间所走过的弯路。以其失败的经历为特征，（第二代文化资产者）的不同群体之间，形成了一个悖论性的，并且多少有些不稳定的联合。

因此，沿着第一章的线索，本章为分析后共产主义的转型奠定了基础。分析的第一步就是确定变迁的执行者，并且绘制出他们的轨迹。这正好也是我们想要分析文化资产者这一概念的目的所在。

一 “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是否可信？ 历史上的类比与先例

最早论述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学者（斯密、马克思，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包括韦伯），绝大多数都只是关注西欧，尤其是英国和法的状况。这些



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

学者都假定——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有产资产阶级的出现，是向资本主义转型的第一个必需步骤。对他们所有人来说，不证自明的一点是，在市场资本主义出现之前，就已经有了私人手中的资本原始积累。尽管在资本原始积累得以完成的来源和机制这个问题上，他们彼此存有争议，但他们都很自然地以此作为自己分析的起点。参与到早期或者随后有关“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争论中的人们，没有谁对这个假设有过质疑。事实上，研究转型的历史学家已经指出，有产资产阶级的社会起源，可以追溯到各种各样的社会群体，比如说英国的贵族、荷兰以及法国的工匠和商人。^①但这些发现，都不能改变这个不言而喻的“资产阶级先于资本主义”的核心论题：不管他们的社会出身是什么，这些行动者也都必须在封建主义被毁灭之前，转变为个体的私有财产持有者。

马克思有关转型的理论将这个观念推得更远。他认为，资产阶级不仅是在封建主义内部孕育的，而且也是领导反封建革命的社会力量。在马克思的分析中，有产的资产阶级必须成为革命的阶级，因为它是封建秩序中“普世的政治集团”（universal estate）；它是唯一对封建秩序的终结感兴趣的历史行动者，它也有能力领导这样一场成功的革命。只有资产阶级可以将庄园主的统治带向终结，因为这是他们作为支配阶级来统治一个阶级社会的唯一途径。

然而，更多近期的学者，开始转而怀疑“资本主义之前先有资产阶级”的假设。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辨别出了很多战略性的研究基点。在这些研究基点中，人们既可以看到，在转型过程中，在不存在有产资产阶级行使领导权的情况下，资本主义依然出现了（比如，这就是“资本主义在资本家之前”）；也可以看到，资本主义正在没有明确的个人所有者的情况下运行（这种形式通常就是“资本主义在资本家之后”）。让我们按照逻辑顺序展现这些关键性的研究基点，从支持最弱主张的研究基点开始，一直到支持最强主张的那一个。其中，最弱的主张指的是，在摧毁封建秩序的“资产阶级革命”中，资产阶级并不必然扮演重要角色；最强的主张亦即“管理主义命题”，这一命题认为，私人所有者阶级的消失，是发达资本主义的特征，它有利于非个人性的资本及其持有者，

^① 如下两套书中总结了这些争论：R. J. Holton (1976) *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T. H. Ashton and C. H. E. Philips (1985) *The Brenner Deb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也就是管理者。

(一) 对法国大革命的修正性解读

即便是关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经典个案”——18世纪的法国——也有学者质疑有产资产阶级在打破1789年大革命前旧制度（ancien régime）的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法国的“修正派”历史学家（“revisionist” historians）主张，资产阶级既没有指挥，也没有领导那场革命。他们的研究表明，国家精英的不同部分——贵族统治者地位略低于贵族的中上阶层以及僧侣——之间所发生的斗争，才是问题的核心。历史学家们也证明了知识分子所发挥的强大作用，但有关城市资产阶级领导群众，或是抵抗君主统治权力这方面的证据，却是无处可寻。^①

当然，这个解释也并非无懈可击，但在其后的激烈争论中，有更多的问题被提了出来。尤其是一些历史学家注意到，法国的资产阶级之所以未能（could not）领导革命来反对旧秩序，是因为他们深深地嵌入在封建关系之中，并且被封建的国家精英拉拢。^② 这一挑战促使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最著名的如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去反思“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③ 安德森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提出批评，他认为，这一理论出自诸如普列汉诺夫和列宁这样的理论家之手，而他们所关心的最主要问题，就是详细阐述将要来临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各种策略。安德森指出，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关于资产阶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未能抓住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型这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前者是两种以私人财产权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尽管它们有区别）之间的转变，^④ 而后者却是从私人财产权转向

① 对有关争论的总结，可参见以下精彩著作：Ralph W. Greenlaw (1975) *The Soci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Debate on the Role of the Middle Classes*. Lexington, MA: D. C. Heath, especially the polemics by Francois Furet (pp. 61 - 98) and Alfred Cobban (pp. 101 - 129, 140 - 149), and the Marxist response by Claude Mazauric (pp. 30 - 58, 137 - 139)。

② 这个观点是由以下几人得出的，Francois Furet, “The Catechism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George V. Taylor, “Capit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pp. 61 - 97, 150 - 159 in Greenlaw (ed.)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③ Perry Anderson (1992) “The Notion of Bourgeois Revolution”. pp. 105 - 118 in *English Questions* by Perry Anderson. London: Verso.

④ 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在私下里的交流）认为，一种更为精确的表达是，个人财产（而不是私有制）是两个体系所共有的。



社会化的财产权 (socialized property)。结果,安德森提出,很有可能的是,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看起来与俄国的社会主义者所设想的暴力剧变有很大不同。既然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存在相似性,那么一个持有恒产的资产阶级就可以在封建主义内部发育起来,而无需去挑战封建秩序。实际上,在资产阶级和贵族地主“双赢的交易”中,贵族也逐渐将他们自己转变为有产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①

因而,安德森对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革命理论的重新阐述,看起来与其说是对法国修正派的一个回应,不如说是对马克思主义正统观点的一个更具创新性的再解释,以适应那些由修正派所提出的新证据。这样做的结果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被移到了幕后,从而有利于人们在“前工业的”和“工业的”转型之间做出明确区分,这也与韦伯对“等级秩序”和“阶级分层”所做出的区分非常类似。^② 我们不是历史学家,我们也没有专门研究法国的历史;因此,在这场争论中,我们不想站在任何一方。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只不过是注意到修正派的“弱”主张变得似是而非:封建秩序的瓦解,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合法化,或许不仅仅是由持有恒产的资产阶级来完成的,而且还包括其他的行动者。此外,即便是在资本主义转型的经典案例中,这种主张也是似是而非的。法国的修正派成功地对马克思方法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提出了质疑——那就是,将集体行动者的历史行为追溯到由他们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位置而决定的利益。修正派提出,资产阶级在封建秩序中“矛盾的阶级位置”不足以使他们成为革命的执行者——或者,从更具方法论意涵的角度来说,对阶级关系的理论分析,不可以被关于集体行动者认同和利益的历史形成的经验分析取代。

(二) 现代化的迟到者

19世纪以降,随着资本主义体系在全球的扩张,很多发现自己处于世界体系边缘或是半边缘位置的国家,都面临着“赶超”的挑战:这些国家要么市场制度欠发达,要么社会结构陈旧且传统。在很多国家,“赶超”与现代化的动力刺激他们做出许多努力,包括引入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与工业技术,创造私有财产者阶级,促进资本积累——所有这一切都意在提升本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并且打破“后发循环”(cycle of backward-

^① Anderson, "The Notion of Bourgeois Revolution", pp. 105 - 118.

^② Anderson, "The Notion of Bourgeois Revolution", pp. 116 - 117.

ness)。一些成功的资本主义转型的著名个案，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的，同样，也有一些众所周知的失败个案。然而，先不论它们是成功抑或失败，我们的发现是，在实践中，所有这些“赶超”的尝试都是由其他人，而不是由资产阶级发起。他们是被启蒙了的贵族、文职官僚，或者是在西方受到过训练并且信守西方价值观的知识分子。所有这些人在私人有产者阶级缺席的情况下，自己承担起了社会与经济现代化的任务。实际上，他们将这样一个阶级的缺席，视为自己需要去填补的东西。

日本的明治维新可以被引证为最成功的个案，在那里，接受过西方训练的职业阶层运用政府机构来贯彻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计划。^① 相类似的，葛申容（Gerschenkron）争辩道，在19世纪晚期，俄国政府领导了一场相当成功的“自上而下”的革命，通过这次革命，俄国实现了经济和社会制度的现代化。^② 在这些个案中，要么只有一个弱小的本土资产阶级，要么就干脆没有。“二战”之后，在后殖民主义的非洲，也有着相似的创建资本主义的规划（尽管最终没能成功）。这些规划，也通常是由文职官僚或是军人来领导实施的。

对于这些现代化的后来者中的绝大部分人来说，其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属于“政治资本主义”的类型——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制度的实施，是通过政府“自上而下”的推行和国家精英的“启蒙开导”实现的。通常说来，私人有产者阶级的缺席或薄弱，被看做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障碍。实际上，从政府的角度看来，有产资产阶级的角色经常被当作是增强国家权力的一个理由。我们的观点是，对迟到者而言，我们正在分析的不再是资本主义的出现，而是它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在这种分析中，主要问题不再是资本的积累，而是对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模仿，以及那些认识到需要这种模仿的行动者的认同与意识。我们认为，在资本主义得到传播的大部分个案中，都是那些对保护与发展“民族经济”感兴趣的精英们认识到模仿的需要——尽管在一些个案中人们发现，他们只是在利用政治公职来为个人积累财富。换言之，资本主义得以传播背后的主要因素，往往是“国家的原因”（reasons of state），而不是国内资本家阶级的需

① Herbert Passin (1965) *Society and Education in Jap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Bernard S. Silberman and H. D. Harootunian (eds) (1966) *Modern Japanese Leadership: Transition and Change*.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② Alexander Gerschenkron (1966)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求。因此，即使是对“资本主义在资本家之前”的一个更为强有力的描述也变得模棱两可：资本主义转型往往是被国家操纵的，国家着眼于创造一个将会致力于民族经济全面发展和强盛的私人有产者阶级。

（三）中欧的文化资产者

关于现代性的迟来者，一个典型案例就是 19 世纪的中欧。^① 考虑到这个个案的特征，我们会将关注的目光从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资本主义”模型上移开，转向对那些引导了现代化进程的社会行动者做出更为社会学的解释。尽管“政治资本主义”模型可以在普鲁士人那里得到验证，但同样正确的是，在世界上的这一区域，政治资本主义却发现了一个难以对付的伙伴，那就是受过教育的中间阶级。这些中间阶级，不是弱势的有产资产阶级，而是承担起建造资本主义这一任务的社会行动者，他们感兴趣的远远不只是增强国家的权力。

在这方面，于尔根·柯卡的著作尤有助益。^② 他并没有假设资本主义只可能尾随于一个有产资产阶级而出现，而是经验性地提出了与转型有关的问题：谁是对将旧的等级秩序带向终点感兴趣，并且也有能力领导一个旨在建立阶级社会的现代化事业的社会行动者？柯卡提出了一个很有抱负的三重比较框架，来对比西欧、中欧和东欧的情况。这个框架所依据的，是他对两种类型资产阶级的区分：一种是持有恒产的资本家阶级，或说经济资产者（Wirtschaftsbürgertum）；另一种是受过教育的中间阶级，或说文化资产者（Bildungsbürgertum）。^③ 这两个阶级，都出于他们各自的原因而对现存的等级秩序不满，并且都对一个更为理性、由精英来管理的阶级分

① 我们用“中欧”来表示一个地理区域，它包括经济上欠发达的东德和一定程度上的中德、以及“受德国影响”的更东边的地区（例如波希米亚）、波兰和匈牙利西部地区。

② Jürgen Kocka (1987b) “Einleitung”. pp. 7 - 20 in *Bürger und Bürgerlichkeit im 19. Jahrhundert*.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请特别参阅第 10 页，作者指出，德国的“Sonderweg”是出于其相对不均衡的资产阶级化进程。也可见 Jürgen Kocka (1987c) *Bürgertum und Bürgerlichkeit als Probleme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von spaeten 18. zum Früher 20. Jahrhundert*. pp. 21 - 63 in *Bürger und Bürgerlichkeit im 19. Jahrhundert*. 他在其中指出，受过教育的中间阶层在德国后发经济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③ Jürgen Kocka (1988b) “Bürgertum und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in 19. Jahrhundert. Europäische Entwicklung und Deutsche Eigenarten”. pp. 11 - 78 in *Bürgertum im 19. Jahrhundert*, Vol. 1, ed. J. Kocka. Munich; Deutsche Taschenbuch Verlag; Puhle Hans-Jürgen (1991) “Einleitung”. pp. 7 - 13 in *Bürger in der Gesellschaft der Neuzeit; Wirtschaft, Politik, Kultur*, ed H. J. Puhle.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层体系充满兴趣。在西欧，资本主义主要是由经济资产阶级分子建立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市场资本主义已经建立完善之后才出场的西欧文化资产阶级分子，最好被描述为一个“职业阶层”。^①相反，柯卡主张，如果资本主义在19世纪的俄国得以成功建立的话，那也只有可能由文化资产阶级分子来实现。在俄国，经济资产阶级分子势力弱小，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外国人；相比之下，俄国的知识阶层在19世纪晚期则发展迅速，而且他们对俄国社会的现代化和西化充满兴趣。最后，柯卡指出，与西欧和俄国相反，中欧的资本主义“受惠”（blessed）于受过教育的中间阶级和组织相对良好的有产资产阶级之间的联盟。在这一联合中，文化资产阶级分子是占据领导地位的合作者，因为在国家机器和大学中，他们资历更老、规模更大，而且占据更为有利的位置。^②

① 因此，“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是西欧以及美国受过教育的中间阶层的集体性流动规划。它表示的是一种在支配性的市场理性界限内的特殊身份（一个人对经济资产阶级支配地位的接受）。可参见 Iván Szelényi and Bill Martin (1989) “The Legal Profession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New Class”. pp. 256 - 288 in *Laywers in Society*, ed. Richard L. Abel and Philip S. C. Lewi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顺便提一句，这里我们做一个小的自我批评，因为在那篇文章中，“专业主义”被理解为是在资本主义（它一般被理解为是市场整合的社会）之下，受过教育的中间阶层所采取策略的理想类型。是柯卡启发我们去做资本主义的比较分析，并且在完整的历史特殊性与连续性背景下，来理解“专业主义”。

② 当然，并不是所有学者都接受柯卡的观点。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注意到，在那些有关中欧或德国“特殊道路”的古老争论中，柯卡的声音只不过是其中之一（尽管他的声音很重要）。在英国和法国，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以及民主是一个接一个发展起来的，自18世纪晚期以来，对这两个国家所做的比较时常会出现在德国的历史编纂之中。最初，强调中欧例外论的，是保守的理论家。正如布吕格美尔（Brüggermeier）所指出的那样，自由随便、不知羞耻的德国唯物主义“文化”，被认为超越了西方的“文明”[参见 Franz-Joseph Brüggermeier (1990) “Der deutschen Sonderweg”. pp. 244 - 249 in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in Deutschland*, ed. Lutz Niethammer. Munich: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尤其参见 pp. 246 - 247] 但是，在“二战”之后，德国的自由知识分子阶层开始转向关注并强调中欧的有产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化进程的迟滞发展，如何导致这一地区在历史上走头无路，并且毁灭性地走向法西斯主义。参见 Jürgen Kocka (1985) “Einleitung”. pp. 9 - 26 in *Bildungsbürgertum im 19. Jahrhundert*. Vol. 1, ed. Werner Conze and Jürgen Kocka. Stuttgart: Klett-Cotta, 尤其见 p. 11. 马克斯·韦伯也曾预见到这一点。他宣称，德国发展的倒退应归咎于有产资产阶级的“封建化”，而非容克阶级的“资产阶级化”（Kocka, “Bürgertum und Bürgerlichkeit”, p. 52）。这一思想后来被摩尔发展成一个很有抱负的比较理论：Barrington Moore (1966)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Boston, MA: Beacon Press. 最后，新马克思主义者质疑道，导致法西斯主义出现的原因是否就是资产阶级的软弱——或者确切地说，正如他们所争论的，是一个相当强势的资产阶级，其在右翼独裁主义之下达到拥有无限权力的顶峰。可见 Eley Geoff (1992) *From Unification to Nazism: Reinterpreting the German Past*. Boston, MA: Allen & Unwin.



以柯卡的分析为基础，我们认为，与我们所考察的其他研究基点相比，中欧能让我们形成一个更具说服力的关于“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的假设。柯卡的分析表明，不仅封建秩序的瓦解以及向资本主义的转型是由其他人而非有产阶级发起的，在一些情况下，有产阶级甚至是国家行动者为推动资本主义发展而有意识创造的产物；而且，“资产阶级”这一术语的真实含义，也不应该完全等同于有产资本家的形象。我们会在下一部分研究这一主张及其结果。在这里，我们只是说明柯卡的主张仍然有相当的局限，因为在他的解释中，资本主义不可能完全不依靠资本家而获得发展。对他来说，中欧的文化资产者只有在得到有产阶级协助的情况下，才可能取得成功——尽管那是一个弱小的有产阶级。此外，柯卡暗示，在向资本主义转变这一任务中，文化资产者走得越远，经济资产者就越有可能取而代之。^① 如果没有同有产阶级联盟，正如在俄国，资产阶级的计划对知识分子阶层的吸引力就会小很多，他们会更有可能抛弃资本主义，转而偏向民粹主义或中央集权的规划。简而言之，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考察过的所有基点都是“弱”的，因为它们都不允许我们展望这样一幅图景，那就是由除了私人有产者之外的其他人来经营一个正在运行的资本主义经济。然而，这个困难或许仅仅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检验的都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中相对“不发达”的个案。

（四）发达资本主义的管理主义

与发达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关的主要争论之一，是围绕一些分析家的论断展开的。他们声称，我们见证了所有权从控制权中逐步分离的过程，以及与之相伴的，一个由管理者和技术专家所构成的新阶级的崛起。^② 这些分析家认为，随着现代公司的扩散，个体性的私人所有者所拥有的股份开始变得越来越少，并且因此他们不仅开始向管理者让出对生产性资本进行日常管理的控制权，而且还向他们让出战略上的决策权。

^① 因此，受教育阶层，尤其是它在德国保守知识界中的化身，往往表现出焦虑的情绪，而在转型过程中，他们也不时有“运用刹车”的倾向。若想了解文化资产者更为保守的一面，可参见 Fritz Ringer (1969) *Decline of the German Mandari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② 当然，经典的论述是 Adolf Berle and Gardiner Means ([1931] 1968)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James Burnham ([1941] 1962)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实际上，发达资本主义的管理主义理论表明，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置身于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社会之中。这一时刻的到来，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被一个相对不发达的社会利用，而是因为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已经超越了对个体性资本家的依靠。在这样一个体系中，权威和实际权力都是由行动者（actors），而非私人所有者操纵。这些行动者并非通过与私人所有权有关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将他们对生产性资产的控制合法化，而是通过声称他们拥有技术或管理方面的知识来实现的。尽管以此为基础，早期的分析家指出，管理主义代表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的一种超越，以及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开端，但后来的论述却将管理主义和资本家阶级的衰落，作为正在进行中的资本主义秩序理性化的一部分而对其加以关注。于是，从这一方面来看，管理主义是一种关于“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的理论。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管理主义者所声称的在发达资本主义中所有权与控制权已经分离的观点，已经被莫里斯·蔡特林（Maurice Zeitlin）有力地推翻了。^① 他不仅提出了有力的证据，证明了“家族的影响领域”仍然在继续控制美国的大公司这一论题，而且他还令人信服地指出，经理人的动机以及他们推行的政策，与资本家并无差异——也就是说，冷酷地追求利益是管理者以及所有者的共同特征。尽管争论仍在继续，^② 我们认为，蔡特林的大部分观点都是有根有据的。然而就当前的目的来讲，要注意的是，蔡特林的批评所针对的是管理主义命题的现状，而不是它的可能性。换言之，管理主义的论题可以被重新解释为这样一种主张：发达资本主义的制度为经理人控制提供了潜在的可能。而蔡特林对这一主张的批评则可以被看做是指涉了这样一种现象：面对日益增长的经理人权威，美国资本家阶级在历史上所采取的特殊反应。实际上，蔡特林本人的批评证明了资本主义可以在没有资本家的情况下运行，因为他表明管理者已经成功地维持了高利润率。而且，最近对美国公司结构转型的分析指出了金融资本在这一结构中的霸权，以及与之相伴的在公司管理者中一种“有关控制的

① Maurice Zeitlin (1974) "Corporate Ownership and Control: The Large Corporation and the Capitalist Cla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9(5): 1073-1119.

② Davita Silfen Glasberg and Michael Schwartz (1983) "Ownership and Control of Corporation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9: 311-332.



金融观念” (financial conception of control) 的发展。^① 这些分析者都认为, 即便在没有私人所有者的情况下, 金融管理者——对他们而言, 公司首先是金融资产的聚合——日益增长的权力, 也可以保证资本主义经济的持续协调与运行。在这些文献的背景下, 我们的观点就显得温和多了。我们认为, 在一个不同于美国的阶级格局中, 在不受到私人所有者干预的情况下, 管理者能够控制生产性资本, 并且调整投资决定, 并非是无法想象的事情。实际上, 在后共产主义的中欧, 我们所说的这一切恰恰正在发生。

(五) 中欧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 后共产主义的管理主义?

在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过程中, 一种前所未有的历史情境被创造出来。一方面, 市场制度很快地涌现, 这些在发达的西方 (资本主义) 出现的制度在后来不断被 (中欧) 模仿。这一现象, 正如我们在上文已经注意到的那样, 导致金融资本的霸权, 并且为经理人控制创造出了潜在的可能。另一方面, 持有恒产的国内资产阶级的发展相对较慢, 资产阶级转型的规划是由前共产主义的技术精英和管理者联合了前异议知识分子一起领导的。这些群体控制了国家机构和生产性资产; 这些知识分子有意识地追随 19 世纪中欧经历过现代化的知识分子, 并拥有在共产主义下积累起来的技术知识和社会声望。因此在中欧, 过去从未共同存在过的两个条件——用我们的话来说, 就是“资本主义在资本家之前”和“资本主义在资本家之后”——现在却成为后共产主义情境的特征。这也是我们将目前的体制概念化为“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的原因。“后共产主义的管理主义” (post-communist managerialism) 这一概念抓住了这一历史新情境的其他本质特征。它不仅描述了那些领导着现代化和资本主义转型过程的执行者 (专家治国论者和管理者), 而且描述了他们权力和权威的基础 (管

^① Neil Fligstein (1990)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rporate Control*.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Neil Fligstein (1995) "Networks of Power or the Finance Conception of Control?"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0 (4): 500-503; Neil Fligstein and Peter Brantly (1992) "Bank Control, Owner Control, or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Who Controls the Large Modern Corpor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8 (2): 280-307; Micheal Useem (1980) "Corporations and the Corporate Elit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6: 41-77; Micheal Useem (1984) *The Inner Circle: Large Corporations and the Rise of Business Political Activity in the U. S. and the U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理上的实践知识和经理人的职位)。

我们用相关的两点内容来结束这一部分。首先，通过确认各种关键的研究基点并且将我们的情况与之对比，我们指出，资本主义可以在不存在一个有产的资产阶级的情况下被打造出来，甚至有可能运转起来。如果这一点得到承认，那么我们关于后共产主义管理主义的假设就值得经受检验。其次，尽管后共产主义体系与其他“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的情况有相似之处，但我们要强调的是，这种相似性最多只是一种历史上的类比。在我们的案例和其他的类似情形之间，存在如下一些明显的差异。

第一，正如安德森提出的那样，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过程中的行动者联合，与从封建或前现代社会向资本主义转型中的行动者联合，有着本质区别。在大部分由封建主义开始的转型中，都存在着一个由有产者构成的阶级。在一些情形下，这个阶级因为过于弱小或在封建的社会关系中陷得太深，而无法来领导转型的过程，因此打破旧制度的任务，就由封建精英中正在经历现代化的那一部分代替资产阶级来完成。然而在后共产主义的转型中，并不存在一个有产阶级。所以尽管人们不断借用它的名义，但无法依靠它来帮助建立资本主义制度。

第二，相比于现代性的迟到者，后共产主义受惠于（或者是受累于，这取决于个人的观点）社会主义时期完成的高水平的资本积累。结果，即使那些操控了转型的精英，或许在某些方面与那些后发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精英们存有相似之处——比如后发案例中的公务员和知识分子与中欧的专家治国论者、管理者、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的相似性——但他们特有的意识，以及他们由此所可能形成的联盟，都是截然不同的。中欧的专家治国论者和管理者并没有满怀所谓“国家的原因”（*reasons of state*），因此，他们没有为了增加国家权力，而试图将生产性资源集中起来。事实上，他们将自己的工作解释为解除中央集权主义的再分配，而他们所采取的方法一般是“管理主义”的，亦即一种谨慎的、亲自动手做细微调整的转变过程。

最后，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中的管理者相比，后共产主义的管理者或许表现出了某种相似性，这主要依据的是双方对权威进行合法化的方式，以及在大工业企业中，他们的位置所具有的结构性潜力。然而我们要强调的是，这些相似性更多是表面上的而非实质性的。后共产主义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管理者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所占据的位置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



并且他们的行动也处在完全不同的阶级背景之下。后共产主义的管理者是在社会主义中，而不是在常春藤联盟中的商学院接受教育；他们管理的是前国家社会主义的公司，而不是跨国公司；还有，他们既不受有产资产阶级的规训，也不受他们的监督，这是由于目前有产资产阶级还根本不存在。

所有这些差异，都来自参与到中欧资本主义转型规划中的社会行动者所具备的特定历史起源。这也是我们在这一部分将要得出的结论：如果一个人想要理解中欧资本主义转型的具体结果，那么他就不可能通过一个抽象的资本主义模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个模型以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一般性分析为基础，考虑的是它们“应该如何”，或者认为它们是“西方”的制度。人们首先需要承认的是，资本主义并不仅仅是一个“体系”，而且还是一个阶级社会，它由阶级和阶级部门的不同联盟构成。另外，我们还认为，这些阶级及其联盟的特征，其形成的方式是历史性的、偶然性的、视事态发展而定的，对最终的结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也无法回避对资本主义的行动者和阶级做一般性分析的需要。

二 哪个资产阶级？一个有关资本主义 执行者的历史社会学的概念框架

关于后共产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最佳历史类比，就是发生在19世纪中欧知识界的文化资产者规划。事实上，我们在接下来的两部分中会指出，在这二者之间，存在着比简单的类比要强烈得多的理论与历史关联。在下一部分，我们要讲述的是中欧知识界的故事：19世纪受过教育的中间阶级如何着手于从事一个资产阶级化的规划？对与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几乎命中注定的恋爱关系而言，他们是如何走上这条漫长的弯路的？作为一个被设计的社会（engineered society）中受到启蒙的统治者，他们是如何立志成为“新阶级”，去取代资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统治集团的？最后，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们又是如何回到19世纪的轨道上，并且再一次接纳了文化资产阶级的角色的？不过，在投入这历史洪流之前，我们需要先阐明自己的理论框架，以便识别出这两个时期实质上的相似之处。

我们可以首先用简单的术语来表述这一问题。这两个时期明显的相似之处在于，在两种情形中，部分主要的行动者都是知识分子。从分析上来说，人们也可以从他们“社会性独立”的特殊社会位置中，找到他们的相似之处。在其中任何一个时期，这种社会位置（知识分子声称，

这是他们应该得到的)都建立在他们接受的教育和掌握的的知识的基础上,而并非是他们所在的社会提供给他们。结果他们就有了相似的意识。他们由于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而感到痛苦;但与此同时,他们又认为,与那些占据政治职务的人相比(不管他们是贵族还是共产党工干部),他们更有资格进行统治。因此,在他们的利益和有意识的规划中也存在一种相似性:这两种知识分子群体都对从旧秩序(就是贵族统治或共产主义)向市民社会的转变充满兴趣。最后,他们上述声称的基础,并不仅仅在于知识分子比占据政治职位的人拥有更好的文凭(尽管他们并没有忽略提及这一点)。在19世纪和后共产主义两种情形中,他们对权力以及权利的要求,都建立在他们是中欧“有思想的人”这一独特声望的基础上。相比于他们的西方同行,在让社会相信他们是道德和精神领袖这一方面,这些知识分子做得要成功得多。人们从来不仅仅将他们看做是垄断了技术知识的“专业人士”,而且将他们看做是对整个社会有着特定伦理责任的“知识分子”。他们被想象成指向未来的明灯,亦即民族的灵魂。^①

尽管这两组知识分子所扮演的角色有这些相似性,但在两个时期之间仍然存在根本区别。毕竟,并且差不多就定义来看,不管是在后共产主义的知识界中,还是在19世纪受过教育的中间阶级中,知识分子只是其中一部分,而且还不一定是处于支配性地位的那一部分。在上述两个时期中,知识分子的联盟对象也不尽相同。在19世纪晚期,职业性的公务员——一种被共产主义者摧毁掉的社会类别(social category)——构成了经历现代化的知识分子阶层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从共产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中,专家治国论者和管理者则扮演了主要角色——在第一代文化资产者时期,并不存在这样一种社会类别。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将后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阶层称为“第二代文化资产者”呢?尽管这两种联盟在构成上存在差别,但来自不同时代的这两个群体仍然有着相似的规划和凝聚力——我们是在怎样的基础上做出这一宣称的?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从澄清文化资产者的概念开始分析。

^① 这个现象对本书61页的注释^②做出了补充说明。在经济资产阶级领先于文化资产阶级的地方,专业人员的形象就成为受教育阶级的理想类型;而在文化资产阶级领先于经济资产阶级的地方,“有理想的人”则成为代表着领导“现代化攻势”的、受教育的中间阶层的理想类型。



(一) Bürgertum 的含义

bourgeoisie 这一概念在英语中的含义比较明确，而在法语中则更为清晰。^①至少对社会科学家而言，它的意思很明白，指的是一个由私人有产者构成的阶级。类似的，在这些语言中，“资产阶级社会”（bourgeois society）与资本主义是同义的。当然，现代社会生活不能被化约为经济利益和制度，但自 18 世纪起，法国和英国的社会科学家都很好地掌握了相应的术语，对“政治”和“文化”进行概念化，将它们视为相对独立于“经济”的概念。就这一目的而言，最为有用的概念工具是“市民社会”（以及市民身份）。它表示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现实，市民社会与市场 and 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有着很强的历史和理论关联，但又不能被化约为这二者，因此在分析上它也就保持了相对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独立性。

然而，那些用德语（以及其社会科学逻辑受德语塑造的其他语言^②）从事社会科学写作的人，却受到了这样一个事实的诅咒：在这种语言中，人们无法清晰地区分出作为有产者阶级的资产阶级（bourgeoisie as a class of proprietors）和作为市民的资产阶级（bourgeoisie as citizens），以及“资本主义”和“市民社会”。在德语中，Bürger 或 Bürgertum 这一概念的含义要比 bourgeoisie 模糊得多，但同时也更为丰富。^{③④}

举例来说，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这个概念的双重含义就产生了一个

① 我们在这里提出的观点，或许对法国比对英国要更为确切。它所说的是，英语中的 bourgeoisie 这一术语是简单地借自法语，并且它从未完全进入普通大众的语言中。

② 凡是在德语中所说的 Bürger 这个词，同样也表示匈牙利语中的 polgar，以及捷克语中的 Mestak。事实上，polgar 是中世纪时最早由德语词汇引入匈牙利语的词汇之一，它说明了在早期匈牙利的“资产阶级化”过程中，德国的城市居民、艺术家，以及商业移民发挥了重要作用。

③ Bürgertum 是 Bürger 的复数形式，这个词的含义很广泛，指的是生活在城市或城镇上的市民，包括商人、自由民等。——译者注

④ 柯卡引用了一位德国学者（1792 年）的观点，后者认为，德语词汇 Bürger 与法语中的 bourgeoisie 相比，更多地和“荣誉”[Würde] 这一概念有关联（“Bürgertum und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p. 33）。对德语、英语和法语做的语义上的比较，强调了德语的“语言模糊”（plurivalence），可参见 Reinhart Koselleck Ulrike Spreck and Willibald Steinmetz（1991）“Drei Bürgerliche Welten? Zur vergleichenden Semantik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in Deutschland, England und Frankreich”. pp. 14 - 58 in *Bürger in der Gesellschaft der Neuzeit*, ed. Puhle.

模糊的空间，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发了这一空间，从而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解释他们的奠基人。在1845~1846年之前的早期著作中，马克思用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资产阶级社会）这一概念来描述现代性。^① 在后来的著作中，尤其是在力求实现分析的严密性时，他转而使用 *capitalist society*（资本主义社会）这一概念。^② 虽然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这一用语仍然可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Grundrisse*）^{③④} 中找到，但在马克思“认可”的文本中，它几乎已经不再被使用。有争议的是，成熟的马克思决定丢弃掉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这个概念，因为他为这个概念的模糊性感到十分懊恼。随着其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充分发展，他已经看不到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这个概念的丰富性会有什么益处。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对于根本性的经济制度和阶级关系来说，由“市民社会”这一概念所捕捉到的政治和文化现象，都是次要的和从属的。将这两个秩序完全不同的现象融合到一起的概念，只会使两者之间原本明朗的关系变得扑朔迷离，而成熟的马克思原本并不需要这样的模糊效果。当然，“青年马克思”日后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不断

① 比如，可以参见 Karl Marx (1970)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② Karl Marx (1919) *Das Kapital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Hamburg: O. Meissner.

③ Karl Marx (1974)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Berlin: Dietz.

④ 我们将 *Grundrisse* 译为《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1939年苏共中央马列研究院首次用德文全文发表了这一手稿，用的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1857~1858年》。采用这个标题的依据，是马克思1857年12月8日致恩格斯的信中的一句话：“我现在发狂似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为的是在洪水到来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弄清楚。”这句话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就是德语“*Grundrisse*”这个词的复数，它也可以译为“大纲”。1968~1969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46卷上下册首次全文发表了《1857~1858年草稿》的俄译文，用的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书名中“草稿”一词采自马克思1858年11月29日致恩格斯的信，在信中谈到自己的1857~1858年手稿时把它叫做“草稿”，因为它确实具有明显的草稿性质。在1858年5月31日致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又指出，这个手稿“很乱，其中有许多东西只是以后的篇章才用得上”。1976、1981年先后出版的MEGA2第二部分第一卷第一、二册发表《1857~1858年草稿》时，该版编者又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作为标题，其理由是，自从1939年采用这个标题以来，它已闻名于全世界。我国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和中文版采用的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是比较妥当的。因为第一，马克思给自己的《1857~1858年草稿》加的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马克思1857年12月8日那句话中的“*Grundrisse*”一词并不是给《草稿》命名，因此没有必要根据它把《草稿》称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译者注



争论的一个源泉，部分原因就在于，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这一概念既可以被翻译为“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也可以被翻译为“资本主义社会”（capitalist society），其词义的选择，远不单是意识形态或政治上的。

但人们可以从 Bürgertum 这一概念固有的模棱两可中获得某些洞见；如果选择介于两种翻译之间的意思（正如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那样），也就意味着放弃这些洞见。恰恰是因为它的“模棱两可”，我们认为，“Bürger”和“Verbürgerlichung”这两个术语（后者的一个糟糕的英译，是 embourgeoisement）更为准确地捕捉了“现代性大转变”的含义。^①此外，对 18 和 19 世纪德国的现代化进程来说，这是一个更为精确的描述。Bürger 这一术语明显的双重含义，起源于一种具体的社会情境，并不是为了分析上的模棱两可而莫名其妙地被德语吸引，而马克思以及许多英美社会科学家都曾犯过这种错误。

Bürger 这个术语同时包含“所有者阶级”和“市民类别”的意思。实际上，相比较财产这一理念，它更想强调的是市民身份（citizenship）这一观念。归根到底，人们原先创造这个词，就是为了描述那些“居住在城市中的人”。^②这意味着，这个词是要描述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它与有地阶级（landed class）——亦即贵族和农民——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Bürgers 比农民们多少要富裕一些，而且受教育程度肯定也更高。不过与此同时，他们与贵族又有较大的距离，因为他们是有节制的和追求实用的，而贵族们则强迫自己参与一些“炫耀性消费”来保持他们地位的荣耀。因此，在 Bürgers 看来，相比较他们所接受的以技术为导向的学习而言，贵族教育（也许是重要的）是“无用”的。贵族成员们追求的是艺术、哲学和修辞学，而不是数学、科学和法律。^③然而，将 Bürgers 与贵族们区别开来的最重要特征是，Bürgers 是自由的，或者更为准确地说，他们获得了一定的政治权利。Bürgertum 意味着“城市自治权”（urban autonomy）：市民们自我治理的权利；颁布自治法律并拥有自治法庭的权利；自我征集税收的权利，而不是成为封建贵族征收直接税的对象。

正如韦伯所解释的那样，这种非常重要的自治权，其意义在于，它

^① 参见 *Meyers Enzyklopaedisch Lexikon* (1979), vol. 24. Mannheim: Lexikon Verlag, p. 435。

^② 当然，对于“资产阶级”这一术语而言，这也是事实，但在法语和英语中，这个词的含义最终变为表示财产所有者，而另外一个词则被创造出来用以表示与城市居民相联系的政治权利：citizen 或 citoyen。

^③ Kocka, “Einleitung” (1985), pp. 16 - 18.

改变了身份的决定因素，从原来的家族或血统，变成了属地的性质 (territoriality)。^① Bürger 就是那些居住在城市中的人。单靠居住地来判断，甚至逃跑的奴隶也可以成为“市民”(citizens)，如果他们长时间住在城市里的话。城市居民打破了血统权，也迫使贵族放弃了他们对奴隶的所有权。这就是“城市的空气使你自由”(Stadtluft macht frei)的原因，并且顺便提一下，这也是韦伯将城市的权威体系称为“不符合常规”(non-legitimate)的原因。它不符合常规，恰恰是因为它挑战了传统权威的核心制度，亦即在血统基础上得以分配的私人性的主—奴关系。

因此，资产阶级化 (Verbürgerlichung) 这一概念所表明的不仅是，甚至并不主要是市场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发展，而是更表明了一种生活方式的传播，这种生活方式是与市民 (Bürger) 所享有的公民自由联系在一起的。它指的是社会关系的现代化，破除等级秩序，并且用阶级分层的逻辑取而代之。与 Verbürgerlichung 相关联的，不仅包括“占有欲极强的个人主义”，而且包括由公民权、自治、贤能统治、自制克己、文化和文凭所组成的价值观。

在中欧，这种对 Verbürgerlichung 的理解具有特别的含义。它反映了这一地区并不平坦的现代化过程。^② 在 18 世纪晚期和 19 世纪早期，中欧在经济上明显处于倒退状态：市场制度和工业发展远远滞后于革命之后的法国、荷兰，以及英国。而且，私人有产者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影响力，无法与同时代更为富裕的西欧私人有产者的发展程度相比。不过与此同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欧已经实现“现代化”了，因为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得到了很好的传播。教育体系庞大且完善，比起同时代西欧的知识分子以及专业人员，其中欧受过教育的中间阶级在数量上不仅不相上下，甚至还要更胜一筹。在这样一种“不均匀现代化”的背景下，独特的中欧资产阶级化 (Central Europe Verbürgerlichung) 的概念得以形成。虽然发育缓慢，但可以确定的是，中欧的知识分子以及“官员”开始重塑 Bürgertum 的意义。它所指涉的，不再仅仅是城市居民的自治权，也是受教育阶级的文化

^① Max Weber (1978) "The City (A Form of Non-Legitimate Domination)". pp. 1212 - 1374 in *Economy and Society* by M. Weber. New York: The Bedminster Press.

^② Kocka, "Einleitung" (1985), p. 10; Puble, "Einleitung", p. 9.



和教育 (Bildung)。^① 毕竟，这一文化的英雄们——歌德、席勒、康德——本身就是市民 (Bürgers) 中的杰出人物，是“现代”所指为何的典型模范。因此，受教育阶级的成员无疑要站在现代性，也就是市民社会的一边，站在市民的生活方式的一边。

中欧的教育和教育改革，取得了发生在西欧的英法革命所达到的成果：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传播扩散。在 18 世纪晚期和 19 世纪初期，学校的课程得到调整，更加强调科学的重要性。历史教学也不再聚焦于国王和王后的故事，而是以一种庄重的资产阶级方式，回顾西塞罗、罗马共和国，以及“市民教育”的观念。最为有力的改革之一，就是改变了很多寄宿学校的位置，把它们从乡村迁到城市，进入市民生活的大本营。最初的时候，贵族的孩子在家里接受他们私人教师的教育，而通常这些教师被当作佣人看待。而在新城市寄宿学校中，城市资产阶级、贵族、牧师以及工匠们的子女都同宿同学，教师们课堂上教授他们教育的价值，以及要尊敬“有文化的人”。这是新生的文化资产者的苗圃，在这里，社会出身不同的孩子们聚集在一起，共同接受一种团体精神 (esprit de corps)，亦即一条通过文化和教育而“成为现代人”的道路。^②

这就是我们论点的本质所在：我们并非“在结构上”，通过其在生产关系中所占的位置来定义资产阶级，而是“从历史上”，来看是哪一个阶

① Bildungsbürgertum (文化资产者) 这一术语是在非常晚近的时期才产生的。它在出版物中最早出现于 1920 年，并且只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晚期和 80 年代才变得时尚。但德国的社会史学家认为，尽管在 18 以及 19 世纪时不存在这样一个概念，然而却有其他词语用来表示同样的意思。在 18 世纪晚期和 19 世纪早期，人们用的是“gebildete Stande”，而从 19 世纪中期以后则是“gebildeter Mittelstand”。这两个概念都意味着一个由接受过教育的个体所组成的社会群体，和有产的中间阶层一道，组成了“Bürgertum”。而且，这两个概念似乎区分出这样一个群体，它与封建等级秩序中更为“强大”的城市居民（或者，柯卡所称的“旧市民”）并不相同。参见 Koeka, “Einleitung” (1985); Ulrich Engelhardt (1986) “Bildungsbürgertum”. *Begriffs-uns Dogmengeschichte eines Etiketts*. Stuttgart: Klett-Cotta.

② 我们十分感激厄吉贝特·萨莱伊为理解这些概念所做的贡献。也可参见 Reinhart Kosel-leck (1990) “Einleitung-Zur Anthropologischen und Semantischen Structur der Bildung”. pp. 11 - 6 in *Bildungsbürgertum im 19 Jahrhundert*, vol. 2, ed. Werner Conze and Jürgen Koeka. Stuttgart: Klett-Cotta; Georg Mosse (1990) “Das deutsche-juedische Bildungsbürgertum”. pp. 168 - 180 in *ibid.*

级将实现社会现代化作为其历史规划。^① 一门关于资产阶级的历史社会学，不应该通过纯粹经济学标准的定义，来简单解决比较上的困境。相反，关于资产阶级的历史社会学应该努力辨认出那些承担了现代化规划的集体行动者。我们也并不认为，读者应该接受上述经济主义的甚至立场更“弱”的主张：即文化资产者是一个“替代性的资产阶级”，是对“严格意义上的资产阶级”，亦即经济资产阶级的次要补充。正如我们从关于法国大革命争论中学到的那样，有产者阶级可以很深地嵌入于封建关系之中，对自己作为食利者阶级和为君主敛财的角色感到心满意足。这样一来，比起经济精英中的成员，接受过教育的中间阶级也许就是现代化规划更为有力的代理人。追随柯卡的理论，我们提出，这就是中欧向现代性转型过程中发生的故事：“大转变”是由文化资产阶级，而非一个弱小的、传统意义上的经济资产阶级领导的。^② 毕竟，对现代性的形成来说，从等级秩序向阶级分层的转型，与私人资本的积累一样重要。在这项任务中，文化资产阶级往往成为现代化规划中更为有力的执行者。

（二）Bildung 的含义：文化作为资本和符号支配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解释了为什么使用复数形式的资产阶级概念是有意义的，特别在分析中欧社会时，更是如此。在这些社会中，并不是一个，而是多个资产阶级，站在了现代性的发源地。此外我们认为，在这些资产阶级中，哪一个是大转变背后的驱动力，是一个经验性问题。在这

① 在这一方面，我们拯救了马克思自己所反对的原初问题意识，而不是陷入他所给出的种种回答之中。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的问题（来自黑格尔）是：“谁将是废除市民社会的历史执行者”？遵循韦伯的思路，我们反讽性地提出这一点是想说明，谁将是废除等级秩序并且将社会转变为一个普遍的、现代的阶级分层体系的历史执行者？历史行动者是在其任务中，即现代化的规划中被定义的。马克思在后来的对其并不完善的阶级结构理论做过的阐释中，根据最初的问题纠正了他的答案——即，历史行动者开始是资产阶级，随后是无产阶级——但它被用来代表了所有最初的问题。一些德国社会历史学家在用“资产阶级社会”这一概念来刻画19世纪乌托邦规划的特征时，都很倾向于重新抓住这个问题。可见 Lutz Niethammer (1990) “Einführung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als Projekt”, pp. 17-41 in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in Deutschland*, ed. Lutz Niethammer. Munich: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② 费希特 (Fichte) 对这一思想做了十分详细的解释：“现在，国家的根本性重建第一次要由受教育阶级来实现——我们会发现，这些阶级无法计算出，他们能将这一运动中首领导权力的保持多久……人们很快就可以不需要我们的任何帮助而自力更生。” Johann Gottlieb Fichte ([1807-1808] 1944) *Reden an die deutsche Nation*. Leipzig: F. Meiner.



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

个背景下，我们便转向这样一个议题，主张中欧的知识分子阶层是一个“文化资产阶级”（正如我们已经做的那样）意味着什么。^①虽然中欧正在现代化的阶级（modernizing class）的自我定义以文化和教育（Bildung）为中心，但用这种“民间”分类来回答有关“阶级性”的问题也是可能的——就是说，我们是否能够理解这种类比，它将行动者看做是以共享的文化关系为基础而组织起来的集体行动者？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有保留地回答“是”，而且这个答案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皮埃尔·布迪厄的理论为基础而得出的。毕竟，布迪厄通过引入“文化资本”的概念而赢得了其早期声望，尽管——正如我们在第一章对“惯习”的讨论中所提到的那样——他最初是用这个概念来分析社会再生产，而非向现代性的转型。^②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建议用韦伯有关分层形式的历史社会学，来补充布迪厄的概念框架，并使其具有历史性特征。通过这一方式，我们就可以重新使用“文化资本”这一概念，使它成为我们对文化资产者从理论上加以定义的核心基石，因为我们可以用它来评估受过教育的中间阶级的“阶级性”——也就是说，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作为承担起建造现代文明重任的集体行动者而开展行动。

布迪厄对“文化资本”的定义是复杂的，它有赖于同马克思的分析所做的类比——马克思对经济资本及其以异化形式体现出来的辩证逻辑的分析。布迪厄观点的实质在于对两种知识类型的区分：一种是对实践的“实际控制”（practical master），它常常以心照不宣的、日常的、习惯性的，甚

① 我们的工作因为如下事实而变得复杂：阿尔文·古尔德纳用“文化资产阶级”这一术语来描述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的“新阶级”，他提出，文化资产阶级与经济资产阶级之间存在冲突以及竞争。可见 Alvin Gouldner (1979) *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Class*. New York: The Continuum Publishing Corporation. 我们对这个概念的使用与之相似，但有一个重要限制。古尔德纳将知识分子称为“文化资产阶级”，是因为他相信，他们拥有的“文化资本”可以产生一连串的收入，这与经济资产阶级所拥有的能为其带来收入的生产资料十分相像（p. 19）。我们所使用的文化资产者概念，并不带有类似的含义，这个概念是由其历史规划决定的。另外，我们并不认为“文化资本”的本质是占有“剩余价值”，而是行使符号性的支配。可见 Bill Martin and Iván Szelenyi (1987) “Beyond Culture Capital: Towards a Theory of Symbolic Domination”. pp. 16 - 19 in *Intellectuals, Universities and the State in Western Societies*, ed. Ron Eyerman, Lennart G. Svensson and Thomas Söderqvist.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② 可参见 Pierre Bourdieu and Jean-Claude Passeron (1977)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 and Newbury Park, CA: Sage; Pierre Bourdieu (1984) *Distinction: A Sociologic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至是具体化的知识为形式；还有一种是对实践的“符号控制”（symbolic master），这是一种话语式的能力，从理论上或是抽象地将他人的言行整理成体系。^①“文化资本”是性情倾向、位置和头衔的一个总和，它允许个人和群体运用“符号控制”的各种话语机制。一般来说，运用“符号控制”机制的后果是，它会在那些参与日常实践的人和能够详细阐述这些实践“法则”的人之间，制造出一种社会距离。^②但在一所学校或是类似于学校的环境中使用这些机制的后果却更具破坏性，因为此时，上面所说的社会距离就会变成一个评判优劣的等级制，并接受对赞许的制度保证。因此，文化资本的积累，取决于使“实际控制”丧失其功效的制度（与经济资本的积累取决于将工人们从生存手段中剥削出来的道理是一样的）：就文化资本而言，这种制度一般都指的是现代学校和现代教育体系。^③

但我们希望强调的是，对文化资本积累的理解，不能生硬地和经济资本的积累做类比。当然，教育体系是创造了这样一种情境，个人可以通过运用“符号控制”的机制，从而优先获得报酬更高的工作和更有影响力的位置。但相比于教育系统的一般作用，亦即在某些知情和不知情的人之间再生产出“符号支配”和“社会距离”（区隔）而言，这只是一个相对不太重要的后果。随着经济资产阶级的资本积累越来越多，“符号支配”构成受教育阶级的集体规划。

在这个意义上，受教育者的集体规划往往使他们成为打造现代性的承担者，亦即文化资产阶级。随着他们建立起现代教育制度（比如现代大学），并且创造出全民教育，他们使“知识人”（men of knowledge）位置中始终暗含的东西——拒斥“实际控制”（practical mastery）——转化成现代性的基本要求。随着他们努力将自己与社会上的其他人区隔开来，官方知识分子把教育的价值吹捧为一种精神崇高（spiritual nobility），并拒斥所有仅仅是“应用的”知识形式。然而，与经济资产阶级的表现不同，这项集体规划并没有使文化资产阶级必然或者全部站到现代性的一边。在努力寻求文化上的声望和区隔的过程中，受教育者为自己创造出各种各样的证书

① 可参见 Pierre Bourdieu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ierre Bourdieu (1990) *The Logic of Practi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② Martin and Szelenyi, "Beyond Cultural Capital".

③ 并且，自然的，这对于其他各种机构来讲也是事实：医院、诊所、图书馆、法庭，等等。所有这些机构的功能都在于将生物和人类以这样一种方式组织动员起来，就是让他们成为符号控制的对象。



(credentials) 和头衔。他们所追求的“精神高贵”，与世俗性高尚地位的区隔作用是相同的。正如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那样，这样的知识分子会很容易被贵族化 (gentrification) 的前景引入歧途。^①

(三) 在传统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空间中，资本的不同形式

因此，正如我们可以将经济资本看做物质财富（尤其是诸如厂商、股票、债券这样的生产性资产）的所有权一样，我们也可以将文凭当作与文化资本所指内涵最为接近的东西。^② 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关键的问题在于，布迪厄指出，这两种资本形式都是可以替换的权力和特权资源，而且在形塑社会分层的体系方面，文化资本至少“相对自主”于经济资本。^③

根据布迪厄的理论，一个人在社会空间中所处的位置，取决于其所拥有资本数量及构成形式。因此，不论一个人位居高层还是底层，不论他置身“权力的中心”还是边缘，在很大程度上，这些东西所反映的都是他是否拥有资本，以及如果有的话，有多少，是什么类型。我们已经讨论了布迪厄的经验观察，即在法国社会的社会等级制中，一般来说，掌有经济资本是最有用的，而在决定一个人在那个社会等级制中的位置时，文化资本所扮演的角色虽然重要但仍居于第二位。

但是，实际的分析要更为复杂，同时也更为现实，因为布迪厄讨论了在构造社会等级制时发挥作用的其他资本形式。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社会资本”——亦即独立于一个人的文凭和金钱的社会联系与网络，它

① Ringer, *Decline of the German Mandarins*.

② Pierre Bourdieu ([1983] 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pp. 241 - 258 in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ed. John G. Richardson.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当然，这是一个明显的简化，因为正如马克思和布迪厄所强调的那样，没有什么东西是资本，除非它植入一个能给予它价值的、支配性的关系体系之中。因此，假如没有“自由劳动力”，或者没有资本与劳动力市场的话，货币就不成其为资本；同样的，如果没有专业机构或大学的话，文凭也不是资本。在布迪厄的观点看来，与其“物化”（成为“惯习”）或是“客观”（诸如艺术作品、科学，等等）的状态相比，文凭是文化资本“被制度化”了的形式，对它们的理解不可能脱离开这一制度化的过程来进行。这个制度化过程的好处在于，它提供了跨背景的资源，因此使得资源之间易于转换。

③ Bourdieu and Passeron, *Reproduction*, . . . , pp. 11 - 12, 195. “相对自主”与资本之间的可转换性有关。当货币不能用来购买任何一样东西，尤其是不能购买文凭的时候，并且当文凭可以由政治权力和影响（以及收入）转化而来的时候，文化资本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被看做是自主性的，即便在最富有商业意识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也是如此。

可以帮助那个人获得权力和声望。一个人所编结的网络越好——这个人认识更多的人，而且更重要的，更多的人听说过（know about）这个人——他就越有影响力，他也就负有更多的责任，并且当他与其他人谈判时也更容易赢得别人的信赖。换言之，这个人就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布迪厄声称，在法国社会，社会资本在塑造阶级以及不同阶级部门中的社会结构时，一般都是在扮演边缘角色。社会资本将那些更为成功的人或那些设法成为其他群体“代表”的人区分开来。如果只是根据是否属于支配阶级来看，精英个体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但以社会资本为基础无法得出重要的阶级区隔；也没有哪个阶级部门可以通过社会资本得以建构。这是因为，与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不同，在当代法国，社会资本被制度化的程度比较弱。^①

总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是，它是一种经济资本占据支配地位的阶级结构或分层秩序，文化资本虽然拥有相对自主性，但在使支配阶级成为社会中的一个阶层方面，仍然只是扮演次要角色。社会资本是从属性的，并且被“去制度化”了。当然，个人网络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一个人在社会空间中所占据的位置，最主要还是由其财富，另外附加教育资格来决定的。因此，尽管通过促使其他形式的资本更顺利地运转，社会联系有可能成为财富和文凭发挥作用的媒介，但社会资本极少能够超越或是抵消经济资本以及文化资本。

为了将复杂的分析更加推进一步，从一个比较的视野来思考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或许会有所帮助。布迪厄之所以强调文化资本的相对自主性，有可能因为他描述的是法国社会的特性。人们不难发现，他的思想受到一流学院（国家高等学院、国家行政学院、国家商业学院、国家技术学院等）^②在法国所扮演的特殊角色的巨大影响。事实上，所有法国精英都是从这些学校走出来的，而这些学校则共同构成一个灌输“符号支配”的独特体系，作为区隔的示范性标志发挥作用。

在量表的另一端，日本可能是社会资本影响最大且相对自治最为明显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式资本主义是由特别的网络塑造的，这些网络

^① 但是社会资本，诸如作为种族和民族群体中的成员，以及有性别区分的“校友网络”等等，它们作为决定这些群体的实际构成部分的“附属标准”，都在社会阶级的实际建构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可见 Bourdieu, pp. 101 - 109.

^② 可参见 Pierre Bourdieu ([1984] 1988) *Homo Academicu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特别是附录 1; Pierre Bourdieu ([1989] 1996) *The State Nobil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在横向或纵向上将公司联系起来，而公司内部的网络又通过忠诚与责任的纽带，将雇主和雇员联系在一起。因此，一个人在日本的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就不仅取决于其财富以及教育，而且受制于他在这些网络中的位置。^① 这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文化资本在法国，或是社会资本在日本都可以超越经济资本的首要位置，而是说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教育以及社会网络的重要性是可变的，并且可以据此将资本主义的不同形式区分开来。举例来说，从这一方面来看，美国式资本主义或许可以在概念上被视为一种处于法国和日本之间的中间情形。从常春藤高校联盟以及享有盛誉的商学院和法学院中获得学位，对于美国商业精英的再生产至关重要，但这些影响更多地可以解释为有资格进入这些学校的人所拥有的上层阶级背景，以及他们的个人网络关系。^② 学历证明对于一个人跻身美国社会的前沿是必要的，但它们在这里的影响力还无法与其在法国的情况比肩；关系网对于开展商业也同样必不可少，但与日本相比，它们还是略逊一等。

资本的三种形式为我们提供了相对简单却有力的工具，来展现并且比较不同的分层秩序，同时也可以分析不同秩序之间的转型，比如向现代性的转型，或者是后共产主义转型。用这种方法，我们可以更加明确“文化资产阶级”的概念，以及后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阶层和19世纪的文化资产者之间的相似性。

特别要指出的是，我们认为，传统的、前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往往都是社会资本占据支配地位。如果这个观点在一开始看起来牵强，那很可能是因为，我们往往将社会资本理解为个人之间的网络，从而未能观察作为整体的分层秩序是如何建立在这样一个脆弱的基础上的。但这种理解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我们都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亦即一种社会资本最为离散、制度化状态最弱的社会。然而，在封建社会中，社会资本的持有者不需要依靠对其责任和义务进行持续且艰苦的动员。毋宁说，他们所承担的职责受到他们的头衔、他们在传统身份秩序中所处的位置、仆从对他们的个人效忠的保护。简言之，社会资本在封建体系中是被高度制度化

① James R. Lincoln, Michael L. Gerlach and Peggy Takahashi (1992) "Keiretsu Networks in the Japanese Economy: A Dyad Analysis of Intercorporate T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7 (5): 561 - 585.

② Richard Zweigenhaft (1992) "The Application of Culture and Social Capital: A Study of the 25th Year Reunion Entries of Prep School and Public School Graduates of Yale College". *Higher Education* 23 (3): 311 - 320.

的，并且用韦伯的话来说，它以地位声望（status honor）为其表现形式。在封建社会，制度化的社会资本不仅是特权阶层最为重要的指标，同时也是其他形式的资本是否有价值的准则。因此，即便在封建社会，拥有经济和文化资本也为一个人提供了重要资源，但它们的影响力，却被严格限定在等级秩序的范围之内。

我们已经指出，可以将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看做这样一种社会类型，其中社会资本（尽管是以现代的形式）处于支配地位。在共产主义制度之下，权力和特权的最重要来源就是党，以及由党所承认的高度制度化的关系网与责任。控制这一网络并且占用它所产生的权力与利益的能力，并非来自传统的血统形式，而是一个人在准现代（亦即准理性）的政治组织中所占据的位置。因此，社会资本被制度化成“政治资本”：亦即共产党员，或者党国精英或中央委员会成员的身份。决定一个人在共产主义的社会空间中所能占据的位置以及能否获得提升的主要标准，一方面是对党、对上以及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热爱和忠诚，另一方面则是参与到党的网络机器的正常运转所需工作中的意愿。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后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阶级和19世纪的文化资产者之间一个重要的相似点。他们都从事着与资产阶级化有关的战略，并且都在一场反对制度化社会资本持有者的斗争中，尝试着评估自己所拥有的文化资本的价值。但在这里，在二者之间，也同样存在一些重要的区别。我们并不是最早强调封建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类同的人，但是遵循布迪厄的路径，我们希望自己所做出的比较在概念上更为严谨，结论也更能和那些微小的差别相协调。因此我们提出，将共产主义刻画为“封建—社会主义”或者“新传统主义”——正如一些分析家已经主张的那样^①——忽略了两个时代之间最为重要的区别。首先，社会资本的制度化在封建主义和社会主义下截然不同。封建的社会资本是作为传统的地位声望而被制度化的；因此，将它从一个贵族身上剥夺走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继承和血统。正如马克·布洛赫（Mark Bloch）业已表明的那样，这恰好是封建分层如何演变的写照。随着社会资本被制度化，原先相对而言还是以功绩

^① Ference Fehér, Agnes Heller and Gyorgy Markus (1983) *Dictatorship Over Needs*. Oxford: Basic Blackwell; Kenneth Jowitt (1983) "Soviet Neo-traditionalism; The Political Corruption of a Leninist Regime". *Soviet Studies* 35 (3): 275-297; Andrew Walder (1986)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

为基础的骑士制度体系，就被严格限定在了合法继承的范围之内。^①相反，共产主义的政治资本，是作为一种现代理性组织的成员身份而被制度化的。因此，它不仅可以为任何一个单独的个人所拥有，并且，它也并不排除人们通过个人奋斗和社会流动而获取这一资本。

另外一个相关的区别在于，在封建体系和共产主义体系下，两种资本形式所扮演的角色也并不相同。在共产主义下，政治上的忠诚不可能像在封建主义中那样，通过传统的亲缘关系与效忠来维护，所以文凭就容易成为忠诚的一个附加且可靠的指标。因此，党所希望的是，即便人们靠他们的政治资本获得提升，但如果想要保住新的工作和权威位置的话，他们还是要继续获得适当的文凭。在这个意义上，在共产主义之下，文化资本就扮演了一个在封建主义下不曾扮演的角色。文凭成了更进一步的忠诚证明——也就是说，虽然文化资本仍然从属于社会资本，但与此同时，在影响一个人的人生机遇方面，文化资本的重要性又在不断增加，并且日趋变成一个“相对自主”于党员身份的因素。但经济资本就不能这样说。经济资本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位置，大致和社会资本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位置类似。它是从属性的、次要的，并且是被去制度化的。而且，在革命之后的共产主义早期，先前拥有的经济资本已然成为一个累赘，而不再是财富。那些前有产资产阶级的成员，要么经历了地位的沉降，要么通过证明他们也拥有完全符合要求的文化资本，来对其资产阶级的历史进行补偿。有时候，他们甚至需要付出比共产党员更大的代价来表明自己在意识形态上对党的义务与忠诚。^②

而另一方面，在封建社会，情况却恰恰相反：文凭几乎不存在，它们自然也不能扮演忠诚的附加指标这一角色。贵族接受教育，但受教育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却是由“第三等级”来决定的。简而言之，文化资本是附属性的、次要的，也是被去制度化的。但另一方面，经济资本却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因为——正如佩里·安德森提出的那样——封建贵族和原始资本主义中的资产阶级（proto-capitalist bourgeois）都是个体性的财产所有者。货币流动（flow of money）作为忠诚流动（flow of loyalty）的部分替

① Mark Bloch (1961) *Feudal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② Zuzana Kusa (1994) "To Be of Bourgeois Origins: An Insurmountable Stigma? (On the Erosive Power of Social Networks in the Period of Communism)". Institute for Sociology of the Slovak Academy of Science. Paper presented in the XIII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Bielefeld, Germany. 18 - 23 July.

代物，开始逐渐发挥作用。不仅“购买”贵族的头衔和职位变得可能，而且从一开始，封建联盟就是通过金钱和货币义务（monetary obligations）的纽带而团结在一起的。

（四）对韦伯主义等级与阶级之间区分的再解释

在封建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空间中，社会资本所占据的支配位置之间的类比，对韦伯在“等级秩序”和“阶级分层”之间所做的区别提出了一种新的看法。它一方面使我们得以保留一些这种区分中更有启发性的要素，另一方面超越了其所带来的“传统主义”和“现代性”之间的二律背反。这种二律背反，是韦伯与其他大多数19世纪的知识分子共同持有的观点，它遭到了更为晚近的学者的质疑，而且我们自己也认为它不甚合意。在我们看来，将20世纪社会主义的现象压缩进19世纪的特征中，这种做法忽略了社会主义规划中最为关键的部分：社会主义正是为了克服这种二律背反而诞生的。毕竟毫无疑问，社会主义是一个现代化的规划，是启蒙观念的产物。没有人会比卡尔·马克思更为热心地相信启蒙的价值，尽管我们并不能这样评价他的追随者们。而且，尽管中欧的社会主义复制了许多在其之前的“半传统社会”的特征是一个事实，但在实践中，“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对精英统治重要性的强调，甚至超过了其与生俱来的专制特征，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各社会主义政权在它们第一次获得权力的时候，会在招募精英的过程中引发一场真正的革命，而且它们会由于资本主义以及私有制精英统治的程度不够，而对其进行严厉的批评。^①但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又有很多特征，与韦伯及其追随者习惯性归入“传统”中的特点相类似：经济嵌入在政治与社会关系中；对实质理性的强调；世界观和意识形态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共产党的领导角色。

坦率来说，我们的观点是，传统和现代性之间的区别不足以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但是我们相信，通过引入布迪厄的理论——尤其是“社会资本”的概念——来了解韦伯对“等级”和“阶级”所做的区分，就可以在克服这种古老观点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也可以因此拯救韦伯分析

^① 在中欧社会主义的最初阶段，大致是在1948~1968年间，党国精英中的成员几乎都是从农民和工人阶级家庭中招募来的。可见 Gil Eyal and Eleanor Townsley (1995) "The Social Composition of the Communist Nomenklatura: A Comparison of Russia, Poland, and Hungary". *Theory and Society* 24 (5): 723-750.



中的“理性内核”(rational core)。

我们的理论抱负在于，提出一个并不只是用来描述传统社会秩序的“等级”概念。韦伯有关社会结构的理论已经被人们用不同的路数解释过了。有一些人(其中最为善辩的是伦西曼)对韦伯的解读是，似乎他要提出一种多维度的方法来进行分层分析。^①根据这种观点，韦伯的“阶级、地位和权力”是社会不平等的三个维度。但在我们的解释中，韦伯是一位历史社会学家，他提出了两种不同的分层逻辑：等级秩序(Stand)，以及阶级分层(Klasse)。在这个解释中，权力并非第三个维度(a third dimension)，而是一个独立的变量。问题的关键是：在一个既定社会中运作的权力，其社会基础是什么——是阶级，还是等级？

如果我们不将这两种逻辑解释为是从传统到现代的一种进化运动，那么，这里的关键变量就是“嵌入性”：在韦伯的著作中，“阶级”意味着一种经济体并未嵌入其中的社会结构，而且这种社会结构可以被想象成一种由其自身所构成的社会实体领域(a sphere of social reality in and of itself)。一旦发生这种情况，经济制度的无情运行，就将开始主宰个人的人生机遇，同样也就决定了他们的身份认同，以及他们能够结成的群体。当然，正如很多分析家已经指出的那样，政治中心、族群，以及人际网络，在决定权力分布以及社会行动的后果时，都会扮演重要角色，^②但它们主要还是作为“次要特性”(secondary characteristics)而发挥作用的。^③我们的建议是，将个人和群体理解成由不同股票所组成的控股包，或者一支支挥动着不同颜色纸牌的“手”。在这些股票、纸牌或资本中，总有一种是支配性的。所以我们仅有的声明是，在阶级分层中，经济资本才是“王牌”股票

① Walter G. Runciman (1983) *A Treatise on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② Frank Parkin (1979) *Marxism and Class Theory: A Bourgeois Critiqu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Mark Granovetter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3): 481-510; Peter Evans, Dietrich Rueschmeyer and Theda Skocpol (eds) (1985)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③ Bourdieu, *Homo Academicus*, p. 102. 将这些“次要特性”概念化的关键在于，并不是要缩小它们的重要性。事实上，正如布迪厄主张的那样，“社会阶级并不是通过财产而得以界定的……也不是通过财产的集合……甚至不是通过由基本财产延伸而来的资产链……而是通过所有相关财产的关系结构而得以界定的，这种关系结构赋予每种财产以及它在实践中的应用效果以特殊的价值”(p. 160)。因此，在阶级分层特性的关系结构中，人际关系、种族地位等因素的特殊价值是“次要的”。在社会阶级的建构中，它扮演的是附加性的选择和排斥标准。

或纸牌；社会资本，以及文化资本只是扮演了补充性的角色。当然，正如在股票交易中一样，人们很谨慎，他们不会把所有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他们在最能赢利的股票上投资，但为了以防万一，他们也会小心地光顾其他利润较少但是更为安全的股票。特别是社会资本，它就是在资本主义下个人的“抚恤金”，当其他所有一切都失败时，它是可以救命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观察等级与阶级区分的另一面时，我们可以发现，韦伯关于“等级”的概念代表了这样一种分层逻辑：经济制度仍然嵌入于封建的政治和法律结构当中。在这种秩序之下，权力与人生机会分配的决定因素，首先是相互关联的义务结构，尤其是对主人的顺从。而这个主人所拥有的权威，则建立在古老的法则和“地位声望”的基础上。在这个概念化中有两个要素：第一，它暗示了社会权力的基础存在于一个由社会纽带和义务所组成的网络之中；第二，垄断和积累这种权力的能力是通过与“传统权威”的关联而得到正当化的。如果我们抛弃了这第二个包含在“等级”概念中的具有历史特殊性的要素，那么与社会主义的类比就变得不可能。社会主义代表了一种在性质上全新的等级秩序，在这里，经济制度被重新嵌入于共产主义“党治国家”（Communist Party-state）的政治结构中。和在封建主义中一样，在国家社会主义中，政治生活处于控制之下，而且对主人的忠诚是重中之重。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与权力网络正当化的模式关系更大，而与其结构上的特性关系较少。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处于控制下的政治活动，是依据理性主义的标准，而不是传统的标准来证明其正当性的。党是政治上的主人，而不是私人生活的主人。“党治国家”并不是一个先赋性的秩序（ascriptive order），而是自愿性的。当然，“党治国家”肯定会宣扬加入它是一种可以“选择”的事情——它是一个自愿性的组织——并以此来努力使自身获得正当性。

但是，如果作为一种理想类型的等级秩序概念建立在社会资本的基础上，而阶级分层的理想类型又是以经济资本为根基，那么，文化资本如何适应这一分析呢？历史的经验似乎显示，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种稳定的分层秩序存在于一个文化资本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中。世界上并不乏那些梦想着“美好社会”（a good society）的知识分子——在那样的社会中，知识成为荣誉和权力的主要来源——但他们从来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实现这个理想。

由此导致的一个后果是，在历史上，文化资本的支配是作为一种暂时



现象而出现的。只有当一种分层秩序崩塌，而另一种还没有被建立起来的时候，文化资本才可以占据支配地位。在我们的理论中，它所扮演的角色与韦伯社会变迁理论中“卡里斯玛”所扮演的角色并无不同。实际上，在使用“卡里斯玛”这一概念的时候，我们是如此大胆，以至于暗示自己解决了与这一概念有关的许多模糊和困难之处。

根据韦伯的理论：“卡里斯玛这一术语可以被用来描述一个人某种特殊的品质，具备这一品质的人，会被认为是超常的，并且被看做是被赋予了超自然、超人类，或至少是特别异常的力量或者特性。”因此，韦伯一面宣称卡里斯玛是一种个人的品质，但一面又认为它必定是被其他人“归加”到这个人身上的。这意味着，对于那个被看做是卡里斯玛型领袖的人来说，这种归因并非完全客观。^①类似的情形是，为了发挥效用，文化资本必须得到“承认”。那些运用“符号控制”的人，要想使符号控制发挥作用，就必须成功地说服别人相信他们所宣称事实是正确的，或者相信他们所掌握的知识是有用的——但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都无法根据客观标准而得到真实的判断。^②

但是，在“卡里斯玛”的情况中，总有一个个体，他被认为具备这些超人的特性，而且韦伯也永远都无法真正逃脱这样一个暗示，即这的确是一个超过一般水平的个体。因此，超人（*übermensch*）的念头就一直环绕在韦伯关于卡里斯玛的理论周围。至少可以说，这种隐含的意义正是让20世纪晚期的读者感到不舒服的一个来源，他们知道，韦伯所处的时期，正位于尼采和希特勒之间。在这种背景下，文化资本概念的吸引力就在于，它将这个问题从个体那里抽取出来，并放到了话语（*discourse*）当中进行分析。这里需要认可的并不是个体的特征，而是事实宣称的正确性，以及生产并证明这种正确性的推论过程。

那么，文化资本代表了哪种分层的逻辑呢？我们想要指出的是，一个

①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pp. 241–245. 这种对卡里斯玛的不同理解模式之间的张力，在下一页表现得更加明显：“对那些隶属于权威的人们来说，‘承认’是卡里斯玛获得正当性的关键。这种‘承认’是由人们所认为的证据来自由给予和捍卫的……但在卡里斯玛是名副其实的地方，构成其正当性基础的东西，却不是这个。毋宁说，它的基础存在于这样一个观念中：对那些隶属于权威的人来说，承认它的真实性并采取相应行动，是他们的指责。”请注意，卡里斯玛不再与个人品质而是与社会承认有关，这一事实如何立刻在“承认”的两种替代模式之间产生一种张力。这两种替代模式，一是“证据”，另一个是“职责”，前者是理性的，而后者——我们想——大概是传统性的。

② 有关“承认”在文化资本再生产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可见 Bourdieu, *Distinction*, pp. 318–361.

权力和特权主要源于对文化资本的占有的体系，只可能被描述为某种介于“等级秩序”和“阶级分层”理想类型之间的“混合”类型。^① 这样一个社会既不以等级，也不以阶级作为它的基础，而是以同时具备这两种分层逻辑为特征。这在最常见的将文化资本制度化为“学历证明”的情形中表现得非常明显。我们可以借用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著作中的定理，来表达相关的发现：来自社会关系的非嵌入性（disembedded）的经济资本越多，它就越容易积累并转化为经济资本，但文化资本不能得出同样的推论；来自社会关系的非嵌入性的证明学历的机构越多，它就越难积累并且转化为经济资本。^② 因此，由社会性因素决定的资格证书越多，就越会使人联想起一个人加入某一地位群体而非阶级的过程：它包括各种各样的典礼和入会仪式，比如考试和授予学位。人们这么做，是为了让这一群体的话语获得最大程度的社会认可，并在成员之间创造出一种共同体和团结。此外，在界定由文化资本所组成的社会群体，以及在将“真正的知识分子”（genuine intellectuals）和其他人区分开来的过程中，一些“不重要”的社会特征——例如种族和民族群体中的成员资格、生活方式和品位——其实往往非常重要。与此同时，非嵌入性的文化资本越多，它就越会以一种“纯粹的”（pure）方式接近阶级分层的逻辑，也越会倾向于发展出一种去制度化和去正当化的机制，使上述的认同变得困难和富有争议。“受启蒙者”对他们反对者（以普世主义真理为表现形式）的胜利、批判性话语文化、更优论断的力量，也都象征了它们不可避免的毁灭。

于是，在我们关于社会变迁的理论中，一个文化资本在其中占据支配地位的分层政体所扮演的角色，与韦伯理论中卡里斯玛的作用是一样的。但是不谦虚地说，我们认为，我们的理论比起韦伯的还要更胜一筹。这是因为在面对社会变迁时，它使得我们能够通过辨别出特定的、可以

① 实际上，赖纳·莱普修斯（Rainer Lepsius）主张，文化资产者是社会结构化中的一种“政治集团”类型，参见 Rainer Lepsius (1992) “Das Bildungsbürgertum als standische Vergesellschaftung” . pp. 8 - 18 in *Bildungsbürgertum im 19. Jahrhundert*, vol. 4, ed. Werner Conze and Jürgen Kocka. Stuttgart: Klett-Cotta. 另一方面，柯卡富有说服力地指出，在描述文化资产者的社会特征上，无论是等级还是阶级，都不是一个合适的概念。参见 Kocka, “Einleitung” (1987b) 以及 (1990) *Weber Stand noch Klasse: Unterschichten um 1800*. Bonn: Dietz.

② Randall Collins (1979) *The Credentialling Societ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尤其请参见他关于“文凭通货膨胀”的讨论。



引发划时代变革的社会机制来对其做出解释，而不是依赖某个特殊人物的出现。这些机制既使得那些为特定的分层逻辑进行辩护的霸权意识形态丧失了正当性，同时也是反霸权（这有可能是历史上最为重要的革命行动）的产物。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内，那些组成文化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最有可能成为一个“普世的政治集团”，因为他们所代表的是一种阶级分层逻辑的发展。然而，尽管他们是对消除“等级秩序”以及建立阶级分层逻辑感兴趣的地位群体——这是因为他们是一个以文化资本为基础而组织起来的群体——但他们不太可能建立自己的阶级统治。

三 资本主义转变的后共产主义 策略之起源

在前面的章节，我们尝试提出一个更为严密的概念基础，用以区分不同类型的资产阶级。我们想要说明的是，以拥有文化资本而得以界定的文化资产阶级，何以能够做出令人信服的努力，去领导一场将社会从等级秩序转变为阶级分层的转型过程。通过将社会主义界定为一种现代等级秩序，我们指出，那些改变了中欧社会主义的能动者可以被看做“第二代文化资产者”，而他们的努力则可以类同于19世纪晚期的“第一代文化资产者”。在这一部分，我们想从历史的角度来讲述这一相同的故事。为此，我们追溯了中欧知识分子阶级的社会史，将它视为一个“中断的资产阶级化”（interrupted embourgeoisement）的过程——“中断”并不是因为外部力量的干扰，而是由于第一代文化资产者不能继续资本主义转型的规划，并且开始了与左派与右派激进主义长时期的恋爱关系。在共产主义时代中期“新阶级”规划失败时，这种恋爱关系达到顶峰。随着他们的渴望被击碎，中欧的知识分子重新开始了他们与资本主义的合法联姻，同时也作为第二代文化资产者而重新回到向资本主义转型的轨道上。中欧知识分子阶级的社会史，就像一首由三篇乐章构成的奏鸣曲。下面，请允许我们来谱写它的曲调。

（一）第一乐章：19世纪，资产阶级化的规划

近代的中欧历史有一个明显特征，那就是自19世纪中期以降，教育体系的扩张超过了市场的发展。就历史的原因来看，这是由于经济资产阶级

力量弱小，而且城市化与工业化的速度都相当缓慢。^①与此同时，就经济的原因来看，贵族也鲜有将自己转变为追求利润的资本家阶级的动机。他们保持着容克的特征，并且农业的发展也依然遵循的是“普鲁士式的道路”，其取向，仍然是用低廉的劳动力换取昂贵的产品。^②在这种背景下，对那些由于农奴解放和行会废除而无法在社会上安身立命的人所组成的社会群体来说（也就是被排除在容克阶级之外的小土地所有者、工匠，以及犹太人），相对庞大且运行良好的大学体系成了他们实现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但这个规模相对大的、接受过大学教育的阶级，却不能作为专业人员被刚刚萌芽的市场经济吸纳。在这种环境下，受过教育的中间阶级被加倍地“弃置”了：他们刚刚被剪断了与旧制度的脐带，又未能在新制度里博得一席之地。

这是一个经验性现象。曼海姆将它称作“在社会上无所依附的知识分子”（socially unattached intellectual）。^③作为一个关于知识分子所扮演角色的一般性命题，这个概念很缺乏说服力，但是作为一个对19世纪晚期中欧的犹太以及贵族知识分子的描述，它是很富有洞见性的。如果没有独立的财产，他们经常就不得不面临找工作的压力。由于在这个相对不发达的经济体制中，人们对职业性专家技术的需求极其有限，所以，作为“无所依附的人”的尴尬处境，便成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压力。当然，这也很有可能是一种主动选择的结果，比如那些拥有足够的家族财产、出身贵族的知识分子，他们可以借此避免工作。对于这些“绅士知识分子”而言，成为“无所依附的人”是一种特权。他们可以终其一生来“寻求真理”，而不是来为雇主服务。无论他们这种“无所依附”的境况是自己的选择还是由于无业可就，这些受过教育的人都是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色和位置，因此，他们是最有热情推动社会转变的行动者阶级。他们会成为中欧社会变迁的执行人——他们既不是规模较小的资产阶级或者无产阶级，也不是贵族，前者为现存秩序所包容，后者则是这个秩序中最大的受益者。

中欧的知识分子阶级是在探索哪种类型的变迁呢？正如我们将要看到

① Perry Anderson (1974a) *Passages from Antiquity to Federalism*. London: Verso; Perry Anderson (1974b)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London: Verso.

② Max Weber ([1906] 1958) "Capitalism and Rural Society in Germany". pp. 363 - 385 in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eds) *From Max Web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③ Karl Mannheim ([1936] 1985) *Ideology and Utopia*.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

的那样，他们的规划随着时间而不断变化；但是至少在一开始，他们的兴趣在于资产阶级化——亦即在于打造一个资本家阶级和市场经济——因为，他们热衷于西化。毕竟，在中欧那些显赫的大学里，学生都是在近代科学，以及西方启蒙价值观的规训中完成社会化的。因此，他们立志沿着这条道路来完成自己社会的转变，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那么接下来，针对这一已被西化且仍在继续西化的群体，为了描述他们的性质及行为，文化资产者规划将是一个十分精确的概念。

Bildung（教育和文化）这一概念表达了这个阶级的特殊渴望，而它的变化也反映出这一阶级形成和瓦解的过程。康德第一个使用了这一短语，用它来表达这样一种历史观：沿着理性化的路线，理性（reason）朝向一个界定明确的终点大步前进——简言之，这个终点代表的就是“启蒙”。这个时候，亦即在18世纪晚期，它还尚未与“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市民社会）的理念发生关联。

经历了一代人之后，只在歌德那里，这两个理念才开始被联系在一起，其时中欧的文化资产者开始形成，并提出自己的规划。然而，歌德对这两个理念之间的二律背反，却怀有一种强烈的悲剧感。^① 尽管他本人坚定地致力于启蒙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他还是强调，Bildung从根本上说是人格全面、发展和谐的贵族理想，无法在资产阶级社会维系。用歌德自己的术语说，资产阶级必须适应“单面的时代”（Zeit der Einseitigkeiten），这样一来，Bildung就变成了Ausbildung（训练）和Berufsbildung（职业培训）。因此，关于文化资产者的短暂角色，歌德得出一个悲剧性的见解：如果它想实现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规划，它就必须摒弃自己。

自歌德之后，这种对Bildung的悲剧性理解便销声匿迹。对19世纪中期中欧的自由主义者来说，Bildung是德国走向资产阶级社会特殊道路（Sonderweg）的同义语。^② 他们认为，德国的发展，尤其是自19世纪中叶

^① *Meyers Enzyklopaedisches Lexikon* (1972) vol. 4. Mannheim: Lexicon Verlag, p. 195.

^② “Durch Bildung wird der Mensch zum Bürger”（通过文化教育，一个人才能成为市民）参见 Mosse, “Das deutsche-jüdische Bildungsbürgertum”, pp. 169–180。在这个意义上，柯卡是19世纪中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直接继承者。虽然“二战”之后，许多德国的自由主义者将德国例外论看做纳粹主义的根基，但柯卡却并不完全接受这种消极的解释。例如，他争辩道，在“古典”模式，亦即英国模式中，文化资产阶级分子的欠发达也许并不是一个优点（1995年春季在UCLA发表的演讲）。

以来，一直走在“黄金般的中间路线”（golden middle road）上。这种中间路线，是对文化与文明、文化资产阶级与经济资产阶级、社会稳定与快速工业化的一种折中。显而易见，这表现了一个新兴阶级的自信，他们宣称自己正在力图实现一个新“综合”。

实际上，从1870年到1890年前后，在中欧地区发生了一场实质性的现代化，其进程遵循着与文化资本家的想象相一致的路线。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过程得以加速，而普鲁士和奥匈帝国也开始谨慎地尝试扩展公民权并形成公共文化，在这个意义上，整个社会确实被快速地资产阶级化了。但是，我们并不是在声称，文化资产者在中欧曾获得过霸权性的位置。在特权统治集团中，文化资产者有一个令人生畏的强大敌人，而且他们未能成功地向社会推广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另外，他们只能通过与文职官僚体系结成一个不稳定且自我限制的联盟，才可能获得仍然相对贫乏的政治权力和影响力。

实际上，我们的主张是，19世纪中欧的文化资产者乃是由一个知识分子的联盟所构成的。这个联盟中的成员，一方是人文知识分子（humanistic intellectuals）^①，另一方是一部分以公务员为业的知识分子。处于矛盾地位的德国“官僚”教授（“mandarin” professors），是这个联盟的最佳代表。他们一方面是富有声望的知识分子，同时又拥有公务员的级别。结果，他们更为保守，而且他们的生活方式与那些地位较高的公务员，而不是与那些先锋派（avant-garde）知识分子更为相似。但另一个事实是，对普鲁士和奥匈帝国公务员的主体部分来说，这些官僚知识分子又扮演了模范和导师的角色，因此这些官员的身份认同和世界观不能被简单地描述为“官僚主义的”，至少在这个词的通俗意义上来说不能如此表达。“受过教育的中间阶级”是一个更为贴切的说法。

那么在什么意义上，我们有可能将这个社会群体想成一个市民群体（a group of Bürgers）呢？他们为国家服务，违背了作为市民（citizens）的角色，这是事实吗？他们的合法性基础，并不是他们所掌握的知识，而是所占据的公职，以及国家委派给他们的权威。不过这里依然要说明的是，很显然，为了获得公务员的职位，他们通常必须持有学历证明，并且要接受有分量的大学教育；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与官僚知识分子接触，并学会认

^① 人文知识分子这一提法来自古尔德纳，在《新阶级的兴起与知识分子的未来》一书中，古尔德纳区分了两种知识分子，一是人文知识分子，二是技术专家。——译者注



可后者在文化上的权威。文化和教育（Bildung）的影响和共同纽带解释了为什么普鲁士或奥匈帝国公务员的社会类型，和“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有着明显的相似性。一般来说，这些公务员将他们自己描述为“开明人士”；他们和大部分人文知识分子拥有共同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他们信奉程序理性，崇尚高效和确定性；他们还相信，他们为之服务的政府是推动改革、变迁，以及现代化的车轮。

20世纪中欧公务员官僚制这种程序主义和理性主义特征，或许有助于解释韦伯颇有争议的官僚制理论中的一些复杂之处。如果不考虑这一特殊历史群体与文化资产者之间的密切联系，韦伯所相信的官僚制是法理型权威最纯粹形式的主张，就会令人相当不解。^①对很多学者，尤其是社会主义的研究者而言，这个判断似乎是荒谬的。它也与人们的共识相违背，那就是，官僚制是与“橡皮图章”（red tape）和无效率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19世纪中欧的官僚制在有些时候的确非常压抑和沉闷（Kafkaesque）^②，以至于人们会有上述共识一点都不为过。不过，在这些官僚普遍的“开明”特征中，以及他们招募受过教育的中间阶级，让他们将公务视为“天职”（vocation）的能力中，韦伯理想类型的“理性内核”——或者，在那样一种情况下，黑格尔主义关于官僚作为普世阶级的理论的“理性内核”——依然存在。

一个有用的办法是，在概念上将这些公务员行动者与文化资产者区分开来，并给前者贴上 Beamtenbürgertum 或是 bourgeoisie of officials（官员资产阶级）的标签。这里的要点是，他们是中欧资产阶级化规划的组成部分，并因此成为文化资产者的天然同盟。对于受过教育的中间阶级来说，在公共部门之外的就业机会相对较少，所以，在人文知识分子和官僚之间存在着大量的人员循环。此外，如果在公务员中没有自己的代表，也就没有任何可能使得文化资产者的规划成为现实。Beamtenbürgertum 这一概念的要点是，对辨认“第一代文化资产者”的规划而言，它是有意义的。也就是

^①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p. 220. 也可参见 p. 226。在那里，他注意到了实质理性和管理主义心智之间的亲和性，这与他原先的观点似乎有点矛盾。因为他曾假定，法理型权威的实质，更多的是形式理性，而非实质理性。

^② kafkaesque 在英语中，应用于一件不可理解、不可思议、十分隐晦的事件上。法语中多半指工作方式非理性化，没有透明度，令人感到压抑的官僚作风和政治体系，特别是后面一种意义，现在越来越流行。意大利语中特指时代的恐惧感。在北欧，这个词的意义包罗万象，与美国、德国的使用状况相似。——译者注

说，它只是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和公务员之间的核心联盟。在这里，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都受到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吸引，而公务员则拥有政治行动和制度建设的能力，并且对程序理性深信不疑。^①

另一个事实是，当这个联盟解体，人文知识分子接纳了“相反文化”的生活方式，并且开始奚落而不是羡慕公务员时（大约开始于19世纪10年代早期），这也就意味着“第一代文化资产者”规划的终结，以及中欧人文知识分子与左翼和右翼激进主义恋爱关系的开始。在20世纪20年代，“真正的知识分子”不再将自己视为资产阶级，他们把 Bildungsbürgertum（文化资产者）这个术语看做 Bildungsphilister（文化市侩）这个贬义词的同义词。^②

然而，在理解资产阶级化规划的崩溃时，不可能不去考虑它最为强大的敌人——特权统治阶级——以及由他们所施加的对抗压力和贵族化的诱惑。实际上，有一些证据表明，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不但特权统治阶级没有逐渐变成严格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市民（citizens），而且，那些掌握政治权力的族群（大部分都是德国和匈牙利人）中的文化资产者反而被贵族化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甚至连被同化了的犹太知识分子家庭，也未能抵挡住贵族生活方式的吸引力。毕竟，捷尔吉·卢卡奇（György Lukács）将他的第一部书署名为捷尔吉·冯·卢卡奇（György von Lukács）；我们从同时期的室内照片中还可以得知，处于世纪之交的波兰尼（Polányi）一家人，其家庭住宅，也与那个时期任何一个城市贵族家庭一样。^③ 而且，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德国的情况一样，公务员官僚同样受到贵

① Engelhardt, "Bildungsbürgertum", p. 14. 这位作者争辩道，在向资本主义的转型中，他所说的“verbeamteten Intelligenz”（受教育的中间阶级官员）扮演了支配性的角色。他也将其称为“intelligenz Bürgertum”，虽然我们相信，“Bildungsbürgertum”是一个更为精确的术语。

② Bildungsphilister 这一术语是由库诺·布龙巴赫尔（Kuno Brombacher）创造的，他早年曾是民族社会主义的鼓吹者，虽然他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批判，对左翼知识分子也颇有吸引力。Engelhardt, "Bildungsbürgertum", pp. 188 - 191.

③ 作为大地主贵族阶级，德国的容克阶级一般都在姓氏前面加 von，以表明自己的身份。所以，在大多数时候，德语里的 von 跟法语、意大利语中的 de、di 一样，是贵族血统的标志。不过也有所谓的“蔬菜贵族”，其名字中的 von 只代表“来自”的意思，而没有贵族血统。卢卡奇出身于匈牙利籍犹太家庭，父亲是当时匈牙利最大的银行“匈牙利通用信贷银行”的经理，1891年成为匈牙利皇室枢密官，进入贵族阶层，因此卢卡奇才会在自己的姓氏前加上 von，而这个 von 本来是不存在的。卡尔·波兰尼和他的弟弟迈克·波兰尼，也出身于一个匈牙利籍犹太家庭，父亲因建筑铁路而致富，从而跻身资产阶级行列。——译者注



族化的吸引。高级公务员和官僚化的教授，如果他们自己不是容克家族的成员，就会挖空心思地想办法进入那个阶级，不论是通过联姻，还是通过模仿容克阶级的生活方式。

那么，我们究竟从世纪之交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的，是不断加剧的两极分化，以及原先相当均质的“文化资产阶级”的瓦解。^①推动这个群体分离的，是这样一些与之相反的趋势：市场与工业的增长为那些拥有市场技能、受过教育的人提供了在私人部门中实现职业化的前景；其他一些在这种发展中被边缘化的受教育群体，受到了“激进”的反资本主义思想的吸引；最后，受过教育的中间阶级的其他部分，尤其是那些来自更为古老显赫家庭的人们都被贵族化了，或者至少是接纳了高度资产阶级化的生活方式。受教育的中间阶级中的社会分裂表明，他们正处于痛苦的意识形态争论，尤其是围绕有关资本主义和“现代性”而展开的争论之中。^②因此，伴随着文化资产阶级的解体，打造资产阶级社会的乌托邦计划也破产了。

（二）第二乐章：右翼与左翼激进主义的魔力，以及新阶级规划的吸引力

尽管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文化资产者的贵族化程度，是一些社会史学家争论的主题之一，^③但他们无一例外地承认，到“二战”末期，文化资产者的规划就已经破产了。它的瓦解主要并不归咎于贵族权力的衰落，虽然在那次战争中贵族的权力被大大削弱。毋宁说，对文化资产者规划的

① *Bildungsbürgertum*（文化资产者）这一概念是否反映了历史事实，或只是存在于历史学家的头脑中？受这一问题的压力驱使，柯卡主张，对于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中期来说，使用这一概念是有意义的。他令人信服地指出，在上述时期，存在一个同质的群体，可以被称作“文化资产者”。不过，在同一篇文章中，他也指出，随着19世纪继续向前推进，这一概念的意义逐渐下降，因为这一群体的分析单位在逐渐消失。Jürgen Kocka (1989) “Bildungsbürgertum; gesellschaftliche Formation order Historikerkonstrukt?” pp. 9 - 20 in *Bildungsbürgertum im 19. Jahrhundert*, vol. 4, ed. Werner Conze and Jürgen Kocka. Stuttgart: Klett-Cotta.

② 参见 Ringer, *Decline of the German Mandarins*, pp. 128 - 199。他论述了官僚阶级中“现代派”与“正统派”之间斗争的社会基础。他认为官僚阶级分裂的时期，是1890年左右。这一判断，与柯卡的十分接近。

③ 柯卡和其他社会史学家认为，韦伯过分夸大了中欧资产阶级在19世纪晚期被重新封建化的程度，因此，“双重分层秩序”的命题低估了资本家阶级关系的发展。Kocka, “Einleitung”, (1987b), p. 10.

支持确实被逐渐增长的对资本主义的幻想而销蚀，而这种幻想又因大战而加速。中欧的知识分子阶层首先失去了对经济资产阶级的热情，认为后者应当为战争负起责任。自此，知识分子阶层便开始质疑资本主义转型本身的可行性和吸引力。战争也毁掉了知识分子和公务员之间的联盟，因为公务员依然效忠于国家利益，即便是在国家最好战和最不理性的时候也是如此；但就在同时，战争也摧毁了旧的帝国，并且随着这一切的发生，公务员的权力基础也一并坍塌了。

讽刺的是，文化资产者规划的崩溃，正好发生在资本主义转变在中欧社会上演之时。在19世纪最后一个十年里，这一地区经历了实质上的城市化以及工业化。柏林和布达佩斯是欧洲发展最快的大都市，它们的发展速度可以与同时期的芝加哥和纽约相媲美。尽管中欧仍然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半边缘地带，但它或许永远都不会像在20世纪最初几年那样接近发达资本主义的核心。事实上，在经济发展上，德国和波希米亚的西部地区曾一度与同时期的资本主义核心处于同一水平。

即便如此，在这一时期，甚至直至“二战”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声音都已经转变成一种失望和“绝望”。他们因为认为现代化已无可挽回地失败，而指责贵族和他们继续存在的统治。马克斯·韦伯就是这些“绝望的自由主义分子”中的一员，而他的智识发展正是从这种观点中受到了启发。韦伯著作的早期部分，创作并发表于19世纪，是一个文化资产者进行反思的典型。这个时候，韦伯对资本主义转变这一理想深信不疑，而他对普鲁士社会与政治秩序的迂腐陈旧以及反动的本质已是无法容忍。在精神崩溃之前，韦伯是一个改革者，对德国社会该往何处去有着明确的答案。然而，在许多方面来说，韦伯都不愧是20世纪与众不同的人物。在他康复之后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①，现代性变成一个“铁笼”，现代化的故事也就是一个有关“祛魅”（disenchantment）的故事：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理性主义世界使人丧失人性，但在现实中只有它，而别无选择。尽管终其一生，韦伯都保持着对自由的承诺，但是战争的经历，以及它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非理性和残酷，都使韦伯痛苦地意识到人类为实现资本主义转型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他开始将这种代价看做越来越沉重的负担，但他从未得出结论说，这笔负担已经高到我

^① 韦伯于1897~1903年间精神崩溃，被迫停止一切教学、研究与政治活动。1903年他重返学术界，并于1904年11月发表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第一部分。——译者注



们根本不值得承受。

但是，一些与韦伯同时代的人，却得出了这个结论。在他们看来，弗朗茨·约瑟夫皇帝（Kaiser Franz Josef）的轻歌剧世界^①和普鲁士的官僚制铁笼，都是在永无止境地复制自身。结果是，右翼和左翼的激进主义都开始传播开来。尽管不可否认的是，右翼意识形态吸引了一些优秀的知识分子，但在我们看来，激进的革命左翼却有着更加强烈和难以抵挡的吸引力。当然，这种吸引力的主要原因在于，它为中欧“在社会上无所依附”的知识阶层提供了一项历史使命，这种使命不仅契合而且超越了文化资产阶级的规划。另外，对许多一直对经济资产阶级感到担忧的知识分子来说，左翼激进主义也很有吸引力。这些知识分子不能容忍工具理性的霸权，对成为职业人士的前景不感冒，因为那样的话，他们的知识就被降低到实际的技术层面。左翼激进主义，尤其是从马克思主义中获取灵感的社会主义规划，承诺给“有知识的人”另外一种角色：知识分子可以成为历史的先锋，成为把自己“投身”到无产阶级历史任务中的革命理论家。

在这一方面，捷尔吉·卢卡奇在智识上的轨迹很有启发性。在海德堡度过的那些年月里，他与韦伯交往甚密——不仅是作为韦伯的一个家庭朋友，而且还作为一位思想者。实际上很明显，在这一时期韦伯和卢卡奇都对彼此的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有可能的是，或者是韦伯的“祛魅”观念最先给卢卡奇以启发，为他最终形成的物化理论提供了思想的轮廓，或者是卢卡奇对异化问题的兴趣刺激了韦伯，使他借助祛魅这一概念来阐明现代性的二律背反。不论哪一种情况，都可以很容易地看出，即便在早期，卢卡奇都已经比韦伯要激进许多。尽管他们持有共识——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祛魅了的实体，亦即一个人们身居其中却无家可归的世界——但卢卡奇同时还在探索解决之道。在他看来，尽管现代性肢解了人类存在的整体性（totality），但恢复这种整体性仍然具有历史的可能。比如说，卢卡奇就在希腊艺术中找到了这种整体性，在《小说理论》（*The Theory of Novel*）一书中，他也同样觉察到他那个时代俄罗斯文学中存在的整体性的可能。

简言之，自20世纪早期伊始，被歌德称为生产性二律背反（productive

^① 弗朗茨·约瑟夫（1830-1916）是奥匈帝国的皇帝，电影《茜茜公主》里男主角的原型。在他统治时期，奥地利的艺术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尤其是圆舞曲和轻歌剧（operetta）。——译者注

antinomy)的东西——亦即存在于“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张力，以及 Bildung（文化）相互抵触的含义——就开始获得不同的价值和意义。文化不再被看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元素，它与市场以及私有制发展的关系，一部分是紧张，另一部分是协调。而且它开始暗示，尽管每一个国家的经济都相对滞后，但与“特殊道路”（亦即中欧道路）有关的见解，不仅异于而且优于西方的现代化途径。^① 在本章正在讨论的概念中，我们可以说，对那些早期持有这一观念的人而言，一个不证自明的事实是，他们是文化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或者作为支持者，甚或是资本主义转型的先锋；但对卢卡奇而言，即便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这种认同也充满了矛盾。他表现出一种高涨的反资产阶级情绪，将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等同于文化的退化、人类关系商品化，以及工具理性独占霸权。对于卢卡奇及其同时代人来说，逃离这种霸权的唯一希望所在，就是文化。在他们看来，文化是一个避难所，一个“家园”，甚至是一种革命性的力量。实际上，在卢卡奇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革命者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是一个“文化上的革命者”，他相信，整体性可以在文化中得到实现。不过，在1918年末，他实现了一个巨大的飞跃：他对“家园”的向往将他带到了马克思和共产党那里。卢卡奇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入了党，并且这个在文化上持相反观点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夜之间皈依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一名事实上的无产者——这一切，就像扫罗（Saul）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变成保罗（Paul）一样。^②

卢卡奇的轨迹，就像扫罗的一样，从自世纪之交直至20世纪50年代，成为中欧知识分子一遍遍顶礼膜拜的对象。不错，这不仅在中欧，在西欧也同样是事实（尤其是在法国和意大利）。在那里，如果一个人要成为一

① 参见 Brüggermeier, “Der deutschen Sonderweg”; D. Blackburn and G. Eley (1980) *Mythen der deutschreibung Die gescheiterte bürgerliche Revolution von 1848*. Frankfurt and Berlin: Ullstein.

② 保罗是最著名的圣徒之一，原名扫罗（Saul）。扫罗是希伯来人惯用的名字。保罗是罗马人惯用的名字。为了便于在罗马人管辖地传道，扫罗改名为保罗。保罗的悔改有一段奇妙的经历。他本来是一个极力逮捕、关押、刑讯基督徒的人，在去大马士革搜捕信徒的路上，耶稣亲自向他显现并向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保罗立时双眼失明，只好被人领进大马士革，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当地一个很有名望的虔诚信徒，顺服神的带领，前去医治这个本来要捉拿他的人，并亲切地称他为：“兄弟扫罗……”这时的保罗痛心悔改，信了耶稣为自己的教主，并且尽力宣扬耶稣的教恩，为了传讲福音曾屡遭苦难，最后甚至殉道而死。全部新约圣经共有27卷，古代信徒都认为，其中有一半是保罗在神的感动下写的。——译者注



名真正的知识分子，就至少要有一段短期的左翼革命者的奇遇，这是“必需”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关斯大林主义的“坏消息”会尽可能长地被压制、隐瞒，还有很多透露消息的人都在智力上被“杀戮”了（基本上一直持续到1956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大会的召开，和苏联对匈牙利人民起义的镇压）。卢卡奇生命历程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对独裁和党的忠诚。尽管对大多数左翼激进主义知识分子来说，这只是一段相当短暂的际遇，但卢卡奇却终其一生保持着对党的忠心，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对于在现代世界中无家可归的焦虑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自始至终都无法离弃自己寻到的那个家园。

与左翼激进主义的奇遇还没有尽情地表达，俄国革命的短暂热情就已经转变为斯大林主义的大屠杀，但是此时，中欧的知识分子（例如卢卡奇）却发觉对此难以放弃。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他们这种承诺的核心，在于他们相信国家社会主义的改革是可能的并且是迫切的。改革赋予他们一种目的论知识分子（teleological intellectuals）的角色，党曾经许诺给他们这种角色，但后来又对此予以否认。因此，他们普遍性地预见到了作为一场理性化过程的社会主义改革，而在这个过程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共产主义政治集团最终将会与知识分子阶层联成一个整体来分享权力。又过了十年，在目睹了对布拉格之春的镇压之后，知识分子方才意识到，与官僚政治分享权力是不可能的。反过来，这使知识分子迅速得出结论：必须推翻社会主义而不是对其进行改良。

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在中欧的知识分子阶层对资本主义现代性丧失信心之后，左翼革命者的反资本主义只是向他们敞开的诸多道路之一。一般来说，选择这条道路的更多是人文知识分子，而不是公务员或者受过教育的中间阶级中的民众。后者中的很多人都选择了一种民粹主义的方式来反对资本主义，这种方式偶尔会带有左翼的色彩并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趋同，但更为普遍的情况是，它与激进右派的目标与实践同流合污。当左翼知识分子为自己勾画作为工人阶级“有机知识分子”^①的社会职能时，民粹主义者正在为“人民”代言，他们成为各种农民党、法西斯主义运动，以及威权主义军事独裁的领袖。于是，左与右之间的分界线实际上相

^① “有机知识分子”以及相对应的“传统知识分子”是葛兰西提出的一对著名概念。所谓的“有机知识分子”，强调的并不是“知识”分子，而是知识分子的参与职能，他们可以赢得“文化领导权”的胜利。——译者注

当狭窄：对某些人来说，“人民”就是工人；对另一些人来说，“人民”则象征着未受破坏的民族灵魂——这里的民族，主要指的是农民的特征，这些特征与那些支配了城市生活的种种可耻的元素（它们常常是异己的或“异族”的）是截然对立的。

对中欧知识分子阶层来说，右翼冒险经历的篇章相当简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它已结束，而左翼的狂热则延续了更长的时间；并且，正如我们在上文所解释的那样，它本身有一种邪乎的吸引力。尤其对那些在战争期间成年的更年轻一代来说，比起重建文化资产阶级的规划，左翼激进主义向他们发出的召唤更能博得他们的注意。不要让中欧的知识分子肆意沉溺于历史的重造之中，而这正是过去十年里，尤其是自共产主义垮台以来他们在做的事情；我们不接受他们集体生命历程记忆所隐瞒的事实，我们也不接受这样一个故事：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从一开始就处在，而且一直处在与共产主义的冲突状态中。事实的真相是，1945年前后，在中欧，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力量是薄弱的。它对那些30或者35岁以下的人几乎没有什么吸引力，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都更青睐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计划。纳粹主义也并不像今天一些知识分子所宣称的那样，就是斯大林主义的孪生兄弟，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结果。于是，对于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来说，反纳粹主义就同反资本主义一起变成了并驾齐驱的事业。^①

现在就来判断广泛传播的左翼激进主义在“二战”后的状况如何，尚有困难。由于这一地区被红军占领，反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只能保持沉默，或者受到压制，或者去往西方国家（尤其是那些有着更为明显的资产阶级倾向的人）。在这里我们唯一的主张是，在那些留下来的，以及声音可以被听到的知识分子中间，支配性的意识形态也已经不是19世纪的那个文化资产阶级的计划，毋宁说，是一种让年轻知识分子投身于领导社会的历史使

^① 纳粹主义是否得到一个强有力的资本家阶级的支持？或者，它是否反映了布尔乔亚的相对弱势？关于这些问题的争论，回到了关于中欧例外论或德国“特殊道路”的争论上。关于这一争论，在知识分子的历史上共有三段插曲。第一段插曲发生在20世纪早期，反对资本主义的知识分子转而发现，中欧资本主义的相对欠发达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完全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他们把“特殊道路”捧上了天。第二段插曲，大约发生在“二战”结束之后的德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将“特殊道路”或中产阶级的弱势发展重新解释为纳粹主义的肇因，以及克服纳粹主义的障碍。因此，他们重新为自己设计了文化资产者的角色。在最后一段插曲中，伴随着“新左派”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瓦解，中欧的知识分子阶层将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等同起来，并且加入德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行列，成为新文化资产者的一部分。



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

命中的意识形态。

渐渐地，这批知识分子开始转变对共产主义的态度。对其中的一些人来说，共产主义的幻想在1953年就破灭了；实际上，在1956年时，在匈牙利和波兰发生的反斯大林主义的运动中，原先那些年轻的共产主义者就扮演了关键角色。但故事要比这复杂得多。20世纪50年代末这些反斯大林主义的知识分子阶层，更倾向于将斯大林主义理解为是对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扭曲，而不是非常一致的表达。因此，斯大林主义就被那些被认为持“真正”社会主义立场的人拒绝了。

在这一方面，1956年的匈牙利具有一种启发意义。回顾历史我们知道，起义的爆发将各种非常不同的因素都集合在了一起：一些人是“共产党改革派”，尤其是那些想要用“真正的社会主义”（这里没有双关之意）来取代斯大林主义的年轻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其他一些人是“自由战士”，他们多是那些想要恢复前共产主义社会秩序的、享有特权的前共产主义家庭的后代。在起义失败之后，就如何为运动“定性”这个问题，人们展开了激烈斗争。那些试图恢复共产主义秩序的新斯大林主义者坚持将运动称作“反革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很多“自由战士”也认为这是合适的说法。毕竟，建立于1919年苏维埃共和国废墟之上的霍尔蒂政权（Horthy regime）^①，就骄傲地称自己为反革命。但共产党改革派却不能接受这个标签。这是因为他们仍然信奉一套关于社会经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坚持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的革命者”，只有他们才能作为执行者来推动真正进步的历史变迁。

尽管这些关于“定性”的斗争打得如火如荼，但它们都没能经受住时间，以及中欧知识分子阶层发展进化的考验。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期间，很多人因为争论1956年是否一场“革命”这一话题，而做好了失业甚至去坐牢的准备，但这对于1989年的年轻知识分子而言，早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尽管纳吉·伊姆莱（Imre Nagy）这一共产党改革派的英雄（在他被行刑之前，最后记录下来的话表达出一种愿望，就是“由国际无产阶级”来

^① 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匈牙利共产党于1919年建立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但在133天后就很快被镇压。霍尔蒂·米克洛什（1868-1957）正是镇压的元凶，他实行白色恐怖，屠杀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1920年3月1日，他更是用武力强迫国会选举他为摄政王，恢复君主制度，建立独裁政权。——译者注

判定他的历史角色)在1989年6月被重新安葬^①,但这一事件也只是引起了相对很少人的关注,几乎都是中年人和老人。对于更年轻的一代来讲,这只不过是一场国内的共产主义争论。他们并不准备将其作为自己追求的事业。纳吉的重新安葬,也标志着“共产党改革派”和“自由战士”之间最后的决裂。后者希望将1956年看做一场民族主义运动,他们的目的在于恢复教会的角色、宗教信仰,以及传统的匈牙利文化与社会价值观。而前者则开始将他们过去的盟友描述为原始法西斯主义者(proto-fascists),并且将他们自己的运动重新解释为一场争取公民价值与自由民主的斗争。

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前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向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集体转变,在1968年之前并未发生,尽管这是紧张的定性斗争中的一件要事。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知识分子更有可能支持专家治国论社会主义,或者是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观点,并且将自己看做社会主义者或社会民主主义者,而不是自由主义者。在一些情况下,他们甚至将自己看做新斯大林主义秩序的“左派”。简而言之,从他们与左翼激进主义的奇遇,到形成新自由主义分子的新认同,中欧知识分子的这条转变之路历经了一段现在看来已经是死胡同的改良社会主义的历程。当时统治性的意识形态就是改良共产主义,这种观念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变成民主的政治体系,也可以作为一个经济体系相对有效地发挥功能。这一观点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渴望看到斯大林主义官僚制的“逆向选择”被消灭,这样,知识分子就可以凭借他们所掌握的专业知识,来占据社会中关键性的领导位置。

中欧知识分子阶层的不同部分对改良社会主义感兴趣的理由各不相同。其中的一些人,尤其是来自“旧左派”的那些,是受到这样一种可能前景的吸引,即改革最终会兑现社会主义革命的诺言,而这一诺言被斯大林主义背叛了。20世纪50年代末期列宁主义的复活,就是这种意识形态旨趣的一个直接后果。对另外一些人,尤其是那些专家治国论者而言,“改革”承载了一种更为理性的社会秩序的含义,其中一点就是科学将成为主要的生产力,而理性将克服市场的无政府状态。“新经济机制”的口号就抓住了将改革看做是一种完美的再分配机制的产物这一想象,

^① 纳吉·伊姆莱(Imre Nagy)(1897~1958),匈牙利政治家。纳吉曾于1953~1955年短暂出任匈牙利总理,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再度出任总统,企图推动自由化与退出华约的计划;后来苏军长驱直入布达佩斯,纳吉寻求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的援助,但没有成功;1956年11月22日纳吉被捕,在秘密审判后被处决,并被草草掩埋,所葬之处被苏联列为机密,直到1989年匈牙利民主化后他才被重新安葬。——译者注



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

他们将以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基础来实施管理。还有一些，尤其是那些更年轻的“新左派”知识分子，则受到了“人道的社会主义”承诺的吸引。像卢卡奇一样，他们都对“整体性”，亦即对将社会主义转变成一个家园有着浓厚的兴趣。在这个家园里，西方的罪恶（消费主义、异化、自我主义）得以避免，而与此同时，文化也重新获得无上地位。在他们对斯大林主义——有时他们将此建构为资本主义的孪生兄弟——的批评中，你可以听到20世纪早期的知识分子对“文明世界”（civilization）表达愤懑时所传来的回音。

尽管有这些差异，这些群体还是有共同的信仰，那就是：理性的知识话语将在社会变迁和对社会的管理中扮演最主要的角色。他们都认为，在20世纪60年代，“文明世界”正“处于十字路口”，而他们则注定是要把它带到一个更美好未来的行动者。如果我们用一种后知后觉的眼光来看，这种信仰或许听起来很天真，但在当时，它却并非那么不切实际。随着斯大林离世，中欧的共产主义遭受了一次合法性危机，斯大林主义官僚体系急于寻找盟友、合法性以及新的思想。所有上述这些群体都代表了可望成功的候选人，他们也许能够将科学、人文主义或者革命激进主义带入这种联盟。

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改革，上面提到过的两类新行动者出场了：专家治国论者，以及大概可以被称作是中欧“新左派”的那些人。这两者普遍比1956年的“共产党改革派”和“自由战士”要年轻。专家治国论者相对没有意识形态倾向。他们对建设社会主义这项工作感兴趣，认为如果能运用恰当的精英遴选程序——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能力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可以放弃权力，或者至少能够和他们分享决策权——这项任务就可以实现。

中欧的新左派同样也玩弄着妥协的把戏，但这场不严肃的恋爱并没专家政治和官僚政治之间曾经的恋爱关系持续得那样长久。很多新左派成员都是前共产党员的子女，这些共产党员有些是肃清运动的受害者，有些本身是清除别人的肃清者。这些子女最终得出的结论就是，专家治国类型的实用主义改革悖逆了社会主义的真正目标。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对现政权的反抗，就是对他们自己父亲的反抗。他们首先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或者是共产党，并且试图从内部推进改革。当他们意识到以这种方式推行改革充满了巨大困难时，他们就进入了与官僚制的直接对抗中。这一方面的典型事例有波兰的库隆（Kuron）和莫泽莱夫斯基（Modzelewski），

匈牙利的基什（Kis）和班采（Bence），以及捷克共和国的卡万（Kavan）和乌尔（Uhl）。

20世纪60年代的中期与晚期，在这些各不相同的群体之间发生了实质性的竞争与卡位——不妥协的官僚、年轻的技术专家、新左派知识分子、“共产党改革派”，以及“自由战士”。在这个关节点上，一种开放性的历史可能性在于，这些群体有可能就权力在它们之间的分配问题，以及由此而来的有关改革的过程与特征的问题再做协议。尽管不同群体之间存在争议，但我们认为，在这一通过斗争而形成的团体中，我们可以辨别出某种也许能贴上“知识分子权力计划”或“新阶级规划”标签的东西。在改革的背景之下，知识分子中这些形形色色的群体有可能会接管政治和经济系统中的指挥位置。^①

我们的核心主张是，自20世纪早期以降，在大约五六十年时间里，中欧知识分子中支配性的意识形态都是反资产阶级。在纳粹主义垮台之前，他们在左翼和右翼的激进主义之间摇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们明确将自己定位为左派，甚至在他们开始反对斯大林主义之后也是如此。最终，他们被把反资本主义带到它的逻辑终点这一可能性吸引，他们为自己刻意谋求了一种位置，不是作为“市民”而是作为“持目的论的知识分子”，亦即成为“新阶级”而不是文化资产阶级。

中欧知识分子在这一历史轨迹中的关键转折点是在1968年。随着（苏军入侵）波兰事件的发生，以及对“布拉格之春”的镇压，中欧的知识分子阶层开始怀疑与强硬的官僚之间的妥协是否可能。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知识分子权力计划的实质是在强硬派官僚、专家治国论者，以及批判性人文知识分子之间达成和解（*rapprochement*）的话，那么这一计划显然无法在1968事件之后继续维系下去。这种教训并不是每一个地方都能立刻领悟。或许捷克斯洛伐克是领悟得最快的地方，尽管仍然有很多“人道社会主义”的积极分子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忠于这一梦想（某些人至今矢志不渝）。在波兰，幻灭也很快降临，但在东德和匈牙利就慢了许多。在后面两个国家，多年之后，很多知识分子依然认为1968年事件只是“改革过程”中一个暂时的挫败。不过在东德和匈牙利，最晚到20世纪70年末期，便都有了规模可观的知识分子群体转向激进。至此，他们得出结论：社会主义是

^① 参见 George Konrád and Iván Szelényi (1979) *The Intellectuals on the Road to Class Power*. New York and London: Harcourt Bruce Jovanovich.



无法进行改良的，同时他们开始将自己视为新规划的一部分。他们在“市民社会”这个旗帜下集合起来，这并不令人感到惊讶；实际上，在那些对社会主义的幻想破灭得最彻底的地方，它被视作一场“资产阶级化”的规划——亦即一个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规划。

（三）第三乐章：中欧知识分子阶层重返资产阶级化的规划

20世纪70年代末期，当中欧的知识分子阶层再一次将自己的历史角色假定为资产阶级转型的领导者的时候，他们形成了与第一代文化资产者大相径庭的意识与联盟。中欧的第二代文化资产者是由异议分子和专家治国论者组成的，其中异议分子中的大部分都来自20世纪60年代的“新左派”，而专家治国论者中有一些积极参与了1968年的改革，但大多数还是属于年轻一代。这两个群体在20世纪的70~80年代走过了彼此不同的道路，而后在1988~1989年前后联合起来。

20世纪60年代期间，在专家治国论者与新左派知识分子之间存在许多张力，但在经历过整个改革过程后，他们却由于如下共识而团结起来：真正的裂缝不是发生在他们之间，而是他们与官僚政治之间。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都被古尔德纳所说的“批判性话语文化”吸引。^①两个群体都看重通过合理的论证来确立真理，反对诉诸权威。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形成了共同的社会网络，这是由于他们都受到高雅文化的吸引，并且可以在拥挤的音乐会会场和剧院，或者是布拉格、布达佩斯和华沙文学社团组织的“沙龙”里寻找至交。

1968年事件动摇了技术实用主义者和新左派意识形态批判家之间的不稳定联盟。新左派迅速走上了异议人士的道路，并且开始与政权形成直接对立。对他们中间那些在苏联干涉捷克斯洛伐克之后，以及在波兰被打压的过程中遭到“肃清”的人来说，持不同政见成了一种生活方式——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天职”。在那个时期，他们不再惧怕警察国家，也不再对获取政治影响力有什么热情。知识分子阶级规划的失败，或许也摧毁了他们对意识形态的信仰；但他们在坚持异议的过程中发现了一条道路，这条路能够让他们重新找回自己灵魂中已经失落的纯洁，回忆起“二战”前那些自愿“无所依附”于社会的贵族知识分子。所以，他们并不介意自己是

^① Alvin Gouldner (1979) *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s...*, pp. 28-42.

否会被捕入狱，并且还会在那里待上几个星期，因为这是一个进入持不同政见“圣徒团体”的人会议式。

相反，知识分子中的那些技术专家群体，惊恐地目睹了持不同政见者的发展。他们仍然忠于实用主义，奉行妥协，坚持改良而不是革命，而且他们对于自己的灵魂也不太关心。因此，在1968年后，专家治国论者和异议人士只能分道扬镳。异议分子愈加认识到技术专家不再是自己的合作人，而有着改革想法的专家治国论者也刻意回避那些异议分子，将他们视为不负责任的“麻烦制造者”。即便是那些在20世纪60年代曾一度将二者聚集起来的社会网络也破裂了。异议分子从事秘密活动，传播地下出版物（samizdat），在秘密的房间里聚会讨论，学习阴谋诡计。结果是，在相对狭小的圈子里，他们与世隔绝。对于专家治国论者来说，他们认为被别人看到与异议分子交往会对自己产生负面影响，所以不想去冒这个险。因此，他们尽力和那些“空想家”以及“异议分子”划清界限。

专家治国论者与异议分子，也同样因为生活方式和品位而彼此有所区别。后者是在20世纪60年代期间步入成熟的，他们被社会化为“新左派”。于是，他们就有一种特别的“反文化”的心智。从他们的生活方式、艺术品位、性道德观，以及对于家庭和宗教的态度上来看，他们类似于反布尔乔亚的“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因此，当他们最终提出资产阶级化这一规划的时候，他们花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来协调其外在的意识形态与内在的价值观及生活方式之间的矛盾。而另一边的专家治国论者，是“社会主义良民”，他们重视家庭生活，在稳定的20世纪70年代成熟，他们以最快捷的步伐轻松迈向了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目光注视着西方，而且在很多方面，他们都在努力模仿西方的传统。

历史的反讽恰恰在于，他们二者虽然彼此隔绝，但为了回应1968年的冲突，作为知识分子阶层的不同部分，他们都开始发生变化，而他们变化的方式最终使和解成为可能甚至必需。就异议人士的情况来讲，这发生在他们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以及所有形式的宏大理论绝交的时候。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独特发明，就是“反政治”的话语（discourses of “anti-politics”）。这意味着，“批判性话语文化”开始占据中心位置。这种“批判性话语文化”也是一种使人“与众不同思考”的方法，有助于形成替代性的意识形态。虽然意识形态的内容被丢弃，但新的“语法规则”（grammar）却被作为剥夺政权合法性的武器来使用。因此他们已经准备好将意识形态搁置一边，拥抱所有那些服从新语法规则的人。

至于上文提到的专家治国论者，他们与官僚政治的冲突不断激化，而他们对社会主义可以进行改良的信念也在动摇。他们开始在反官僚政治的斗争中寻找武器，并且他们发现，自己也懂得如何运用批判性话语文化，尤其是使用抛弃了意识形态内容的新异议版本。因此，到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可以发现，专家治国论者在阅读秘密的地下出版物，组织秘密的讨论，研读诸如哈耶克以及米尔顿·弗里德曼这样一些人的著作。注意到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正如他们在19世纪的前辈将Bildung（文化）作为维系彼此的共同纽带那样，知识分子与专家治国论者又因为批判性话语文化而结合到一起。

异议知识分子开始用经过改造的“市民社会”概念，吸引专家治国论者走得更近。在第一阶段，亦即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这显然并非一项资本主义规划。实际上，它与经济几乎毫无干系，并且因此对专家治国论者几乎没有什么吸引力。它首先是一个反官僚主义的计划，伴随着对“反政府”的“社会契约”、人权以及自由的强调。一些异议分子甚至相信一种“社会主义的市民社会”的可能性——因此自由权（liberty）不仅是存在于正式的、资产阶级的意义上，同时也作为经济自由权，或者（我们大胆地将它称为）“自由”（freedom）而存在。

所以，尽管看起来异议人士强调的是市民社会，而专家治国论者的兴趣在于自由市场以及货币主义的戒律，二者在20世纪80年代时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但一旦当他们都得出社会主义已经死亡的结论，他们也就都意识到，那些看起来如此不同的东西其实只不过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而已——那就是，自由资本主义社会。^①

事实上，在1985~1988年间，由来自不同方向的异议分子和专家治国论者所组成的第二代文化资产者确实开始形成。正像他们19世纪的前辈那样，这一代人提出了一幅向资本主义转变的乌托邦图景，而且将自己的角色重新界定为这一转变的领导者。有关这方面的证据不胜枚举。比如，柯卡有关文化资产者在资本主义转型中所承担的突出角色的证明，就部分依赖于对1848~1849年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社会构成所做的研究而得出的。其中，3/4的代表拥有学位，但只有7%的人来自有产阶级。^② 相比之

① 我们将在第三章对一点做更进一步的展开。

② Jürgen Kocka (ed.) (1987a) *Bürger and Bürgerlichkeit im 19. Jahrhundert*.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p. 34.

下，在共产主义垮台之后，在中欧产生的所有新议会中的全部代表，实际上都拥有大学学位，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是博士学位获得者。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他们中没有一人是私有财产主。如果说在 19 世纪早期，中欧通向资本主义的道路的特殊性在于，它尝试着由一个文化资产阶级来领导一个弱小的经济资产阶级，那么，在第二代文化资产者领导下产生的“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的后共产主义规划，又有多少更多与众不同和引人入胜的地方呢？

第三章 后共产主义权力精英的意识形态

为了找到一个术语，来指称将第二代文化资产者的不同派系联系在一起

的纽带，我们想对“管理主义”（managerialism）这一概念重新做出解释。我们用管理主义来表示一种心智——更具体地说，一种“治理心智”（govern-mentality）：这是一幅关于社会、市场、公司以及个体如何被引导、协调并加以监控的图景。这种心智并非 CEO 们的独有财产；后共产主义权力集团中的所有派系都平等地享有这种心智，尽管它确定无疑地表明，在权力集团联盟中，管理性的惯习是支配性的。虽然有时会觉得并非心甘情愿，但知识分子和专家治国论者不得不勉力习得这种心智，因为他们的任务就是使“实际存在的后共产主义”（actually existing post-communism）正常运行。事实上，管理主义心智并非简单地起源于观念领域，而恰恰是意识形态与现实痛苦碰撞的结果。它有一种二元起源，一方面是货币主义者

为治愈后共产主义经济问题而开出的失败药方，另一方面是受到后共产主义现实影响的“异议人士世界的祛魅”（the disenchantment of dissident world）。

这种祛魅，是一个广为人知的“现代主义者的阴霾”（modernist gloom）。正像彼得·瓦格纳（Peter Wagner）注意到的那样，诸如中欧文化资产者规划那样的现代性方案，总是始于一种推论上的分裂，亦即创造出新的“对个人和社会的想象中的意义”。然而，必要的现代制度却往往发展迟缓，如果它们真的有所发展的话。因此，“在分析现代性的历史时，有关现代性的观念与制度之间的亲密关系，而非二者之间的不一致，才是大部分问题的根源”。这种后共产主义中的观念与制度之间的亲密关系而非不一致，正是我们想要试图通过“管理主义心智”这个概念去了解的东西。

管理主义心智在物质上的化身，是那些意在调和意识形态与现实，以及在祛魅过程中除魔的仪式。在这些仪式上演的过程中，这一“从远处”对社会进行治理的图景（通过货币手段来居中调节），就被重新解释和转变为对日常经济事务事必躬亲的管理，以及对人民思想的密切监视。这些仪式的第二个功能在于（同第一个一样重要），将后共产主义权力集团中的不同派系结合起来，形成联盟。这些群体中没有谁会对这种讨价还价的每个方面感到满意，但他们对管理主义的仪式都保持了敬意，并且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也都对想象出来的后共产主义转型的意义，以及精英之间权力共享和博弈的真实现状表示认可。

在本章的开始，我们将考察货币主义和市民社会意识形态的“纯粹”形式。这两种意识形态，分别属于权力集团中的技术专家精英和知识分子群体。我们会描述这些意识形态之间的“选择性亲和”（elective affinity），这种亲和存在于对知识在社会中该扮演何种角色的相似观点，以及由此导致的关于社会该如何被统治的理解中。然后我们要描述，当异议人士和专家治国论者认识到有必要与国有企业的管理者结成联盟的时候，这些意识形态是如何被转换为“管理主义治理心智”的。这种与现实的妥协意味着，知识分子和专家治国论者开始就他们意识形态的关键信条进行协商，而且，关于后共产主义的卡里斯玛式幻想开始走向常规化和世俗化。在这种与经理人惯习的互动中，货币主义者将他们的意识形态重新解释为预算约束主义（budgetary restrictionism），而前异议人士则将“市民社会”的理念重新解释为市民教育。我们将这种重新解释的结果（亦即管理主义心智）描绘成一种从远距离控制变为微观管理的特殊变化。最后，我们将描述与这些重新解释有关联的各种仪式，并且论证它们是如何既维护了关于后共产主义转型的假想意义，又维护了将权力集团不同部门的利益和认同维系在一起的关节点的。

一 精英中技术专家的 货币主义意识形态

由于专家治国论者与货币主义之间的调情开始成为它迷恋西方经济制度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首先就货币主义意识形态在西方发展的历史做一个简要介绍。

货币主义的古典形式，正如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们所宣称的那样，



是一种经济学理论和一套经济政策，它挑战了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占据主流地位的凯恩斯主义理论和实践。其政策建议中最重要的内容是：①减少通货膨胀并且/或者对其严格控制（因为通货膨胀扭曲了市场提供准确信息的能力），甚至以长期失业为代价；②减少政府的任意管制，从而有利于固定人所共知的政策规则，并因此得以保护稳定的预期结构（expectation-formation）；③维持紧缩的财政政策，以及一个“在货币存量（money stock）中稳定增长的金融规则”；以及④建立弹性汇率，向国际竞争者开放国民经济。^①

由此可见，货币主义的目的就在于减少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且制定一种限制政府利用货币手段来规制经济活动的制度。货币主义者认为，这些行为甚至可以通过法律来约束，以避免政府过多地尝试对经济做出“调整”。政府不需要制定专门的产业或就业政策，因为这只会扰乱经济行动者的判断，妨碍市场的固有平衡，并且与自己最开始的目标背道而驰。最糟糕的是，政府干预会侵犯个人自由，而仅仅出于这个原因，它就是不受欢迎的。^②

但是，货币主义在西方的成功并不能只是简单地归因于它对“自由”的强调，同时也因为它提供了一幅秩序的图景。这就是我们会追随福柯，将其称作一种“治理心智”的原因。^③ 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只需要回想起，“economy”（经济制度）这个术语本身只是在最近才开始表示“社会领域”（sphere of society）的意思。早在 18 世纪，它还指的是政府的一种节约术（economizing art），亦即一种安排事务使其各得其所的方法。^④ 当我们讲某人做某事是“经济的”时候，我们保留了这一层含义——也就是说，适当的、节制的，等等诸如此类。只是到了 19 世纪的自由主义者那里，“经济”才开始表示社会的一个领域，而正是出于这一原因，这个社会领

① Milton Friedman (1962) *Capitalism and Freedom*.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尤其请参见 pp. 38 - 39; Milton Friedman (1959) *A Program for Monetary Stability*.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Gregory N. Mankiw (1990) "A Quick Refresher Course in Macro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8 (4): 1645 - 1660; 尤其请参见 p. 1650; Thygesen, Niels (1984) "Milton Friedman". pp. 217 - 250 in *Contemporary Economists in Perspective*, ed. Henry W. Spiegel and Warren J. Samuels. Grenage, CT: JAI Press; 尤其请参见 pp. 229 - 243.

② 对这个观点最强有力的说明，可参见 Friedman, *Capitalism and Freedom*.

③ Michel Foucault (1990) "Governmentality", pp. 87 - 104 in *The Foucault Effect*, ed. Graham Burchell, Colin Gordon and Peter Mill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④ Michel Foucault (1990) "Governmentality", pp. 92 - 93.

域被看做自生自发秩序的来源。因此，自由主义本身就成为了政府的一个“节约”艺术，还附带着一个条件，即自由主义试图去发掘自己的能力，从而把握它所统治的对象中与生俱来的自然秩序。

同样，货币主义也是这样一种有关治理的自由技艺（liberal art）。货币主义者在市场的运转，尤其是在货币的流通中，重新发现了从“远距离”控制社会秩序的可能性——距离在技术上与自由发生了关联。通过给社会现象强加各种货币的表现形式，这种技艺得以延续下来，然后人们预期它会走向“自我调节”。虽然这些货币的表现形式从未变成现实，但是，通过尽可能避免对社会现象造成粗暴的干涉，这种与治理有关的货币主义技艺，却在小心翼翼地培养社会现象自发的自我调节趋势中得以立足。货币的表现形式，就如同其他所有表现形式——地图、图表、统计学、报告以及表格——一样，为人们“从远处”对个体和大众进行调节提供了可能，因为它们可以“动员”远距离的现象，并且把它们带到与“计算中心”（centers of calculation）更近的地方。^①此外，大众和个人在货币上的表现形式（例如“货币存量”或“人力资本”）还有另外的优势，就是可以精确计算，并且它们发掘了市场自我调节的趋势。根据这一理论，我们就有可能想象，社会问题也许可以在没有直接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得到调节或是安抚。

我们举“意外保险”的例子来说明问题。在这种保险被发明之前，工作中发生的意外是雇主和雇员之间发生激烈冲突的一个领域。保险是一种允许行动者对这种社会问题做出规范的技术，因为它使意外作为“风险”的可能性变得客观，也就是说，可以用货币来表示了。自此之后，人们委托市场的自我调节来抑制这一问题，亦即让问题变得可以治理。出于这个原因，雇主就会有一个经济上的刺激来为雇员提供安全的工作条件，否则的话，他们就会支付很高的保险费。供给和需求会来决定什么被社会定义为“意外”，以及何种意外值得赔偿。当然，这并不是意外保险在现实中运作的必然状况，但这肯定是它之所以被采用背后的“治理心智”，而且其后果也是无可厚非的：一个界定不清的、曾经只可以通过直接干预，甚或是暴力来控制的社会生活领域，现在被赋予了“章程”，可以说，实现

^① Peter Miller and Nikolas Rose (1990) "Governing Economic Life". *Economy and Society* 19 (1): 1-31. "远距离的行动"、"动员"、"计算中心" 这些概念，都出自 Bruno Latour (1987) *Science in Ac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了自我治理。^①人们很快提出类似的各种建议，用来处理与移民、结婚与离婚、惩罚与监禁等现象有关的“问题”；我们不仅可以在诸如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这样的理论家的著作中，还可以在克林顿的“新民主党”和“与美利坚的契约”（contract with America）^②中看到这些建议。

一旦社会活动以这种方式被货币化了，“计算的中心”——亦即这些活动可以得到调控的要害——就将不再是国家预算。事实上，由于预算（尤其是预算赤字）扭曲了货币的运作，故而它们会妨碍这类控制。新的计算中心，并且也是新的货币主义技术的支配日益增强的中心，就是银行——特别是中央银行，以及某种意义上的金融市场，和作为整体的金融系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货币主义远不只是西方国家的一种意识形态。它是一种治理心智，这种心智由于很好地具备了丰富的技术工具，从而超越了那些陈旧的治理形式，比如凯恩斯主义。正像尼尔·弗里格斯坦（Neil Fligstein）所表明的那样，货币主义完全改变了公司世界的面貌。公司的总部成为由金融管理者来填充的“利润中心”，而这些管理者是“从远处”（比如，通过货币形式而非“计划”）来控制公司的“资本单元”的。^③由于得到金融市场和世界金融机构（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不断增长的权力的支持，这种治理方法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必要条件规则”（sine qua non）；在诸如中国农村、孟加拉国村庄以及中东城市这样的地区，它甚至同时还被看做一种推进民主化进程的手段。

但是，从货币主义成为这样一种政治乌托邦方案起，它就面临一个不断加剧的问题：它引发了一块注定要与之斗争的西西弗斯的石头。^④这是一个与个人义务和主动性有关的问题。米尔顿·弗里德曼在他的著作中这样写道：

只有对能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人而言，自由才是一个合理的目的。
对于疯子和孩童来说，我们并不相信他们有自由。无可回避地，我们

① François Ewald (1991) "Insurance and Risk". pp. 197 - 210 in *The Foucault Effect*; Daniel Dfert (1991) " 'Popular life' and Insurance Technology". pp. 211 - 234 in *ibid.*

② 加里·贝克尔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主张用经济学的假设和理论来解释社会生活的各种现象，代表作有《生活中的经济学》等。“新民主党”和“与美利坚的契约”分别是克林顿在1992年竞选美国总统时提出的竞选纲领和口号。——译者注

③ Neil Fligstein (1990)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rporate Control*.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④ 在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斯被天神罚以推石上山的苦役，石头推上山顶又滚落下来，循环往复，永无休止。——译者注

有必要在可靠的人与其他人之间划出一条界线，它也意味着……对那些我们认为无法对自己行为负责的人而言，具有家长式作风的政府仍是必不可缺的。^①

换句话说，远距离进行的货币控制依赖于具备企业家精神的个体，亦即人力资本的有效单位，这样他们就可以对货币化提供的机会做出正确反应。因此，那些萦绕在货币主义理论家以及政策制定者心头的问题，变成了有关“企业文化”以及“信任”和“渎职”的问题。^②

但是，这一议题并不是货币主义最初吸引中欧专家治国论者的方面。货币主义对专家政治中的那些异端分子最有吸引力——亦即那些经济学家、社会科学家，以及其他在事业上受挫但对体制的根本革新感兴趣的专业人员。他们并不是持异议者，他们是为了追求更多理性而遭到挫败的职业公务员。遭遇挫折的他们开始阅读，并随之开始秘密翻译和讨论哈耶克以及弗里德曼的著作。货币主义者对“第三条道路”的尖锐反对深深吸引了他们，这样一种姿态把他们与“共产党改革派”区别开来，同时也和自己的上级区别开来。最吸引他们的是，货币主义者承诺，伴随着更大的自由，更多可控制性与可预见性也会出现。货币主义为共产主义的两种病症提供了简单又快捷的解决办法。它也为管理后共产主义的转型提供了一套规则：市场化、货币化，以及恢复货币作为一种普遍流通手段的地位，然后接下来你就可以知道社会中将会继续发生什么了。^③ 所有这些都可以在“500

① Friedman, *Capitalism and Freedom*, p. 33.

② 在这一联系中，请注意货币主义与社会保守主义核心问题意识之间的亲和性。

③ 请注意下面这些文字，它来自捷克一位著名的异议分子，他后来担任了非共产主义的捷克联邦共和国的首任总理（这里指的是瓦茨拉夫·克劳斯，1989年后，他曾任捷克斯洛伐克财政部长和副总理，1992年捷克斯洛伐克解体后，任捷克共和国首任总理，1998~2002年任众议长，2003年当选捷克第二任总统。——译者注）：

货币成功维持了其作为普遍流通手段的地位，（这种情况不会变得令人大为担心。在这种环境下，一些人的失败，恰恰是由于他们拥有的比别人更多……但实际上，很多人开始能够操纵他们在官方那里不能拥有，也不应拥有的权力。但不幸的是，这种权力不能通过货币这种媒介来传递。它是直接的、隐秘的和不可控的。随着权力都集中到有影响的人手中，要想再探知在社会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了。[Petr Pithart (1989-1990)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s in Czechoslovakia in the 1980s (part I)". *East European Reporter* 4 (1): 42-45; Petr Pithart (1990)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s in Czechoslovakia in the 1980s (part II)". *East European Reporter* 4 (2): 4-7.]



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

天”或更短的时间内完成。^①人们只需要清楚地知道货币主义能够提供什么：“简单、普遍、既定的规则……市场强度与质量的提升，以及理性的宏观经济政策。”^②

瓦茨拉夫·克劳斯（Václav Klaus）——他后来当上了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届后共产主义政府的财政部长——在1989年初代表新专家治国论者们说道：“他们相信某种普遍的货币经济学原理，它和很多不同的制度安排都相关，而且他们提倡一种传统的公共金融途径和货币管制。”^③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中欧的专家治国论者并不是很热衷于货币主义的乌托邦面向，他们是在为“休克疗法”寻求一种经济上的原理；事实上，他们是带着20世纪50年代精神病学家一样的自信，来开展自己的事业的。^④

但是很快地，中欧的专家治国论者就抓住了信任和渎职的问题，这与货币主义在西方受到的困扰是相同的。实际上，后共产主义货币主义的问题比西方的要困难很多。尽管一个人可以去怀疑货币主义观点的智慧，但是毋庸置疑，在市场制度已经建立良好的地方，这种政策至少是可能的，并且经济行动者已经有了一种倾向，使他们能够驾驭由货币政策所塑造的环境。不过，这些条件在1989年的中欧尚不具备。从那个时候起，专家治国论者开始变得对货币主义的乌托邦面向感兴趣，因为——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货币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维度，与由异议人士提出的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批判，有着很强的相似性：这就是“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这种批评将责任和主动性作为问题提出，而这种方式，与乌托邦货币主义为了劝导他们而使用金融纪律的方法非常相似。而且，在中欧的背景下，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也吸引了由异议分子在共产主义时代晚期所积累起来的数量可观的符号资本。

① 典出戈巴乔夫大时期著名的沙塔林“500天改革计划”。该计划拟用一年半时间完全实现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大规模推行企业的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完全放开价格和政府管制等等。由于资本家索罗斯积极参与并资助了拟定“500天计划”的过程，因此，有人声称该计划实质上被美国情报部门操纵，成为颠覆苏联的工具。——译者注

② Václav Klaus (1989) "Sociologist Economies, Economic Reforms and Economists; Reflections of a Czechoslovak Economist". *Communist Economies* 1 (1): 89-96.

③ Václav Klaus (1989) "Sociologist Economies, Economic Reforms and Economists; Reflections of a Czechoslovak Economist". *Communist Economies* 1 (1): 95.

④ 20世纪30-50年代，胰岛素休克疗法、电休克疗法曾是精神病治疗中最主要的手段；直到1958年，比利时的保罗·杨森博士研制成功氟哌啶醇，才促使世界精神病学发生一场革命。作者在这里用1958年之前精神病医生对休克疗法的自信，来比喻20世纪80年代晚期人们对休克疗法的执着。——译者注

二 异议人士超越社会主义的生活观： 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

对于异议知识分子而言，超越社会主义的社会应该是一个理性化的，但又使人陶醉的花园。与克服理性化过程中的二律背反相比，他们的规划不乏抱负：社会与社区、真理与效力、义务与罪责，以及个性与真实——所有这些冲突都将被取代。当然，他们没有实现其中任何一项目标，但是，在为这些图景而斗争的过程中，异议分子彻底剥夺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合法性，积累起数目可观的符号资本。

从很多方面来说，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都是理性主义的。举例来说，超越社会主义的社会将会是一个市民的而非军人的社会，亦即一个契约的而非命令的社会。那里没有指挥官和士兵，没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也没有以无条件服从命令为天职而无须反省的军人。毋宁说，后共产主义将是一个人们彼此平等协商的社会，人们最终要为自己的生活负责。因此，“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对共产主义家长制作风的非理性提出了强有力的批判。市民社会的支持者提出了一个由成熟公民所组成的社会图景，代替了那些人们始终需要被保护、养育以及父亲般管制的由未成年人组成的社会。^①

① 哈维尔对捷克刑法典第 202 款的驳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描述了这样一个亲身经历：他和某酒吧的领班发生扭打，然后他回想起，根据上述条款，他有可能被以“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起诉。哈维尔说，第 202 号条款，反映了某种继承自沙皇俄国的“特定治理方式”，从而试图使公民处于永久的控制之下。通过颁布诸如 202 号条款这样具有柔韧性的法律，政府实现了以下目的：这一法律，其适用范围可以轻易地扩展到所有的行为，其使用，取决于官员一时的兴致，既可以用作政治压迫，也可以公报私仇。除了批判政权的非道德性和非理性之外，人们能够感受到哈维尔对这种统治模式中非理性特征的蔑视，这种模式也因此抛弃了个体的自我调节。这种治理模式不但不推进个人履行他们的责任，反而要求人们“放弃自己的尊严和荣誉，接受与官方道德戒律一致的思想”：“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这种集中制的权力“将社会大众看做顺从的羊群，他们的本分就是永远对分到的那一把草心存感激。”参见 Václav Havel (1994) “Article 202”, pp. 1 - 16 in *Chronicles from Prague*, ed. John Miller and Kirsten Millers.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Books. [哈维尔 (1936 -)，原捷克斯洛伐克剧作家，异议知识分子的领袖人物。他于 1989 年当选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统，1993 年又当选为新独立的捷克共和国总统直至 2002 年。哈维尔和酒吧领班发生冲突的情节是：1977 年，在布拉格一家酒吧，哈维尔因领班表现怠慢未让其进门而大发脾气，开始用脚猛烈地踢酒吧的门，然后领班将哈维尔暴打一顿。在这一过程中，哈维尔“表现得很现实，像一个懦夫”。事后，哈维尔由此对共产主义的治理模式及其后果做了深刻的反思。详细内容可参见崔卫平翻译的中文本。——译者注]



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

至少在这一方面，“市民社会”将会“由理性来支配”，亦即以程序为其表现形式的理性。

但是，“反政治”（anti-politics）的口号^①试图在异议人士批判的理性维度与迷惑性承诺之间做出调和。它表达了一种要求，就是将社会的不同领域彼此分离，从而通过这一方式，将政治“带回它应有的位置上”。从这方面来说，它是理性的，甚至是程序理性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在尝试开创一个自由的领域——在那里，知识分子可以充分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也可以在没有政治干涉的情况下从事艺术与科学事业。他们全部的期待所在，只是能够不被干扰地去过自己的“市民”生活；写他们的小说或是散文，而不必担忧国内的情报部门会查抄他们的手稿，或是由于他们身为知识分子所做的工作而被送去坐牢。社会主义被认为是一种“超级理性”（hyperrationality）的形式，亦即一个由于实质理性或“极权主义意识形态”遍及所有领域，而未被理性化的世界。相反，市民社会意味着一种程序理性，在这个世界里，一个人不能用意识形态咒语的魔力来压制针对每一个社会领域的规则。

然而，“反政治”也意味着“生活在真实中”（living within the truth），^②就这一方面来说，异议分子的偏好十分清楚，那就是生活在一个使人着迷的世界里。社会主义将受到抵制并且被超越。于是，作为其替代物，一个

① “反政治”这一意识形态的主要主张，可参见 Václav Havel (1985)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pp. 23 - 96 in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ed. John Keane. London: Hutchinson; György Konrád (1984) *Antipolitics*. London: Quartet Books; David Ost (1990) *Solidarity and the Politics of Anti-Politic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关于这些作者的意识形态主张，只有相对较少的几篇文章做了批判性的讨论，而且主要是外国学者。例如，可参见：Knud Erik Jørgensen (1992) “The End of Anti-Politics in General Europe”. pp. 32 - 60 in *Democracy and Civil Society in Eastern Europe*, ed. Paul G. Lewis. London: Macmillan; Aviezer Tucker (1993 - 1994) “Waiting for Meciar”, *Telos* 94 (Winter): 167 - 182.

② Havel (1985)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pp. 31 - 35; Václav Havel (1986) “Politics and Conscience”. pp. 136 - 157 in *Václav Havel or Living in Truth*, ed. Jan Vladislav. London: Faber & Faber.

“真正的共同体” (authentic community) 就可以被创造出来。^① 我们几乎无法想起, 在近代哲学中有哪一个概念的自反性程度, 比异议分子的这个“市民社会”概念更低。二律背反、反讽, 甚至是陈旧的现实主义观念, 也没有哪个能在这个“鱼与熊掌兼得” (have your cake and eat it too) 的现代假想中得以保存下来。这些市民社会的鼓吹者为他们有关市民社会的理论感到自豪, 它包含这样一幅图景: 这个社会既依据程序理性来治理, 同时又是一个“真正的共同体”。所有 19 世纪的思想家 (卡尔·马克思可能是一个例外) 都知道, 这是一项“化圆为方” (squaring of the circle) 的任务。^②

异议分子之所以如此轻易地忽略了这项他们在社会主义下为自己设定的任务的迷幻本质, 其中的原因在于, 他们没有将自己的共同体看做一个由有着利益冲突的现实个体所组成的团体, 而是看做一个“圣徒的共同体” (community of saints) ——也就是说, 一个由异议知识分子所组成的共同体。由于它为社会上的其他人树立了一种榜样, 教他们如何去过符合道德的、真实的生活, 因此, 在人们的理解中, 这个共同体具有特殊的精神力量。在异议分子眼中, 通过他们牺牲的事实 (或者至少是一种牺牲的意愿), 这种榜样的道德力量得到加强; 而所有这些牺牲, 都是他们以真理和道德的名义做出的。异议分子相信, 正是这种道德权威, 拥有一种力量,

① 除了“市民社会”, 异议人士还用各种各样的其他名称来指代这个共同体。哈维尔经常称之为“社会的独立生活”, 参见 Havel (1985)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p. 56。在其他最有影响力的表述中, 有一个是瓦茨拉夫·本达 (Václav Benda) 关于“平行城邦” (Parallel Polis) 的观点, 参见 Václav Benda (1991) “The Parallel Polis”, pp. 35–41 in *Civic Freedom in Central Europe*, ed. H. Gordon Skilling and Paul Wilson. London: Macmillan 以及来自捷克学者的回应。还可参见 Václav Benda, Milan Simecka, Ivan M. Jirous, Jiri Dinstbier, Václav Havel, Ludislaw Hejdanek and Jan Simsa (1988) “Parallel Polis, or An Independent Society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n Inquiry”. *Social Research* 55 (1–2): 211–260; 以及 Martin Palous (1989) “The Parallel Polis after 12 Years”. *Uncaptive Minds* 2 (5): 36–40。异议群体中的哲学派系, 则从“自然世界”的现象学观念中, 发展出了一套关于共同体的有影响的观点。参见 Zdzislaw Krasnodebski (1993) “Longing for Community: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 of Politics and the Dilemmas of European Culture”.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8 (3): 339–353; Roger Scruton (1988) “The New Right in Central Europe (I): Czechoslovakia”. *Political Studies* 36 (September): 449–462。

② 化圆为方是古希腊三大作图问题之一, 即: 求一正方形, 其面积等于一给定圆的面积。其难度在于作图使用工具的限制。许多学者致力于破解这一难题, 但尚未有严格意义上的成功者。——译者注



能将社会主义转变为一个由负责的、道德的个人所组成的共同体。^①在这一方面，异议分子将其主张建立在一种古老的权力形式的基础上，亦即福柯所命名的“牧养权”（pastoral power）。这种权力形式模仿了基督教中牧师的权威，这些“好牧人”（good shepherd）对他的羊群照料细致，并得到它们的顺从。牧羊人权威的根本基础，在于他具备“准备为羊群的生命和救助而牺牲自己”的意愿。^②

这一关于共同体的观念^③也意味着，在那个持异议者所预期的世界中，真（truth）和善（virtue）是融为一体的。这是异议分子思想使人着迷的另一面。自西方理性开端以来，真和善的区别就一直萦绕在它的周围，并且在促进其发展的过程中，这种区别也是那些生产性二律背反中的一个。当然，很多西方理论家都对这种区分表示不满，尤其是在它导致真与善之间产生激进对立的时候。对法兰克福学派来说，这种分裂代表了现代性中一些最丑陋特征的根本肇因所在。但在异议人士的话语里，这种二律背反在“市民社会”令人着迷的世界中被解决了。异议人士想象出了一个社会主义之后的世界，在那里，人们“生活在真实中”——这可以被理解为是，人们同样将过着有道德的生活。事实上，他们认为，实现“善”的唯一途径就是“生活在真实中”，而唯一的“真”则存在于善良的、合乎道德的

① 将“牺牲”这一观点引入异议分子话语中的，是 Jan Patočka (1993-1994) “Waves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the 20th Century as War”, *Telos* 94 (Winter): 116-126。还可参见 Ivan Chvatik (1992-1993) “The Solidarity of the Shaken”, *Telos* 94 (Winter): 163-166，以及 Ladislav Hejdanek (1985)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and Socialism in Eastern Europe”, pp. 145-151 in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ed John Keane。

② Michel Foucault (1983) “The Subject and Power”, pp. 208-226 in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ed. Hubert L. Dreyfus and Paul Rabinow.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③ 顺便说一下，虽然这个共同体被视为思想的共同体，但它有时候也是一个“由妇女组成的共同体”。参见 Karl Marx ([1848] 1978)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pp. 469-500 in *The Marx-Engels Reader*, 2nd edn., ed. Robert C. Tucker.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尤其是第 488 页。这并非仅仅是闲聊的谈资，也不是异议人士“生活方式”的附带特征。相反，对知识分子共同体及其市民理念来说，这是一个基本特征。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那些市民理念在本质上是男权制的，这一事实在伊万·克利马的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Ivan Klima (1994) *Judge on Trial*. New York: Vintage]。在这本文学作品里，主人公最终与改良共产主义以及他自己的法官职业决裂，这一过程，与他和朋友妻子婚外情的第一次体验巧妙地一致。

生存方式里。^① 不得不承认的是，在 civility（礼貌）这一概念（在捷克语中，为 *kulturnost*）中，善与真得以合二为一。*kulturnost* 是一个异议分子很喜欢的术语：它指的是与慈善和同情、邻里之间的友爱和尊敬有关的理念，以及与个人独立、自我利益追求和自我实现有关的精神。具备同情心和责任心并不会阻碍一个人充分地实现自我，也不会要求他做出任何让步。“真”有着最为长久的生命力，它也值得被称作是“真”，因为即使它在伦理上是不正确的，它也将是“真”的。

人们为一个超越共产主义的世界（亦即市民社会）所陶醉，因为它是真实的（*authentic*）。真实性（*authenticity*）意味着，与市民社会同时发生的个性化过程，不会将个体与他或她所在的氛围（*aura*）分割开来，因为内在和外在的自我应该是重合一致的。对真实性的这一重新发现，其讽刺在于，这种真实性恰恰是斯大林主义的目的所在，它就是想消除私人领域，这样内在与外在的自我就会重合。随着共产主义仪式完全进入公共生活并得到认可，后来的共产主义统治者便放弃了这种试图强行侵入私人领域的做法。但对于异议分子而言，这种共产主义的妥协是“生活在绝妙的谎言中”——谎言的实质就在于，公共的自我与私人的自我并没有重合一致。^②

在将异议人士共同体的不同部分联合成一个暂时性的联盟方面，这一意识形态发挥了什么样的社会功能？如果我们不去解释这一问题，就不可能理解异议分子的意识形态，特别是他们关于“市民社会”的观点的迷幻本质。到了共产主义的晚期，在对社会主义进行批判方面，知识分子变得日益多元化。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他们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看法也愈加多元。自由主义者与“爱国一宗教”右翼人士之间的分歧，在 20 世纪 70 年代晚期就已经开始酝酿，1989 年之后则演变成全面的冲突。但是，在 1989 年之前，这种分歧却没有得到认可，因为在全面包围的“市民社会”概念的笼罩之下，分歧被清扫掉了。用一种事后诸葛亮的眼光来看，我们可以说，异议分子有关“市民社会”的话语，其社会功能之一恰恰就在于掩盖了两个群体之间的差异，并且使得他们认为，他们所讨论的是“同样的事情”。它不仅是一种针对国家社会主义等级秩序的强有力批判，从而为那些在这种秩序中找不到北的社会群体清楚地阐明了他们所在的位置；而且，它也

① Ladislav Hejdanek (1985)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and Socialism in Eastern Europe", pp. 145 - 151 in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ed John Keane, p. 147.

② Havel (1985)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pp. 31 - 35.



是不同对立群体之间和睦相处的基础，否则的话，这些群体不会怀有这样的信念，亦即认为他们之间还存在可以共享的利益。

在“市民社会”这一概念中，两种不同的立场也合二为一了。自由主义立场的核心是与人权有关的议题，而所谓人权，则是一个来自社会契约论的与公民权有关的概念。在此基础上，自由主义的异议分子攻击社会主义是一种威权主义的和压迫性的统治模式，将个人看做是治理的目标而不是公民。另一方面，爱国—宗教反对派将共产主义看做一种世俗的、信仰无神论的、普世主义的意识形态，它忽略了由“民族”所组成的自然共同体。在这个基础上，爱国—右翼异议分子控诉共产主义统治者背叛了民族，充当了俄罗斯帝国的忠实党羽，并且为了俄国沙皇而不惜毁坏波兰、匈牙利、捷克以及斯洛伐克的民族利益和文化。因此，爱国反对派拥护与公民权有关的观念，但他们对这一观念的理解与自由主义者眼中的意义大相径庭，因为在前者那里，公民是根据种族而划分出来的。

在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个案中，“血统”以及“由民族组成的天然共同体”在建构“市民社会”意识形态中的重要性表现得尤为突出。匈牙利的“爱国者”之所以反对共产主义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共产主义统治者忽视了匈牙利族人定居国外的原因。在他们看来，毫无疑问的是，居住在国外的匈牙利族人是匈牙利社会，从而也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因此，他们要求匈牙利的权威人士保护这些移居国外的匈牙利族人的“公民权”以免遭到其他统治者的迫害。不管自由主义者有可能对这种民族—种族公民身份的“爱国主义”建构感到多么不舒服，他们对市民社会言语的忠诚使得他们在共产主义垮台之前，不可能明确地表达出自己的不同意见。然而，当第一位非共产党员的匈牙利总理安塔尔（Antall）将自己称为“1500万匈牙利人的总理”时^①，上述两个群体之间的分歧便无法继续包容下去了。爱国—宗教右翼所考虑的是，匈牙利政府应该保护这些匈牙利族人的权利，即便他们定居在罗马尼亚或者斯洛伐克，而很明显，这

^① 匈牙利族人问题有着非常复杂的历史因素，尤其是凡尔赛体系下奥匈帝国的瓦解，以及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许多匈牙利族人定居在匈牙利共和国以外的土地上。在20世纪90年代初，全世界的匈牙利人和匈牙利族人大约有1500万，而当时匈牙利共和国的总人口大约是1057万。1989年之后，以安塔尔为首的民主论坛上台执政，这届政府在外交上奉行咄咄逼人的“大匈牙利主义”，与邻国在匈族地区（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南斯拉夫的伏伊伏丁那与斯洛伐克东南部）问题上发生冲突，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其外交上的孤立。——译者注

正是自由主义者所理解的不负责任的沙文主义（chauvinism）。当然，自由主义的公民身份，指的是与政治上、领土上的民族国家，而非与种族和血缘有关的概念。

类似的，尽管没有几个斯洛伐克人在“77宪章”^①上签名，但捷克的异议分子，尤其是信仰新教的知识分子阶层仍然很快指出，斯洛伐克加尔文教教会的活动，标志着“市民社会”在那里已经得以复苏。但是对于在斯洛伐克的加尔文教徒来说，“市民社会”的叫法则意指斯洛伐克社会的复兴，甚至是希林卡（Hlinka）意义上的“人民共和国”的延续。^②又一次地，分歧紧随共产主义体系的崩溃而出现，它所导致的一个戏剧性的结果，就是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

因市民社会的话语而结合到一起的民族主义—自由主义联盟在后来的命运，再清楚不过地揭示了，市民社会的话语只是在一些异议知识分子的头脑中调和了现代性的基本矛盾。但在现实中，异议分子联盟中不同派别之间的不一致仍是不可调和的。随着社会主义的瓦解，以及异议分子面临着建造“实际存在的后共产主义”的艰巨任务，他们必须要与世界实现和解。尤其是，他们要找到一些手段，使得社会——接近于他们所想象的“市民社会”——能够进入一种可生存、受教育、文明开化，以及（最重要的）受控制的状态。

三 货币主义与市民社会话语 之间的选择性亲和

在这一节中，我们将总结货币主义者与异议分子的意识形态之间的五点选择性亲和，其中前四点论证的是，关于社会应如何被统治，以及他们

① “77宪章”是20世纪70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艺术家和反对运动者，为了反抗胡萨克的高压统治而成立的非暴力异议团体，构成了要求民主化的国内力量。——译者注

② 尽管大多数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都信奉天主教，但两者的民族矛盾由来已久。从1918年这两个民族组成共同国家起，斯洛伐克民族就失去了独特性。由于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斯洛伐克地区成了工业发达的捷克统治和剥削的对象，差距越拉越大。安德吉·希林卡（Andrej Hlinka, 1864~1938）是斯洛伐克人民党的主席，该党以民族主义为旗帜，致力于保护斯洛伐克族人的利益，而且，由于他本人曾是天主教神父和罗马教廷的最高书记，所以该党又带有很强烈的天主教色彩。但是，1939年之后该党开始变质，在希特勒的支持下，该党新党魁图卡成立了傀儡政权，在斯洛伐克实行法西斯统治，对犹太人、左翼人士和捷克人进行残酷的迫害。——译者注



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

在社会中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们是如何趋向于同一种特定看法的（确切地说，是同一种乌托邦式的看法）。尽管这种看法与后共产主义的现实之间有着尖锐的冲突，但在如何成功地应对后共产主义祛魅的现实这一任务上，货币主义和异议分子做出了相同的回应，这一点确是事实。这种共同的回应证明，“惯习”的运作相当有效。因为正是惯习展示了，这两个差异如此巨大的知识分子群体，面对不同的困境，却通过创造性地运用以往他们熟悉的方式来应对新的情景，做出了十分类似的回应。这一共同的回应，成为货币主义者和异议分子之间最后一个，也是出现的第五个亲和性，涉及他们关于知识分子在社会中所扮演角色的看法，并且描述了中欧文化资产者的新历史规划。

我们将第一种亲和性称为“卡桑德拉情结”（the Cassandra complex）。正如读者所知道的那样，卡桑德拉是特洛伊国王的女儿，她因为能够预见到任何人都都不相信的未来而受到诅咒。因此，随着新阶级规划的破产，不论是异议分子还是专家治国论者都没有承担“目的论知识分子”的角色。事实上，异议分子奋力争取的是牧人的权力而非世俗的权力，而专家治国论者则将他们自己看做是转型的技师，并且独具特色地接受了一种在转型过程中限制了他们角色的保守意识形态（货币主义）。这两个群体都拒绝了“极权主义”的暗示，即知识分子掌握的知识可以成为对社会做出设计的基础，并且指出这种暗示的“邪恶后果”。举例来说，货币主义者就认为，政策制定者应该制止“预见”和计划性“目标”，而且务必要用固定的规则取而代之，因为如不这样的话，个人就有可能指望政策制定者自己违背自己的诺言，成为妨碍因素，并且产生诸如通货膨胀这样的不当后果。^①就像卡桑德拉那样，没有人会相信他们；因此他们只能预告不幸。同样，作为牧人，异议分子并不宣称知晓未来，甚至没有提出一个政治纲领。^②他们主张的是，任何一种想要对一个道德社会做出计划的尝试都必将适得其反，因为解放是一个内在过程，而一个人是不可能自上而下为此做出规定的。

异议分子和专家治国论者都在试图创造出个人可以进行自我管理的环境。换言之，关于社会应如何被统治，他们各自看法之间的第二个亲和性，涉及他们的共同努力，以创造出“生活在真实中”的环境。如果个体能通过一些标准对自己进行评估，并且这种评估标准在生活的所有领域都有效

^① Mankiw, "A Quick Refresher Course in Macroeconomics", pp. 1650 - 1651.

^② Hejdanek, "Prospects of Democracy...", p. 147.

的话，那么他就有能力做出有意义的决定。对于异议分子来说，这种评估标准就是“真”/道德/真实性，并且它需要持续不断的斗争来继续。然而，对于货币主义者来说，有关“信息”的问题就是一个技术问题，货币化则提供了解决之道。如果你让市场运转起来，如果你为所有物品都定出了正确的价格——也就是，如果你有一套由市场来设定的“理性的”价格结构——那么，你就“生活在真实中”。你生活在真实中，是因为你的行为受（由市场）自然设定的信号（价格）的控制，这些价格反映出了它们的真实价值（通过货币的形式）。于是你可以做出合理的决定，理性地计算你的每一步并采取相应的行动。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是在社会主义之下，你就不能用货币来衡量你的预算或是对其做出权衡（结果都一样），于是你就“生活在谎言中”。与此类似，通货膨胀也意味着人们生活在谎言之中，因为它扭曲了价格。^①

关于社会应如何被统治，异议分子与货币主义者之间的第三个亲和性，是他们对“远距离行动”的偏爱。异议分子展望了一个通过“牧养权”来统治的社会——也就是说，不是通过命令或者压迫，而是通过“在远处”运转的政府来统治。而货币主义者则向他们提供了一种技术——货币主义——来实现这个目标，尽管这种技术迄今只是在公司领域里获得了真正的成功。私有化不仅应该用所有权的观点来理解，而且还应该站在“治理术”的角度去看待。货币主义者的兴趣，首当其冲的是公司化，并且为这些公司创造一个共享的贸易市场，因为这样的话，它们就可以避免国家的直接控制——也就是说，它们可以脱离国家对公司的直接经济控制，并且通过银行使后共产主义的企业服从一个金融控制结构。^②

关于社会应如何被统治，异议分子与货币主义者之间观念的第四个亲和性，是他们对法治（the rule of law）的兴趣。这是异议分子为创建市民社会而提出的纲领的主要部分。如果法治没有被遵守，那么个人的责任就很容易被腐蚀，而无节制的统治则有可能带来自我毁灭，亦即一种不可治理的状态。另一方面，如果法治被遵守了，人们就会富有责任心，并且对

① Václav Klaus (1991) "Radical, Realistic Economics: An Interview with Václav Klaus", pp. 157 - 165 in *After the Velvet Revolution: Václav Havel and the New Leaders of Czechoslovakia Speak Out*, ed. Tim D. Whipple. New York: Freedom House. 也请参见本章 111 页注释①中所引 Petr Pichart 的文献。

② Kare Dahl Martinsen (1995) "From Impotence to Omnipotence: The State and Economic Transition 1989 - 1994". *Bohemia* 36: 330 - 361.



他人以礼相待。类似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就赞成一种有关货币缓慢增长的确定规则，以及一套有关预算平衡的确定规则；而瓦茨拉夫·克劳斯则用一种对“稳定、明确的规则”的呼吁，回应了弗里德曼开出的药方。另外，他们还警告说，在经济中很可能存在过度干预，而这有可能导致经济“失去控制”。

前面的讨论试图表明的是，货币主义者与异议分子关于市民社会的话语都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最恰当描述，可以说是“统治”——亦即寻找到引导个人和大众行为的正确方法，从而培养他们对秩序和进步的自然倾向。正是在这个颇为乌托邦的层面上，他们第一次发现了存在于他们各自规划中的一个“选择性亲和”。尽管“货币主义”提供了一系列工具，通过它们可以“从远处”对个人和大众的行为产生作用，可是异议分子的话语也为这种工具的运用制造了必要的符号资源。

然而，不幸的是，由于这两个迅速成长的后共产主义权力精英群体打造资本主义的方式是自上而下的，所以，他们不得不面临后共产主义光彩不再的现实。反政治和货币主义的倡导者发现，他们自己正深深地卷入政治斗争之中。关键问题是，后共产主义社会根本就不是市民的，尤其是在“（财政）紧缩措施”与“休克疗法”的背景之下。新的权力精英很快就意识到，无论改变所有制关系与重建经济制度的任务有多么艰巨可畏，与促使这类人在这些制度中运作相比，前者所具有的困难都会黯然失色。这些后共产主义的新领导者们认识到，在他们可以做到远距离治理之前，他们先要留意与公民教育有关的工作，要培养出可以用这种方法来治理的社会行动者。

正是在这里，货币主义技术专家和异议知识分子发现了分别存在于他们意识形态中的最后一个亲和性。权力集团中的这两个派系都开始将自己看做是类似于牧师和教化者的角色。货币主义者倾向于强调，市场的责任更为重大，它扮演了一个“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教育家的角色^①；异议

^① “任何一个到过西方的人都可以作证，乐于助人、尊敬他人、尊重别人的需求，在那里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这是因为，市场制度在那里已经盛行了两百多年的时间，而它那‘看不见的手’已经通过这种方式教育了它的公民……商家都准备好了带着友善的态度去服务，而且对顾客的需要感兴趣——在市场竞争中，这些都是企业生存下来的基本前提。”（Anna Cervenkova in *Lidove Noviny*, 3 September 1990, cited in Ladislav Holy [1996] *The Little Czech and the Great Czech N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155）

分子则对文明礼貌教育投入了更多的关注，而这显然是由知识分子引导和带动的。尽管存在这些差别，但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这两个群体都将自己的工作看做一种“治理”而不是一种命令。他们的角色榜样不再是埃及的约瑟，而是沙漠中的摩西，因为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远离了埃及的奴隶制和歌珊地的奢靡生活，带着他们去往那应许之地（Promised Land）。^①

正像摩西一样，他们发现自己的任务比之前料想的要复杂得多。他们最初以为自己会带领人民走向自由，在这个（他们想象的、非常短的）旅途中，他们将通过温和的忠告，而不是强迫来实行统治。哎！也正像摩西一样，他们发现那将是一条远比他们所料想的要漫长得多的旅程。40天变成了40年，而这主要是因为人民并没有做好拥有自由的准备。^②因此，他们重新界定了自己的工作：通过让奴隶们受到法律的约束，并教育他们成为守法的公民，从而将奴隶转变为自由的个体。

中欧的后共产主义文化资产者就像摩西一样，毅然肩负起了立法者、牧羊人和开化者的角色。和摩西相同，他们告诉人们，通向文明的唯一道路，就是通过牺牲并服从于一种新的法律。正像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雄辩地指出的那样，他们必须穿过“伤心之谷”（Vale of Tears）^③才能实现这一目标。^④讽刺的是——至少在目前的转型过程中——资本主义的形成要求人们远离物质主义的价值观，远离“消费主义”，也远离歌珊地的奢靡生活，而朝向“精神上的文明”。

在寻找自己新角色的过程中，异议分子和货币主义者改变了市民社会的话语，也终结了长达两百年之久的“牧养权力”世俗化的过程。18世纪

① 约瑟和摩西皆是圣经中的人物。约瑟是以色列人，自幼被当作奴隶卖到埃及。后机缘巧合，因替法老解梦而获得信任，被任命管理埃及，又因功绩显著，成为埃及全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势人物。后约瑟返乡，将族人接回埃及，并在法老的允许下，得以定居在埃及的歌珊地（Goshen）。然而，约瑟的后代在埃及定居多年后，新登基的法老已记不得约瑟的功劳，反将以色列人贬为奴隶。在神迹的启示下，摩西立志将200万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奴役下解救出来，带领他们离开肥沃舒适的歌珊地，去往上帝许诺给他们的“流着奶与蜜的迦南地”。在出埃及的过程中，早已堕落的以色列人在西乃山扎营并亵渎上帝，于是在那里，上帝与摩西面对面40天，把《十诫》等律法启示给摩西，要它们从此成为以色列人生活的戒律。正是在十诫的规训下，以色列人最终到达了上帝许诺给他们的福地。——译者注

② 俄罗斯的改革者承诺，在500天内完成经济制度的重建。但后来人们很快发现，这一进程显然要持续更长的时间，虽然不像悲观的俄罗斯人所预计的那样要花费500年。

③ Vale of Tears 语出《旧约》，它指的是尘世的生活所带来的痛苦。——译者注

④ Ralf Dahrendorf (1990)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s in Europe*. London: Times Books.



时，“市民社会”表示的是一种自然秩序，亦即一种自然地进行自我治理的社会。这是一种尤其适合新生产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引入的并非专制主义的权力，而是法理型权威。这既是一种从远处实践权力的支配类型，也是一种治理形式，它利用牧养式的运作，但无需牧羊人与羊群之间的牺牲这样的古老交换。随着经济资产阶级实现其世俗的支配，它为其理性的权威寻找到了一个“积极的”精神支柱，并拒斥了牺牲的神秘性。^①毕竟，执行者已经以自我牺牲的企业家形象出现在这里，而这种形象，则深受“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他们的任务，就是去创造一套有关资本主义市场以及资产阶级民主的制度。相反，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过程中的任务是双重的：制度以及具有适宜惯习的执行者都需要被生产出来。因此，在中欧关于市民社会的话语中，我们看到一种奇特的扭曲，而早在社会主义时代晚期，这种扭曲在异议分子的争论中就已经可以觉察到：我们不能指望市民社会能自己组织起来，而必须对其进行教化。它不是一种自然秩序，而是一种需要由道德榜样，以及最重要的，通过牺牲来创造的秩序。

从新权力集团的观点来看，这是由于新的后共产主义市民只不过是“荒废的一代”（the generation of the desert）。几十年来社会主义的奴隶制、家长制、过度依赖，以及不切实际的安全感、平等主义和消费主义，已经把这一代人腐蚀掉了。因此，市民社会需要被创造、被培养，并且要保护它免受国家和社会本身的妨碍。这是一种从未与18世纪反封建、反贵族的思想有过交叠的理念。但恰恰就是这个理念，在共产主义统治者消失，并且通向公民社会之路的唯一障碍就是社会本身的时候，开始大为盛行。^②

于是，使18世纪的契约论者与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相分离的行动者，就前者而言，是新生的经济资产者思想体系的倡导者，而后者则是文化资产者的成员。经济资产者满足于制定能够保护他们阶级统治的经济制度，而文化资产者则不得不在市民社会被发展起来之前，创造出—个经济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

① Michel Foucault (1993) "On the Beginning of the Hermeneutics of the Self". *Political Theory* 21 (2): 198 - 227.

② 这与布尔什维克统治俄国的最初几年非常相似，那个时候，解放工人的障碍，变成了工人自己。

四 管理主义心智及其对货币主义和市民社会的再解释

对专家治国论者与异议分子的新联盟来说，另一个他们不得不做出让步的后共产主义现实的祛魅维度，就是工业管理者的抵抗。专家治国论者和异议分子很快发现，如果没有工业公司管理者的支持，他们关于经济转型的规划就几乎没有实施的机会。工业管理者拥有后共产主义最有价值的商品之一：有关国有企业及其财产、债务、商业伙伴等方面的精确且实用的知识。专家治国论者快速获得的货币主义知识，是高度抽象的，并且他们尤其对公司内部的事务一无所知。实际上，作为“符号控制”的一种形式，货币主义不会被误解的力量，要部分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它将公司看做一个“黑箱”。在货币主义者的黑夜里，所有的黑箱看起来都是相同的，并且所有的公司都要服从相同的金融控制机制。这一知识使得专家治国论者面对管理者时有一种紧迫感，但这也让他们不可避免地互相依赖，因为对任何一个想要拟定私有化规划，或者是购买公司的人来说，有关公司内部运作的知识都是必要的。^①

但是，工业公司的管理者却不大可能会陶醉于货币主义的前景。他们可能愿意看到这样一个政府：它拥有工业与就业政策、出口补助，并且能保护他们免受来自外国的不平等竞争。因此，他们组建了“工业游说集团”和压力群体，其中的一些据说十分强势，以至于他们直接隶属于斯洛伐克总理的私人圈子。^②与管理者的妥协以及随之形成的联盟，使得异议分子与专家治国论者不得不转变他们的意识形态。“管理主义心智”是对这一转变最为恰当的描述。也就是说，他们以在共产主义时期作为官僚、专家治国论者以及管理者而形成的惯习为背景，对市民社会理论和货币主义做出重新解释。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描述了新权力集团的意识形态，它好像仅仅通过与外部现实的和解就得以形成——在这里，外部现实指的是，社会还没

^① Martinsen, "From Impotence to Omnipotence", p. 336.

^② Martinsen, "From Impotence to Omnipotence", p. 337; Sona Szomolanyi (1994) "Old Elites in the New Slovak State and their Current Transformations", pp. 63 - 82 in *The Slovak Path of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ed. Grigorij Meseznikov and Sona Szomolanyi. Bratislava: Interlingua.

有真正为建设资本主义的任务做好准备。但事实却是，管理主义意识形态的塑造过程，也是一个它与自身及其缺点达成妥协的过程。正如我们将要在第四章中看到的那样，后共产主义技术专家，尤其是后共产主义管理者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原共产党的工作人员。他们和其他人一样，都是社会主义的一分子。他们选择“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这个很重要的事实可以归咎于：他们倾向用自己过去的经验来解决后共产主义转型中的新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培养起三种习惯做法（practices），这些习惯做法反映了三样东西结合起来的作用和效果，那就是：货币主义意识形态、惯习，以及管理者和专家治国论者相互妥协的必要性。

这些习惯做法中的第一种，也是后共产主义经济政策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存在于管理者和专家治国论者之间的“预算—讨价还价”（plan-bargaining）。在共产主义时期，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是，“计划”表面上是一个由中央的再分配者根据推测来草拟，并强加给企业管理者的蓝图，但实际上却服从于经理人和中央计划官员之间的紧张谈判。在这个过程中，经理人对“计划”的某些要素提出质疑，并且机动地为工厂设定生产目标，这被认为是“计划—讨价还价”。^① 这一代管理者和专家治国论者正是在这样的“计划—讨价还价”的制度中成长起来的，所以他们从不按照中央指令的字面意思来执行，总是去寻找机会提出各种“附加条件”，从而巧妙地利用计划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也恰恰是这一代人，对货币主义有关财政和金融纪律的标准，做出了重新的解释。其结果就是，在后共产主义的背景下，专家治国论者提出了预算约束的政策。在管理者看来，这个政策是一种暗示，他们要开始新一轮的紧张谈判，而谈判的过程就像是一种“预算—讨价还价”（budget-bargaining）。这种经过谈判后的预算—讨价还价产生了一个空间，在表面看来满足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出的要求，但与此同时，它也使管理者卷入金融专家的业务成为可能，而这一过程，与“计划—讨价还价”非常类似。

将货币主义者和货币主义与管理者及其管理主义惯习联系起来的第二种习惯做法是，对公司及其他机构实行事必躬亲的管理。没有哪个地方的货币主义转型，比“国家私有化基金会”（NPF）的角色转换来得更为明显。这一机构作为转型的一个工具，是由第一届后共产主义政府创建的。

^① Tamás Bauer (1981) *Tervegazdaság, beruházás, ciklusok* (计划经济、投资和循环)。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iadó, p. 14.

它当时仅仅被理解为一个“虚构的所有者”，只是在真正的私人所有者被找到之前才需要它。事实上，创建它的动力是出于纯粹的货币主义特质，因为它被看做一种将“国家”从私有化进程中驱逐出去的手段，如此一来，私有化就可以在最为中立、更接近于市场的空间中进行。此外，人们还认为，如果私有化进程被放置在这样一个新成立的实体中展开，那么这些进程就不会被那些预算饥饿的官僚篡夺。

然而，在共产主义垮台之后的七年，事实上在中欧的所有国家中，原先国有企业的实质部分都被国家私有化基金会掌控了。而且，这些企业中大部分都负债在身并且需要援助。货币主义者开出的药方因为充满矛盾而对此情形一筹莫展。一方面，他们要求国家私有化基金会的官员在这里扮演“真正所有者”的角色，密切注视市场给出的信号，并做好准备采取行动对这些信号做出反应。然而另一方面，货币主义的药方也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国有制。国家私有化基金会的官员，以及财政部的技术专家——他们人数稀少而且负担过重——不能扮演真正所有者的角色。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又控制着（来自于其他公司私有化的）各类基金会，国有企业可以从中获益从而继续处于他们的监管之下。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私有化基金会的官员根据预算约束主义的原则重新制定了工作任务，并且也卷入自己控制的公司以及机构的日常事务当中——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关注了有关财政纪律的议题。^①

由此所导致的情形是，国家私有化基金会对公司实施控制的结构，其程度远远超过共产主义权威在共产主义晚期所实施的公司控制。正像卡尔·达尔·马丁森（Kare Dahl Martinsen）注意到的那样，与共产主义晚期的特征不同，后共产主义国家已经开始摆脱面对企业时的无力位置，转而变得无所不能。所有的道路都回到国家那里。国家对企业进行控制的能力得到快速提升，而这要归功于它采纳了货币主义的方法，但讽刺的是，

① 在捷克共和国，关于NPF卷入它所控制的企业程度，有大量争论。一些分析家争辩道，NPF最近变得非常活跃，尤其是在这些企业董事会成员的任免方面。参见Karel Brom and Michael Orenstein (1994) "The Private Sector in the Czech Republic: Government and Bank Control in a Transitional Economy", *Europe-Asia Studies* 46 (6): 893-928。其他一些人则认为，NPF已经成为一个消极的所有者，参见Peter Kenway and Eva Klvačová (1996) "The Web of Cross-ownership among Czech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Europe-Asia Studies* 48 (5): 797-805。不管怎么样，双方都同意，“私有化部门所生存的环境，与新私营企业面对的不同，前者的财政和行政环境都处于严格的监管中”[Karel Brom and Michael Orenstein (1994) "The Private Sector in the Czech Republic", p. 894]。



国家官员在他们的权限内，仍然致力于对企业实施事必躬亲的监管。^① 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匈牙利的财政部不去削减大学的预算，并放手让每一个机构自己去决定如何处理有关裁员的问题，而是直接告诉每一个机构，它们需要辞退多少员工。

最后，甚至货币主义的“先锋”也发生了改变，金融管理者没有让他们的货币主义驱动力冲昏头脑。面对积重难返的呆账问题，他们以捷克“联合银行”的形式，或是像其他国家的“地下再分配”那样，重新动用了再分配的手段。^② 而这种地下再分配，正是货币主义意识形态与管理主义惯习遭遇后所产生的第三种习惯做法。

五 与后共产主义生活有关的仪式

专家治国论者和异议分子需要用他们的纲领对社会施加影响，需要与经理人权力达成妥协，而这种需要也在“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这个印记可以在后共产主义文化资产者的各种仪式中看到。在那里，诸如削减掉承载象征意义的预算这样的实际行动，都来自他们对市民社会充满迷幻的想象。这些仪式的功能，并不仅仅是一种集体表征（其意在使社会文明开化），同时也是最后一道防线，以试图从魅力不再的现实中挽救一丝对于市民社会的想象。通过运用对人类而言最为古老的方式——重复（repetition），后共产主义的文化资产者致力于保护他们的集体性人生经历，从而使自己免遭怀疑。

有两种仪式试图击退后共产主义魅力不再的现实。第一种仪式直接来自原异议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以及他们自称拥有的牧养权；第二种仪式则直接来源于对货币主义的管理主义解释。前者是有关公民教育的仪式；后者是有关预算约束的仪式。它们都涉及由牺牲、净化以及忏悔所组成的同样的符号复合体（symbolic complex）。

（一）牺牲

尽管契约论者和 19 世纪的中欧文化资产者许诺带给人们富足的生活，后共产主义文化资产者却在呼吁牺牲。在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

^① Martinsen, "From Impotence to Omnipotence", p. 330.

^② Martinsen, "From Impotence to Omnipotence", p. 358.

神》一书中，这种呼唤直接指向的是个体性的企业家，他们被要求为了积累而推延消费。^①相反，后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精神”将这种呼唤扩展到了全社会，要求每一个人都要为了“未来”而做出牺牲：社会主义下的社会开支超过它的收入，现在需要向现实做出让步。^②

讽刺的是，只要社会主义还存在，它就常常会因为“为了生产而生产”（production for production's sake）、“对于需求的专政”（dictatorship over needs）而受到批判——简言之，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感兴趣的事情只是加速的工业化，而不是个人的消费需求。^③社会主义毫不含糊地要求人们做出集体牺牲——为了社会积累，而集体性地推迟消费——并且这种政策达到成效也蔚为壮观。但是，以后共产主义的观点来看——不管是对于那些怀念社会主义黄金岁月，还是将它看做当代社会所有缺陷的肇因的人们来说——社会主义现在看起来都好像是舒适的歌珊地。

正如我们在上文看到的那样，对于社会主义晚期的异议分子来说，牺牲的理念十分重要。实际上，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在自我牺牲的行为中表现得勇气可嘉。做一名异议分子就意味着牺牲自己，因为只有自我牺牲的行为，才可能对政权腐化堕落、玩世不恭的实用主义构成挑战。^④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无产阶级作为牺牲的羔羊拯救了人类，它才是普世阶级（universal class）；^⑤而异议知识分子则对这种意识形态做了奇特的颠倒，他们将自己抛向政权的祭坛，献出自己的身体去做牺牲。在这方面最令人感动的事例是，杨·帕拉赫（Jan Palach）在瓦茨拉夫广场上从容地自我牺牲。^⑥现在，异议

① Max Weber ([1904-1905] 1958)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② “我们的生活以消耗未来为代价。现在，所有人的账单以牺牲的形式，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它们值得重视、数量众多，在等待着算账的那一天。它们就像数额巨大的贷款，已经和将要掏空我们未来的银行账户。这笔债务的规模，与我们默默接受的共产主义对我们未来的剥削成正比。”（Václav Havel [1983] “What I Believe”, pp. 60-79 in *Summer Meditations by Václav Havel*. New York: Vintage.）

③ Antonio Carlo (1974) “The Socio-Economic Nature of the USSR”. *Telos* 21 (Fall): 2-86; János Kornai (1992)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Ferenc Fehér, Agnes Heller and György Markus (1983) *Dictatorship Over Needs*. Oxford: Basic Blackwell.

④ Havel, “Politics and Conscience”, p. 156; Patočka, “Wars in the 20th Century”, p. 121.

⑤ István Mészáros (1970) *Marx's Theory of Alienation*.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

⑥ 杨·帕拉赫是查尔斯大学（Charles University）的一名学生，1969年，为了抗议苏军占领布拉格，他在瓦茨拉夫广场上引火自焚。——译者注



分子是新权力集团中的成员和理论家，当面对后共产主义转变的任务时，他们又一次地冒出了牺牲的念头。但是这一次，自我牺牲已经远远不够了，为了将来的经济资产阶级，现在他们要求整个社会都要成为牺牲的羔羊。

正如我们将要在第四章中看到的那样，后共产主义权力精英中的成员，是中欧向资本主义转型过程中的大赢家。因此，一些人可能会谴责他们有些伪善：他们要求社会做出牺牲，自己却在享受后共产主义的阳光雨露。对于这些指控，管理者和专家治国论者几乎无法辩驳，但是原先的异议分子却能通过强有力的辩护来反对这类批评。他们可以争辩道，在共产主义晚期就已经有人做出了牺牲。由于这个原因，对于新权力集团来说，前异议分子的价值不可估量，因为他们可以合理地去要求那些在“土豆烧牛肉共产主义”（goulash communism）^①中坐享清福的人：现在该你们做出牺牲了！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注意到，预算削减和预算平衡，通常主要并不是服务于经济目的，而是表达一种与市民教育中的训练相类似的牺牲仪式的召唤。举例来说，在匈牙利，政府在大学中每月投入 15 美元的学费，任何一个思维清醒的人都不会认为这一点点小钱会给资助高等教育带来什么明显效果。毋宁说，政府拨款的原因在于教育市民知道其责任。这笔新的高等教育费并不是用来资助教育发展的，相反，它是想成为一种金融教育的手段。类似情况也发生在捷克共和国，政府举行了隆重的典礼宣布，在 1991 ~ 1992 财政年度结束时，他们在财政上实现了盈余。为了对这一成果表示纪念，政府还举办了一个小型庆典，并向全国做了电视转播。总理和财政部长都参加了这次庆典，庆典的盈余都划入了下一年的预算中，并且由这两名政治家正式签署。我们注意到，这一典礼背后的经济理性并不明显：一个一毛不拔的政府也是一个向其人民征税过重的政府。很显然，这一事件的仪式性特征是更为重要的；它向民众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权倾你的支票，并且做一些储蓄——这就是美德的含义所在。”

^① 在我国，“土豆烧牛肉”曾作为赫鲁晓夫的政治笑话而家喻户晓。20 世纪 50 年代，赫鲁晓夫访问匈牙利时，在一次群众集会上说，到了共产主义，匈牙利人就经常可以吃“古拉希”（goulash）了。“古拉希”是匈牙利饮食中一道颇具代表性的家常菜，即把牛肉和土豆加上红辣椒和其他调料炖熟，再浇到米饭上。当时国内报刊考虑到读者理解的便利，遂译为“土豆烧牛肉”。现在看来，这个译法不太确切。但为了便于读者理解，这里还是采用了这一译法。更详细的典故，请参见《党史纵横》2006 年第 4 期上刊登的《“土豆烧牛肉”共产主义的由来》。——译者注

(二) 净化

因此，这正是牺牲的第一个目的所在：这是一种为了未来而节约，并塑造高尚的、有道德的市民的方法。但是同时，牺牲的仪式也同样指向过去。牺牲是一种手段，它偿还个人和社会过去所犯下的罪过，并因此洗净它们在共产主义统治下沾染上的腐化堕落。这就是后共产主义文化资产者道德伦理的另一个奇特之处——有关净化（purification）的修辞。尽管对于亚当·斯密和本杰明·富兰克林来说，人类进行“交换、交易、贸易”（truck, barter, trade）的自然倾向是与生俱来的（比如说，市民社会的要素是给定的；它是自然而然的；它是纯粹的，并且是易于传授的），唯一需要的仅仅是向他们灌输商业伦理的价值观，但是，后共产主义的改革者却从这样一个假设出发：人类从前人那继承而来的物质都已经被彻底污染了。因此，牺牲就不仅是保护未来的一种手段，同时它也在抹去曾经的罪恶。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污染了环境，但是比起共产主义政治和教育对人心智和灵魂的污染，这简直是微不足道的。灵魂，这大概是最严重的问题：人们不仅有着错误的理念（ideas），而且有着错误的动机（motivations）。^①

后共产主义改革者吸收了异议分子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批评以及有关牧羊人的观点，他们谴责整个共产主义时代的教育十分糟糕。而且，在心智和灵魂被腐蚀之前，人们还经历过“社会主义心智的闭合”（the closing of the socialism mind）。^② 它始于学校的课程设置。学校教给人们的是俄语而非英语，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非新古典经济学，是焊接技术而非计算机程序。于是，封闭的心智变得枯竭，因为它与其所在的自然环境剥离开来。索尔仁尼琴（Solzhenitsyn）曾说过，官方的苏式语言是俄语的一种退化形式，它利用的是一套受到极为严格限制的词汇表和一套简化的语法，它不

① “在捷克斯洛伐克，过去20年里发生的事情是，广泛社会框架的意义（它过去曾经将整个国家联合到一起），要么蜕变了，要么丧失了。结果是，所有社会行为的规范消失了……捷克斯洛伐克人越来越不反对利用现存的病态的和社会和经济关系来为自己谋取好处……只有非常少的一部分人，为了改变，愿意冒丧失他们既得福利的风险。”（Pithart,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zechoslovakia in the 1980s [1]”, p. 5）

② 这里没有双关的意思。正如读者有可能注意到的那样，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与西方的新保守主义批判有着很强的亲和性：前者对再分配的攻击，对应的是后者对福利国家的批判；对社会主义大锅饭和“逆向选择”的谴责，则与有关肯定性行动和多元文化的争论产生了共鸣。



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

允许人们表达他们真实的自我或者他们的民族认同，也不允许他们真正地思考。这也就意味着，人民不可能获知自己的历史。他们学到的，只是有关其民族的错误历史，甚至他们被要求忘记对自己民族历史的私人体验。由于这些原因，异议分子争辩道，个人意识与集体意识都是被污染的、有缺陷的。^①

这种由学校课程造成的思维枯竭，在学校外面更容易被腐蚀。人们被社会化了，从而“在谎言中生活”，他们玩着“自欺欺人”的游戏，就好像他们在其中信以为真，他们参与到公共仪式中，而他们唯一的目的是表现出服从。^② 因此，他们学会了对公共言论的价值表示不敬，并且怀疑所有的政治家都是对权力垂涎欲滴的堕落的说谎者。他们还被教导怀疑并且蔑视所有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那类做出了牺牲的知识分子。甚至，他们被教导去偷窃：他们被允许不劳而获。整个社会的花销可以入不敷出，消费水平远远超过经济承受能力。人民的身体也被污染了：他们胡吃海喝，酗酒嗜烟，损毁了自己的肌体，也给社会带来伤害。^③ 即便那些看来是从事市场竞争的地方（亦即第二经济），也变成一个（宣扬）寄生价值的学校。^④ 最重要的是，在教育人们如何对自己的生活负责这一点上，共产主义失败了。^⑤ 人们变得沉溺且依赖于国家的再分配：一种社会主义的福利依赖。因此，削减福利预算，同时也是一种要求人们做出牺牲的呼吁，以及一种净化人们福利依赖的尝试。后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从未错过任何一个机会来畅谈这些意义。关键在于，后共产主义的改革者并不相信这些社会主义生产出来的人。他们不相信市民社会可以从这样的原始材料中建造出来，他们也不相信这些社会主义的寄生虫能够从容应付市场资本主义的

① 参见 Petr Fidelius (1992) "The Mirror of Communist Discourse". pp. 193 - 204 in *Good-bye, Samizdat: Twenty Years of Czechoslovak Underground Writing*, ed. Marketa Geotz-Stankiewicz.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Petr Fidelius 是 Petr Pithart 的笔名)

② Havel (1985)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pp. 31 - 35; Miroslav Kusy (1985) "Chartism and Real Socialism". pp. 152 - 177 in *Power of the Powerless*, ed. Keane.

③ Pithart,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zechoslovakia in the 1980s [II]", pp. 4 - 5.

④ 伊万·克利马将第二经济描绘成政府与部分公众之间的共谋，亦即“真实物质主义者的共谋”。Ivan Klima (1985) *My Merry Mornings*. London: Readers International.

⑤ “公众也许并不十分乐意被告知，他们有着特定的责任：作为人、公民、专业人士的责任。今日全国性的堕落，也许可以被十分恰当地描写成，人民丧失了对他们自己、他们的同伴、他们的社区、他们的民族、他们的顾客和伙伴，以及对上帝（如果你仍然敬神的话）的责任感的结果。”(Pithart,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zechoslovakia in the 1980s [II]", p. 6)

复杂情形，甚至这些人能否遵守法律都值得怀疑。前社会主义的市民必须首先被净化一遍才值得相信。

当净化以及打造新“资本主义人类”的任务进行到年轻人身上时，就相对要容易了（尽管不是完全没有问题）。^① 在后共产主义改革者看来，这里的主要问题是，他们无法信任新一代年轻人的教师。这些教师是在旧环境中受到了污染的人。因此，与西方民主制下的教师通常都有很大的自主权来决定教什么以及用什么教材相比，后共产主义的课程设置是由那些塑造民意的知识分子一手完成的，这就如同他们在斯大林时期的作为一样。出于对这些年轻学生的灵魂的关注，这些知识分子编写了新的教材，并且要求全国的教师都以同样的方式，来教授这些被审定过的内容。

另外，在遇到更为年长的一代人时，净化的工作变得更为严肃和困难，甚至似乎没有希望能治好他们。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新左派”激进分子认为凡是40岁以上的人就应该被怀疑的话，那么现在，后共产主义精英中的知识分子成员——他们自己就是新左派的逃亡者，并且也正好超过了要求的年龄——则认为，所有40岁以上的人都是不可救药的。在这样的背景下，诸如“精简”和临时解雇这样的经济政策，就不仅仅只是为了恢复经济的健康运行而必须采取的技术步骤，而且还象征着净化社会与个人的仪式性牺牲。举例来说，在大多数中欧国家，有大约10%的劳动者在1989年时选择了提前退休。提前退休金与西方大公司或大学里的高额退休金（golden handshake）完全不同；它通常采取伤残抚恤金的形式。这是一种象征性的“伤残”寓意：这些在共产主义之下耗尽了大部分生命的人，现在却让我们爱莫能助——他们不再适合工作，人们不再相信他们可以工作，甚至怀疑他们是否还可以参与到社会中来。他们也可能倒下并且死去……他们所做的是：作为悲惨的旧共产主义领袖的符号性人物，他们在1989年被罢黜之后，很快地一个接着一个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在相似的逻辑下，失业被看做是“炼狱”。人们被辞退不仅仅是为了公司的利益着想，同时也是为了他们自身。他们被给予一个机会进行“重组”，获得“人力资本”，并且继续自己原来的工作。这种逻辑传达了这样

^① “对停止将捷克斯洛伐克社会的现状描绘得暗无天日来说，现在正当其时……例如，年轻一代中的一些人，似乎已经决定与前辈的生活方式决裂。后者成长于20世纪70年代，现在要么变得十分平庸和消极，要么就是表现出明显的犬儒主义心态，拼命向上爬。而年轻一代则参加生态活动，追求对音乐的欣赏力，并且发现他们的意愿正在朝宗教信仰的方向发展。”（ibid. p. 5）



一个寓意：事务不能再照搬老办法来处理。人们已经犯下罪过——他们必须通过变得更能干、更灵活、更负责以及更熟练，来弥补自己的罪责。事实上，失业打破了个人和国家之间的依赖关系，并且教会个人要对自己负起责任。事实上，以灌输责任感为名，改革者动用了最为奇特的手段。举例来说，匈牙利牙科系统的改革，就废除了除拔牙之外所有免费的牙科医疗。所以，现在的病人所面临的是，要么对自己负责，要么就没有牙。这就是预防保健的后共产主义版本——防止无责任，而不是防止蛀洞。

这种对“净化”的意识形态旨趣，解释了为什么那些自称拥护货币主义准则的后共产主义技术专家，事实上却设计出了这样一套政策。这套政策暗示，政府要对经济活动进行大量干预，并且对经济过程实施事必躬亲的管理。我们认为，在货币主义仪式表面的背后，后共产主义的管理主义对预算约束主义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将它作为一种在国有企业和各种机构的日常运作中获得立足点的手段。这恰恰是因为专家政治认定，人们的心智都被污染了，从而无法相信他们能够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做他们应该去做的事情。于是，专家治国论者从教育—牧养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任务：他们需要人们对人们实施教导、监督和管理；他们需要将必需的进取心注入那些尚未完全具备企业家精神的行动者心中；他们需要向那些习惯性地破坏常规，或是在他们周边寻找捷径的对象，灌输自律和责任的意识。即便你削减了某些机构的预算，也无法相信它们就会“消瘦”下来并且变得更有效率。举例来说，大学可能会决定制订一项全面的减薪方案，而不是决定辞退工人。这里遗漏了一个要点，因此专家治国论者必须要干预，并且保护预算削减得以通过——这就意味着净化。这意味着要将前共产党员或是“寄生虫”从大学中驱赶出去。如果错误的“团结观”以及倒退的“平等主义”妨碍了大学校长采取理性、有效的净化方式，那么，就需要能够胜任于此的技术专家来教育并监督他们，来确保他们通过预算削减的方式净化机构，并且使其更有效率。^①实际上，在削减预算的仪式中，去

^① 因此，捷克的改革者无休止地抱怨捷克人，说他们“天性”就喜欢集体性的自我保护——亦即一种以马扎儿化（Magyarization）的面貌被发明出来的老掉牙的“生存”策略——现在，他们又逃避后共产主义的牺牲。参见 Jiri Musil (ed.) (1995) *The End of Czechoslovakia*. Budapest: CEU Press. 尤其请参见 Petr Pithart 在这本论文集中的文章，“Towards a Shared Freedom” (pp. 201-202)（“马扎儿化”指的是19世纪中晚期匈牙利政权对包括斯洛伐克人在内的众多中南欧民族的同化，而马扎儿人则是匈牙利最大的民族。——译者注）

共产主义的净化和经济效率的意义开始融为一体，并互相提供合法性。

(三) 忏悔

在净化的仪式中，后共产主义文化资产者已经远远超出他们最开始的意图。起初的角色是温和的，它被想象成掌握了牧养方面的技艺：在一个由忏悔的个体所组成的市民社会中，净化并不是必要的。对于那些有意关照自己灵魂的对象，权力集团中的知识分子群体将有能力作为道德上的向导来行使权力。不幸的是，大多数中欧人并没有忏悔。他们虽然度过了社会主义，但完全不能理解自己的罪恶可能是在哪里。

但是，忏悔却是必须的。如果没有对过去所犯罪恶和不良行为做出忏悔，再多的牺牲和再教育都无法让被污染了的“社会主义人类”变得纯洁。中欧的改革者相信，一个人如果不能面对自己的过去的话，那么他就无法拥有一份真实的生活。除了异议知识分子以外，大概中欧每一个人的过去都有什么是需要忏悔的。正如哈维尔（Havel）在杂货商的隐喻^①中所指出的那样，那些从事日常事务的最普通的人，不会怀疑他们犯下了什么罪行，但实际上，他们已经被深深地和不可饶恕地牵连进了共产主义体制的运作之中。^②

要想认清他们所犯罪恶的严重性，后共产主义的市民就不得不意识到，他们没有和体制对抗是一项巨大的过错。这正是知识分子努力要给公众留下印象的要点所在。为了实现上述要点，他们重新唤起人们对斯大林时期的死刑、拷打以及关押的回忆，即便斯大林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只持续了大约四五年时间，而且不到40岁的人都不可能见证或是用行为来抵消斯大林主义政策的罪恶。但更重要的是，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重新使人想起了所有那些带有社会主义时代特征的“反人性罪恶”：所有那些行为妨碍了人们去过一种真实的生活，犯下这些罪过的人，包括从新闻审查员

① “杂货商的灵魂”是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一书中使用的一个极为著名的例子：有一个杂货店贴了一个“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这一标语和店里的水果、蔬菜一样，都来自工厂总部，但杂货商张贴这幅标语，并不是因为他真想告诉公众他的理想，而是在告诉世界：“我，一名杂货商，居住在此地，并知道我应该做什么。我要按照别人所希望的那样去生活。我是可靠的，而且我的所作所为无可指责；我是顺从的，因此有权得到平安的生活。”这条标语表明，杂货商屈从了系统内部的原动力，而这种系统依赖于每一成员的表现。恰恰是这些在很多人看来是习以为常的东西，让大部分人，乃至所有人都参与到国家制度的游戏中，使得这个制度能够运转起来。——译者注

② Havel (1985)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pp. 31-35.



到超市中的收银员（后者让你排着不必要的长队直至你大动肝火，让你开始诅咒并且在真实的自我面前感到窘迫不安）。^① 正像哈维尔所说的杂货商或酒店领班的故事那样，收银员的例子听起来或许是琐碎且微不足道的，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在后斯大林主义很长的几十年里，很少有人被判处死刑；也没有几个人由于其政治举动而坐牢。人们主要忍受的，是社会主义体制普遍的无效率；他们将生命都浪费在排队上，努力做好时间上的统筹安排。所以我们正在讨论的，是被浪费的生命。但是，这些罪过不同寻常的一点是，事实上所有的人都参与其中。今天排队的受害者通常就是明天的犯罪者。这就是集体犯罪之所以能够形成的素材。如果人们回想起自己曾是受害人，那么他们仍会感到愤怒，但如果记得自己是曾经的犯罪者，他们就往往不去理会这些行为，只当它们是微不足道且无关紧要的事情。一般来说，中欧人民很难留下这样一种印象：他们全都参与到了巨大的集体罪恶之中。

但是，他们必须铭记，也必须忏悔，如果说他们想要得到净化的话。因此，知识分子就需要去做人所能及的每一件事情，来揭示过去的罪恶。在这些忏悔仪式中，首要的工作就是打开秘密的警察档案，公布执行人与合作人的姓名，甚至将全部文件公之于世，使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集体罪恶的墓碑。这一后共产主义的忏悔过程和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有几分相似之处。这种相似性的意义在于，它们的真正意图并不在于惩罚，而是要让被指控的人做出忏悔以拯救自己的灵魂——亦即使他们得到净化。在捷克共和国，这个过程被称作“*lustrace*”。这是一个采自拉丁文的术语，被伊芮娜·西克诺娃（Jirina Siklova）描绘成“通过牺牲、肃清而实现的净化”。^②

并且，还有一个事实是：如果一个人忏悔，那么就会被宽恕。匈牙利政坛莽汉伊斯特万·楚尔高（István Csurka）的例子，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当楚尔高第一次冲撞了安塔尔总理并要求后者辞职时，安塔尔则通过暗示他有证据表明楚尔高与共产党内部安全机构有关联，对楚尔高做出

① 或者是，领班拒绝让哈维尔进入那间著名的布拉格酒吧，因此将其牵扯进一种道德上的悖论中：破坏还是不破坏错误的社会主义“社会秩序”。Havel, “Article 202”, p. 4.

② Jirina Siklova (1996) “Lustration, or the Czech Way of Screening”. *East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Review* 5 (1): 57-62 (伊芮娜·西克诺娃是目前捷克最为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她曾做过教授、兼职记者，并因持不同政见而入狱。她还是布拉格性别研究中心的创立者，现任教于查尔斯大学社会工作系。——译者注)

了反击。楚尔高的反应相当精明，他公布了一篇“罪己信”（self-lustration），在这封信中，他描述了自己如何被招募成为一名告密者，他都做了什么。^①对于这一忏悔，公众的反应十分生动：很多人都被他在忏悔时表现出来的“勇气”感动——这足以说明他的灵魂已经得到了“拯救”。忏悔过后，即便是对他最为怀恨在心的敌人，也无法再利用他作为告密者的过去来攻击他。是忏悔，使楚尔高得以净化。^②相反的情况却发生在尤若夫·托尔贾恩（Jozsef Torgyán）——一个多少不如楚尔高极端的政客——以及杨·布达（Jan Budaj）的身上，后者是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异议分子。这两位都被指控曾充当为秘密警察提供情报的告密者。他们从不忏悔，直至今日，他们仍因为被假定在共产主义时代与秘密警察有关联而备受攻击。

这种忏悔仪式的性质，使人回想起共产主义的“自我批评”，也同样有助于促使道德共同体的形成。如果没有忏悔，异议知识分子将会在一场控诉的战争中四散而去。相反，公共忏悔使集体罪行的信息得以戏剧性地表现出来，而且也使得赎罪和重新统一的手段成为必需。它是后共产主义审讯中的慷慨、仁慈以及宽容的证据。劝说个人去忏悔，这并不是一个复仇行为。毋宁说，它的目的在于，去掉前政权罪恶本质中的神秘色彩，并且提供一条能够拯救犯罪者灵魂的道路，使他们重新加入圣徒的共同体中。即便只有数量很少的几个人公开忏悔，其结果却可能促使更多的人去排出污垢（cathartic）。其他负罪在身的个体，所有那些“生活在谎言”中的人们（事实上他们是普通人中的大多数），可以仿效忏悔剧中的那些反面英雄，虽然他们自己没有什么公开的表现，但至少可以向自己忏悔并接受赦免。

后共产主义权力集团在公开的忏悔仪式上投入了很多的精力。事实上，由于去告发那些在法律范围内活动的人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借助于法律之外的公开展示——比如由历史学家和其他的研究者引导的模拟审讯——来促进忏悔并使其生效。如果检举人的目光无法洞穿这些人的罪行，并且如果他们不忏悔，那么这就应该留给历史学家去处理。实际上，很多

① István Csurka (1993) "Önértékelés" (Self-Lustration). *Magyar Forum*, 30 June.

② 与此相似，在20世纪80年代，对捷克最受欢迎的前政客来说，忏悔参加共产党、承认自己的罪过，是一件他们很乐意去做的事情，而且对大多数捷克老百姓来说，他们对此举也很欣赏。参见 "Interview with Vladimír Dlouhý", pp. 27 - 35 in Martin Komárek and Jana Kasalová (1994 - 95) *GEN: 100 Cechu Dneska*. Prague: Fischer.



著名的捷克异议分子都出现在公共场合反对《净化法》(Lustration)^①的实施,但他们这样做并非因为他们想要终止忏悔的进程。相反,他们之所以抗议,是由于认为《净化法》的忏悔程度不够。当记者以及其他一些不负责任的煽动者,出于自己的目的而篡夺《净化法》(尤其是当这些人追求的只是丑闻和指控而非忏悔)的时候,异议知识分子被激怒了。当然,最糟糕的事情是,记者常常将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异议分子。捷克的卡万(Kavan)事件^②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它促使哈维尔和伊芮娜·西克诺娃公开指责那份“轻率名单”的发布者,并且解释说《净化法》并不是复仇行为。^③与此相类似,其他人也曾建议,在那些只能供历史学家和其他研究者而不是记者或普通大众查阅的特殊档案中,去收集秘密警察的档案。然而,不管他们如何反对新闻报道中追求轰动效应的做法,也暂且不论有人提出的控制狂热的忏悔环境的建议,捷克共和国的后共产主义权力集团依然对忏悔仪式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以至于捷克议会将“净化”的进程扩展到了第六个年头。

由于人们不做忏悔,公共知识分子开始致力于扩大那些所谓罪行的范围。这种扩大范围的形式之一,就是在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之间做出类比。毕竟,很多德国人自己并未亲手犯罪,但由于他们没能仗义执言而沾染了罪恶;他们明白别人的罪行但却不敢抗议——或者,即使他们不明白,他们也是有罪过的,因为他们不曾付出努力去查明真相。同样的辩论结构也被应用于共产主义:那些没有抵抗的人,就是共谋者。“二战”之后的西德人就被认为是忏悔的榜样。人们强调指出,在纳粹之后,一个成功的市民社会之所以在西德能够迅速建立起来,恰恰是因为德国人被要求去面对他们的集体罪恶并做出忏悔。而另一方面,东德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例,在那里,纳粹主义的阴魂从未散去,因为那里从未有过任何忏悔。在这个

① 捷克于1991年通过的一部激进法律,该法规定:曾经在共产党政府中,任职于情报系统或特务机构的情报人员、线民,或前共产党一定层级之上的干部,五年之内不得在政府、学术部门、公营企业中担任一定层级以上的职位。1996年,捷克议会又将这部法律的效力延长了一年。——译者注

② 扬·卡万(Jan Kavan)曾任捷克外交部长(1998年起)和副总理,2002-2003年当选为联合国第57届大会主席。所谓的卡万事件,指的是其担任外长期间,被指控为英国和捷克的双重间谍(有人散布了一份相关名单,卡万名列其中),还有人说他涉嫌贪污腐败,甚至有媒体报道说,卡万同一桩谋杀案有牵连。但是后来,这些指控都无果而终。——译者注

③ Siklova (1996) "Lustration", pp. 60-61.

基础上，中欧的公共知识分子得出这样一个论点：除非人们做出忏悔，否则共产主义的幽灵就不会消失。

可以用同一种狡黠的扩充形式来解释，为什么共产主义时期轻微的犯罪和苦难都是对共产主义之前“原罪”的惩罚。在捷克，对“苏台德德裔人”（Sudeten Germans）的驱逐，就是原罪。^①这恰恰是因为，捷克人并没有对他们曾在共产主义之下遭受的原罪做出弥补。这里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直线：从驱逐之后的掠夺，到共产主义之下对私有财产的废除；从蔑视“苏台德德裔人”的人权，到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审讯与极刑；从捷克人重新搬到德裔人的房屋中居住，到1948年“共产主义的支持者”使得捷克斯洛伐克成为中欧唯一一个共产党赢得民主选举的国家；从驱逐的失道之举，到捷克民族在共产主义之下的道德沦丧。^②知识分子争辩道，捷克人将永远无法克服他们的道德滑坡，如果他们不对原罪做出忏悔的话。这就是为什么哈维尔总统上台之后，他做的最初的几件事情中，有一件就是向德国人道歉。他的意图就在于公开打开一个忏悔的链条，这个链条中包含了所有那些通过共产主义权威侵占德裔人财产的人，以及除此之外，所有那些与德裔人问题毫无干系，但与共产主义合作的人。

除了原罪之外，另一个议题是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之间的连续性。由于后斯大林主义罪行的严重性只可能在总体性中被理解——因为每

① 20世纪初，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居住着一批德裔少数民族，由于他们居住的地区位于捷克易北河和奥德河之间的苏台德山脉一带，便被当地人称为“苏台德德裔人”，人数总共有250多万。1939年，纳粹德国通过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吞并了苏台德地区。“二战”末期，捷克从纳粹铁蹄下解放后，深受纳粹迫害的捷克人将一腔愤怒全部发泄到了那些居住在捷克境内的德裔居民身上。1945年，这250万“苏台德德裔人”被当时的捷克总统贝尼斯下令驱赶出境，他们在捷克住了几辈子的房屋和土地也全被没收，其中一些人更遭到屠杀，总共有数千德裔居民死在捷克人的报复行动中。1990年1月，哈维尔首次以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身份访问德国时，就“苏台德德裔人”在“二战”后遭受的报复表示道歉。但很多捷克人对此并不认可，因为他们认为，作为纳粹的支持者和告密者，那些德裔根本就不值得同情。——译者注

② Bradley F. Abrams (1995) "Morality, Wisdom and Revision: The Czech Opposition in the 1970s and the Expulsion of the Sudeten Germans".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9 (2): 234 - 255. 下面这段引文来自历史学家 Jan Mlynarik, 他的论述点燃了争论的导火线:

（向国家社会主义）转变所带来的后果，是教导整个民族不要去崇尚物质价值，不要去崇尚财产原则，亦即世代所创造的价值。它……教导（整个民族）去偷窃……社会主义所有制中财产的异化，达到了看不见的比例，其来源和源泉并不来自社会主义的原点，相反，在这里，它来自对德裔财产无限的偷窃和抢劫。



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

一个单独的行为往往都十分微小——因此，这里很有必要强调斯大林主义与后斯大林主义之间的连续性在加剧集体罪行上的作用。人们设计了一些特殊的公共仪式，将这一点用戏剧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对纳吉·伊姆莱及其伙伴的重新安葬，就是一个这样的仪式。木桶中盛放着陨落的英雄的英雄的残骸，当喇叭中播放着被处决者的长名单时，庄严的音乐回旋四周——所有这一切都强有力地表明，一种未受惩罚的罪行如今受到了宣判。它证明了，卡达尔主义（Kádárist）政权^①的实质就包含在这些处决之中，而不是在“土豆烧牛肉共产主义”的漫长岁月中。因此，所有卡达尔主义家长制的受益者都被要求忏悔。尽管他们没有犯下杀人罪，他们也是谋杀者家中的房客。并且，就像纳粹时代普通的德国人一样，他们看不到真相，听不到真言，也无所作为。

最后，忏悔仪式也有其货币主义的形式。举例来说，作为一种防止逃税的手段，关于财产公开的立法，在匈牙利就引起了争论。在那里，由于要求人们公开其资产详细目录的法律遭到强烈反对，所以法律做出了改动，使得资产公开变成自愿性的活动。这件事情留给我们的印象，同指望原先的警察机构做出忏悔是相似的。如果你现在就你在共产主义晚期或者后共产主义早期积累的财富做出忏悔，那么你将不会被问及这些财富从何而来，或者你是通过合法还是非法的途径得到它们的。即便你在过去犯了错，如果你能做出一个简单的忏悔，那么那些过错都可以被宽容；这时的主要问题就是，从现在开始，你可以并且将要过一种道德的生活，亦即“生活在真实中”。这与西方国家中税收“赦免”（tax “amnesty”）的理念不同，因为忏悔的目的，不是要将人们过去的收入公之于众，而是为忏悔中的大众建立一条底线。

我们对这一章的总结如下：后共产主义心智，是在市民社会和货币主义理念的孕育中得以形成的，而且后共产主义权力集团受益于这些理念之间的选择性亲和，因为这为他们树立权威做出了贡献。然而，后共产主义心智也是祛魅性的。它的形成要求对经济哲学与政治哲学做出基础性的重构，尤其是重新阐述“远距离行动”这一理想类型。它需要对经济实施事

^① 卡达尔·亚诺什（1912~1989），1961~1965年任匈牙利总理，1965年当选为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委员，此后主要担任党中央第一书记。卡达尔于1968年在匈牙利实行新经济体制，贯彻“谁不反对我们，就是同我们在一起”的联盟政策，因此匈牙利的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曾一度有了较大的提高。——译者注

必躬亲的管理和监督，而且在全社会推行与公民教育有关的仪式。

权力集团的不同派系用不同的态度来看待这种发展。作为原共产主义的工作人员，管理者极大地受益于货币主义带来的颠覆效应。他们习惯于在预算讨价还价的背景下从事商业活动，他们也能够接受这样的例行公事。毕竟，作为原共产主义的工作人员，他们已习惯于在一个以“走走形式”为风气的环境中，协调他们的做事方式。在这个新的后共产主义社会里，管理者如鱼得水；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将从市民社会惯习、货币主义惯习以及管理主义惯习这三者和解中得来的心智，称作一种“管理主义的治理心智”。

很多专家治国论者在其职业生涯的早期，同样也是共产主义的工作人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反应与那些管理者十分相似，这是因为他们的惯习本来就非常接近。不过，这些信奉货币主义观点的专家治国论者，对他们的一贯做法与货币主义正统做法之间的分歧也十分敏感。他们采取了一种留有余地的口气：毕竟，他们是技术专家；他们唯一的任务就是让体制运转，不论其时盛行的是什么环境，也不论体制对他们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也许，社会还没有做好可以实行自我调节的准备；它仍处在“转型期”，它还需要再多一点的规范以及调整。

在新权力集团中，受原体制影响最弱的群体，就是原先持不同政见的民意精英。这个群体以一种祛魅以及常常冒出的浓重的内疚心理，勉强接受了管理主义的心智。实际上，他们的负罪感是如此沉重，以至于很多知识分子同时放弃了权力，重新回到他们专业的学术研究活动中。然而，即便是这些“中途退出的人”，也很少成功地与后共产主义的仪式保持距离。事实上，在他们积极地创建这些仪式，且为这些仪式背后的高尚思想打保票的时候，期待他们进行批判性地审视是不可能的。此外，那些仍然掌权的知识分子，是他们的朋友和曾经并肩战斗的同志！现在批判前者的实践，就相当于背叛。这就是后共产主义心智维度单一（unidimensionality）的原因。在这种心智中，只有肯定性的维度得以存活下来，批判性的想像力已经丧失，而且使其得到复兴，事实上也不再可能。

总而言之，在这一章里，我们描述了一种后共产主义权力集团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起源，是市民社会的异议理论与西方货币主义理论之间的选择性亲和。但是，从这种选择性亲和中发展起来的管理主义心智，同时也受到下面两个因素的形塑：一是打造和治理“实际存在的后共产主义社会”这一任务，二是与社会主义企业管理者的妥协，而后者正是完成



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

上述任务所必需的同盟者。毕竟，市民社会理论是作为一种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批判而被提出的，它永远都不会成为一幅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蓝图。与此相类似，货币主义是一项为治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机构而提出的建议，它所针对的并非后共产主义的机构。于是，当社会主义解体时，“市民社会”和货币主义的理论家就面临着全新的任务。他们所做的，正是“轨迹调整”理论引导我们去期待的东西：他们采用自己的旧思想来理解新现实，并在过程中大量地修正原有的旧思想。这就是后共产主义的管理主义心智如何诞生的写照，尽管未能满足异议分子寻求实现的“远距离行动”目标，但它至少实现了资本主义，一个对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控制的决定性突破。

第四章 后共产主义的管理主义

——关于新有产阶级形成的理论争论和社会斗争

在中欧，有产资产阶级的形成是如何发生的？它确实发生了吗？第二代文化资产者，或者它的任何组成部分，成功地将自己转换成一个私有财产阶级了吗？在第三章，我们将管理主义思想介绍成一种文化现象，亦即一种后共产主义权力集团的人生观、世界观（Weltanschauung）。在这一章中，通过使用管理主义的思想，来解释后共产主义社会中政治经济和阶级关系的一些重要特征，我们进一步拓展了这一分析。

正如我们业已强调的那样，在中欧，从国家社会主义的废墟中建设资本主义的一种独一无二的特征是，它是在没有一个持有恒产的资产阶级的情况下发生的。在所有其他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历史基点那里，有的起源于私有财产，有的则是私有财产阶级已经存在（不管他们是多么不成熟，也不管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家之间有多大不同）。转型的古典情况是：封建地主逐渐将他们的财产转变成私人所有权，并开始从中产生一个新的大资产阶级；城里的工匠和商人，忙于积累资本，并且成功地将他们自己由封建秩序中的第三等级，转变成资本主义生产模式里新支配阶级中的一员。试图从集体形式的所有权，转向私人所有权，后共产主义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此外，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观察到的那样，这一规划是由“第二代文化资产者”领导的，也就是说，是由一个前共产党官僚、专家治国论者、经理人以及他们的前左翼批判者所组成的松散联盟领导的。简言之，正在打造（中欧的）资本主义的，是一帮没有财产权的行动者的临时性联盟，仅仅在不久之前，他们还在反资本主义方面相互抬高自己的身价。

1988年，这一地区的两名最主要的社会学家——雅德维佳·斯坦尼茨



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

基斯和艾勒梅·汉基什，曾做出一个引起激烈争议的假设。我们在介绍关于政治资本主义的理论时，已经对此做过详细讨论。^① 在斯坦尼茨基斯和汉基什看来，到1988年的时候，前共产主义的红色贵族们，已经知道旧共产主义秩序的毁灭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们设计了一套方案，将政治资本主义转化成私人财富，并且试图将自己转变成一个新的大资产阶级。实际上，许多研究中欧转型的评价家，认为这正是1989年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共产党的官员们利用公职，将公共财产变成私人财富——实际上，他们盗取了国家财产，成为“盗贼统治者”（kleptocracy）。

我们也曾是那些被政治资本主义理论强烈吸引住的人中的一员。在1988~1989年间，当所谓的“自发私有化”（spontaneous privatization）的法案在波兰和匈牙利通过的时候，这一假设听起来似乎非常有道理。有一种说法认为，共产党的官僚们已经开始鼓吹资本主义，这也引起我们的好奇心。认为他们将作为私有财产者进行统治的观点，似乎也与我们对于历史的反讽感觉相吻合。在这种情况下，1990年，我们在中欧和东欧的六个国家组织了一次调查，以评估那些支持斯坦尼茨基斯和汉基什预测的经验性研究。这六个国家是俄罗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在每一个国家，我们都访谈了1000名在1988年时曾是党政官员的人，1000名在1993年属于新经济、政治和文化精英的人；我们还从总体中随机抽取了5000人，对他们的个人生活史进行调查。^② 在这一章中，我们将展示从三个国家搜集来的数据：捷克、匈牙利和波兰。我们的问题是：对旧党国精英来说，发生了什么？新精英成员的社会起源是什么？到1993年为止，有证据支持说存在一个持有恒产的资产阶级吗？如果有，这一本土有产者的新阶级是如何构成的？他们拥有多少财产，以及什么财产？

为了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我们把自己由经验社会学家转变成“侦探”。在我们搜集和开始分析数据的时候，我们的怀疑也开始增加，但问题

① Jadwiga Staniszkis (1991a) *The Dynamics of Breakthroug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Elemér Hankiss (1990) *East European Alternativ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关于政治资本主义的理论，与韦伯关于政治资本主义的理论并不相同。后者更关注的是经济体制的逻辑，而不是人事和资本家阶级的出现。对韦伯来说，政治资本主义之所以是资本主义，是因为它也是以对利润的理性获取为导向，但它之所以又是政治的，是因为这一切，都发生在国家的监护之下，及或是政治对经济系统进行系统性的干涉的情况下。我们在第五章中会再次讨论这一议题。

② 关于调查的技术细节，尤其是我们对于“党国精英”和“精英”的界定，可参见附录 I 和附录 II。

的根源仍然让我们感到困惑。我们继续重新形成我们的假设，并且，我们现在仍然在做这样的事情。我们邀请读者，加入到我们当中来，花上一个小时，或者足够长的时间直到问题得到解决，来共同探讨这些“侦探小说式的问题”。用戈夫曼的术语来说，虽然书籍通常向读者展示的是戏剧的“前台”，一般来说，那里整齐有序、干净明亮、表演优美，但我们仍然乐于邀请你们来到“后台”。我们希望你们看到脏乱的幕后劳动，“前台”的表演要想顺利展开，它们就必不可少。我们并不想向你们展示由数据支持的完美理论，而是要指出，随着我们对数据进行深入分析，理论是如何一个接一个地失败，而怀疑又是如何一个接一个地被排除的。实际上，就在我们写这一章的时候，我们的探索仍然在继续。我们并没有声称，自己已经掌握了终极的真理。坦率地说，我们也并不相信什么终极真理。我们正在研究的这个伟大的历史转变，仍然在继续进行。在我们写作和你们阅读的同时，人们关于这场转型的感觉也在不停地改变。把这些记在头脑中之后，让我们接下来展望这场戏剧的情节结构，并且告诉你们这一章所试图完成的东西。

第一幕 党国精英：布达佩斯和华沙的盗贼

故事从我们与政治资本主义理论的对质开始。这一理论主张，通过将政治权力转换成私人财富，那些在1989年之前处于党国精英位置上的人，将在后共产主义的转型之后，继续维系他们的权力和特权。这一分析的前提假设引发很多人的强烈质疑。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在后共产主义转型期间，我们发现的基本事实却是精英循环的产生。本章的第一部分，即证明了在旧党政官员中，存在着大规模的向下流动。此外，我们几乎没有发现什么证据表明，党政官员在攫取私人财产方面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些新发现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关于政治资本主义的理论，因为直到1993年，前共产党官僚都还没有将自己确立成一个新的持有恒产的大资产阶级。

第二幕 胜利的专家治国论者

我们要面对的第二个理论，是厄吉贝特·萨莱伊（Erzsébet Szalai）关于“技术革命”的理论。在很多方面，我们都可以将这一理论看做是一般化的政治资本主义命题的“精致版”。^① 萨莱伊的主张是，社会主义晚期的

^① Erzsébet Szalai (1989b) "The New Elite", *Across Frontiers* 5 (Fall-Winter): 25-31. [In Hungarian; Beszélő, No. 26, 1989]



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

党国精英是高度分裂的，社会变迁的动力，已经被理解为旧统治集团中官僚派系和技术派系之间紧张的斗争。在这一观点看来，1989年就是一场成功的革命，社会主义晚期的专家政治击败了共产党统治集团中的官僚派系。实际上，我们在本章第二部分所展示的数据，也确实支持了这一论点。所有那三个国家中，在1993年，高层经济领导位置中的大多数，都被在20世纪80年代属于技术—管理精英的人占据了。与党国精英作为一个整体已经失去他们的权力不同，他们中的一个群体（技术管理精英），似乎已经将自己确立成一个新的有产阶级。

第三幕 谨慎的管理者

接着，在本章的第三部分，我们将开始描述我们所认为的新有产阶级，他们来自前社会主义技术专家和管理者阶层。我们的分析确认了下面这一主张：在后共产主义的新政治精英中，技术专家显得尤其突出，而占据高层经济职位的，则是前社会主义的管理者和买办经理人。然而，我们也惊讶地发现，这些后共产主义的管理者并不是以私人所有者（private owners）的身份来行使他们的经济权力的。管理者几乎没有什么财产，但他们可以在资本家所有人（capitalist proprietor）缺席的情况下，行使他们的决策权。换句话说，虽然管理者确实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并不是政治资本主义理论家所预测的那种成功。我们曾相信，我们已经将正确的怀疑隔离起来，在后共产主义的转型开始之后，管理者保留了他们的职位、权力和特权。但是，我们现在开始怀疑，一种罪过是否应该对所有问题负责。实际上，如果管理者需要对什么事情负责的话，那就是他们没有能够将公共物品当作私有财产侵吞掉。这真是一个讽刺性的扭转：管理者没有做那些我们害怕“党国精英”会在1989年之后去做的事情，我们竟然感到遗憾！根据这些发现，我们开始建构我们自己的理论，来解释这些管理者的权力。^①

第四幕 1993~1996年间的“大银行抢劫案”

终于，我们进行到了我们侦探故事的最后一幕——至少，到目前为止

① 我们理论的一个早期版本，可参见 Gil Eyal, Iván Széclényi and Eleanor Townsley (1997)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 The Theory of Post-Communist Managerialism". *New Left Review* 222 (March-April): 60-92.

是最后一幕。我们要提醒读者注意，在中欧，大幕没有落下，戏剧仍在继续。我们最初的调查，是在后共产主义转型的相对早期阶段进行的，并于1993年完成。从那以后，我们又获得了更多关于财产关系变迁的近期数据。虽然它们仅限于反映1995和1996年匈牙利的情况，但它们提供了一种可能，让我们用类似的趋势来概括其他地区的特征。这些数据显示，财产所有权的类型发生了显著变化。最令人惊讶的变化，是公共所有权戏剧般地衰落，以及随后发生的本土私人所有权的大规模增长。尤其重要的是，在1993~1996年间，私人所有的中等规模的公司，获得了快速增长。根据这些数据，本章的最后一部分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中欧，一个有产阶级是否正在出现？我们要问的是：这些所有者是谁？他们是我们的管理者吗？如果是，我们关于后共产主义管理主义的理论是不是失效了？或者说，这一轮的“私有化”，与我们关于中欧社会高层阶级力量平衡的分析是否一致？

一 对党国精英而言，发生了什么？

（一）前党国精英成员中的向下流动

政治资本主义理论指望发现，旧共产主义精英已经将自己转化成后共产主义社会的新的持有恒产的资产阶级。它最普遍的主张是，在1989年之前占据党国精英位置的人，通过将他们的政治资本转换成私人经济财富，能够维系他们的权力和特权。我们的数据对这些预设提出了质疑。

表4-1描绘了那些1998年在匈牙利、捷克和波兰占据党国精英位置的人，在1993年时的后共产主义职业终点。^①虽然各国之间有一些不同，从这张表格中，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在后共产主义的第一个五年间，党国精英中出现了大规模的向下流动。在1993年，他们中只有一半的人仍然占据党国精英的位置，这还包括低级管理层中相当次要的位置。实际上，在1993年，不管是什么样的权威位置，前党国精英成员的比例都是相当低的。而且，更加令人惊讶的是，在匈牙利这样一个国家，虽然它于共产主

^① 党国精英的总体，被界定为于1988年，在这些国家中占据3000~5000个高层位置的那些人。这些职位的任命，通常需要获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某些机关或官员的批准。参见附录I和附录II。

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

义晚期实行过最为先进的市场改革政策，但与其他国家相比^①，其前党国精英成员丢掉权威位置的现象却是最明显的：只有 43.1% 的匈牙利党国精英保住了自己的工作。^②

表 4-1 1988 年占据党国精英位置的人，在 1993 年时的职业终点（按国别）

单位：%

1993 年的职业	捷克	匈牙利	波兰
所有身居权威职位的人	51.7	43.1	51.2
高级政治官员	3.0	6.4	9.0
高级管理者（公共部门）	16.2	11.2	13.4
高级管理者（私人部门）	12.8	2.4	9.1
高级文化官员	1.1	4.4	7.1
低层管理者	12.6	13.0	8.6
企业家	6.0	5.7	4.0
职业人士	12.2	19.9	13.9
工人	12.6	5.5	9.5
提前离休（低于 65 岁）	15.4	19.1	17.2
其他退休者和失业者	8.1	12.6	8.2
合计（百分比）	100	100	100
合计（人数）	468	803	849

注：由于凑整的原因，数字也许不能叠加成 100%。

批评者也许会主张，我们夸大了后共产主义转型中前党国精英成员成为“受损者”（losers）的程度。毕竟，有些党政官员已经非常老了，无论

① 我们的捷克同事并没有严格按照我们的指示进行抽样，这部分是因为，在捷克，他们发现了令人惊讶的高水平的精英再生产。至少有一部分捷克“经济干部”的样本，似乎是从在 1993 年的时候仍然是 CEO 的人中抽取的。因此，对捷克的“经济干部”来说，他们中的幸存者比那些在 1989 年之后丢掉职位的人有更多的机会进入样本中。不过，由于“经济干部”只是整个“党国精英”中相当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虽然这种前“党国精英”的过度代表（overrepresentation）也许会夸大人们所观察到的再生产率，但我们并不相信它能够完全解释我们在捷克观察到的高水平的再生产。

② 关于“匈牙利例外情况”的原因，一个详细的讨论，可参见 Szonja Szelenyi, Iván Szelenyi and Imre Kovach (1995) “The Making of the Hungarian Post-Communist Elites: Circulation in Politics and Reproduction in the Economy”, *Theory and Society* 24 (5): 697-722。

如何都是要退休的。^①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质疑：将退休，尤其是提前退休纳入向下流动的总数，是不寻常的（non-trivial）。所以，为了调查退休是否向下流动的指标，我们考察了退休的年龄、财产所有权的类型，以及前党国精英成员的职业轨迹。

（二）前党国精英成员中退休和财产所有权类型的趋势

在后共产主义的新秩序中，提前退休是衡量“受损”的一个好指标，所以，知道它到底有多么普遍就显得十分重要。虽然在匈牙利和捷克，官方的退休年龄是男60岁，女55岁，但实际上，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等级制的高层人士来说，他们的退休年龄则要更晚些，通常是在70岁左右。因此，我们选择65岁作为界限，来标识提前退休。表4-1清楚地显示了，在中欧，前党国精英成员的提前退休率相对较高，从捷克的15.4%到最高的匈牙利（19.1%）。此外，1993年，在这些提前退休者当中，还有许多60岁以下的前党国精英成员：在捷克，1988年时60岁以下的前党国精英中，到1993年时，有7%已经退休；在匈牙利是14%，在波兰则是16%（这些数据在表格中并没有显示出来）。这些发现支持了我们的论点：在后共产主义转型期间，前党国精英中出现了大规模的向下流动，他们被逐出权力位置，回到了劳动力市场中。

表4-1中的第二个重要发现是，到1993年，只有相当少的前党国精英成员报告说自己转产到了私人商业，不管是作为所有者，还是作为私有公司的管理者。这一发现也与政治资本主义理论不同。这一理论预言，只要给他们机会，干部们就会很快将自己转变成私营部门的企业家。然而我们的数据却显示，到1993年的时候，在匈牙利和捷克，只有大约6%的前党国精英成员已经成为商界的私人所有者，而在波兰，这一比例更低，只

^① 此外，在共产主义体制中，虽然一些人占据了“党国精英”的职位，但并没有在他们的日常工作中占据“权威位置”（positions of authority）。例如，国会的一名议员可以只是一个普通工人，科学院的一名院士可以只是一名普通的大学教授，没有什么下属。在1988年，一名议员或者院士，都有资格被算是“党国精英”中的一员，但这并不是由于他们的职业（jobs）。毋宁说，这种类型的“党国精英”职位反映的是共产党的等级制。在议员的例子中，一个人曾经是、现在也是一名工人，但在后共产主义转型中，他就已经不再是议员。我们所界定的“向下流动”完全指的是结构上的。这些人并没有改变他们的职业，但作为政权垮台的结果，他们已经失去了他们的政治位置。不过，这种人的数量是相当少的，所以我们并不认为，这会对我们关于“党国精英”向下流动的发现构成主要威胁。



有4%。事实上，选择提前退休的党政官员的总体比例（17.2%），要远远高于去从事私人商业的总体比例（4.0% + 9.1% = 13.1%）。此外，1993年，在这三个国家里，所有前党国精英成员中，只有大约8%的人声称自己正在管理一个私有企业。在这里，各国之间有明显的不同，捷克的党国精英成员转向私营部门的比例，比另外两个国家要高：捷克的前党国精英成员中，有18.8%的人（12.8% + 6%）在1993年时拥有或管理着一家私营公司，匈牙利是8.1%（2.4% + 5.7%），波兰是13.1%（9.1% + 4%）。这种差别也许应该归咎于捷克的“净化”政策：在捷克，前共产党领导干部在法律上被禁止使用公有办公室，这也许导致“逃往”私营商业的结果。不过，无论如何，到1993年的时候，前党国精英在每一个国家中的比例，都相对较低。这提示我们，政治资本主义理论的假设需要得到纠正。

（三）不同部分前党国精英的职业终点

如果进一步地深挖数据，政治资本主义命题的问题就更加严重。在它的最初形式中，这一理论声称，中欧的政治公职已经被用作私人财富的积累。为了检验这一声明的精确性，我们需要进一步分解“党国精英”这一概念。在共产主义体制中，“党国精英”职位的种类，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有很充分的理由相信，它们之间是分化的。^①因此，要想证伪政治资本主义的理论，就应该调查是否“党国精英”中的任一特定部分都已经成功地适应了后共产主义的转型，并成为私人所有者。在1988年，我们所说的“党国精英”中的某些人，是大型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因此，他们是“技术专家”，或者用我们的术语来说，是共产主义晚期的“经济精英”。对这些人来说，即使成为一个私有企业的管理者，政治资本转化成私人财富也并不明显——管理者和技术专家也许仅仅是利用了他们的人力资本和管理经验，以维持他们在后共产主义转型中较高的经济位置。还有一些前“党国精英”属于“文化精英”，他们是大学的校长、科学院的院士，或者日报的编辑。这些文化部门的职位，都不太容易产生大量的私人财富。因此，政治资本主义理论也必定不会指望这些共产党的前文化精英，能成为最会将政治公职转换成私人财富的那些人。不过，有争议的是，政治资本主义

^① Szalai, "The New Elite".

的命题会抓住“政治精英”不放。认为政治精英的成员在党的机构或者公共服务机构中拥有职位，而且在所有“党国精英”的成员中，他们处于最有利的地理位置上，可以使用他们的“公职”，通过“自发私有化”的机制让自己致富。^①在将“党国精英”分解成经济、文化和政治三个组成部分之后，我们现在应该就斯坦尼茨基斯和汉基什关于政治资本主义的命题提出关键性的检验。我们要问的是：统治集团中的“官僚”部分（“政治精英”）在多大程度上从后共产主义的转型中获得了经济上的好处？

表4-2展示了每一种类型的前“党国精英”成员（经济部门、政治部门、文化部门）在1993年时的职业终点。首先，它显示了在经受后共产主义转型的考验方面，“党国精英”的政治成员是最不成功的一群。在1988-1993年间，只有39.3%的政治官员保住了他们的权威位置，文化精英和经济精英则分别是44.2%和70.7%。第二，政治官员中提前退休的现象（20.9%），也比经济和文化部门（分别是14.7%和11.1%）更普遍。这暗示了与文化资本，尤其是以管理经验的形式体现出来的文化资本相比，就更成功地适应后共产主义的陷阱来说，政治资本并没有它们管用。第三，表4-2还显示，就进入新的私营部门来说，1988年时的前党政官员也没有前共产党经理人成功。在1993年，在前经济精英成员中，有24.6%的人（5.4%+19.2%）要么拥有、要么管理着一家私有商业，而前政治精英中，这一比例只有9.8%（5.8%+4.0%）。这些发现显示，如果一个人想在后共产主义时期成为新经济精英，经理人比党政官员更有优势。此外，这些发现直接驳斥了斯坦尼茨基斯和汉基什的主张，他们认为，就从后共产主义的改革中获得好处而言，前共产党中的政治精英处在最好的位置上；相反，我们发现，与政治干部的成员相比，经济干部从后共产主义转型中获得了更大的利益。

^① 在1988年，匈牙利和波兰政权都开展了一场被称作“自发私有化”的运动。共产党的精英们承认了改变财产权利、将公共持有的资产私有化的必要性，但他们用一种相当杂乱的方式，开始了这一过程。在自发私有化的名义下，企业可以自己开始自己的私有化，自己和国家组织（在1988年，这仍然指的是共产党）协商他们的费用。实际上，斯坦尼茨基斯和汉基什关于政治资本主义的最初假设，正是对这些自发私有化计划的反应。

表 4-2 在三个国家中, 1988 年占据经济、政治和文化职位的
“党国精英”, 在 1993 年时的职业终点

单位: %

1993 年的职业	1988 年		
	经济精英	政治精英	文化精英
所有身居权威职位的人	70.7	39.3	44.2
高级政治官员	1.5	10.8	1.3
高级管理者 (公共部门)	33.4	5.9	7.8
高级管理者 (私人部门)	19.2	4.0	1.4
高级文化官员	0.4	1.8	19.3
低层管理者	10.8	11.0	11.8
企业家	5.4	5.8	2.5
职业人士	4.7	16.9	27.4
工人	2.2	13.4	3.3
提前离休 (低于 65 岁)	14.7	20.9	11.1
其他退休者和失业者	7.6	9.4	14.1
合计 (百分比)	100	100	100
合计 (人数)	536	1186	398

注: 由于凑整的原因, 数字也许不能叠加成 100%。

(四) 前党国精英不同部分和后共产主义精英中的厂商所有权

不过, 针对我们的发现, 政治资本主义理论的回应也许是, 在后共产主义私营部门中, 谁在管理企业并没有什么意义。而且, 政治资本主义理论家也许会声称, 他们的理论预见到了后共产主义时期, 政治干部会成为厂商的所有者。为了处理这一议题, 表 4-3 展示了前“党国精英”中不同群体拥有厂商所有权的情况, 以调查在 1993 年政治或经济精英是否更容易获得厂商所有权。而且, 为了评估“老共产党员”或后共产主义新精英是否在向资本主义转型中获利最多的人, 表 4-4 展示了一组数据, 对 1993 年时前“党国精英”成员和新后共产主义精英中厂商所有权的水平进行了比较。

我们从表 4-3 和 4-4 中可以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 前“党国精英”不同群体在后共产主义时期的所有权分布情况, 正好与政治资本主义理论所预测的方向相反。表 4-3 显示, 与前经济部门的成员 (15.2% + 7.6% = 22.8%) 相比, 前政治部门的成员 (13.4% + 4.5% = 17.9%) 所报告的

厂商所有权要相对较少。

表 4-3 1988 年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精英所拥有的厂商数量

拥有的商业数量	经济精英	政治精英	文化精英
未拥有厂商 (%)	77.1	82.0	88.5
拥有一家企业 (%)	15.2	13.4	8.8
拥有一家以上的企业 (%)	7.6	4.5	2.8
合计 (%)	100	100	100
合计 (数量)	538	1191	400

注：由于凑整的原因，数字也许不能叠加成 100%。

表 4-4 1993 年时的后共产主义精英和 1988 年时的
“党国精英”的厂商所有权

厂商所有权	后共产主义精英 (1993)	“党国精英” (1988)
1993 年时拥有企业	22.2	18.4
未拥有企业	77.8	81.6
合计 (百分比)	100	100
合计 (数量)	2898	2139

第二，表 4-4 显示，在 1993 年，与前党国精英的成员（18.4%）相比，后共产主义新精英的成员（22.2%）更有可能报告自己的厂商所有权。^① 将我们早先关于提前退休的讨论联系起来，这些发现提示我们，与那些随着共产主义的结束而向下流动的老“党国精英”成员相比，那些在后共产主义转型期间能够更好地维系他们位置的人（亦即“党国精英”中的经济精英），以及在此期间向上流动成新精英的那些人，更有可能获得厂商所有权。这也支持了我们的主张。也就是说，厂商所有权的基础，似乎

① 在解释表 4-4 的数据时，需要小心谨慎。新经济精英中 CEO 的比例，要大大高于老“党国精英”，而且，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与老精英或新精英中的其他部门成员相比，经理人更有可能成为所有者。如果我们将新老政治精英做一番比较的话，老政治精英比新政治精英更有可能拥有厂商。这也许是两个因素的结果：第一，新政治精英受到的监督更加严格，与老精英成员相比，从私有化中揩油的难度更大；第二，与他们的共产党前辈们相比，新政治精英不太需要那些厂商所有权，因为他们都有着薪水很高的职业，以及大量的权力。



与技术和管理上的实际知识（文化资本），而不是共产主义时期所掌握的公职（政治资本）联系得更紧密些。

第三，表 4-3 和表 4-4 暗示，不管是在前“党国精英”还是后共产主义新精英中，厂商所有权都不是精英阶层的主要面向。虽然我们缺乏关于公司规模，以及精英成员在公司掌握的股票规模的详细信息，这些笼统的数据依然显示，1988 年时的“党国精英”中，在 1993 年只有大约 1/4 报告说拥有厂商所有权。这一比例，在匈牙利和捷克大约对应的是 500 名前“党国精英”，在波兰这个大得多的国家，则大约是 800~1000 人。如果前“党国精英”中的厂商所有权都是在大公司，那么，这些发现就为上述经过修正的政治资本主义假设提供了看似强有力的证据支持。然而，我们要重申的是，表 4-3 和表 4-4 只是描绘了一个笼统的厂商所有权状况。我们的调查所要问的问题是，前“党国精英”或者他们的家庭成员，是否拥有商业公司，而不管它是什么规模，拥有的是哪些部分。^① 因此，那些报告说拥有厂商所有权的前“党国精英”中，包括了只是拥有很少的厂商所有权利益的那些人，以及在微型公司中拥有利益的那些人。虽然就规模问题而言，厂商所有权数据显得比较贫乏，但我们可以得到的证据显示，在匈牙利、捷克和波兰，大多数前“党国精英”报告的，都是在非常小的公司中的所有权。这些企业中，许多是极小的转包单位，固定资本很少，或者只是作为“避税天堂”（tax havens）为外资提供服务。

通过使用匈牙利社会研究中心（TARKI）采集的关于匈牙利厂商所有权的更加详细和可信的数据，我们将在这一章的后面回到这一议题。现在只要记住的是，TARKI 的数据证实了我们的怀疑。在 TARKI 的被访者中，声称拥有厂商所有权的人，有大约一半拥有的只是小公司。此外，另一半声称在雇佣 10 人以上公司拥有股票的被访者，在这些较大点的公司中只是拥有很少的股份。只有 7%~8% 的前“党国精英”承认在 10 人以上的公

^① 还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关于前“党国精英”成员厂商所有权性质和程度的数据，质量之所以不高，原因是这道问题的回答率很低。要想形成前“党国精英”成员正在成为一个持有恒产的资产阶级的观点，这些关于厂商所有权的程度、性质和类型的回答就十分关键。所以，虽然我们被缺失数据的问题困扰，但考虑到关于所有权的高质量数据数量很少，以及，在前“党国精英”财产所有权的性质这一问题上，由于我们的数据仍然是质量最好的信息资源，因此，我们还是依靠它们进行分析。需要注意的是，在匈牙利的案例中，我们关于财产所有权的数据的质量要好得多，我们将在本章的后面部分展示这些数据。

司拥有所有权，这些所有者中只有3%~4%报告说在这些厂商中拥有超过10%的股份。如果我们将百分比转换成人口，那么，在匈牙利和捷克，这就是大约90~100个高级干部家庭，在波兰则是大约150个，他们也许在十人以上的公司拥有10%以及以上的股份。这些在私人公司中拥有10%以上股份的高干家庭中，大约有一半的家庭，其成员来自前“党国精英”中的政治部门。^①

这些关于前“党国精英”厂商所有权的发现，和我们的研究完全符合。我们的研究显示，在中欧，前干部厂商所有权中的绝大多数，只是小资产阶级所有权。^②这种所有权，并不能标志一个有产的统治阶级的形成。例如，埃里克·汉利（Eric Hanley）就指出，要想成为一个小企业（也就是雇员很少的企业）的经营者，最好的预先位置，就是共产主义垮台之前的经理人职位。一旦将经理人职位计算进来，那么在1993年，对于成功获取小厂商所有权的机会来说，共产党员身份就根本没有什么影响。这一发现，与我们已经论证过的前“党国精英”中的厂商所有权情况完全一致。也就是说，对跨入私人商业的前干部们来说，最有可能的后共产主义目标是，成为一名小雇主；他们所拥有的公司，雇员一般都比较少。^③

- ① 在这一情况下，需要注意的是，在中欧社会中，收入是呈偏态分布的，而且在匈牙利社会研究中心（TARKI）的调查中，很少有受访者报告说在特大型公司中拥有所有权。此外，那些在大商业公司中拥有所有权的受访者，所持有的股份也通常非常少。这意味着，大商业公司中的所有者非常少。在每一个国家中，也许只有6~12个高干家庭，在雇员超过300人以上的公司中，拥有超过10%的股份。如果这些财产是非法获得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并没有什么信息），那么我们所面对的腐败的影响范围，就并非微不足道。但是，腐败的程度并不足以支持这一假设：前共产主义的统治者现在正在以私有财产所有者的身份，统治着中欧。
- ② 参见 Eric Hanley (1996) "Self-Employment in Post-Communist Eastern Europe: The Emergence of a New Petty Bourgeoisi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CLA; 以及 Eric Hanley and Iván Szelényi. (1996) "Changing Social Structure during Market Transition: The Case of Central Europe". Paper presented to the workshop on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the Reform of the State*.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 ③ 还需要注意的是，许多共产党的政治干部，来自向上流动的工人和农民家庭。而且完全可以想象，如果共产主义不在这些国家发生，这些人也许无论如何已经成为小资产阶级。实际上，关于前干部们在后共产主义时期变成小商人的一个解释就是，他们只不过是回到了他们原来应该经历的轨道上——如果共产主义没有发生的话。换句话说，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国家在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中作为官员和管理者所受到的训练，使得这些前干部不可能成为中欧的洛克菲勒（Rockefeller）和杜邦（Du Pont），而且，这些来自工人和农民家庭的前干部，或许也并不掌握能够生产出充满活力的企业家精神的文化资本和惯例。我们在新的大资产阶级的大所有者中，也许能发现这种企业家精神。



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并不是要暗示，没有任何旧共产主义精英成功地利用了公共企业，通过极其成功的方式，使自己致富。我们确信，在某种程度上，这已经发生，而且，当斯坦尼茨基斯和汉基什在1988年早期，宣称前共产主义精英计划侵吞国有企业，将它们变成私有财产的时候，他们是很有说服力的。不过，我们要指出的是，在所有三个国家的前“党国精英”中，将共产主义的政治资本成功转换成后共产主义的经济资本，与其说是规律不如说是特例。弗莱德曼（Frydman）和他的合著者使用了一个术语，叫“盗贼统治”（kleptocracy），但真正获得成功的“盗贼”的数量，似乎很少；在我们所研究的任何一个国家中，正在进行统治的看上去并不是盗贼。

（五）前“党国精英”成员的退休、厂商所有权以及经济福利

虽然将共产主义的政治资本成功转换成后共产主义的经济资本并非不可能，但我们的数据显示，它比大多数人想象得要难得多。关于共产党员资格的数据进一步支持了我们的主张。表4-5再次回到提前退休的问题，考察共产党员退休行为所引发的效应。在这方面，我们试图弄清楚，哪些前共产主义精英是转型中最大的“受损者”，以及哪些成功地经受了1989年以来的各种变迁的考验。

表4-5显示，第一，捷克“党国精英”的成员中，共产党员受影响的程度要远远高于匈牙利和波兰。第二，需要注意的是，在1988年年龄低于60的“党国精英”成员中，到1993年时，退休的人数比例要高于仍然从事经济活动的比例。在60-69岁的退休者当中，共产党员也有一种不均匀的表现。简而言之，在前共产主义高层官员中，要想在达到官方退休年龄之后仍然维持自己的职业，那些不是共产党员的人的机会要多很多。我们认为，作为一名专家，有助于他保住自己的职业，而如果他只是“红色”人才，那就比较麻烦了。

还需要注意的是，在匈牙利，共产党员所受到的“惩罚”要比在捷克和波兰严重得多。这也许是因为在匈牙利的共产主义晚期，共产党员资格并不是获得一份高层职业的先决条件。在捷克则相反，如果一个人想爬到高层，除非他先入党，否则就几乎没有机会。即使在社会主义的最后几年，这也是事实。因此，在匈牙利，共产党员更多地被视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而在捷克，许多人只是被视为“实用主义者”。与捷克相比，匈牙利的共产党员更有可能被迫丢掉他们的工作，这显示了在

表 4-5 各国前“党国精英”在提前退休上的党员效应

单位:%

	捷克	匈牙利	波兰
1988 年时, 所有“党国精英”成员中的党员百分比	91.7	82.4	80.5
1993 年时, 已经退休的“党国精英”中的党员百分比	96.8	90.1	86.8
1993 年时, “党国精英”成员中, 60 岁以下仍然从事经济活动中的人中的党员百分比	90.7	82.8	81.1
1993 年时, “党国精英”成员中, 60 岁以下已经退休的人中的党员百分比	94.1	90.9	86.2
1993 年时, “党国精英”成员中, 年龄在 60~69 岁之间仍然从事经济活动中的人中的党员百分比	86.5	69.2	76.9
1993 年时, “党国精英”成员中, 年龄在 60~69 岁之间已经退休人中的党员百分比	97.3	90.7	91.2

资料来源: Hanley and Szelényi. “Changing Social Structure during Market Transition”。

后共产主义的匈牙利, 共产党员资格更多是一种不利条件。同时, 这也许还表明, 匈牙利的共产党员对社会主义的认同要更深, 因此, 随着共产主义的解体, 他们中的许多人自愿退出了工作岗位, 承认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

我们已经从提前退休中获得许多信息, 并将其作为一个衡量的指标来判断谁是中欧后共产主义转型中的“受损者”。我们已经指出, 对那些在共产主义时期身居高位的人来说, 市场转型并不总是友善的。我们发现, 提前退休更多是沉重打击了前共产主义统治集团中的政治部门, 而不是技术部门; 而且我们还指出, 在共产主义时期掌握大量政治资本, 并不总是有助于人们逃避提前退休的厄运。然而, 对我们分析的一种反对声音可能是, 提前退休并不像我们所声称的那样, 是一种不利条件。批评者也许会主张, 提前退休是共产党员保存他们特权的一种机制。前高级干部也许已经将他们的政治资本兑换成私人财富, 然后, 带着他们的新经济资本, 他们也许会选择提前退休, 以“掩盖”他们获得这些新财富的方式, 或者, 他们已经不再需要靠薪水来养活自己。对我们的分析来说, 这是一种合理的质疑。这就要求我们去探索, 在转型期间, 提前退休者是不是积累大量财富的那些人。特别的, 我们需要考察, 一



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

些人之所以提前退休是不是因为他们已经不再需要他们的薪水，或者是因为，由于他们过去的共产主义经历，使得他们的工作生活变得不再舒适。

为了对这些可能性进行评估，表4-6展示了一组和前“党国精英”不同部门中的退休情况以及厂商所有权有关的数据。这一表格显示，在1993年的时候，前“党国精英”的退休人员中，有大约90%多的人宣称不拥有厂商所有权。相反，对那些在后共产主义转型期间成功保住职位的前“党国精英”来说，他们在1993年时拥有厂商所有权的比例，是退休者的两到三倍。这张表格展现出来的趋势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在后共产主义转型中，“党国精英”成员中的退休代表的是一种向下流动。

表4-6 1988年“党国精英”中不同部门的厂商所有权
(按1993年时的职业分类)

	单位：%	
	拥有企业	不拥有企业
1988年时的经济精英		
1993年时仍处在精英位置上的	26.3	73.7
1993年时处于亚精英位置上的	27.0	73.0
1993年时退休的	10.9	89.1
1988年时的政治精英		
1993年时仍处在精英位置上的	29.8	70.2
1993年时处于亚精英位置上的	12.6	87.4
1993年时退休的	9.4	90.6
1988年时的文化精英		
1993年时仍处在精英位置上的	14.9	85.1
1993年时处于亚精英位置上的	11.0	89.0
1993年时退休的	7.0	93.0
所有被访者	18.1 (380)	81.9 (1719)

- * 我们将那些没有被管理者 (supervisees) 的职业人士，或者从事相对次要工作的人界定为“亚精英” (sub-elite)。这里所说的“精英”是很宽泛的，不仅仅包括那些在正式的“党国精英”位置上的人，而且也包括所有拥有“被管理者”的职位上的人。

我们还必须追问这些数据的可靠程度。如果像政治资本主义理论暗示的那样，旧共产主义政治精英是一个盗贼，那么，面对访问员，他们不承认自己拥有厂商所有权也非常合理，尤其当这些厂商是非法获得的时候。由于我们的数据是通过调查研究得来的，因此我们并没有办法检查每一特定个人的回答是否可靠。对付这种可靠性问题的一种防御性手段是，检查报告上来的一系列经济指标是否具有连贯性（比如收入、所有动产和不动产的总价值），然后将这些指标做比较，以检查它们是否前后一致。不过，由于这些其他的经济指标同样也有可靠性的问题，所以，我们改为分析前“党国精英”成员的住房中房间的数量（the number of rooms in the house/flat），以评估他们的经济福利。住房中房间的数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衡量经济福利最“客观”的标准，因为我们相信，这是我们的被访者最有可能给出真实答案的问题。

表4-7展示了在1993年间，前“党国精英”不同部门成员的住房中房间的数量。这些数据告诉我们，几乎没有什么理由来过分关注前“党国精英”成员的经济福利。在国家社会主义时期，这些人显然都对自己不薄，按照中欧的标准，他们住得也都很好。在我们的总体样本中，一套住宅的平均大小是有两个房间，所以，将近一半的前“党国精英”住在四室及其以上的住宅里，这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表4-7显示，与前政治和文化精英相比，前经济精英享受着最大的住宅。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与那些在后共产主义转型期间仍然从事经济活动，以及已经保住相对有利职位的前“党国精英”相比，那些在1993年之前提前退休的前“党国精英”成员，享用更高标准住房的可能性要明显低得多。在这一标准上，退休人员的处境显然比仍然在工作的人要糟。^①将这一数据与厂商所有权的数据结合起来，这些关于住宅规模的数据支持了我们的主张。那就是，在向后共产主义转型的过程中，许多前“党国精英”是向下流动的，而前“党国精英”中的经济精英则处于更有利的位置上。

^① 当然，他们的年纪比较大，也不太可能和孩子们住在一起，这也许部分是他们的住房相对较小的原因。然而，这种差异实在是太大了，并不能仅仅被归结为人口上的因素，尤其是在中欧，人们不太可能像美国人那样，仅仅因为家庭人口情况的变化，就换一所房子。



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

表 4-7 1988 年“党国精英”中不同部门成员的住房中房间的数量
(按 1993 年时的职业分类)

单位:%

	3 间或以下	4 间或以上
1988 年时的经济精英		
1993 年时仍处在精英位置上的	39.8	60.2
1993 年时处于亚精英位置上的	37.8	62.2
1993 年时退休的	60.5	39.5
1988 年时的政治精英		
1993 年时仍处在精英位置上的	52.6	47.4
1993 年时处于亚精英位置上的	60.9	39.1
1993 年时退休的	65.3	34.7
1988 年时的文化精英		
1993 年时仍处在精英位置上的	51.5	48.5
1993 年时处于亚精英位置上的	52.9	47.1
1993 年时退休的	67.3	32.7
所有被访者	54.6 (1107)	45.4 (920)

我们正在逐渐展开的戏剧的第二幕，探索的是共产主义在最后岁月中瓦解的动力机制。我们讲述的，是一个与成功的革命有关的故事，它由技术精英发动，破坏掉了旧的官僚秩序。我们还要展示，为什么是管理者，而不是高层政治官员，最有可能从正在出现的市场体制所提供的新机会中获益。

二 胜利的技术—管理精英

在这一部分，我们将探索前共产党统治集团中的技术部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看做后共产主义转型中的最大赢家。虽然就“党国精英”本身而论，他们不可以被视为绝对的赢家（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向下流动了），但是，前共产党统治集团中的技术部门成员，看上去却肯定是胜利者。不过，技术专家权力的来源，仍然尚不清晰。虽然政治资本主义的理论家希望在财产所有权中找到技术—管理权力的根基，但前述关于退

休、职业轨迹以及财产所有权类型的数据已经充分表明，如果要想捕捉到后共产主义转型的动力机制，政治资本主义的理论就需要做出实质性的修正。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相当粗糙地考察了政治资本主义命题的各种观点。这些命题的根基，可以回溯到1988年。那个时候，共产主义精英仍然掌权，而且在“党国精英”的成员中，一个“政治资本主义”的规划也许已经在私底下酝酿。在阻止这一政治资本主义规划获得成功的过程中，诸如斯坦尼茨基斯和汉基什这样的学者也许扮演了某种角色，因为他们将旧精英的新权力游戏暴露了出来。在1988年的时候，当斯坦尼茨基斯和汉基什观察到，自发私有化已经成为人们为了在共产主义垮台之后，继续维持特权的媒介的时候，他们表现出了非凡的知识分子的勇气和理论预见。正如汉基什所指出的那样，通过向政治精英提供私人财富，共产党改革派试图塑造出一个“广泛的联盟”——他们希望通过这一方式，通过为老保守派创造新资本主义中的股票，使得针对转型的抵制能够扩散开来。^①我们在这一章的要点之一则是，在转型期间，汉基什所担心的这种“广泛的联盟”并没有团结起来。我们并不想去问，在事实层面上它是否曾经存在；我们只是认为，它已经失败了：到1989年的夏天和秋天，在匈牙利和波兰，市场改革的力量已经不需要统治集团中官僚部门的帮助或许可，就能够继续创造新的市场机会。^②事实上我们认为，通过自发私有化的过程，老精英们致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障碍，就是他们在转型期间必须承受的公共监督：1989年之后反共产主义的新政治精英、自由的媒体、诸如斯坦尼茨基斯和汉基什这样的学者，都对旧精英高度不信任，并且给予了有力的批判。

在承认汉基什对政治资本主义理论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之后，我们也

^① 事实上，当他的著作于1989年夏天在匈牙利第一次出版的时候，汉基什遭到了刻薄的攻击。卡博·瓦基（Gábor Vági）将汉基什的主张解释为鼓吹这种“广泛的联盟”。就我们所阅读到的汉基什的著作而言，我们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指控。与其说汉基什提供了一项政治建议，不如说他提供了一项诊断。

^②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汉基什所预言的“红”与“专”之间的“广泛联盟”的形成，在中欧也许已经失败，但在今天的中国，它也许仍然在起作用。中国在贯彻市场改革上的成功，也许可以被归于这样一个事实：至少对部分共产党干部来说，市场经济的股份已经被创造出来，这在农村工业化中尤其明显。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之一，在地方上应该归功于乡镇企业。在许多中国问题专家看来，这些乡镇企业也许实际上属于地方上的干部。

注意到，在 20 世纪 80 年代晚期，厄吉贝特·萨莱伊已经对政治资本主义命题中粗糙的或者一般化的形式做了修正。萨莱伊研究了 20 世纪 80 年代大部分时间里大公司的经济行为。还在国家社会主义晚期，市场改革的进程刚刚开始的时候，她就觉察到了，社会变迁的动力，根植于共产党精英的内部分裂。^① 与将“党国精英”看做一个同质性的概念不同，她主张，至少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一种“新的精英”就已经出现，他们开始来挑战统治集团中的旧官僚部门。^② 她最终非常精确地将这种新精英确认为“晚期卡达尔主义专家政治”（late Kádárist technocracy），他们将很快成为共产主义官僚政治的对立面。^③

萨莱伊对匈牙利 1989 年发生的各种事件的早期解读是，专家政治已经成功地打败了统治集团中的官僚部门。不过，这一胜利的结果，并不是专家政治渴望去取代官僚主义精英。更准确地说，专家政治试图改变社会主义支配的性质。专家治国论者准备将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分开，他们对自由选举和多党政治体制也表示支持。在这一努力之下，获胜的专家治国论者与异议知识阶层展开了对话。在 1989 年早春和晚秋召开的所谓圆桌谈判中，政治和经济的分离，以及自由选举的议题，都是议事日程上的主要项目。人们甚至可以说，为战胜官僚政治，专家政治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就是声明放弃它对政治的垄断；它必须允许一帮新政治官僚，亦即一个新政治阶层的兴起。在 1989~1990 年间，这些新政治官僚的成员，大部分来自前异议知识分子，以及其他的知识阶层。

① Erzsébet Szalai (1981) *Kiemelt vállalat-beruházás-érdek* (Privileged firms, investments, interests).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Szalai, Erzsébet (1989a) *Gazdasági mechanizmus, reformtörékvések és nagyvállalati érdekek* (Economic mechanism, reform scenarios and the interests of large firms).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Szalai, Erzsébet (1989b) "The New Elite".

② Erzsébet Szalai (1989a) *Gazdasági mechanizmus*, pp. 169–176.

③ 当然，有大量文献，对“红”与“专”、“专家政治”和“官僚政治”之间的差异予以了关注。萨莱伊的主要贡献在于，她将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力，置于统治集团的这两个不同派系的冲突之中。她是最早预见到专家政治必定会战胜官僚政治，以及技术专家将利用市场改革中财产权的转变来实现这一目标的学者之一。相反，其他学者所预言的，则是这两个派系的和睦相处或者相互合并 [参见 George Konrád and Iván Szelényi (1991) "Intellectuals and Domination under Post-Communism", pp. 337–361 in *Social Theory for a Changing Society*, ed. James Coleman and Pierre Bourdieu.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Alvin Gouldner (1979) *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Class*. New York: The Continuum Publishing Corporation]。

然而，对专家治国论者来说，从官僚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向后共产主义的转型，比他们原先预料的要困难得多。由于这场转型是“一个协调的产物”——实际上，如果它是一场革命的话，也是一场“天鹅绒革命”^①——所以，它遇到了权力分享的问题。1989年圆桌讨论之后12个月不到，前国家社会主义的专家治国论者就很明显地感到，这场转型并没有像他们期望的那样发展。随着1989年的逝去，专家治国论者的政治位置受到了削弱。而到了年底，前异议知识分子已经形成一个新的政治精英阶层，操纵了政局。^②前共产党专家治国论者和新政治精英之间并没有出现和睦的合作，相反，在共产主义之后的第一次选战中，我们目睹的是猛烈的相互攻击和尖刻的反共修辞。实际上，新政治精英扮演了反共的角色，不仅反对强硬的共产党政治官僚，而且反对专家治国论者，而就在这年的秋天，他们还坐在一起，就转型问题讨价还价。在事后，我们也许能够观察到，在多党体制下的政治竞选中，这种政治上的反复是必然的。而且，由于它紧跟着柏林墙的倒塌而发生，所以，中欧的各个新成立的非共产主义政党，都试图通过它们恶毒的反共言辞来相互贬损。需要注意的是，很重要的一点是，共产主义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分离，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

在这样一个迅速两极化的政治空间中，体制瓦解的过程，并没有像共产党专家治国论者中的改革派原初预想的那样，沿着一条奔向西方市场经济的“进化”路线前进。甚至在匈牙利，虽然非共产主义的“市民论坛”曾表示，它愿意且有力量与前共产党联合进行统治，但这种联合也没有实现。在“市民论坛”于1990年赢得大选之后，它采取了更加敌对的反共产主义姿态。在这一时期捷克和波兰的政治生活中，强烈的反共情绪也处于支配地位。此外，在所有这三个国家中，反共修辞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它并没有对共产党专家治国论者中的改革派和共产主义支配集团中的保守派官僚做出区分，前者在催生转型中发挥过作用，而后者在那个时候已经被赶走了。在这种夸张的政治修辞的旋风中，过去的40年都被一笔勾销了：

① “天鹅绒”一词在俄语中含有“温柔、柔软”之意。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政局发生剧变，群众成立民主议会，实行多党议会民主制，推举著名异议人士、戏剧家哈维尔为总统。这场改变自始至终没有发生流血事件，有媒体形容它“有天鹅绒般的顺滑质感”。从此，人们把“通过不流血的方式实现政权和平转移”的改变或革命称为“天鹅绒革命”或者“和平演变”。——译者注

② Erzsébet Szalai (1989a) *Gazdasági mechanizmus*, pp. 181 - 186.



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不仅是失败的，而且简直就是劳改营。没有人对（相当短暂的）斯大林时代和仁慈得多的后斯大林时代的家长统治做出区分。因此，共产党专家治国论者中的改革派感到十分震惊：曾经和他们联手反对官僚政治的异议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反对他们。

在捷克，《净化法》^①得以通过。在波兰，瓦文萨赢得总统大选，他指责马佐维耶茨基（Mazowiecki）对共产党员太心软，允许他们从私有化中牟利。在这样的背景下，瓦文萨许诺立法，将前共产党领导人把公有公司私有化视为非法。与此相似，在匈牙利，“市民论坛”领导的政府开始遣散一些改革派共产党员中的领导者，用自己的人取代他们。安道尔总理甚至解雇了国家银行的行长苏兰尼（Surányi），后者在共产主义改革时期赢得了同行的尊重。苏兰尼的位置被“市民论坛”内阁中的一位部长伯德（Bod）取代，而他在银行圈子里并没有多大的名声。

正如萨莱伊和其他人业已指出的那样，到1990年时，社会主义晚期专家政治的胜利庆典看上去是很短命的。新的政治精英似乎正在将旧的国家社会主义的专家治国论者赶出权力圈。然而，1993年的数据却证明了专家政治的顽强生命力，没有它们，新的政治官僚就无法统治下去。

表4-8和4-9分别按照不同部门和国别，展示了1993年时新精英的职业起源。我们主要有三个发现。第一，许多1993年时的后共产主义精英，在1988年时的职业起源都不是精英。所有新政治和文化精英中（在共产主义之后的最初五年里，他们占据国家的最高决策位置），有超过一半的人在1988年时，只是普通的职业人士，只有1/3的新政治和文化精英在共产主义时期占据过权威性的职位。这一发现证实了在后共产主义转型的早些年里，社会等级的高层在人事上所发生的剧烈变化。这些数据还有助于破解一般化的政治资本主义假设，后者认为，虽然体制的逻辑发生了变化，但高层的人事仍然没有什么改变。很显然，不管是政治领域还是文化领域，都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

^① 捷克于1991年通过的一部激进法律，该法规定：曾经在共产党政府中，任职于情报系统或特务机构的情报人员、线民，或前共产党一定层级之上的干部，五年之内不得在政府、学术部门、公营企业中担任一定层级以上的职位。——译者注

表 4-8 1993 年时的新经济、政治和文化精英，在 1988 年时的职业起源
(捷克、匈牙利、波兰)

单位：%

1988 年时的职业	1993 年时的职业		
	新经济精英	新政治精英	新文化精英
精英/“党国精英”	31.9	15.3	18.8
低层管理者	41.0	14.0	15.9
企业家	1.1	1.9	0.2
职业人士	12.9	52.8	56.6
工人	11.3	12.0	4.9
不详	1.8	4.0	3.6
合计(百分比)	100	100	100
合计(数量)	1793	642	464

资料来源：1989 年调查后东欧的社会分层，1993-1994，新精英样本。

不过，表 4-8 中的第二个发现是，后共产主义的新经济精英，亦即 1993 年时这些国家 3000 家最大公司的 CEO，却很有可能在共产主义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他们在高层经济职位上的职业生涯。超过 2/3 的后共产主义新经济精英 (31.9% + 41% = 72.9%)，在 1989 年政权垮台之前，就已经占据共产主义经理人的位置。

第三，表 4-8 显示，1988 年在国家社会主义“第二经济”中从事个体私营商业的阶层，只有相当少的人被吸收进后共产主义的经理人职位。正如表 4-9 显示的那样，即使在匈牙利这样一个“第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1993 年最大的 3000 家商业组织中，只有不到 2% 的人在 1988 年时是私营企业主。这是我们调查中与我们的直觉最不一致的发现之一。在匈牙利和波兰，都有许多非常出色的私营企业主，早在国家社会主义时期就开始了他们的事业，而且在后共产主义早期，随着他们生意的增长，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后共产主义商人通过自我奋斗而获得成功的故事，是真实存在的。然而，表 4-9 却显示，在 1993 年的高层经济决策职位上，他们却不是最有代表性的在职者。

更准确地说，我们的数据显示，在经济领域，存在着程度很高的精英再生产，而在后共产主义早期，政治和文化领域，则大多是精英循环。转型中的大赢家，是旧统治集团中的技术专家部门。这一群体与前异议知识分子共享了转型中的好处，后者中的许多人已经占据了政治、国家行政机关、文化领域中的高层职位。



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

表 4-9 1993 年时的新经济精英，在 1988 年时的职业起源
(捷克、匈牙利、波兰)

单位:%

1993 年时的新经济精英成员			
1988 年时的职业	捷克	匈牙利	波兰
精英/“党国精英”	19.3	31.4	48.7
低层管理者	47.2	42.6	31.3
企业家	0.4	1.9	1.1
职业人士	15.4	11.6	11.2
工人	14.8	11.4	6.6
不详	2.9	1.1	1.1
合计(百分比)	100	100	100
合计(数量)	689	570	534

资料来源：1989 年调查后东欧的社会分层，1993-1994，新精英样本。

考虑到这些发现，以及上述已经成为历史的政治事件，我们现在要问：经济精英间高程度的再生产说明了什么？当我们知道，在共产主义瓦解后不久，异议知识分子很快就转而反对前社会主义的技术专家之后，有什么东西可以解释前社会主义专家治国论者保住他们精英位置的能力？后共产主义早期的反共言行，只是为了“秀”（show）一下而已吗？反共的修辞只是被利用来赢得大选，而新政治官僚和共产党改革派专家治国论者实际上在幕后进行交易吗？我们并不这样认为。正如我们在对表 4-2 的分析中指出的那样，国家社会主义的前经济精英中，存在大量的向下流动。1988 年时大型公司中的高层管理人员，到 1993 年时，只有一半仍然是国有或私营企业中的高层管理者。他们中 1/3 的人明显地向下流动了，大约一半的人，则提前退休。简言之，经济精英中是发生了大规模的再生产，尽管在 1989 年之后，国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高层人士中，许多人也向下流动了。我们如何解释这种令人费解的事情？答案是：虽然在共产主义体制垮台之后，那些处在高层的人向下流动了，被赶出了经济精英的位置，但那些占据低层管理职位的人，却并不是这样。表 4-8 显示，只有 31.9% 的后共产主义新经济精英，在 1988 年时占据着“党国精英”中的高级职务，他们中的 41%，来自较低级别的管理层。一旦我们理解了精英再生产和精英循环的动力机制，就会很明显地发现，在后共产主义早期指向共产党改革派专家治国论者的反共言论，并不仅仅是修辞上的。一些“胜利者”（top-

dogs) 乘胜追击，但在试验了用政客来取代商业管理者之后，新政治官僚退却了。因为实践证明，这场实验简直是一场灾难，可以与用普通工人代替资本家的共产主义实验相类比。折衷的办法就是提拔一批原来的中层管理者到 CEO 的岗位上来，因为这些人既没有背上前共产党干部的污名，而且掌握着管理上的实践知识，以及对在后共产主义环境中做生意来说，非常关键的社会网络。

表 4-8 和 4-9 中的数据也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因为它们是在共产党的继承者赢得共产主义之后的第二次大选之前采集的。共产党的继承者在匈牙利赢得大选的时间是 1993 年的秋天，在波兰则是 1994 年的春天。在这两个国家中，新政治官僚和社会主义晚期的专家治国论者之间的“和解”，发生在第一届自由选举的政府统治期间，而这届政府毫无疑问是反共的。这次“和解”的基础，使前异议知识分子和社会主义晚期的专家治国论者都意识到，他们彼此需要，以实现“第二代文化资产者”“在没有资本家的情况下建设资本主义”的规划。这次“和解”在匈牙利表现得尤其明显。在 1994 年的大选中，匈牙利共产党的继承者（匈牙利社会党）赢得了议会中绝大多数的席位。他们选择邀请主要的自由主义政党——自由民主党，加入他们的联合政府。而自由民主党——它主要由 20 世纪 70 和 80 年代异议知识分子的中坚力量组成——则接受了这一邀请。^① 这是一件多么奇怪的转折：并不是出于两党之间在组阁技术上的需要，一个联盟组成了，而且仅仅在四年之前，他们还是最不共戴天的敌人。

在这一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虽然汉基什和斯坦尼茨基斯在某些方面是错误的，但萨莱伊的预言却大体上命中目标——并不是所有“党国精英”在共产主义之后的早些年里，都将他们的政治权力转化成了私人财富。旧统治集团中的官僚部门在 1989 年被击败了，他们中的许多人忍受着向下流动之苦。是技术管理精英——社会主义晚期的专家政治，击败了共产党统治集团中的官僚部门，接着开启了与前异议知识分子谈判的圆桌会议。专家治国论者愿意让异议人士在自由选举中竞争政治权力，并形成一种多党政治。虽然在转型的早期，这导致政治上的长期争斗，但最终，专家治国论者巩固了他们对经济权力的掌握。社会主义晚期的专家治国论者和前异议知识分子开始学会在政治和文化领域中相互合作。

^① Erzsébet Szalai (1996) *Az éliték átváltozása* (Transformation of elite). Budapest: Cserépfalvi Kiadó.



不过，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问的是：这是不是只是政治资本主义一个更加精致的例证？我们的批评者也许会主张，虽然“党国精英”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像政治资本主义理论所预言的那样中饱私囊，但在后共产主义的转型中，技术—管理精英确实成功地维系了他们的经济位置。只有“相对自主”的国家权力和文化领域被转让给前反共人士，亦即异议知识分子。我们要指出的是，即使是这一主张，也不能充分把握我们前面所说的精英循环和再生产的动力机制。毕竟，在匈牙利和波兰，共产党的继承者于1994年完全赢得了共产主义之后的第二次大选。他们根本没有必要与前异议知识分子妥协。此外，这些继承党包含共产党干部中更年轻的追随者，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与共产党改革派共同合作，一起反对旧的官僚统治集团，而且在后共产主义早期，他们正陆陆续续地回到政治和文化领域中来。到1997年的时候，在后共产主义的新政治和文化精英中，已经包括了许多在共产主义时期曾经是中层干部的人，甚至许多在1989年剧变之前的共产党员。^①在这一基础上，政治资本主义的理论也许会做出修正，去主张：社会主义晚期的专家治国论者，将他们的专长和政治网络混合起来，以将自己确立为共产主义之后资本主义新的大资产阶级。他们同时改造了政治和文化领域中的许多精英职位，提供给他们的食客，只是把边缘性的位置，留给以前的非党员或者反共知识分子。

这样一个修正过的政治资本主义理论有很多优点，但技术—管理精英确实真的成功地将自己确立成一个新的大资产阶级了吗？技术—管理精英是以经济资本所有权的形式，来巩固他们在经济领域中的霸权职位的吗？在这一章的下一部分，我们将揭示，即使是这一修正过的政治资本主义理论，也夸大了技术—管理精英利用私有化来获取私有财富的程度。实际上，我们认为，技术—管理精英并没有成功地将自己转变成为一个有产阶级，他们仍然是在自己专长的基础上行使权力。他们的行为，虽然像是后共产主义权力集团中的支配群体，但他们只是一个部分而已。简而言之，后共产主义还没有形成一个新的支配阶级。

^① 事实上，这一现象在1996年的12月表现得尤其明显。在致党的一封“公开信”中，伯克希（Bekesi）控诉了自己所属政党的庇护主义，谴责社会党过快地将党的忠实信徒提拔到权威岗位上去。伯克希是匈牙利社会党的一名领袖人物，于1994年做过短暂的财政部长，而他在最后一届共产党政府中也担任过这一职务。他认为，对党的忠诚，尤其是对总理和社会党党魁（霍恩）的忠诚，正在变得比能力更重要，而这种情形，让人回想起共产主义时期的逆向选择（counter selection）。

三 作为管理控制背景的混合财产关系

(一) 管理者获取了极少的私有财产；他们的权力来源于他们的文化资本

把我们的故事推进得更远，我们要问的是：前社会主义专家治国论者和管理精英在1993年行使他们的经济权力的基础是什么？是（经济）资本的私人所有权吗？还是管理上的实践知识（文化资本）？换句话说，管理者和技术专家已经将自己变成有产阶级了吗？以我们从1993年调查的数据为基础，我们相信，直到1993年，管理者们还没有将自己建构成一个有产阶级。借用侦探剧的隐喻来说就是，我们怀疑“犯罪”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发生。可以肯定的是，在共产主义转型后的早先年里，确实发生了一些管理层收购，一小部分经理主管人员，在他们管理的公司中获取了足够多的资产，从而以财产所有者的身份经营公司。不过，1993年的数据显示，在大型公司中，经理人的所有权还是相对较少的。管理者的厂商所有权，被局限在小公司中，而且经常不是那些他们自己正在管理的公司。此外，我们认为，对管理者而言，这种小公司中的经理人所有权，扮演的也是次要角色，仅仅是他们丰厚的管理收入的补充，在某些情况下，则是用来刺激他们将公司管理得更有效率，获取更高的利润。和西欧或者北美公司中的管理者一样，后共产主义管理者行使权力的基础，是他们在管理上的实践知识、商业联系和人际网络。

不过，我们的阶级行动者和精英成员所生活和表演的组织环境，与西方的管理者、商业所有者以及政治上的代理人有很大不同。中欧的这些环境，以及正在出现的阶级关系结构，为我们的“演员”们所塑造的阶级形成、阶级权力和阶级行动的可能性，与西方相比，也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接下来，关于中欧的这些不同（至少是目前为止的不同），我们将提出一些尝试性的假设。我们的出发点是这样一个发现：后共产主义中欧向资本主义转型的独特之处在于，即使在中小规模的公司中，财产所有权也是混合的。在这一脉络中，我们归纳出共产主义之后资本主义的三个特征。

第一，在1993年，公共所有权的比例依然很大，占到所有公司资产中的25%。那些可以被私有化的国有企业，早已经被私有化了，而国家现在则被许多没有市场能力的企业缠住。此外，如果这些没有市场能力



的企业都倒闭了，失业率很有可能就会很高。所以我们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高水平的公共所有权有可能成为后共产主义经济景象的特征。

中欧财产权中第二个有趣的因素，似乎正是戴维·斯塔克 (David Stark) 所说的“重组的资产” (recombinant property)，它通常采取制度上的混合所有权形式。^① 拉里·金 (Larry King) 在捷克也发现了大量的“自我所有权” (self-ownership)，或者“制度性交叉所有权” (institutional cross-ownership)。^② 戴维·斯塔克和拉里·金都发现，在“制度上的混合所有权”链条中，银行都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反过来，这些银行要么是直接地由国家所有，要么是间接地由国家所有。实际上，在银行领域，公私分离似乎已经是一个特别费力的过程。^③ 政府经常利用他们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银行，来继续它们以前的再分配实践——拉里·金敏锐地将这一过程称作“隐蔽的再分配”。^④ 政府向银行施加压力，让它们继续向陷入困境的企业提供贷款，试图将它们从破产中拯救出来，因为政府害怕大规模的失业，而这会使已经陷入赤字的预算雪上加霜。当银行在政府的这种压力之下，发放了不安全的贷款之后，它们就会陷入困境。这个时候，政府就很有可能帮它们脱困。在1991年，这种“救助”方案 (bail-out scheme) 曾在主要的匈牙利银行小规模实行，而在1993年则是大规模实施。^⑤ 在1993年，匈牙利政府从这些要救助的银行中，举债约3000亿匈牙利福林^⑥ (约300亿美元)，从而制造了一场严重的国内债务危机。^⑦ 在1994年之后，社会党和自由民主党组成的联合政府继续推行这一政策，虽然与由保守的市民

① David Stark (1996) "Recombinant Property in East European Capital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4): 993 - 1027.

② Larry King (1997) *Pathways from Socialism: The Transformation of Firms in Hungary, the Czech Republic and Slovakia*.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CLA.

③ Eric Hoorn (1996) "Tschechische Banken haben zu viel Macht" (The Czech Banks Have Too Much Power). *Die Presse*, 20 June, p. 17; Roman Frydman, Cheryl W. Gary and Andrzej Rapaczynski (1996)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Central Europe and Russia*.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④ Larry King (1997) *Pathways from Socialism*. 同时可参见 Éva Voszka, (1994) *Centralization, Renationalization, Redistribution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Changing Ownership Structure in Hungary, 1989 - 1993)*. Budapest: Central for Economy Policy Research, Discussion Papers, Series No. 916.

⑤ Stark (1996) "Recombinant Property...".

⑥ 福林是匈牙利货币名。——译者注

⑦ 同上揭。我们很感谢戴维·斯塔克，他非正式地提供了银行合并过程中的有关信息。

论坛主导的上届政府相比，在规模上，已并不相同。另一个例子是，在1995年，社会党和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向布达佩斯银行（Budapest Bank）注入了几十亿福林的资金，使它变得对外国投资者更有吸引力。^① 在注入这笔资金之后，匈牙利政府将布达佩斯银行卖了出去，所得的资金，刚够挽回政府不久之前给这家银行的补贴。^②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私有化时期，布达佩斯银行将它的一些投资抛售给了它的一家附属机构——市民银行（Polágr Bank）。而在私有化的合同中，有一条附带条款声称，在新的所有者愿意的情况下，政府可以买回市民银行。这正是1996年12月发生的事情：市民银行被重新“国有化”，为把它买回来，政府向布达佩斯银行支付了10亿匈牙利福林。这似乎是戴维·斯塔克所描写过的政府推卸责任和保存资产的策略中一个经典的案例。企业将责任推卸给了附属公司，自己破产，然后让政府来救助它。然而，市民银行国有化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被救助，而且成了公有财产，而政府给现在已经私有化了的布达佩斯银行的报答，是它担负了政府的坏账这一荣誉。^③ 当然，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政府对亏损的企业的救助，也并非完全没有。不过，在中欧，一个似乎特殊的因素是，这一种救助发生的程度，并不仅仅是一种量的差别。制度性交叉所有权的网络过于密集，公共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往复过于频繁，以至于经常很难说出，是什么将公共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区别开来。

第三，我们认为，那些CEO拥有公司所有权股份的案例，与只是管理公司的案例相比，是相当少的。戴维·斯塔克和拉里·金注意到，这些CEO自己拥有的公司，大多数是以“转包合同”的方式来运作的小卫星公司——管理者从他们管理的“母公司”中挖掘大量的收入来源渠道。在西

① 这件事情发生在布达佩斯银行总裁博克洛什（Bokros）被任命为财政部长后不久。在离开他在银行的岗位之后，博克洛什从一家他离职时仍然是公有的机构中，收到了一大笔退休金。

② 这种问题并不是布达佩斯银行私有化过程中独有的现象。在匈牙利，私有化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它们体现在高比例的私有化税收资金上。为了使私有化政策合法化，这一政策的推动者指出，私有化的首要目的，并不是为政府的预算创造税收，而是减轻政府未来再分配的负担，并最终创建出一种医疗计税基数（tax base）。因此，你卖掉一家公司所要付出的代价，至少应该和你买它时的成本一样；而根据这一逻辑，这才是好的商业。当然，对于这种快速私有化政策的批评会反对道：最后，我们都完蛋了。

③ 参见 László Hajnal (1996) “Viaszaállamosították a Polgári Bankot” (The Civic Bank was re-nationalized), *Magyar Hírlap*, 31 December.



方公司中，一个对明确的股东负责的董事会，允许它的 CEO 这样来运作公司，是不可想象的。虽然像拉里·金指出的那样，确实不管在哪里，管理层都利用转包合同公司（subcontracting firms）来组织管理层的收购，但在中欧，管理层似乎是在将这些“寄生的卫星公司”当作一个永久机构，而并不仅仅是管理层收购过程中的一个中介步骤。对此，我们的观点是，在混合所有权的情况下，例如我们在前面描述过的中欧的情况，对“寄生性卫星公司”的经理人所有权，能够在一个相当长期的基础上得以确立和维系，并非是不可想象的。

下面，我们将展示管理者厂商所有权的证据，以评估到 1993 年为止，业已发生的管理层收购的程度。

表 4-10 的数据证明，1993 年时，管理者中的厂商所有权是相当有限的。表格显示，1993 年时，大多数中欧的 CEO 报告说不拥有任何的厂商所有权。此外，少部分报告说拥有厂商所有权的人，也都只是掌握了相对较少的股份，一般不到公司全部资产中的 25%。^① 还需要注意的是，各国之间也有很大不同。在匈牙利，管理者厂商所有权要比捷克和波兰更普遍——51.4% 的匈牙利管理者报告拥有某种程度的厂商所有权，而在捷克和波兰则大约是 20%。这是一个指标，表明直到 1993 年，与另外两个国家相比，管理层收购和私人所有权的发展，在匈牙利走得更远。^② 不过，在 1993 年，大多数中欧管理者报告说没有厂商所有权是一个事实，而在那些承认拥有厂

① 不过，应该对这些发现保持警醒。因为，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样，当我们询问被访者他们所拥有的企业有多大规模时，拒绝回答的比率很高。此外，我们也未能询问被访者，他们所拥有是他们在管理的企业还是别的企业。幸运的是，在我们的调查结束三四月之后，匈牙利社会研究中心开展了一项关于 1001 名匈牙利经理人的调查，其抽样的程序和我们非常接近。匈牙利社会研究中心抽样的总体和我们是一样的；关于所有权，他们提出了一组更好的问题；关于公司特征（包括公司规模），他们则获得了更高的回答率。同时，管理者所拥有的所有权是在他们自己所管理的企业，还是别的企业中，匈牙利社会研究中心的数据也提供了相关的信息。这组数据的唯一缺陷是，它们只是针对匈牙利；因而我们失去了比较研究的权利。在表 4-11 中，我们对匈牙利社会研究中心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并且通过这种方式，为我们自己数据的可靠性，提供了一种双重检验。

②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的数据有可能夸大这种差异。我们的波兰同事并没有严格按照我们的手册去抽取 CEO 的样本。与我们的匈牙利同事相比，他们选取的企业较少，主要关注的是大企业，而且对每一个企业管理层团队中不止一人进行了访谈。相反，匈牙利的样本，仅仅涉及 CEO。不过，即使有这样的差别，波兰和匈牙利数据反映的事实差异还是太大，仅仅是人工抽样差别并不会产生这样的结果。而在没有收集进一步的数据之前，这样的差异还很难被解释。

商所有权的人当中，大部分只是部分所有权，且经常低于 25%。

表 4-10 新经济精英成员中的厂商所有权
(捷克、匈牙利、波兰)

单位：%

所拥有的商业百分比	捷克	匈牙利	波兰
无厂商所有权	80.4	48.6	81.3
低于 25%	9.6	30.1	7.7
25% ~ 49%	4.3	8.3	4.1
高于 50%	5.7	13.0	6.9
合计 (百分比)	100	100	100
合计 (数量)	690	578	534

资料来源：1989 年调查后东欧的社会分层，1993-1994，新精英样本。

我们的下一个问题是：管理者承认拥有所有权的公司，是他们自己正在管理的那家公司吗？在这里，我们必须依赖于对匈牙利社会研究中心 (TARKI) 1993 年的数据进行分析，该数据针对的只是匈牙利。首先，在匈牙利社会研究中心的调查中，管理者报告拥有所有权的水平，和我们调查中管理者报告的水平相似：51.8% 的管理者承认拥有某种程度的厂商所有权。^① 从统计的角度来说，这与我们的调查中 51.4% 的人承认拥有厂商所有权并没有什么差异，这也支持了我们自己数据的可靠性和正确性。根据匈牙利社会研究中心的调查，20.5% 的管理者在他自己管理的公司中拥有所有权，21.8% 是在别的公司拥有所有权，8.5% 既在自己管理的公司，也在别的公司拥有所有权。当我们声称，1993 年时管理层承认的所有权中，大约有一半可以被归为管理层收购的结果时，我们并不离谱。另一半管理者所有权则并不是管理层收购的结果，而有可能是戴维·斯塔克所说的“重组”类型，或者是拉里·金所说的“寄生性卫星公司”的结果。转换成后共产主义经济的纯粹数字就是：代表管理层收购策略的管理者所有权，在 1993 年时的捷克和波兰，可以描述所有管理者中 10% 成员的行为，

① 这些数据可以从玛蒂尔达·沙基的著作中得到 [参见 Matilda Sági (1994) "Menedzserek. Az új gazdasági elit rekrutációja". (Managers. Recruitment into the new economic elite. pp. 334-350 in *Társadalmi Ríport*, 1994 (Social Indicators), ed. Rudolf Andorka, Tamás Kolosi and György Vukovics. Budapest: TARKI, p. 348].



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

以及匈牙利 3000 ~ 5000 家最大的企业中，大约 25% 的管理者的行为。这暗示在中欧，直到 1994 年之前，管理层收购并不是私有化的主要形式。

表 4-11 展示了匈牙利社会研究中心针对匈牙利一国的数据。这张表格可以让我们感觉到，在管理者作为经理人行使权力的企业中管理者所有权的程度。也就是说，这张表格展示的数据，涉及那些 27.3% (14.2% + 7.6% + 5.5%) 承认在自己作为经理人的企业中拥有所有权的匈牙利管理者，他们在企业中分享所有权的大小。令人好奇的是，这些经理人中，正好有超过一半的人在他们的企业中拥有 10% 及以下的资产。它甚至告诉我们，在匈牙利社会研究中心 1001 名被访者中，只有 3 个人在雇佣 300 人以上的企业中 (0.4% + 0.8% = 1.2%) 拥有超过 10% 的资本资产 (capital assets, 亦即固定资产或专利权)。另有 19 人在雇佣 100 ~ 299 人的企业中 (6.8% + 1.3% = 8.1%) 拥有超过 10% 的资产；但其中只有 3 个人是大股东。因此，在 1001 名匈牙利社会研究中心调查过的被访者中 (他们大概占到作为一个整体的管理者总体中的 30%)，我们发现，在至少拥有 100 名雇员的企业中，有 23 人拥有较多的所有权，但只有 5 个人是大股东。那么，在管理者总体中，就会有 15 人是 100 名雇员以上企业中的大股东。另外还有 60 名左右的管理者，拥有 11% ~ 49% 之间的股份。这也许代表了直到 1993 年秋天为止，匈牙利管理层收购所进展到的最大限度。所以，虽然就关于前共产党和政府官员将自己转变成公司所有者来说，管理层收购也

表 4-11 匈牙利管理者拥有的商业百分比
(按企业规模分类)

单位: %

管理者 所有权	1 ~ 10 名 雇员	11 ~ 19 名 雇员	100 ~ 299 名 雇员	300 名及其 以上雇员	合 计
无	53.3	64.3	78.2	88.9	72.6
1% ~ 10%	15.0	17.0	13.7	9.9	14.2
11% ~ 49%	15.9	10.5	6.8	0.4	7.6
50% ~ 100%	15.9	8.3	1.3	0.8	5.5
合计	100.1	100.1	100	100	99.9
(数量)	(107)	(400)	(234)	(253)	(994)

注：由于凑整的原因，数字也许不能叠加成 100%。

资料来源：匈牙利社会研究中心调查数据，1993。

许是一个更重要的情节，但管理层收购仍然只是小规模现象。可以肯定的是，它并不是1994年之前经济转型的主要情节，因为在这些证据的基础上，“管理者—所有者”很难被看做一个将经济当作他们自己的财产来玩弄的新支配阶级。

如果说管理者并不是所有者，那么在后共产主义的中欧经济中，谁是这些企业的所有者？表4-12和表4-13描绘了在1993年匈牙利最大的企业中，公共所有权和外资所有权的程度。这些数据清楚地显示，在1993年的匈牙利，公共所有权仍然是占优势的所有权形式。在3000家最大的企业中，有超过一半的企业至少是部分公有的。更重要的是，在1993年，在拥有超过300名雇员的企业中，有65.2%的企业，至少50%的资产是政府所有的。共产主义之后的头四年，政府所有权的衰落影响的主要是很小型的企业，也就是雇员在10人及其以下的企业。而且，这些小企业中30%也具有某种公有的特征。这种情况是管理层所有权的翻版。虽然有大约1/4的匈牙利管理者承认在他们管理的企业中拥有所有权，但这些企业中，有超过一半的企业也同时是公有的。管理者看上去更有可能拥有小企业中的所有权，而政府更有可能在大企业中保持它的所有权。换句话说，我们观察到，随着企业规模的增长，管理者承认拥有所有权的概率会下降，而公共所有权的概率则会上升。

表4-12 匈牙利政府拥有的商业百分比
(按企业规模分类)

单位：%

管理者 所有权	1-10名 雇员	11-19名 雇员	100-299名 雇员	300名及其 以上雇员	合计
无	71.0	56.9	46.8	23.3	47.5
1% - 10%	1.9	4.0	4.7	3.2	3.7
11% - 49%	10.3	9.8	9.0	8.3	9.3
50% - 100%	16.8	29.3	39.5	65.2	39.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数量)	(107)	(399)	(233)	(253)	(992)

资料来源：匈牙利社会研究中心调查数据，1993。

正如表4-13显示的那样，在1993年，外国所有权的程度，位于管理层所有权和公共所有权之间。在所有企业中，有1/4报告说有外国投资；



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

换句话说，外国投资的规模和管理层收购现象差不多。此外，与国家相比，外国投资也更有可能拥有规模较小的企业。实际上，表 4-13 显示，企业越小，外国所有权的比例就越大。不过，与管理者相比，外国投资者在经济体中的大型公司部门中，似乎进展得更深。在匈牙利社会研究中心调查的 1001 家企业中，外国投资者在大约 25 家雇员超过 300 人的企业中是大股东。外国投资者在中等规模企业，也就是雇员在 100~299 人之间的企业中，表现得尤其积极。总之，在 1993 年，在 3000 家匈牙利最大的企业中，支配性的所有权形式仍然是公有的，而从私有化过程中获得利益方面，外国投资者走在了本国管理者的前面。

表 4-13 在匈牙利的外国投资者所拥有的商业百分比
(按企业规模分类)

单位: %

管理者 所有权	1~10 名 雇员	11~19 名 雇员	100~299 名 雇员	300 名及其 以上雇员	合计
无	71.0	71.7	74.4	83.8	75.3
1%~10%	0.0	0.8	2.6	4.3	2.0
11%~49%	5.6	8.8	7.7	4.3	7.0
50%~100%	23.4	18.8	15.4	7.5	15.6
合计 (数量)	100 (107)	100.1 (400)	100.1 (234)	99.9 (253)	99.97 (994)

注：由于凑整的原因，数字也许不能叠加成 100%。

资料来源：匈牙利社会研究中心调查数据，1993。

在某些方面，这些发现与直观的感觉吻合。对管理者来说，管理层收购也许并不像人们一开始对它的想象那样，是一种理性的策略。虽然管理者的位置，可以让他们欺骗政府，用很便宜的价格收购国有企业，但这种腐败的效益，也许并不高。这些企业中的大多数，都能量耗尽、投资不足、技术落后，在世界市场上没有赢利空间。在这样的情况下，对管理者而言，找到一个愿意收购他的公司的外国投资者，让外国人投资，利用他们在世界市场上的专门市场，销售公司的产品，反而更加理性。因此，精明的管理者，也许并不要求获得他管理的企业的所有权。^①相反，他也许会把大

^①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管理者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男性。

量的精力，花在替他的外国熟人与政府的私有化机构处好关系上，向他的外国伙伴传递关于这个公司真实状况的信息。作为对这些“内部”消息的交换，管理者也许会要求外国投资者继续聘请他当经理人。此外，这些管理者现在也许会觉得，他们有资格要求一份西德标准的薪水，而不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水平。在第五章，我们将其描绘为“买办知识阶层”（*compradore intelligentsia*）的策略，而且我们认为，它也许比管理层收购更普遍。外国投资者通常也很喜欢雇佣前管理者，因为这些被雇佣者，拥有当地的实践知识和网络，而要在现在的中欧获得商业成功，这些都十分必要。即使在东德，虽然大多数企业都被西德人买走，但新的西德所有者通常还是雇佣前共产党管理者来经营他们的企业。保罗·温多夫（Paul Windolf）于1995年在东德做了一份与我们类似的调查，发现，在他所研究的288家东德企业中，只有31%的CEO在1989年时没有国家社会主义管理者的经历。^①在这些发现的基础上，我们认为，虽然在共产主义之后的经济领域中，管理者确实掌握了关键性的决策权，但他们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持有恒产的资产阶级，因为他们并不是在私有财产所有权的基础上运作这些权力的。相反，正如我们业已指出的那样，管理者的治理，建立在文化资本（他们的技术专长和实际知识）的基础上，并且与专家治国论者和塑造民意的政治官僚，结成了松散的联盟。

（二）新权力集团：专家治国论者、政治官僚和塑造舆论的知识分子

我们认为，后共产主义是这样一种社会经济体制，它处在管理者和专家治国论者与宽泛的知识政治官僚所结成的松散联盟的统治之下。但是，一些反对我们的人认为，中欧的真实经济权根本就不在国内。这些批评者也许会主张，中欧的社会变迁乃是受到世界市场力量的推动；外国资本、跨国集团，以及个体性的外国投资者正在操纵中欧的社会变迁。这种主张是有价值的。中欧的民族政府、向政府提建议的金融和经济专家，以及中欧公司的管理者，拥有的自由程度很低。他们所能做的，大多数受到国际机构（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限制。在他们行动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世界市场的力量，亦即外国公司的管理者。即使一家企业

^① Paul Windolf (1996) "The Transformation of East German Econom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Territoriality and Modern Society", UNG, Chapel Hill, 29-30, March.



并不是直接由外国投资者所有，管理者们也经常要按照外国所有者和跨国技术官僚演奏的曲调跳舞。然而，我们在这本书中的焦点，是国内的阶级结构。虽然我们并不想贬低国际因素的重要性，但我们相信，假设国内的社会结构至少有一种“相对自主性”是合理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人们又将如何解释斯洛伐克或塞尔维亚、捷克、波兰和匈牙利近期历史中令人震惊的差异呢？所有这些国家都处在相同的国际环境中，都面临来自世界市场和外国投资者的相同压力。但是，面对同样的挑战，它们的反应却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的要点是，研究国内的阶级结构非常重要，因为在国家层面上，阶级和精英形成的方式，以及他们展开斗争的方式，都会引发重要的结果。

我们关于“后共产主义管理主义”（post-communist managerialism）理论（我们将在后面对此展开详细论述）的出发点，乃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在共产主义之后的中欧，并不存在一个可以“发号施令”的本土私有财产者阶级。相反，技术专家—管理精英占据着权力结构的顶端。我们相信，这些精英的权威，乃是根植于他们对文化资本的掌握，而他们运作这些资本，并与其他人结成联盟的方式，又会反过来促成上述事实。这一主张，与我们在第一和第二章中发展出来的思想有着密切联系。它既与“第二代文化资产者”的理论，又与后共产主义的理论相契合，在后者中，后共产主义被视为一种文化资本居支配性资本形式的社会结构。

对“第二代文化资产者”理论、“后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由文化资本支配的社会结构”的理论，以及我们的“后共产主义管理主义”理论而言，一个关键性的前提假设是：后共产主义社会的新权力集团，并不是完全由国家社会主义晚期的专家治国论者和管理精英构成的。这一权力集团是一个复杂现象，它还包括被我们以不同名称称为“新政治官僚”、“新政治精英”、“新政治集团”、“新政治阶级”的那批人，以及最后的一个部分——“塑造民意的知识分子”。这一节的目的，就是提出证据以证明我们的主张：中欧目前存在的新权力集团，就是由这三个部分组成的。

再一次的，关于一个新的权力集团是否存在，以及哪些群体属于这一集团的问题，调查数据只能揭示部分事实。去寻找权力集团的边界，以及决定它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断裂带在哪里，是一项棘手的工作。不过，尽管有这些困难，我们还是要展示初步的证据。第一，一方面，新权力集团中的三个组成部分之间确实存在分裂，另一方面，新权力集团和普通群众之间也存在断裂；第二，与不同精英派系之间的分工相比，这些断裂更加重要。我们承认，这为一项雄心勃勃的主张提供了初步的准备和部分的证

据。我们依然想从经济特权这一方面出发，来揭示技术专家—管理精英与新政治和文化精英非常相似。图 4-1 比较了三个国家中，精英的不同派系和普通群众在住房所有权、住房规模、周末别墅（weekend retreat）的所有权、不动产所有权、股票和债券所有权上的差别。关于所有这些指标，跨国之间的差异比每个国家内部精英不同部门之间的差别要更加明显。与此相似，在每个国家内部，在所有权类型上，国内精英和普通群众之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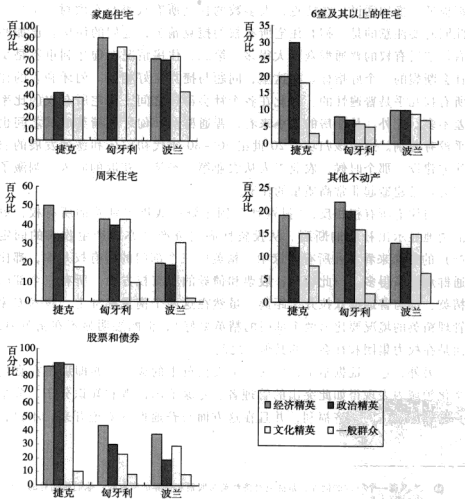


图 4.1 新经济、政治和文化精英成员中的住宅所有权和其他资产的所有权（捷克、匈牙利、波兰）

资料来源：1989 年调查后东欧的社会分层，1993 - 1994。



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

差别要高于国内精英不同部分之间的差别，虽然正如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所做出的预测那样，技术专家—管理精英成员的境况要比其他精英部门成员多少要好一些。

针对这些全面发现，有两个主要例外。第一，在捷克，住宅的所有权并不能解释太多的东西，因为在这个国家，住宅所有权（home ownership）相对较低，而且与普通群众相比，精英成员也不太可能拥有他们住宅的所有权。这是因为，城市中大多数精英成员居住的房子，住宅所有权的程度都极低。换句话说，在捷克，大多数的住宅所有权都是在农村。不过，与此同时要注意的是，拥有住宅所有权的捷克精英，他们的住房要比那些拥有住宅所有权的普通群众要大得多。第二，住房情况在匈牙利也不是衡量社会断裂的一个好指标。在这里，问题与捷克正好相反。匈牙利人的住宅所有权几乎是普遍性的。因此在各个社会群体之间，住宅所有权的比率相差不多。此外，从住房的大小来看，普通群众和匈牙利精英成员之间也几乎没有差别。这应该归功于20世纪70~80年代初匈牙利蓬勃发展的农村住宅建设。那个时候，农业工人从农业第二经济中获取的收入，刺激了他们为自己建造起非常高质量的住宅。

与住宅所有权相反，“投资性”固定资产或周末别院的所有权，更加清楚地显示出社会的断裂。从投资性固定资产（亦即产生收入的固定资产）的方面来看，在所有国家中，精英中三个部门的所有权几率，都比普通群众要高得多。与此相似，股票和债券的所有权方面，所有三个部门的精英，都与普通群众拉开了距离。虽然在这两个衡量标准上，技术专家—管理精英的境况要比另两个部门的精英要好^①，但断裂明显不在精英内部，而是在权力集团和社会上的其他人之间。

另外，这一证据暗示，后共产主义精英中的成员，亦即那些在官场和文化领域内表现得如此突出的管理者、专家治国论者和知识分子，分享了一份非常舒适的经济福利，并且在这方面与普通群众隔绝开来。不过，正

①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例外，是捷克经济精英对股票和债券的所有权：他们所拥有的，比政治和文化精英成员要少。对此我们所能想到的唯一解释是，捷克曾有过一个重新私有化的过程，因此，固定资产的所有权也许会受到共产主义之前财富持有者的影响。既然新经济精英的成员更有可能是前共产党干部（他们往往是工人和农民背景），而不是其他精英部门的成员，那么，他们所收到的给共产主义国有化时期受到损失的家庭所提供的补偿，也就少一些。

如前面注意到的那样，这里所展示的证据只是初步的。^① 未来分析的一项关键任务，不仅仅是要去证明普通群众和权力集团成员之间的断裂，而且要探索那些进入权力集团的知识分子和留在外面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差别。

（三）后共产主义新权力集团中三个派系之间的合作和冲突

与从调查证据中获取更多证据来支持我们的假设不同，接下来，我们要展示其他证据，来讨论后共产主义权力集团的形成和运转。在这一努力中，第三章中的分析就显得十分重要。在那一章中，我们对权力集团不同部门明显多样化的意识形态做了一次“话语分析”。我们展示了“货币主义”的话语，它在社会主义晚期专家治国论者的心目中十分具有吸引力，并且与1989年共产主义崩溃之前的异议知识分子所散布的“市民社会”和“反政治”的话语有选择性地亲和性。当每一个群体都面临建设共产主义之后的资本主义任务时，这两个话语就开始汇合。最终，一套共享的话语发展起来，它将前两种话语联系起来，用来将新权力集团中的不同派系捆绑在一起。在这里，我们以第三章的分析为基础，以突显出将前共产党专家治国论者和它昔日的主要对手（前异议知识分子）结合到一起的其他历史和政治力量。

我们从社会主义晚期专家治国论者的视角出发来推进我们的研究。我们要问的是：专家治国论者需要与已经成为新政治精英，并且通过媒体发挥重要影响力的前异议知识分子联合吗？如果需要，为什么？

在共产主义还没有彻底垮台之前，社会主义晚期的专家治国论者就开

^① 通过更加复杂的统计方法，我们也许能够更好地知道不同精英派系之间生活方式的相似性，以及精英成员和普通群众之间的断裂。还可以想到的是，权力集团成员的生活史、职业生涯和详细的受教育史，也许能揭示出后共产主义精英成员社会轨迹的相似性，以及他们与普通群众和没有成为精英的职业人士之间的距离。在这样的情境下，需要注意的是，对我们关于后共产主义管理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应用，就是在后共产主义转型过程中，知识分子和职业阶层自身的分化。1989年之后，知识阶层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向上流动，职业人士的不同阶层所受到的影响也不同。例如，职业人士中人口稠密的群体——比如教师和医务工作者，这两个群体合起来组成了职业人士范畴中最大的一个部分——就可能已经成为后共产主义转型中“受损者”中的一员。在1989年之前，这两个职业中的从业人员严重依赖公共雇佣，而在后共产主义预算危机的背景下，他们的收入已经急剧恶化。所以，让我们强调以下这一点：我们关于后共产主义管理主义的理论，绝不是暗示“知识阶层正走在通往阶级权力的道路上”。相反，我们相信，作为后共产主义转型的一个结果，知识阶层这一范畴已经严重分化。知识阶层中只有特定的群体从后共产主义转型中获得经济上的好处，而且只有少数的人，在共产党统治集团中的官僚部门于1989年被击败的时候，成功地保住了他们的权力或者拨款权（appropriate power）。



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

始将异议知识分子视为与官僚政治斗争中潜在的联合对象。不过，这远远不是什么“一见钟情”。当20世纪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早期异议人士作为一种现象出现的时候，共产党统治集团中的专家治国论者群体是带着满腹怀疑注视着他们的。在那个时候，专家治国论者相信，他们能够通过与政治官僚的协商来推进改革事业；而且他们认为，异议人士也许会毁掉他们的计划。专家治国论者将早期的异议人士当作“麻烦制造者”（trouble makers），亦即不负责任的空想家，他们正在动摇改革的事业，而且并不是出于什么好的理由。接着，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专家治国论者担心异议人士会逐渐破坏掉相对和平的政治环境，而要想劝导政治官僚从事改革，政治和平是必需的。

专家治国论者们还将早期的异议人士视为“左翼人士”。他们带着怀疑的眼光，观察异议人士与西方左派的联系，而将自己看做实用主义者，认为异议人士的左翼理想主义对他们并没有什么用处。在与异议人士的斗争中，反犹太主义（Anti-Semitism）也被技术精英调动起来，尤其是在专家治国论者想吸引尚未支持异议人士的大的知识分子选区的时候，更是如此。这是因为，在波兰，以及尤其是在匈牙利，许多重要的异议知识分子都是犹太人出身。为了对他们进行攻击，专家治国论者开始炮轰“犹太人”，希望这能够暗中破坏异议人士和其他知识分子之间的潜在团结。

然而，渐渐地，专家治国论者对异议人士的态度开始转变。这里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事实变得很清楚，那就是政治官僚不会也不能妥协。专家治国论者们开始相信，异议人士终究是正确的：它们必须打倒官僚政治。另外，到了20世纪80年代早期和中期，异议人士开始掌握一些政治力量。异议人士看上去似乎已经创造了一种武器：批判性话语文化（culture of critical discourses）。^①正如我们中的一个人早年主张的那样，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之前，异议人士曾领导过一场“话语革命”（discursive revolution）。^②他们开始打破共产主义话语神圣不可侵犯的规范，将自己视为“那些在思想上与众不同的人”。不久，他们就变成“在语言上与众不同的人”。通过尽可能地直接说出事物的本来名称，异议人士拒斥了专家治国论者那深奥的、隐喻性的语言，并且挑战了共产主义话语的禁忌。许多年来，

^① 参见 Gouldner, *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s*。

^② Konr6d and Szelényi, *The Intellectuals on the Road to Class Power*。

专家治国论者都相信，通过发展出一套隐喻性的语言来掩饰含蓄的基础性改革，变化就会实现——简言之，他们相信，只要使用共产主义的语言规范，你就可以致力于一种针对政权的有效的批判性分析。你可以对官僚主义进行批判，只要你使用的不是官僚主义这个词，而是“政府”；你可以谈论贫困问题，只要你不直接说出“贫困”这个词，而是使用“那些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人”。异议人士选择了一种“口头震惊”（verbal shock）的方法，与专家治国论者形成鲜明对照。这种异议人士的语言，催生了地下出版物，而社会主义晚期的专家治国论者也开始阅读这些出版物。最终，专家治国论者们被“批判性话语文化”说服了。异议人士的话语之所以对专家政治有吸引力，部分是因为许多专家治国论者都是纯正的知识分子（genuine intellectuals），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他们都对共产主义话语强加给他们的语言污染心怀不满。批判性话语文化对专家治国论者们富有吸引力，还因为它是一个有力的武器，拥有逐渐破坏掉官僚集团合法性的潜力。异议提供了一种方法，可以展现官僚集团是“不可靠的”，它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这个政权不可以被信任。在战略的层面上，当这些新思想像燎原之火传播开来的时候（尤其是在更年轻的一代学者中间），专家政治确实可能看到它们的力量。

在官僚集团于1989年倒台之后，随着新专家治国论者开始面对建造一个新的后共产主义社会的任务，又出现了其他与前异议人士联盟的理由。首先，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专家治国论者开始意识到，要想对官僚政治的支配进行不可逆转的重建，就需要将经济和政治进行某种程度的分离。专家政治的目标，并不是要在“党治国家”那些相同的机构中，用专家治国论者来代替政治官僚，而继续让经济嵌入在这些机构当中。相反，专家治国论者们意识到，经济必须从中脱离出来，而且必须创造一个相对自主的政治领域。最终，这导致他们接受了多党政治体制和竞争选举的理念。虽然也许大多数的改革派共产党员都相信，异议人士在1989~1990年间盗取了太多的权力，但专家治国论者依然觉得，对于确保永远地将官僚政治排除出去，以及终结社会主义者的支配来说，与异议人士分享政治权力是必须付出的代价。其次，对异议人士来说，从他们的立场出发，他们对所有与他们“反中央经济统治论的暗示”（anti-statist overtones）相合的政治民主化都表示支持。然而，与此同时，他们认识到，转型的任务只有通过一个相对有力的国家才可能实现。市场制度需要通过合法的行为建立，并且要通过政府的多重干涉，来扶持和保护刚刚成长起来的私有财



产。于是，在转型的过程中，经济和政治精英之间的亲密合作就成了实践上的必需。最后，对后共产主义管理主义理论来说，最重要的一点也许是，“技术专家—管理精英”的权威并不是建立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的。他们并没有突然之间成为中欧持有恒产的新资产阶级。相反，他们对权力的运用，是以他们的“专业”文凭为基础的——也就是说，以他们对文化资本的占有为基础。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指出的那样，对行使权威来说，这是一个相对弱势的基础。因此，技术专家—管理精英需要得到塑造民意的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上的支持。专家治国论者和政客们一样，读报纸、看电视上播放的圆桌会议讨论，以了解这些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是如何谈论他们的。在后共产主义环境中，塑造民意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媒体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要比西方民主国家中类似群体的权力要大得多。

在试图与公共知识分子合作的过程中，专家治国论者开始邀请这一群体中的成员，在一种类似于政府咨询委员会的机构中一起坐下来共商国是。专家治国论者恳请最主要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提供建议；通过这一方式，主要的公共知识分子就被带入权力的博弈中。毕竟，想批判似乎由你自己提出来的政策，要困难得多。合作的第二种策略是基金会系统，它们创立的目的，就是给文化、科学和教育工作提供资金支持。在共产主义时期，这些基金会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官僚体制控制的公共资金。在后共产主义时期，技术专家—管理精英也为商业资金进入基金会开辟了渠道。而且，在尊重后共产主义时期民意知识分子扮演的角色这一姿态下，技术专家—管理精英将这些基金会的控制权交给了知识界中的著名人物。对那些现在成为董事会成员的知识分子来说，基金会已经成为一项收入的来源；而且最重要的是，基金会作为知识分子对于文化、科学和教育领域行使权力的制度基础，发挥着作用。

回到开头的问题，我们现在要问的是：是什么原因，使得前异议知识分子必须以后共产主义新权力集团成员的身份，加入这一“非神圣同盟”？考虑到许多异议知识分子在共产主义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道德诚实，他们明显的政治投机主义令人震惊。异议人士曾坚称，他们对权力并不感兴趣。他们也曾声称，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他们说，他们只是为了追求真理——而他们主张，事实上，这也是生活在“可信的生活”中唯一的方式。那么，这些在1989年之前反对强权、做出大量牺牲的知识分子，同样一拨人，现在又是如何与权力合作的呢？前异议人士通往权力的道路反映

了这种模棱两可；与专家治国论者相比，引导他们参与新权力集团的社会轨迹，要更长，充斥了更多的冲突。

正如我们在上面看到的那样，几乎就在共产主义垮台后不久，后共产主义的新政治精英就发现，他们自己与技术专家—管理精英陷入冲突的过程中。虽然在1989年底，他们也参与了与改革派共产党员的对话，但随着这一体制在1989年的解体，异议人士和塑造民意的知识阶层似乎已经丧失了区分共产党改革派专家治国论者和非斯大林主义政治官僚的能力。不过，此后不久，异议知识分子就发现，他们无法引导商业人士来反对社会主义晚期的专家治国论者。他们甚至无法离开技术专家来管理商业，因为技术专家掌握着管理上的实践知识以及国内国际的商业网络，而这些都是异议人士缺乏的。于是，不管他们多么不喜欢前共产党员，政治官僚中的前异议人士都必须学会与技术专家相处和共事。

对塑造民意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来自学术和文化领域的人来说，与专家治国论者的和解甚至更加痛苦。还需要注意的是，知识分子群体是权力集团中最为弱小的成员。他们在权力集团中的“股份”没有其他成员高，而他们的权力也相当有限。他们是权力集团中的“被支配部门”。因此，他们中的一些杰出成员，已经选择退出这场游戏，另一些人已经取得了西方大学中的教职，其他一些人，则退回到私人生活中，或者成了批评家。不过，还有一些人顺从了后共产主义的权力游戏，从各种基金会中获得好处。这些基金会为民意知识分子中的精英，提供了特权性的收入和大量的权力。毫无疑问，这是比较重要的因素。不过，在我们看来，将前异议人士推到新权力集团中的最重要力量，是内疚（guilt）。他们将自己——并非毫无理由地——视为后共产主义规划的设计师。他们是第二代文化资产者中的核心。他们也看到了后共产主义转型中高昂的社会代价，并且觉得有责任对此负责。在关于他们病理学的排列中，他们相信，正在发生的事情是不可避免的——后共产主义的转型只是违背了“历史的铁律”，没有别的替代性选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通过这一方式，前异议知识分子已经绕了个圈，又回到了起点。他们中的许多人曾经声称，他们的知识轨迹是马克思主义的，他们反对斯大林式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坚持别的选择，并且主张，知识分子行动的目标，正是勾画出替代性的社会情节。到了后共产主义，这些知识分子又重新发现了“历史的铁律”。这些就是“看不见的手铁律”，亦即市场的“铁律”。在与批判思想短暂冲突之后，中欧的知识分子已经重新回到一种具体化了的意识中；在苏



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

式马克思主义具体化之后，他们现在成了资产阶级具体化（bourgeois reification）的牺牲品。用马尔库塞的术语来说，后共产主义的心灵是“单向度的”。

总之，新权力集团的成员是多种多样的。它的不同派系，用猜忌和怀疑的目光相互盯着对方。不过，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有一种强大的必然存在的和意识形态的力量，将他们拴在一起。我们认为，直到一个本土的持有恒产的资产阶级出现之前（将这一权力集团分割开来也许符合他们的利益），权力集团的成员都有可能继续待在一起。

（四）管理资本主义理论大纲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将关于管理资本主义（managerial capitalism）的理论，归纳成如下六个命题。

命题1：后共产主义经济体的特征，通过混合的财产关系（diffuse property relations）得以塑造。目前，不可能识别出个人，或者由拥有大量财产的个人所组成的群体，后者甚至能够像控制经济决策的所有者一样，远程运作任何事情。

命题2：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所谓的“私有化”创造了这种混合的财产关系。私有化破坏了对国有企业的再分配控制，但是还尚未生产出清晰可辨的所有者。

命题3：财产权的分散是一个普遍现象，但在持有恒产的资产阶级已经确立的市场资本主义经济体中，这一现象得到了严格的限制。而在后共产主义的环境中，这种限制则并不存在。后共产主义的管理者并不需要应付一个强大的资本家有产者阶级；所以，管理权和决策显而易见地促成了新权力集团的威望和“区隔”。

命题4：考虑到财产权的分散这一情况，中欧管理权的核心代表，并不是工业企业的管理者，而是金融管理者。^①后共产主义时期最有权的人物，是银行经理人、投资基金的管理者、财政部的专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顾问，以及为国外和国际金融机构工作的专家。在一个大私有财产阶级缺席的情况下，金融管理者的权力，并不取决于他们在自己

^① 在对20世纪90年代早期匈牙利银行合并过程的分析中，斯塔克就金融部门的关键角色，提供了一份重要的洞见。参见David Stark（1996）“Recombinant Property in East European Capitalism”。

管理的银行，或者他们银行管理的公司中掌握多少股份；相反，他们的权力是一种“文化资本”，它取决于他们调动专门的知识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工作的能力。

命题 5：尽管中欧的管理者并未受到有产资产阶级的权力的限制，但我们要强调的是，他们并不是在真空的环境中行使权力的。相反，他们位于历史上非常独特的后共产主义的阶级情境之中，而塑造这一情境的，则是关于私有化和新阶级行动者形成的持续不断的斗争。这些斗争一方面在权力集团的成员——管理者、专家治国论者、知识分子——中发生，另一方面在权力集团和前政治官僚之间发生。正如我们在全书中所主张的那样，在这些斗争中，尚未有一个单独的阶级派系作为决定性的胜利者出现。因此，在胜利者缺席的情况下，管理者掌握了权力以及控制半公共财产的能力。

命题 6：管理者的策略反映了他们对当前阶级力量平衡的认识，亦即这种平衡是不稳定的。他们认识到，他们是在行使缺席的权力。因此，为了生存，管理者已经发展出了一系列多样性的策略，来操纵共产主义之后不确定的政治和经济。也许最为流行的管理者策略，并不是管理层“收购”，而是尽可能多地“脚踏几条船”。在私有化的过程中，许多管理者获得了某些财产，但一般来说这都是相当少的股份，而且甚至并不必然是他们自己管理的企业的股份。实际上，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就有一些管理层团队中的成员，在忙于建立小型的、由他们自己或家庭成员所有的转包合同企业。^① 他们将自己管理的国有企业中最为赚钱的活，转包给那些小公司。他们甚至盗取母公司中某些最为值钱的资产，以缩水的价格卖给这些转包合同企业。此外，如果有管理者一起从他们的母公司中退休，然后“跳槽”到他们自己拥有的转包合同企业中，那么这也许属于一种例外。他们之所以不愿意这样做，原因很明显：他们为什么要用重要的管理者工作，来换取一个次要的、只雇佣一小撮人的经营业务中的“所有者—管理者”位置呢？另一方面，管理者在不仅仅作为管理者这一方面，也有自己的利益。在后共产主义社会中，管理精英与政治官僚之间缠绕得十分紧密，因此，与西方的资本主义经理人相比，后共产主义的经理人要更加依赖于政治官僚。通过对各个企业直接

^① David Stark (1992) "Path Dependence and Privatization Strategies in East Central Europe".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6 (1): 17-51.



或间接的国家所有权，东欧和中欧的国家官僚政治，经常有权任免经理人的职位。对管理者们来说，只要他们的位置能够受到政治精英的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拥有自己所有的小型私人公司就是一种明智的选择。^①

四 附录：1993 ~ 1996 年间的银行大盗

就在我们刚刚宣布谜团已经解开，并展示了我们关于管理资本主义的理论之后，新的证据又出现了。匈牙利社会研究中心以 290 个雇员在 50 人以上的匈牙利企业为随机样本，从中收集的数据显示，国内个体中的私有财产权有了大幅增长。^② 这一新证据提出一个问题：管理主义是不是只是后共产主义转型中一个非常短暂的阶段？这是否意味着，政治资本主义最终将赢得胜利？前共产党的专家治国论者是不是只是暂时躲了起来，等待着反共产主义的火焰自己慢慢熄灭，然后他们再将自己 1988 年时的梦想付诸现实？这些都是我们将在这一章的附录部分调查的问题。

我们关于后共产主义管理主义的理论，是在后共产主义转型早期收集来的数据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 1993 年，私有化刚刚开始以一种严肃的方式实施，而且，人们有可能主张，当时要想找到稳固清晰的财产关系，或者充分形成了的有产阶级，都还为时尚早。出于这一原因，在 1996 年，我们决定在 1993 年曾经调查过的企业中，搜集最新的关于财产关系的数据。我们 1993 年样本中的所有 600 家企业，在霍彭施泰特商业注册簿 (Hoppenstadt business register)^③ 中也都有，这一商业注册要求它所列出的企业公布关于财产所有权的信息。因此，在 1996 年的春天，我们参考了 Hoppenstadt 最近的版本，它报告了 1995 年所有权情况的数据，于是我们将

① 我们要感谢艾勒梅·汉基什，他提醒我们注意，在后共产主义的形成中，管理层是如何依赖于政治官僚的。

② 参见本书后面的附录 III。

③ Hoppenstadt 是一家德国公司，它每年都出版一部年鉴，涵盖许多国家大公司的基本信息。——译者注

所有能够得到的关于这 600 家企业的霍彭施泰特数据，编码进我们的样本中。^①

我们通过这一方式收集来的 1996 年的数据，与我们早先的发现相一致：在后共产主义转型早期，管理层收购相对来说并不重要。虽然这些数据显示，在 1993~1995 年间，发生了一些有重大价值的变化，但并没有证据显示，管理层的所有权，或者其他国内私人个体的所有权有任何增长。不过我们却发现，公共所有权有了大幅下降。匈牙利社会研究中心 1993 年的数据（见表 4-12）显示，在所有企业中，政府掌握了 52.5% 的企业中的所有权股份，而且通常拥有的都是这些企业中大部分的资产；但到了 1995 年，我们掌握的霍彭施泰特数据中，213 家企业中只有 27.7% 由政府部分或完全拥有。这一发现在快速私有化的背景下是讲得通的。社会党—自由党政府在 1994 年 5 月掌握政权之后，将私有化作为优先选择的目标，而在 1995 年，他们报告说，他们从私有化中已经获得几百亿美元的收入。我们从 1995 年霍彭施泰特数据中看到的另一个明显趋势是，外国所有权有了快速增长。外国所有权增长的幅度几乎和公共所有权衰落的幅度一样大。表 4-13 中匈牙利社会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在 1993 年，在所有公司中，只有 24.6% 报告说有外国所有权；到了 1995 年，这一数字蹿到了 44.6%。不过，需要注意的是，1995 年霍彭施泰特数据列出的 213 家企业中，并没有证据显示管理层收购有了增长。事实上，就我们 1995 年掌握的信息而言，这 213 家企业中经理人所有权的比率，要低于 1993 年匈牙利社会研究中心调查的 1001 家企业所报告的比率。于是，在这些新数据的基础上，我们得出结论：虽然在 1993~1995 年间，私有化推进得很快，但从公共部门

① 我们最初于 1993 年调查的企业中，只有大约 1/3 在 1995 年的 Hoppenstadt 数据中报告了它们的财产关系。因此，我们 1995 年的数据只涉及 213 家企业。这么少数量的案例让我们感到担心，而且我们也很关心它们的代表性，因为如果有人怀疑那些丢失的数据与财产形式是高度相关的，也并非没有道理。如果我们的怀疑有一条“做实”了的话——比如说，他们窃取公共财产中饱私囊——那么，他们就很有可能拒绝向 Hoppenstadt 通报情况。于是，我们检验了企业规模（以雇员人数为衡量标准）是否与报告给 Hoppenstadt 的情况相关，但我们发现，并没有这种相关性。正如我们在前面指出的那样，在 1993 年，财产关系主要随着企业规模而变化：经理人所有权或者个体的私人所有权，经常是在规模较小的企业中，而较大的企业更有可能由政府或者外国投资者所有。在这一基础上，我们可以推论出，如果向 Hoppenstadt 的报告率随企业的规模不同而发生变化的话，那么将会标示出选择性偏差（selection bias）。既然我们没有发现这种相关性，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说：这 213 家企业可能是我们原来 600 家企业样本的一个合理的代表性“亚样本”。



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

所有权减少中获益的，并不是管理者，而是外国投资者。

这样，我们觉得，我们关于后共产主义管理主义的理论得到了支持。“布达佩斯和华沙的盗贼”仍然是一个谜——如果已经有人犯下任何罪行的话，那也不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偷窃公共财产。实际上，事实正好相反。我们的这些小心翼翼的管理者们，似乎并不想对他们经营的企业负责，而且似乎也不愿意将自己由社会主义的管理者，转变成资本主义的“所有者—企业主”（owner-operators）。

一旦我们满足于“吃老本”，现实就会冲到我们结论的前面。正如社会学家经常做的那样，我们被提醒注意，社会现实要比社会理论复杂得多。在1996年的秋天，匈牙利社会研究中心在匈牙利就财产关系做了一次新的调查。和1993年一样，样本来自霍彭施泰特商业注册簿，但是这次，它仅限于雇员在50人及其以上的企业。在这一基础上，290家企业被挑选出来，并对高管人员进行了私人访谈。在表4-14中，我们将这些数据与前面分析过的从1993年匈牙利社会研究中心的调查中获得的数据做了一番对比，它们告诉了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①

正如表4-14展示的那样，1993和1996年数据的比较显示，报告说拥有国内个人所有权的企业比例，有了大规模的增长。表4-15则显示，通常由这些有产者拥有的股份规模，竟然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它们有了实质性增长。

表4-15显示，在1996年，许多企业都报告说拥有某种程度的国内个人所有权。这一趋势在雇员少于100人的小企业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到了1996年，这类企业中的大多数，都报告说拥有某种程度的私人国内所有权，而这些企业中的41%~45%，私人的、国内的个人是主要所有者。虽然随着公司规模的增长，由国内个人拥有大部分所有权或部分所有权的比例在下降，但私人国内所有权远非微不足道。在拥有100~199名雇员的企业中，46.2%（10.3%+35.9%）的企业报告说有某种程度的私人国内所有权，35.9%则报告说大部分的私人所有权掌握在国内个人手中。在拥有

^① 不过，在急于解释这些新数据之前，需要注意的是，我们1993年调查的数据和匈牙利社会研究中心1996年的数据并非完全可比。重要的是，在1993年的数据中，我们未能区分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针对企业的所有权。在1996年的数据中，我们可以知道国内个人中的厂商所有权的程度，但我们并不知道所有权股份的规模，或者这些所有者是否也是他们拥有的企业的管理者。尽管有这些比较上的问题，但这些数据仍然暗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故事，它与我们到目前为止所讲述的情节并不相同。

表 4-14 1993 和 1996 年匈牙利企业中的公共、本土和外国所有权

单位: %

	1993		1996	
	无所有权	50%或以上	无所有权	50%或以上
公共所有权	47.4	39.4	—	—
政府	—	—	83.6	11.3
地方政府	—	—	86.0	2.4
其他国内组织	82.7	9.3	67.6	20.5
国内银行	—	—	95.9	1.0
工人	69.9	12.3	86.7	4.5
所有的国内个人	—	—	54.1	33.3
管理者	73.3	4.3	—	—
他们的配偶	97.3	0.6	—	—
他们的亲属	98.1	0.7	—	—
其他的国内个人	84.2	6.4	—	—
所有的外国投资者	75.3	15.6	—	—
外国企业	—	—	72.9	16.3
外国个人	—	—	95.4	2.7

表 4-15 1996 年国内个人拥有的厂商所有权

(按企业规模分类)

单位: %

所有权百分比	1-49 名雇员	50-99 名雇员	100-199 名雇员	200-499 名雇员	500 名及其以上雇员	合计
无	41.7	40.0	53.8	65.6	88.5	53.8 (156)
小于 50%	16.6	14.6	10.3	14.0	7.7	12.7 (37)
大于 50%	41.7	45.4	35.9	20.4	3.8	33.5 (97)
合计 (数量)	4.1 (12)	37.9 (110)	26.9 (78)	22.1 (64)	9.0 (26)	100 (290)



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

200~499名雇员的企业中，34.4%（14.0%+20.4%）的企业报告说有某种程度的私人国内所有权，20.4%则报告说大部分的私人所有权掌握在国内个人手中。在拥有500人及其以上雇员的企业中，即使在1996年，个人国内所有权仍然是罕见的，只有1家企业报告说国内个人拥有大部分的所有权。不过，从这些数据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1993~1996年间，一个有相当规模的有产中等资产阶级（*propertied middle bourgeoisie*）出现了。而且，由于直到1993年12月都没有任何指标显示这一阶级的存在，因此，它们的出现和增长，即使没有那么显著，也令人印象深刻。

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些新的数据？我们是不是该得出结论说，后共产主义的管理主义只不过是一种过渡现象？我们的理论，是不是和大多数理论一样，是在黄昏中起飞的密涅瓦（*Minerva*）的猫头鹰^①？这些理论刚刚变成铅字，是不是就已经过时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如何说明中等资产阶级在1993~1996年间的显著增长？

虽然我们并不能为这些问题提供任何结论性的答案，但我们的怀疑是，我们不应该这么早就埋葬我们关于后共产主义管理主义的理论。如果我们重新扮演侦探的角色，我们就会立刻发现，1993~1996年间匈牙利“中等资产阶级”的显著增长，正好发生在政府变动之后。因此，作为训练有素的侦探，我们可以很快地宣布，罪行发生了（“1993~1996年间的银行大盗”）；并且，我们形成了一个与卷入其中的怀疑、情感和意义有关的工作假设，它与我们原先的理论完全一致。我们指出，快速增长的财产所有权，并不是企业家精神胜利的证据，相反，它是我们在前面描述过的那些阶级力量的平衡发生变化的结果。

我们关于后共产主义管理主义的理论要点是，管理者行使的是“缺席”的经济权力。他们特殊的策略以及为自己开辟的位置，反映了社会结构上层阶级力量的复杂格局，亦即专家治国论者、知识分子和管理者之间的权力平衡和有条件的合作。前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技术专家部门先是与知识分子联盟，来反对政治官僚；然后，当这些知识分子通过反共的修辞（专家治国论者也包括在内）获得政治权力之后，专家治国论

^① 密涅瓦是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她的身边栖落着一只猫头鹰，是思想和理性的象征。黑格尔曾用“密涅瓦的猫头鹰”来比喻哲学：密涅瓦的猫头鹰要等到黄昏才会起飞。在这里，黑格尔旨在说明哲学是一种“反思”的、自甘寂寞的活动，是一种沉思的理性。——译者注

者发现他们必须起来保卫自己。因此，管理者们有了一只相对自由的“手”来控制国有企业的运转，但当他们要将这种控制转变成所有权和物质奖励的时候，他们还必须认真对付知识分子“看门狗”的监督。

让我们提醒读者们注意，在1990~1994年5月间的匈牙利，掌握政府大权的，是激烈反共和反专家治国论者的“市民论坛”。但是到了1994年5月，前共产党的继承党，所谓的“匈牙利社会党”，赢得了大选，随后，霍恩（他是1989年之前共产党政府的外交部长）成为总理。我们认为，对于解开银行大盗之谜来说，这是一条关键的线索。虽然我们必将最后的分析留给其他的“侦探”（他们必须首先确定盗窃的具体时间），但接下来的邪恶阴谋可能与事实相符，并且与我们关于后共产主义管理主义的理论相一致：是社会党，这一前社会主义专家政治的代表，做了这一切。前共产党专家治国论者和管理精英感到他们受到了反共的“市民论坛”的威胁，于是，他们用“无能”这一修辞来反击“市民论坛”，从而让第一届非共产党政府声誉扫地。通过这一方式，他们成为社会党的理论家，这个党在1994年赢得大选的口号就是：“投社会党人一票，就是投称职者一票。”^① 当社会党人在1994年赢得大选后，高层的权力平衡偏回到了专家治国论者和管理者一边，而他们将管理控制转变成彻底的所有权的能力也大大增强。此外，虽然社会党组成的政府并没有表现出什么出色的能力，但在用国有财产来奖励“称职者”（也就是他们的干部基础）方面，他们却做得非常有效率。这就是我们意欲推进的假设。认为“1993~1996年间的银行大盗”是斯坦尼茨基斯和汉基什所确定的“1988年国家社会主义专家政治共谋”的部分实现，是不可想象的。

对匈牙利社会党选举好运的考察，为我们的假设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在1990年的选举中，前共产党获得了大约10%的选票，主要来自老的共产党官僚。但到了1994年的时候，社会党却赢得了三倍于1990年的选票。他们不仅保持了前共产党的选票，而且只要他们站在“社会民主角色”的反面，将自己表现成是工人阶级、工会和福利国家的鼓吹者，他们就增加了城市工人阶级的选票。然而，一旦开始掌握政权，他们就执行起对前干部和专家治国论者（大约是他们全体选民的1/3）有利的私有化政策，并

① Iván Szélenyi, Éva Fodor and Eric Hanley (1997) "The Left-turn in Post-Communist Politics: The Hungarian and Polish Election, 1990-1994".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II (1) 190-224.



且采取了更加新自由主义的、反劳工的政策。于是，他们开始失去工人的支持。如果大选在1997年3月举行的话，两个主要的右翼政党将赢得60%的选票，而社会党将只能获得20%的选票从而被击败。^① 我们的观点很简单：这个党并不是一个工人的政党，而是前干部和共产党改革派专家治国论者的代表。他们获得了权力，就将天平偏向对专家治国论者和管理者有利的一方，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允许这些人在成为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但是，针对这一方案的选举限制也很明显，这意味着高层权力的平衡在某种程度上将被重建，而“权力集团”将会维持“第二代文化资产者”的代表这一角色。

当然，这些都是推测。我们需要从捷克和波兰获得数据，以检验这些假设的解释力。原则上，在捷克，我们希望看到在匈牙利曾观察到的管理层收购的浪潮；而在波兰，我们猜想，干部资产阶级化（cadre bourgeoisification）的情况将没有匈牙利那么极端，因为波兰前工人党从没有得到过匈牙利社会党人所获得的那种专家治国论者的支持。这里，我们必须给其他调查者留下另一个困惑。如果那个调查者发现，这三个国家中财产权转型的趋势都完全相同，那么他也许会得出结论，这是“历史终结”的证据；终究，我们所辨认出的各个资本主义的范围，也许只是暂时的现象——在桥的另一端，我们也许会发现，所有的道路只有一个终点。各个特殊行动者在历史上偶然的斗争、他们所承载的惯习、他们在其中工作的制度框架的路径依赖转型，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优雅的故事（fairy tales）。终极的现实，是资本主义经济逻辑的铁律，以及人们在这一框架内做出的理性选择。

然而，由于证据不足，我们能够从中得出的所有结论是，到目前为止，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命题，仍然保持了一些新颖的特征。在下面结论性的一章中，我们将总结这些新颖的特征是什么，并将探索，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有多大可能实现自身的再生产。

^① 本书写作时，1998年的大选尚未进行，因此作者是以“虚拟语气”做出上述判断的。实际情况是，到1998年匈牙利大选时，虽然社会党采取了一系列补救措施，但还是以32.25%的得票告败，再次让位于“右派”政府。关于为什么匈牙利的“左派”政府会采取更为激进的私有化政策，以及第一届“右派”政府之所以采取“保守改革”的原因，可参见金雁、秦晖，2004，“渐进？激进？——论匈牙利选择”，载《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变迁和思想转型》，第165-191页。该文对于我们理解该书，提供了一个非常实用的背景。——译者注

第五章 结论：后共产主义中欧阶级形成的竞争格局

共产主义之后的中欧，其阶级形成（class formation）过程充满了竞争。一方面，由于共产主义之后的资本主义已经成为知识阶层，尤其是第二代文化资产者的一个规划，因此，未来将要出现什么样的阶级结构，核心问题在于：知识阶层在未来将如何吸引人们的注意，以及他们还将有多大的影响？我们认为，他们不太可能从政治舞台上完全消失，但他们可能转向后台。某些知识分子可能会开始与政治精英和正在出现的有产阶级保持谨慎的批判性距离，因为他们已经对“新富起来的人”（neuveaus riches）感到厌恶。此外，我们还相信，知识界将仍然扮演“忠诚的反对派”这一角色，因为他们已经实现的第二代文化资产者规划，是市民社会规划的一种；它的成功意味着，知识阶层在这些中欧国家中的地位十分牢固——国家运营的基金会是知识分子收入的来源，而这巩固了他们运用文化行政权的基础。另一方面，我们也认为，一个持有恒产的资产阶级也将发展起来，其实已经有迹象表明它正在缓慢地出现。不过，我们认为，与别的阶级和国家行动者相比，这一阶级可能要显得相对微弱；至于他们有多么微弱，那将取决于组成它的行动者的社会起源和惯习，以及他们与后共产主义权力集团中的知识分子派系联系的策略。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承认，这本书展现了一个“自上而下”的阶级结构分析。因此，我们的读者也许会把我们简单地等同于精英主义者，坚持认为我们忽视了“社会”的存在。作为对这种批评的回应，我们要强调的是，我们将分析焦点放在社会上层，是由于非常特殊的历史原因，它们将证明这种做法的正当性。我们认为，中欧正在建设的资本主义是从上层开始产生的。我们并不认为这是资本主义能够被建造的唯一方式，而且我们



知道在别的历史时空中，自下而上的资本主义与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一样重要。由于这个原因，在这一章的最后一个部分，我们考察了知识分子在后共产主义转型中的重要程度，并且扪心自问，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在中欧是否真的就不可避免？最后，我们考察了从下层起作用的变迁力量，并对它们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们正在描绘的事态做出评估。

一 第四次的“新阶级”规划？

我们并没有把共产主义之后的中欧看做一个阶级社会，而且我们尤其没有将技术官僚和管理者，或者作为整体的知识阶层，看做一个支配阶级。后共产主义管理主义的理论，以及“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的概念，之所以能成立的关键在于：在中欧，有恒产的资产阶级的形成是相对缓慢的，市场制度远远比资本家阶级要发展得迅速。恰恰是本土的有恒产的资产阶级的这个缺陷，使得一个由不同部门的知识精英所组成的权力集团保持一种霸权性的位置成为可能。与此同时，我们关于“谁的规划是后共产主义的”这一“侦探小说”式问题（“Whodunit”？ question）的回答是，它已经成为知识阶层，或者至少是知识阶层某些派系的规划。于是，我们似乎陷入“新阶级”的观念当中。这种观念主张，共产主义之后的权力集团既不是一个新的，也不是一个旧的阶级，而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这些知识分子正在为一项权力规划而努力。

从19世纪70年代早期的巴枯宁（Bakunin）开始，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晚期的古尔德纳（Gouldner），关于知识分子支配和领导社会的“新阶级理论”已经缠绕社会科学多年。在西方，它认为知识阶层将取代资产阶级；在中欧，它主张知识阶层将取代共产党政权的保守派官僚。而且，即使当这些预言被证明已经是错误的时候，社会科学家也似乎从来没有从中吸取教训。他们继续制造各种关于知识阶层将支配社会的新理论。这种理论建设（theorizing）来势汹汹，流行了很多年，接着暂时失去了人们的信任，不料某些年之后又改头换面，重新复活。在一本几年前出版的论文集里，我们中的一位就已经指出，很有必要对“新阶级理论”的“顽强生命力”做出解释。^① 我们主张：尽管知识界从没有成功地将自己变成一个新

^① Iván Szelényi and Bill Martin (1988) “The Three Waves of New Class Theories”. *Theory and Society* 17 (4): 645–667.

的支配阶级，但知识阶层曾形成一个针对权力的“规划”在历史上仍可能是真实存在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将新阶级理论的不同浪潮，解释为对这种权力规划的批判性或辩护性总结。从这一角度出发来思考共产主义之后的管理主义，并且将它与知识分子早先的阶级规划联系起来，也许会很有启发意义。

在1870~1970年间，我们至少能够区分出三次独立的“新阶级”理论建设的浪潮，以及可能存在的三项知识分子的权力规划。

我们将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知识分子阶级”（intellectual class）理论看做“新阶级”理论建设的第一次浪潮。这一理论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其实是一种知识精英的意识形态，它试图利用工人阶级的运动，将自己“偷偷地运到”权力的宝座之上。当一个受马克思主义蛊惑的社会秩序在革命后的苏联建立之后，这一理论也就静悄悄地消失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作为一种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分析也彻底失去了洞察力。从我们的视角来看，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中欧的知识分子在世纪交替的时候放弃了他们的“第二代文化资产者规划”，以及为什么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左翼激进主义的成员。

新阶级理论的第二次浪潮——大致流行于20世纪30~50年代——由“官僚—技术专家阶级”（bureaucratic-technocratic class）理论构成。根据对发达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情况的判断，新阶级理论家主张，专家治国论者及（或）管理阶层将填补因为家族资本主义和个人私有财产的衰落而造成的缺口。^①我们认为，这些理论家也许正确地指出了当时管理者和专家治国论者中“新阶级”的抱负，但是，他们错误地相信了管理主义空想家的辞藻，并大大低估了旧富人阶级的权力。对新阶级理论中的管理主义进行批判的学者，比如蔡特林和多姆霍夫，正确地指出了管理主义在美国和西欧之所以失败，乃是因为它要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握有恒产的

^① 例如，可参见 Thornstein Veblen ([1919] 1963) *The Engineers and the Price System*. New York; Harcourt & Brace; Adolf Berle and Gardiner Means ([1931] 1968)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 New York; Harourt Brace Jovanovich; James Burnham ([1941] 1962)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Ralf Dahrendorf (1972) *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John K. Galbraith (1967) *The New Industrial State*.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资产阶级。^① 我们倾向于在这场争论中站在批判者的一边，因为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旧的持有恒产的资产阶级仍然活得很滋润。实际上，今天美国和西欧的财富集中看上去更加明显，少部分人比以前掌握了更多的生产资料。

新阶级理论的第三次浪潮，开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关于“知识阶层”（knowledge class）的理论所构成。根据右翼的看法，这些关于新阶级的理论将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运动解释为一场权力阴谋，它由反文化的知识阶层发动，试图夺取社会的支配权。相反，政治上左倾的社会科学家则强调，随着科学在生产中的作用日益突出，科学家将开始取代私有财产的所有者，成为西方发达社会的支配群体。^② 以“批判话语文化”为媒介，技术知识阶层和人文知识分子聚到一起，组成了一个新阶级的联盟统治。面对这样一个社会景象，“新阶级”理论家中的某些人（最著名的是古尔德纳）不但没有感到震惊，反而相信这也许是他们“在历史上最好的入场券”。然而，随着20世纪60年代的左派激进主义逐渐消散，以及反文化的知识分子被鼓吹新自由主义的“雅皮士”取代，这一波理论建设的浪潮也随之退去了。

后共产主义的管理主义又怎样呢？我们是不是有可能正在目睹新阶级规划在20世纪内的第四次浪潮？既然没有人能够抵制管理者新建立的支配权，我们可以认为知识分子实际上掌握了权力吗？伯利和米恩斯提出的预言是不是实际上已经变成现实——只不过讽刺性的，并不是在发达的西方，而是在中欧？或者，后共产主义，正如我们分析过的那样，仅仅和我们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看到的一样，是向市场资本主义转型中的一步？或者，我们正在目睹现存的因素转型为一种新的、我们还没有充足的概念来进行描述的形态吗？我们知道，我们正在朝一个快速移动的靶子射击，而且，即使靶子并不移动，社会科学家们也是蹩脚的狙击手。

① Maurice Zeitlin (1974) "Corporate Ownership and Control: The Large Corporation and the Capitalist Cla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9 (5): 1073-1119; G. William Domhoff (1967) *Who Rules America?*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G. William Domhoff (1970) *The Higher Circles: The Governing Class in America*. New York: Random House.

② 加尔布雷思 (Galbraith) 在 *The New Industrial State* 一书中就坚持这一立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丹尼尔·贝尔也是如此，参见 Daniel Bell ([1973] 1967)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也可参见 Alvin Gouldner (1979) *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Class*. New York: The Continuum Publishing Corporation.

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去回答管理主义是否将持续下去的问题。很难预测后共产主义权力集团有多大的机会能够在未来再生产自身，以及再生产它统治的社会和经济秩序。我们也并不清楚，后共产主义的精英是否会抵制国际资本的侵蚀，以及中产阶级是否会尝试进行资本积累，并抓住经济中的指挥职位。不过，管理者权力的再生产是有可能的。很明显，管理者将通过与国内外金融机构的联盟，来巩固他们权力的制度性基础；而且，他们还会继续将管理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继续作为管理者来治理共产主义之后的资本主义。管理者舒服地坐在他们的位置上，对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深信不疑。此外，在后共产主义的社会中，可替代的选择也很少。将财富重新国有化，根本无法想象。正如一个老笑话的那样：我们知道如何从一个鱼缸中做出鱼汤，但我们如何才能从一碗鱼汤中造出一个鱼缸呢？东欧的经济学家在1989年前很喜欢引用这个笑话，但在1989年之后，他们很快就忘记了它。实际上，管理者权力的一个主要支撑，就是他们声称自己是唯一掌握如何处理复杂私有化任务知识的群体。这一任务越复杂，越不可能在实践中将前公共财产转换为等值的个人私有财产，管理者掌握的权力也就越多。既然将后共产主义的管理主义想象为知识分子针对权力的“第四波”规划，有助于我们提出上面那些充满诱惑力的问题，可见，这一想法是有益的。进一步地，继续沿着这一思路思考，那意味着我们并不能仅仅假设管理者的权力是一个过渡的现象。它逼迫我们追问：如果管理主义再生产其自身，社会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把我们的“好运”推得更远，我们也许甚至会困惑：后共产主义中欧的发展对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有没有意义？或者反过来问：中欧是西方的未来吗？毕竟，中欧的管理主义也许与西方资本主义今天运作的方式并没有什么根本不同：产权是混合的，经理人掌握着大量权力，货币主义的意识形态强大且普及。然而，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那样，这些涉及未来的问题是非常微妙的事情，而众所周知，社会科学家并不善于回答它们。也许最好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提出这一问题：“如果像伯利和米恩斯所指出的那样，管理主义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产生的规划的话，而且如果它已经失败了的话，那么，为什么它失败了？”以这种方式讨论这一议题，可能使我们对管理主义在全球的扩展持一种怀疑的态度。既然我们曾主张管理主义在中欧的成功，是因为它不曾面对诸如大资产阶级这样的敌人，那么，我们应该预言，管理主义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尤其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获得成功的机会，实际上也是很小的。



进一步的，在我们放弃后共产主义的管理主义与以前的新阶级规划之间的对比，向前继续推进之前，我们应该注意到，由于后共产主义的管理主义有着一些明显的历史特征，使得这一知识阶层的“权力集团”（如果它是一个权力集团的话）与其他的新阶级规划有着很大的不同。第一，与早先的三个规划不同，后共产主义的权力集团，既没有明显的，也没有隐藏的反资本主义的目的或者意识形态。相反，后共产主义的权力集团把自己看做历史的先锋队，它的使命就是去创造资本主义，甚至去创造一个有产阶级。不仅如此，它还把自己看做一个新的“文化资产者”（Bildungsbürgertum），这恰恰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反面，后者在第一个新阶级规划中被刻画成知识分子的身份特征。第二，尽管看上去这个新的后共产主义权力集团在行使权威时，确实并未受到有产阶级的挑战，但有产阶级的形成已经在进行之中。实际上，虽然权力集团的不同派系相互盯着对方，以确保没有人能够利用私有化为自己谋利，但他们中的某些成员依然钻了空子，已经变得更加富有。更糟糕的是，许多人也许会继续跟进。另外，还有别的候选人可能成为新的大资产阶级，所以，后共产主义权力集团的位置是非常不稳定的，而且他们自己“亲资本家”的意识形态也会逐渐折损他们的权力。

基于所有这些原因，我们得出结论：后共产主义的管理主义不可能成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未来。不过，在中欧发生的阶级结构的形成，仍然是一个需要继续观察的议题，而且展现了一系列广泛的可能性。接下来，我们将对不同群体当下的能力，以及他们可能的未来做出评估，以努力在最广泛的范围内，勾画出后共产主义中欧未来的种种可能。

二 后共产主义中欧的资本主义： 各种可供选择的未来

共产主义垮台之后的中欧，社会结构不断发生变动。哪一个行动者群体能够集体行动，社会裂缝在哪里稳定，将各个阶级和其他社会行动者区分开来的边界将在哪里形成，以及哪些行动会发生，所有这些都还在调整和斗争之中。在如此快速和魔幻般变化的环境中，关于阶级的分析就是关于阶级形成过程的分析。实际上我们认为，质疑某一特定的群体是否构成一个阶级，考察他们在社会中的客观阶级位置，试图勾画出先验的阶级结构，这样来分析阶级都是比较徒劳的。社会变迁的事实隐藏于各个阶级的

形成和分解当中。换句话说，我们应该提出的经验性问题是：“集体行动者的‘阶级性’（classness）程度到底有多高？”即使在最杰出的阶级分析中——也就是说，对19世纪资本主义的分析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也从没真正充分形成过。资产阶级的不同派系总是相互猜忌，而且在19世纪，有的还与无政府主义者联合起来反对别的资产阶级派系。到20世纪，等到资本家阶级最终可以充分发展起来的时候，它却已经开始崩溃瓦解了。

在这一部分，我们将按照上述原则考察中欧社会结构的变迁。考虑到前后的连贯性，我们必须更加慎重地对待“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这一思想。的确，中欧已经有了一些持有恒产的资本家，而且有清晰的迹象表明，一个持有恒产的资产阶级也许会形成，或者，关于它的形成，一场斗争正在发生。我们的关键论点在于，相对于经济发展已经达到的程度、经济联系已经实现的水平，以及考虑到社会主义时期发生的资本积累的程度，这一持有恒产的资产阶级还是很不成熟的。它的财富是适中的，如果还不至于微薄的话；它的政治权力实际上是象征性的。如果我们将后共产主义的早期看做是“向资本主义转型”，那么，我们将会惊讶地看到，是市场制度而不是产权，更加接近我们从西方知道的那些东西。换句话说，中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平衡。对私人产权的发展、一般意义上的阶级结构的演化，以及，尤其是对资产阶级的发展来说，这特别正确。

虽然大资产阶级形成的可能性很高，但它将由哪些行动者构成，却仍然充满竞争。并没有什么历史的铁律，能够事先决定关于财产和阶级形成的斗争将如何展开，以及，是否任何一个单独的行动者或行动者联盟将能够形成一个有产阶级。更确切地说，对未来将会发展出什么类型的社会有着重要影响的，是行动者之间斗争后果的历史格局。从这一角度看，我们关于管理主义的论题既可以有一个强假设，也可以有一个弱假设。强假设主张，可以想象，管理者将继续作为管理者行使权力，他们之间的竞争将阻止他们成为有产者，而他们也必将阻止他们的竞争者成为持有恒产的资产阶级。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能看到强关系意义上的经理人社会的再生产。弱假设主张，管理者或他们的竞争者将会成为持有恒产的资产阶级。在这种可能出现的结局之下，“管理主义”将被理解为建设资本主义的一种策略，并且可以被用来描述社会转型是完成的。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这个弱假设，也暗示在中欧，资本主义是在没有资本家的情况下被创造出来的。而且在我们的分析中，我们认为，这种历史上特有的群体之间的斗争，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给世界上的这块地区留下它们自己独特的印记。



(一) 中欧的政治资本主义及其超越

在第四章，我们详细评介了政治资本主义的理论。我们指出，某些最优秀的中欧问题研究专家相信，那些从私有化中受益致富的人，正是几十年来一直压迫着这个社会的那些人，亦即共产党的旧官僚。实际上，在某些研究中，旧的红色贵族已经转变成新的有产阶级，已经被当成“事实”而不是“预言”：在弗莱德曼及其同事看来，艾勒梅·汉基什和雅德维佳·斯坦尼茨基斯在1989年所预言的东西，亦即政治权力正在转换为经济财富，到1996年时，已经成为确定的事实。^①

基本上，我们关于后共产主义管理主义的理论是在挑战上述主张。我们坚持认为，在政治权力转换成私人财富这一点上，有着明确的政治限制。某些限制是由权力集团中的特定部门，尤其是塑造民意知识阶层设置的。在某些方面，正如我们在第四章中指出的那样，汉基什和斯坦尼茨基斯的理论在中欧变成了某种“自毁预言”（self-defeating prophecies）：尽管前党务工作人员试图盗取公共财产中饱私囊，但像汉基什和斯坦尼茨基斯这样的理论家早先对社会的警告，已足够使媒体、议会、它的专门委员会、社会科学家以及警方开始密切关注私有化的进程，从而使得旧官僚很难轻易盗取国家财产。所以，虽然任何一个中欧国家都可以举出一两个例子，指认一个前共产党官员现在是个富翁和成功的企业家，但我们并不认为这是后共产主义私有化的主要经济“情节”。

让我们简要概述一下第四章在这个方面的主要发现。第一，我们的调查数据表明，在1993年的中欧，大约只有1%~2%的大企业管理者在1988年时是党务或者政务工作者。即使政治资本主义的现象确实存在，它所表现出来的规模也很小。不过，这一主张要想获得大家的认可并不容易。恰恰是因为公众对官僚资产阶级的强烈反对，使得有些人想当然地认为，我们的调查数据肯定低估了中欧政治资本主义的程度。不管由政治权力向私人财富的成功转换是否曾发生过，它都有可能被隐瞒起来。此外，某些官员有可能很聪明，在船还没有沉之前，就已经跳上了岸，也就是说，他们在1988年时就已经在经商了。然而，这些限制条件都没有破坏我们的主张，因为我们的数据，以及这一时期收集的其他数据，证明与管理者的权

^① Roman Frydman, Kenneth Murphy and Andrzej Rapaczynski (1996) "Capitalism with a Comrade's Face". *Transition* 2 (2): 5-11.

力相比，政治资本主义在中欧并不明显。

不过，这个政治资本主义的论题，当它被应用到俄罗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白俄罗斯的时候，也许能解释更多的问题。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掌握斯洛伐克的数据，但有证据表明（例如，私有化凭证的存在，以及直接的、不受审查地售卖国有企业的机构），至少在私有化这个方面，斯洛伐克更接近俄罗斯的道路而不是中欧各国。我们的数据则表明，在匈牙利、波兰和捷克共和国，前党政官员在经理入中的比例低于2%，但在俄罗斯，大约10%的公司管理者声称在1988年他们还在从事着政府或党的工作。这也与俄罗斯社会的普遍趋势相一致，那就是精英的再生产。^①在将自己的政治权力转换为私人财富，或者管理和政治权力方面，俄罗斯的旧官僚看上去要比他们在中欧的同僚们要成功得多。甚至俄罗斯的新政治官僚（politocracy）也来自旧人物。此外，影响民意的知识阶层更加边缘；有证据表明，他们仍然受到各种各样的威胁：在俄罗斯和斯洛伐克就有记者被暗杀、被打和被骚扰的报道。这些国家的政府掌握着关键媒体、广播和电视，对它们实施直接的控制。

为了清晰地概括这种对比，我们也许可以说：如果我们将中欧看做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体制的话，那么，东欧的后共产主义政权也许可以被概括为没有资本主义的资本家体制。

要想打击旧官僚的政治资本主义企图，媒体的自由是关键，但不管在哪里，这种自由都不会不经斗争就自动产生。即使在中欧，后共产主义的政府也试图对媒体进行管制，去控制广播、电视甚至日报。不过，中欧的媒体还是艰难地获得某种程度的自由。那个提出政治资本主义理论的汉基什，如今已经成为匈牙利电视台的总裁。这可能是一种巧合，但从我们的立场看，这就是相当有说服力的例证。在这个位置上，针对共产主义后匈牙利第一届政府试图控制媒体的企图，他打了一场崇高的战役，并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为了理解政治资本主义在这一地区的前景，我们主张，必须去分析晚期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后关键行动者之间的权力平衡。即使在共产主义垮台之前，中欧的精英也是分裂的。正如我们在第四章中指出的那样，官

^① Eric Hanley, Natasha Yershova and Richard Anderson (1995) "Russia: Old Wine in New Bottle? The Circula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Russian Elites, 1983-1993". *Theory and Society* 24 (5): 639-668.



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

僚体系的权力在社会主义晚期受到一个强大的专家政治的挑战，而且慢慢地，专家治国论者对自己的角色定位，也与官僚政治对他们的期望不同。随着后共产主义的到来，精英们进一步发生分化，一个派系牵制着另一个派系的权力，相互监督各自的行动。这种权力分享的情况，反映了社会主义晚期和后共产主义早期专家政治对官僚政治的胜利，以及专家治国论者、塑造民意的知识分子，以及他们以前的敌人（持不同政见者），对各自身份的确认。

相反，在国家社会主义晚期，在俄罗斯和整个严格意义上的东欧，精英的发展却与中欧有很大不同。在俄罗斯，不仅专家治国论者没有能废黜官僚体制的精英，而且专家政治和官僚政治之间到底有没有形成区别还是个问题。两个派系的社会背景都非常相似，而且，正如伊亚尔和汤斯利在别的地方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两个派系更像是同一个父亲的儿子和女儿；在中欧，这个父亲占据的是红色贵族的位置，而不是专家治国论者或者政治官僚。^① 在俄罗斯的案例中，专家治国论者和政治官僚的惯习和心态甚至看上去都很相似。而且，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以来，社会等级制的高层在人事上有了很多变动，但由于新人往往来自同一类人，这就大大限制了人事变动可能带来的变化。^② 在俄罗斯，新人被提拔到了高层，但他们看上去和旧人一样——他们只是更年轻而已。实际上，正如沃斯伦斯基（Voslensky）曾经指出的那样，把这些红色贵族称作“苏联的统治阶级”十分合理，因为通过一种类似种姓制度的方式，它对其他所有社会阶级保持封闭。它通过婚姻纽带实现自身的再生产，而且确保只有它的“儿女”才能够抵达权力的位置。^③

在中欧从来没有这样的案例。在波兰始终存在一条从大众阶级（popular classes）尤其是农民中进入党国精英之列的渠道，而在匈牙利，在社会主义的最后20年间，权力位置对年轻的专家治国论者和知识分子的孩子是开放的。这就是政治资本主义的理论在俄罗斯比在中欧更加合理的原因。而且尽管我们不太愿意去说政治资本主义是共产主义之后俄罗斯的主要情节，但“党国精英—资产阶级”（nomenklatura-bourgeoisie）的理论在俄罗

① Gil Eyal and Eleanor Townsley (1995) "The Social Composition of the Communist Nomenklatura: A Comparison of Russia, Poland, and Hungary", *Theory and Society* 24 (5): 723-750.

② Hanley, Yershova and Anderson, "Russia: Old Wine in New Bottle?"

③ Michael Voslensky (1984) *Nomenklatura: The Soviet Ruling Class. An Insider's Report*. New York: Doubleday.

斯确实比在中欧各国要更有解释力。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在中欧，绝大多数党政官员，除极少数例外，都失去了将他们自身转变为一个持有恒产的大资产阶级的机会，而他们想重新这么做的机会也不会再有了。相反，在更靠东的地方，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白俄罗斯，尤其在俄罗斯，可以想象到的是，许多党政官员不仅变成了有产者，而且也许会构成这些国家中将发育出来的有产阶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管理者成为所有者

正如第四章显示的那样，有许多证据可以支持下面这一论点：在后共产主义转型的早期，更多是管理者而不是前政治主子（political bosses）获取了私人财产，而且至少他们中的某些人开始看上去像是一个持有恒产的资产阶级中的成员。我们的数据指出，在这一过程中走在最前面的，是匈牙利。1993年我们在匈牙利访谈的CEO中，几乎一半承认拥有某些商业财产的所有权，而相比之下在捷克和波兰，拥有所有权的CEO只有20%。

然而，必须注意到，从这些经理人的所有权中体现的，是一些不平常的因素。声称自己拥有厂商所有权的CEO中，大约一半拥有的财产并不属于他自己管理的公司。这些公司中的许多家都是转包合同制企业，经理人创办它们，将其作为自己所属主公司的卫星公司。^①正如拉里·金所揭示的那样，这些卫星公司有两种类型。在有些案例中，经理人创办由其自己或者他们的家庭成员，及（或）公司管理层的同事所有的“永久的寄生性卫星公司”（permanent parasitic satellites），以从母公司中吸取收入。这种做法并没有破坏后共产主义的管理主义。毋宁说，“永久的寄生性卫星公司”是这种体制的产物，因为只要母公司是混合的所有权，就不存在可以严格监督经理人的所有者，这些卫星公司也就可以仅仅由经理人所有和管理。^②进一步地说，只要经理人被允许开办这些寄生性卫星公司，他们就没有动机去成为母公司的所有者。舍弃母公司的所有权，而把风险留给别

① David Stark (1996) "Recombinant Property in East European Capital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4): 993-1027; Larry King (1997) *Pathways from Socialism: The Transformation of Firms in Hungary, the Czech Republic and Slovakia*.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CLA.

② 在西方，基本上没有什么公司会允许它们的CEO将赚钱的生意转包给主要由CEO自己所有的公司。任何这么做的CEO会立刻被解雇。



人（最理想的就是留给纳税人和政府），自然更加安全，而利润则被卫星公司吸走。当然，这些经理人也也许会考虑成为这些卫星公司的完全所有者（full owners），并且完全以 CEO 的身份从他们现在的位置上退休；但我们认为这不太可能，因为他们并不能保证他们的小公司能够继续从母公司中获得能赚钱的转包合同。不管情况怎么样，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固定卫星公司的体制，构成财产的一种独立形式以及资本主义的一种新形式。在这里，只有在你除了能从一个公司中赚取利润，还同时是它的经理人雇员的时候，私人所有者的优势才能被觉察到。由于后共产主义的经济越来越多地受到这种做法的影响，后共产主义也因此确实可以被看做“经理人的资本主义”。这不是伯利和米恩斯所说的管理主义，而是这本书中所定义的后共产主义的管理主义。

拉里·金所指出的另一种类型的卫星公司，是管理者用来收购的载体。在这种情况下，CEO 和他在管理层的同事在预料到母公司要被私有化之前，创立一个转包合同的公司。他们将母公司中最有价值的资产以最低的价格出售给他们的转包合同公司，而把所有的债务和负担留给原来的企业，直到它被宣布破产和拍卖。这个时候，那个小型却富有的转包合同公司就可以很便宜地购买这个贬值了的公司。当然，在后共产主义的中欧，这一过程并没有多少独特性：这也是西方管理层收购的典型策略。唯一区别是，在共产主义之后的中欧，母公司经常是国有的（或者由“国家私有化代理处”所有，它可能是历史上国家所有权最松动的形式）；因此，管理者的收购并没有在董事会的监督下进行，亦非在与资本家的竞争中产生。在后共产主义的情况下，试图进行管理层收购的经理人只有与政客达成妥协，而且除了一帮爱管闲事的臭记者和一个把工作做过了头的检察官办公室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人对收购的过程进行“监管”。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管理层收购的策略也许是共产主义之后经理人成为资本家阶级的一种重要方式。

然而，我们的数据并没有能区分出长期的寄生性卫星公司和作为经理人收购策略一部分的卫星公司。在这一点上，我们知道的全部事情是，在 1993 年所有足够大到能够在商业注册中列出来的匈牙利公司中，大约四分之一能够发现这两种策略的某些结合——而据大家说，在捷克共和国和波兰要少一些。拉里·金在大约三十几个捷克和匈牙利公司中的民族志调查发现，相似比例的公司正致力于使用这些策略中的一种或另一种。所以，当我们宣称在 1993 年，从属于管理层收购或经理人所有的转包合同公司的

比例在所有公司中不高于 25% 的时候，我们也许并没有离标准太远，而且这一比例可能只有 10%。

然而，我们的数据提供了更多的证据表明，直接的管理层收购也已经成为后共产主义转型早期的特征。我们在匈牙利访谈的经理人中，大约四分之一宣称他们拥有自己管理的公司的财产权（再一次的，这一比例看起来要明显小于捷克共和国和波兰）。然而一般说来，这些只是小份额的所有权股份（不超过 10%），而且大多数是在小公司里。在这里，我们所说的大公司，并不是指巨型公司，而是指拥有 100 个以上雇员、经理人的所有权微不足道的公司。

除了直接的或间接的经理人所有权之外，与宣称 CEO 拥有所有权一样，许多匈牙利公司在 1993 年宣称，它们的雇员拥有所有权。拉里·金的民族志作品证实了在捷克共和国，雇员所有权也是相当重要的。虽然我们并不知道在多大程度上“雇员所有权”代表了下层管理者（fellow managers）的所有权，或者它是否严格意义上的雇员的所有权，但不管怎样，我们愿意就雇员所有权指出两点。第一，就它代表了管理干部（managerial personnel）的所有权这点来说，这还不是该管理者个人的私有财产权。如果一个公司内高层的 5~10 人必须协调他们的行动，但他们只拥有该公司 10% 或 15% 的股票时，他们一致行动的能力将会受到限制。他们可能在许多议题上分裂，而且也许会从别的股票所有者那里寻求支持。第二，如果雇员所有权代表了非管理干部（non-managerial personnel）的所有权，这可能会增加 CEO 的决策权，但正如我们关于“后共产主义管理主义”的理论所指出的那样，这也恰恰会限制他的财产权利。非管理干部的所有权有点类似于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工人的自我管理”。对自我管理的批评者指出，在这个体制中发号施令的仍然是管理者；工人们没有信息、技术知识或者渠道，按照章程赋予他们的职权，对管理者做出的决定做出选择或提出否决。

做一个总结：管理者成为所有者的现象在 1993 年是真实存在的，但它的意义是相对的。我们不同意某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看法，他们认为管理层收购是通往资本主义的阳光大道；我们认为，情况不是这样的。虽然自 1993 年以来，情况也许有所改变，但那个时候，经理人的所有权还只是个相对次要的情节。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关于管理主义的分析，只是一种对“过渡性”的、以后会变得无关紧要的现象的分析？我们并不这样认为。如果未



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

来涌现的资本家阶级来源于前管理者——他们曾用这种或那种方式试图去把持国家资产——我们则认为，这将对中欧资本主义的未来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匈牙利社会研究中心于1996年收集的数据显示，在匈牙利，私人所有权在1993~1996年间有了实质性增长。在大多数案例中，这也许代表的正是前任或现任管理层成员的所有权。到1996年，在所有中小企业中，有1/3到1/2报告说它们的所有权掌握在本土的私人，或者私人团体手中。再一次重复一下我们在第四章中的评论：我们力劝读者不要太在意这些发现。第一，有关本土私有产权快速增长的证据并非仅为匈牙利所有，这也许可以被看做由于共产党的继任政党赢得大选之后，政治权力平衡的转移所引起的现象。我们需要来自捷克和波兰的数据，从而评判管理层收购的增长是否追寻的是建设资本主义的“铁律”，或者它是否前共产党为了报答它在前共产党管理层和专家治国论者中的政治盟友而采取的行动的结果。我们的第二个观察是，关于公司部门——例如拥有500及其以上雇员的公司——的最近数据显示，它们仍然是公共所有的，或者可以被归为斯塔克所说的“资产重组”的类型。从计划经济时期延续下来的高比例的公共产权，受到了来自外国投资的挑战，而且，正如1997年春天的数据所显示的那样，在这一部门中，几乎没有什么证据表明一个持有恒产的资产阶级正在形成。

最后，我们观察到，即使一些管理者成功攫取了实质性数量的私有产权，从而使得他们有足够的资格达到“大资产阶级”的水平，但是，他们可能还是保留了管理者的惯习。也许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市场制度的建立重新塑造了他们的惯习，但这些市场制度，以及它们得以起作用的财产关系，也将打上它们制造者的“社会主义—管理主义”惯习的烙印。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些行动者用来处理后共产主义各种情况的仪式和策略，具有丰富的多样性。它们看上去非常不同于熊彼特所说的有生气的企业家的行为和判断力。出于这个原因，我们认为，即使所有者成为管理者，他们看上去也将与西方的资本家有很大不同。我们知道，中上阶层的惯习改变了“二战”前中欧的经济和社会制度，而且在不停地再生产一个“中上阶层”的社会（a “gentroid” society），即使当中欧的经济已经被整合进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之后，也是如此。当然，对中上阶层的生活方式来说，管理者的惯习和心态有一种吸引力和魔力，它可以以一种相似的方式，对共产主义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的社会环境产生持续的影响。

惯习现象通常被用来描绘社会结构再生产的过程：个人的性情倾向被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结构形塑，而这些性情倾向又反过来帮助人们适应他们的位置，从而维系整个结构的逻辑。简言之，一个人的惯习和他所在的那个位置的性质，是一个相互作用和相互决定的关系；不仅是制度形塑了惯习，而且，当这些位置上的人遵循他们的惯习，来操纵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时，制度也被重新塑造了。这就是当一个社会的逻辑和制度结构也正处于变化之中的时候，对社会学理论来说，精英位置的人事变动就显得非常之重要的原因。简单地说，一个由前共产党官员，或者他们的子女操纵和管理的资本主义，将在本质上不同于一个由洛克菲勒们的子女操纵的资本主义。

所以，即使中欧的管理者成为私有财产者，这个可能出现的资本主义也将非常不同于西方的发达资本主义。我们认为，它也许看上去像是韦伯意义上的政治资本主义。韦伯关于政治资本主义的论述，非常不同于我们在前面批判过的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资本主义。新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问题非常简单：资本家从哪里来，资本的原始积累是如何发生的？当官员们使用他们的政治权力来侵吞国有财产时，政治资本主义就被认为发生了。相反，韦伯关注的是经济体制的逻辑，以及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在以理性地获取利润为导向这一点上，政治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但由于它诞生于国家的监护之下，及（或）处于政治对经济体制进行系统化干预的情况之中，它因而又是政治的。也许有很多原因，会让成为所有者的管理者觉得，操纵一个韦伯主义意义上的政治资本主义世界，比操纵一个由自由竞争的环境所决定的世界更舒服。作为前社会主义和后共产主义的管理者，他们非常熟悉一个经济和政治相互联系的系统中的各种游戏规则。此外，前面所描述的管理层收购的过程，在“管理者—所有者”和政客之间建立了一种庇护主义的关系。

总之，假设前社会主义的管理者在一夜之间将成为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的确有点牵强。他们之所以去做管理者，乃是因为他们想为自己获得更高的收入，而不是为其他人谋福利。而现在，他们利用机会去把他们的部分公司私有化，是因为他们试图去进一步补充那些收入。对许多人来说，他们经济行动的动机，与其说是企业家的投资不如说是积累。出于这一原因，我们认为，即使他们能够构成一个资本家阶级，它也可能是一个“食利者”阶级（a rentier class）：很难看到在未来的中欧，如何能够从建立在



国家社会主义废墟上的材料中，很快地诞生出索罗斯（Soros）^①那样的人物来。

（三）买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技术专家成为资本主义管理者

后共产主义的转型有着各种各样的诱惑，管理者可以利用各种方式从中捞到好处。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描绘了其中的一种方式，那就是通过创造和维系混合所有权关系，使得管理者的决策权最大化。如果可以在创建“永久的寄生性卫星公司”的情况下做这件事，那么它就尤其具有诱惑力，因为它允许管理者不冒任何企业家的风险就占用大量的收入。稍差一点，但仍然非常有诱惑力的一种方式，管理者成为他们所管理的企业的所有者。那些如何让管理者获得所有权的方式，我们在前面已经描述过了。在这里，我们将转向另一种重要的诱惑：管理者以低廉的购买条件或价钱，把他们的公司卖给以前认识的外国商业伙伴；作为回报，他们要求在新的外资公司中获得经理人的职位，继续赚钱。

与“管理层收购”相比，这种策略在给管理者带来高收入的同时，还更加安全。与此同时，它还提供了一种无形的、但非常有力的诱惑：西方的声望。在国家社会主义时期就与西方公司打交道的管理者和技术专家，也许会将这个看做是实现了一个梦想：他们终于可以运作一个管理完善、完全所有、装备体面的公司。随着外国资本的流入（一般来说，就是把国有企业私有化，然后卖给外国人），公司可以跨越式地发展成为国内最现代的企业。

对外国公司和国际金融机构来说，雇佣前管理者，甚至前党政官员，也是很有吸引力的选择。雇佣这些人作为经理人、顾问或者咨询专家，为外国公司提供了坚实的当地代理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也往往十分丰富。外国投资者完全知道，要想在后共产主义国家中做生意，从共产主义时期继承而来的社会网络和个人关系有多么重要。他们还知道，你没必要雇佣那些最显赫的人物；相反，你需要的，是那些社会关系最丰富的人。匈牙利的最后一任共产党总理，内梅特·米克洛什（Miklós Németh），出了办公室

^① 乔治·索罗斯（1930-），匈牙利裔美国人，LCC索罗斯基金会董事会的主席。他为基金会的网络提供资金，这个网络在31个国家中运作，遍及包括中欧和东欧在内的世界各地。这些基金会致力于建设和维持开放社会的基础结构和公共设施。索罗斯还建立了其他一些重要的公共机构，如中部欧洲大学和国际科学基金会。——译者注

就直接成了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uropean Bank of Reconstruction）的一名副总裁。就个人而言，我们还知道，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两名前高级官员现在就在跨国公司工作，他们中的一个人半开玩笑半严肃地将自己称为“买办知识分子”。

“买办知识分子”，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术语，如果我们能够将新马克思主义者强加给它的价值判断拆开的话——新马克思主义者看不起第三世界国家的“买办资产阶级”，他们认为这些人应该对新殖民主义和“不发达的发展”负责。我们将分析性地使用这个概念，以指代“买办知识分子”的存在，也正是他们，创造了信任和信心，使得外国资本打入后共产主义的市场成为可能。外国资本的流入对后共产主义的经济是否有利，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并没有现成的确切答案。一些随着旧政权的倒台而立刻跑来的外国投资，也许并不是什么好东西。它们中的一些是掠夺性的，目的在于通过支配竞争者的本土和外国市场，从而最后消灭他们。许多外国投资是垄断性的零售集团：它们培养出完整的共产主义垄断性零售链条，用便宜的西方消费品填充它们，破坏这些货物在本土的生产，从而使其更加难以脱离国家社会主义的垄断，或者发展出替代性的零售活动。然而，还有一些投资是富有成效的。它使一些企业起死回生，创造了高工资的就业机会，甚至带来了非常需要的实际管理知识和技术。

从整体上来说，我们倾向于相信，在中欧后共产主义转型的特殊情况下，在这样一个最主要的经济问题是缺乏资本的地方，外国投资的作用，可能更多是有利而不是有害。尽管作为中欧人均外国投资最多的国家，匈牙利在转型的最初六七年里经济表现最差，但有证据表明，大多数破坏性的投资只是发生在转型的早期。此外，应该对匈牙利糟糕的经济表现负更多责任的，是它的外债负担和无能的本土宏观管理，而不是外国投资。实际上，外国投资能运转得多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买办知识阶层的品质，以及它与新权力精英的关系。只要买办知识阶层与权力精英和谐共处，而不是与那些被贴上“盗贼统治者”（kleptocratura）标签的人发生冲突，一个国家在寻求外资方面，就可能更加谨慎，效率也会更高。

同时，要注意的是，在1993年，外国投资在大多数中欧国家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还是相当少的。在匈牙利，这个对外资最为开放的国家，有资格在主要营业登记中注册的公司中，只有25%在1993年报告说有外资股份。此外，在所有公司中，只有14%处于外国控制之下。然而，在1994~1996年间，匈牙利快速地走向了另一种资本主义体系，在这种体系中，买办知



识阶层成为本土社会结构中最重要行动者。随着公共所有权的衰落，外国所有权快速增长。不过，看上去匈牙利的私有化并没有导致大规模的管理层收购。

（四）新企业家和经理人之间对私人所有权的竞争

然而，还有另一群行动者，他们也有机会成为未来的有产阶级中的一员：这些人就是所谓的“新企业家”。他们不能或不想从公司部门的私有化中占便宜，但从做自己的小生意起家，并希望能够发展壮大。他们中的有些人，在社会主义时期是普通的工人，在20世纪70~80年代的时候，开始涉足“第二经济”。另外一些人则是职业化的，某些人甚至来自中层管理者，但在国家社会主义晚期或共产主义垮台后不久，开始选择做自己的私人生意。

我们关于大公司管理者的数据显示，在1993年，新企业家在这些公司CEO中的比例相对较低。只有大约1%~2%的大公司的CEO，在1989年以前已经在私人部门里工作；相比之下，在旧政权倒台之前，超过2/3的CEO在社会主义厂商中曾经是管理者。

然而，人们不能低估后共产主义中欧小商业的范围和活力。私人部门在所有这些国家中势不可挡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自后共产主义转型以来，所有这些国家的社会结构中，最普遍性的变化就是自我雇佣的增长。超过10%的经济活跃人口都是自我雇佣者。在波兰和匈牙利，共产主义后的第一个五年期间，这一比例翻了一番，而在捷克共和国，它则从无到有。

当然，并不是所有自我雇佣都代表着有活力的经济增长和资产阶级化(embourgeoisement)。正如埃里克·汉利(Eric Hanley)论证的那样，自我雇佣的概念，实际上包括两个不同的范畴：一个只不过是“失业的收容所”，也就是失业后的替代品（这针对的是对匈牙利和波兰，在那里，工作的数量急剧减少，而在捷克，失业则是微不足道的）；另一个是有活力的小商业，经济中最活跃的部门，其中一些小商业正在发展壮大。^①也许可以从这些富有活力的商业经营者中，产生出未来的大资产阶级，而且由于这一原因，他们也许对别的竞争者，比如经理人，构成了威胁，后者把领导和支配正在出现的有产阶级视为自己的目标。

^① Eric Hanley (1996) "Self-Employment in Post-Communist Eastern Europe: The Emergence of a New Petty Bourgeoisi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CLA.

谁是这些小商业的经营者？埃里克·汉利指出，两种目的不同的自我雇佣者，实际上受到不同社会因素的调节。^① 第一种主要面对的是失业工人。相反，对从前从事第二经济的企业家、共产主义之前走资产阶级化道路的家庭，以及前干部阶层（也许其中最多的一部分人是以前的地方小干部）来说，第二种则是向上流动的一个渠道。

与前面讨论过的管理者不同，这些向上流动的小资产阶级的惯习，可能更容易适应纯市场（a genuine market）的规则。所以，虽然这些人中的极少数已经在公司世界中打拼，但还难以想象他们最后会不会与大公司和前社会主义的管理者展开竞争。随着私有化走入尽头，这一竞争也许会加剧。中欧市场转型的主要策略，已经变成改变公司部门中的财产关系，而不是鼓励小商业去发展壮大。私有化的优先考虑，是让大公司的内部人，也就是管理者受益。管理者有内部信息和社会关系，而且在各部委和私有化的管理机构那里，他们的私有化建议很快就能够被接受。不过，私有化的游戏正在走向尾声。前社会主义管理者将在多大程度上适应纯市场的竞争环境，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毕竟他们的权力和特权建立在社会资本，也就是运作庇护网络的技巧的基础上。此外，并不难想象的是，那些白手起家，从他们家庭的地下室和车库中开始创业的商人们，将从纯市场的竞争环境中获益。虽然在后共产主义早期，面对让公共部门优先转型的政策弊端，他们也许曾经不得不与之斗争，但随着公共部门的私有化走到尽头，这些在竞争中习得市场资本主义规则的企业家，也许会做得更好。

因为所有这些原因，我们相信，公司部门的“技术专家—管理精英”，与白手起家的“新企业家”之间的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实际上，它才刚刚开始。这一斗争的结果还无法预测，它不仅由经济理性的考虑来决定，而且取决于历史上的偶然性格局；这种格局，同时又是卷入其中的行动者之间政治斗争的结果。

三 来自上层的资本主义及其替代： 从市民社会到资本主义的历程

后共产主义是来自上层的资本主义：它是管理者所使用的一个策略，

^① Eric Hanley (1996) "Self-Employment in Post-Communist Eastern Europe: The Emergence of a New Petty Bourgeoisi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CLA.



目的是将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转变为市场资本主义经济。

在社会主义的博弈中，知识分子明确将目标定为把他们的社会转变成资本主义，并对此做出系统阐述，是相对较晚的事情，那已经是20世纪80年代的某个时候。在此之前的几十年，从20世纪50年代晚期到70年代早期，大量的知识分子还是希望能对社会主义进行改革，使之更加有效和更加人道。最优秀人物所从事的工作，是将计划体制“合理化”，创造一个市场和再分配的混合体，以及使党的结构民主化。这些改革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从根本上挑战公共所有权或者党的领导权。然而，最终，中欧的知识分子对改革社会主义体制的可能失去了信心。他们惊讶地发现，就在他们的改革设想被官僚体制暗中破坏的同时，社会经济体内正在发生一些深远和基础的变化：二等的、地下的市场经济开始出现。改革派知识分子和异议知识分子都与这些变化无关，他们既没有预见到它们，而且也肯定从没有计划过它们。实际上，在对这个体制的幻想破灭之前，他们几乎没有注意到它们。但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尤其在前南斯拉夫、波兰和匈牙利，资本主义已经在进行之中。这不是被设计出来的改革，这是由于“缺席”而导致的改革。这是来自下层的资本主义。在农业、服务业、建筑业，甚至在分支工业，兼职或全职，合法、半合法或非法，小生产者们开始在价格调节的市场（price-regulating market）中生产货物和提供服务，以新“社会主义企业家”的身份开展活动。当知识分子第一次发现这些企业家的時候，他们最初的反应是积极的。他们看见了“第二经济”中的力量，这种力量最终将可能推翻官僚政治的权力。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早期阶段，知识分子对这些行动者的态度，仍然模棱两可。知识分子厌恶新企业家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以及他们的贪婪，并且质疑这是否就是他们正在等待的市民社会。

我们并不能准确地说出，从什么时候起“市民社会”这一概念第一次被中欧的知识分子用来作为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批判。但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它流行得很快，取代了“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m）这一概念。正如我们曾经指出的那样，从将自己看做是社会主义的改革者，到重新将自己建构成一个新的、以建设资本主义为己任的第二代文化资产者，中欧知识分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当他们还在“过河”的时候，市民社会就是他们摸到的“石头”。许多知识分子，既有异议知识分子也包括非异议知识分子，知道他们不喜欢社会主义，但是那时，只有极少数人已经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是唯一的替代。实际上，在1981年的秋天，

在团结工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当一名波兰经济学家第一次提出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时候，他受到的还是嘲笑和不信任。

市民社会是一种新的理论，它使得来自共产主义集体价值系统的知识分子逐渐“去社会化”（de-socialized），并在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德行中重新接受教育。市民社会的话语之所以在知识上如此厉害，是因为它在不提及资产阶级、不平等、私有产权、剥削或者支配的情况下，暗示了礼貌、自由、个人自治和责任。市民社会是一套关于“无阶级社会”（classless society）的话语，也就是说，是一套从不会遭遇不平等问题关于自由的话语。

以这种方式使用市民社会的观念，在思想史上并不是头一回。在18世纪的法国和英国，它就被系统阐述过。当时，人们从一个理想化的（而且在那个时候，还不存在的）市场社会的视角出发，把它看做是对等级秩序和专制权力的批判。此后，不管怎么说，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市民社会的话语处于睡眠状态。在那段时间里，几乎没有什么哲学家和政治学者使用过这一概念，而社会学家也肯定不会。它在中欧被重新发现，部分是由于，在20世纪70和80年代，中欧知识分子所面对的环境，与18世纪的契约论者（contractarians）比较相似。他们的任务是找到一种工具，可以用来对等级秩序和专制主义进行批判。而在暴露晚期社会主义的家长作风，以及共产党庇护关系的逻辑上，公民权和社会契约的观念正好相当理想。在这一理论传统发展的早期阶段，有一种指责认为，市民社会其实就是资本主义，中欧的知识分子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他们争辩道，市民社会其实既不同于苏式共产主义，也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这就是为什么在20世纪70年代末，那些在一开始与“社会主义”保持距离的西方左翼，一下子就与这一观念“坠入爱河”的原因。市民社会这一观念在德国发展起来的方式，就尤其有说服力：虽然有一个精确的德文术语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来对应市民社会这一现象，但德国的新左派却喜欢谈论 *Ziwiggesellschaft*，以表明他们并不是资产阶级社会的鼓吹者。

直到1988年，中欧的知识分子在使用市民社会这一概念时，都采用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直到今天，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知识分子话语的标志。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在这一矛盾不那么明显的时候，一些学者不仅将社会主义的企业家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先驱，而且将他们视为正在兴起的市民社会的代表。不过，



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

许多知识分子还是对从事第二经济的企业家抱有偏见。为了把市民社会这一抽象概念落实到经验层面，他们通常提及自己的行动，或者同样也是知识分子的父辈、祖父辈的生活方式。于是，市民社会开始变成一个共同体，一个由操着新话语、“以别样的方式思考”的人们组成的共同体。吊诡的是，在这一范围广泛的概念中，有一群人被排斥在外。“他们”被排斥在外，而这里的“他们”，也许指的就是共产党的权力精英，也就是经常被称为“当权者”的那帮人；但“他们”也可以指的是第二经济中的小资产阶级企业家，他们不仅经常被认为没什么颠覆精神，而且在共产主义社会秩序的再生产中，与当权者串通一气、相互合作，是一种安全阀（safety-valve）。

当异议知识分子正忙于对市民社会做出解释，并多少有点自我陶醉的时候，党政机关内的专家治国论者和管理者也变得更加激进。他们的工作，是要使企业运转、在世界市场上销售他们的产品、平衡预算、处理外债和贸易赤字。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们中的许多人干脆甩手不干了，并且宣称，把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经营好，是一项不可能的工作。社会主义管理者和专家治国论者开始形成下面的观念：社会主义是无法革新的，国有产权不会变得有效率，国有企业永远不会有硬预算约束。他们主张进行硬预算约束，并且将经济从政治中彻底分离，让政治家脱离经济过程，从而使得管理者能够履行他们的职责。管理者和专家治国论者很快就承认，他们在说的，其实就是资本主义。他们认识到：再分配的制度必须被摧毁；不仅是消费品，而且劳工和资本，也都必须被分配给由相互竞争的行动者所组成的自我调节市场；最重要的是，国家所有权制造的产权真空，必须由可辨认的所有者，最好是私人及（或）个体所有者来填充。

只要官僚主义者还掌握着权力，社会主义的管理者和专家治国论者就不能实现他们的目标。在与官僚政治的斗争中，专家政治的主要弱点在于话语（discursive）。在官僚政治使用的统治性的语言规范中，有着各种各样的禁忌（就如同关于私人所有权，或者资本主义的禁忌一样），管理者根本不允许表达他们的新观点。结果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阅读异议知识分子的地下出版物（samizdat writings）时，感到兴奋激动；而且发现了市民社会这一新的有力话语。这一话语自称没有禁忌，而且，虽然它并不经常使用诸如私有产权、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这样的术语，但它提供了一种讲述它们的方式。于是，市民社会的话语使共产主义的禁忌话语丧失了合

法性，并且创造了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前资本主义的话语得到了清晰而详尽的阐述。与此同时，它还为专家治国论者和异议分子结成联盟提供了基础。

这就是来自上层的资本主义规划得以形成的过程和来龙去脉，它受到管理者、专家治国论者和知识分子的欢迎。当专家治国论者成功地将私有化变成一项优先的公共政策的时候，关键性剧变就在1988~1989年间的某个时段发生了。直到那个时候，资本主义的形成，看上去似乎都可以通过私人部门的逐渐发展，以及产权形式和经济整合机制的实际混合而实现。既然人们假设小私人企业只能缓慢地成长为大的资本主义商业，那么从这一观点来看，建造资本主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相应的政策之一，就是撤销管制，使私人活动完全合法化，并且保证部门中立，对公共和私有财产实行完全相同的规则，而不是厚此薄彼。

然而，1989年之后，部门中立以及宝贵的小规模渐进主义的抱负消失了。正在成长的小商业似乎走的是19世纪资本主义的道路，变成了“修理厂资本主义”（garage capitalism）。这是朝向“第三世界”的“第三条道路”，而不是直接“回到欧洲”，也就是回到最为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心地带的一流捷径。为了成功实现这一历史性的突变（coup），人们需要勇气和智慧。人们不能等待小企业的缓慢成熟，人们必须在一次毁灭性的猝然攻击中，改变整个体系。一个90%都是公有经济的国家，必须在一百天内，或者五年内，转变成一个100%都是私有经济的国家。

私有化本来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继续进行。实际上，在后共产主义转型早期，最为著名的观点之一就是：之所以要进行私有化，就是要去寻找可辨认的、最好是私人性的所有者，并把国家资产转移给他们。人们相信，这需要相当缓慢地推进，一直要等到足够多的资本积聚在私人的手上，这样公共财产才可以在私有化的过程中以市场价出售。诸如奥地利、英国和中国台湾这样的国家和地区，它们的私有化规划就曾以这一方式实现。在这些地方，50%的公有财产——这构成了所有这些国家和地区在“二战”后的特征——在大约20年的时间里被缩减到15%~20%。这将是不会是中欧的命运。作为一种替代性选择，管理者、专家治国论者和前异议知识分子选择了直接的公司化（corporatization）。在公司化的过程中，所有者是不是可辨认的个体已经没有意义。重要的是，公司的治理结构遵循的是货币原则，而且要接近西方公司的形式。于是，在一夜之间，前社会主义的公司就按照西方大公司的外形，将自己组织



起来了。

如果没有社会主义管理者和前异议知识分子的联盟，上述观点根本不可能得到系统阐述。“通过公司化的私有化”是一种管理主义的策略，它自上而下地将社会主义转变成资本主义。实际上，本书的一个主要启示就是，将晚期社会主义的管理者看做是腐败、愚蠢和贪婪的群体，是一项普遍但根本错误的主张。显然，“通过公司化的私有化”符合他们的利益，因为这必然会增加他们作为管理者的自由决定权，而且在某些案例中，一些人也会快速致富。但是，如果我们不去理解为什么这些人选择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在分析中或经验上，把他们的个人利益和他们对职业伦理的承诺区分开来。作为负责人，管理者也必须为他们公司和雇员的最大利益工作。这些是“他们的公司”——不是因为它们属于他们，或者说，他们试图攫取公司的所有权，而是因为他们为公司工作，是公司的管理者。

如果说管理者想要的，是使他们的公司私有化，而不是寻找可以辨认的所有者，那么异议知识分子想要的，则是说服人民做出必要的牺牲，以净化这个从共产主义中走过来的社会。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所指出的那样，异议知识分子认为，在这件事情上，不可以再慢慢等待。哈维尔所说的蔬菜杂货商的灵魂必须迅速得到拯救，也正是这个意思；为了做到这一点，甚至可以不惜牺牲他的店铺，即使他可能会因此变得贫困，也得让他生活在真实之中。^① 所以，在知识分子的头脑中，休克疗法不仅是拯救经济的方法，而且还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它的目标，是将社会主义的“人民”变成市民社会的“公民”，也就是说，变成愿意为自己的事情负责的私人性的个体。可是，人民的觉悟却姗姗来迟。民意测验表明，大多数的波兰人、匈牙利人，甚至捷克人，仍然赞同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他们想要更多

^① 哈维尔（1936～），原捷克斯洛伐克剧作家，异议知识分子的领袖人物。他于1989年当选捷克斯洛伐克总统，1993年又当选为新独立的捷克共和国总统直至2002年。“杂货商的灵魂”是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一书中使用的一个极为著名的例子：有一个蔬菜杂货店贴了一个“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这一标语和店里的水果、蔬菜一样，都来自工厂总部，但是杂货商张贴这幅标语，并不是因为他真想告诉公众他的理想，而是在告诉世界：“我，一名杂货商，居住在此地，并知道我应该做什么。我要按照别人所希望的那样去生活。我是可靠的，而且我的所作所为无可指责；我是顺从的，因此有权得到平安的生活。”这条标语表明，杂货商屈从了系统内部的原动力，而这种系统依赖于每一成员的表现。恰恰是这些在很多人看来习以为常的东西，让大部分人，乃至所有人都参与到国家制度的游戏中，使得这个制度能够运转起来。——译者注

的平等，他们认为自己是富人的牺牲品，他们要政府保证他们的就业，他们支持政府提供免费医疗和教育。在这样的情况下，前异议知识分子主张，成功的资本主义转型，首先需要的是人民觉悟的转变。于是，管理者对私有化和公司化的关注，知识分子对净化社会和重新教育人民的诉求，两者联合起来，生产出了来自上层的资本主义。

然而，这丝毫不意味着前社会主义的管理者和前反共产主义的异议人士之间只有合作，没有冲突。在一开始，这就是一种既酸又甜的关系，根源则在于彼此之间的怀疑和深深的不信任。知识分子无法忘记的是，许多管理者过去曾经是共产党员。他们怀疑这些“盗贼统治”国家的管理者会窃取公共财产，并把它们转换成私人财富。在另一端，管理者则认为，知识分子是相当不负责任和不可靠的一种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曾经只是为了一个好评点，或者他们认为新颖的观点，冒着风险工作，甚至愿意去坐牢。不过，尽管他们之间不信任，在后共产主义转型中，管理者和知识分子还是分担了大量工作。正是这些他们共同认可的工作，将他们连接在一起，因为两个群体都认识到，任何一个群体都不可能独自操纵转型的进程。

他们对来自下层的资本主义——亦即由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建设的资本主义——的与日俱增的共同恐惧，则进一步强化了管理者和异议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盟。对管理者和专家治国论者来说，他们看不到来自下层的资本主义究竟有什么意义。它对规模经济没有好处，小生产者也还没有准备好到世界市场上竞争，而且对大多数投资和贷款来说，小商业太冒险。管理者还将来自下层的资本主义，看做是来自上层的资本主义国家政策的竞争者，因为人们在使用资金的时候，要么就是放到国有企业私有化上，要么就是把款贷给打算做新生意的小生产者。同时实行两种策略被认为是不可行的。对知识分子来说，他们认为，来自下层的资本主义是民粹主义的一种形式。他们不喜欢小资产阶级，把后者看做是财迷（money-grubbing），而且他们经常以大众的观点为例，认为这一群体是民粹主义政党的潜在基础。

我们要着重强调的是，这里没有暗示任何的共谋理论。我们正在描述的，主要是不同阶级和精英派系之间的竞争过程，而且最终的结果，可能是任何一个前面提到过的主要行动者都不渴望的一个结局。比如说，这场斗争中的另一个主要行动者就是新政治官僚（politocracy），他们与专家治国论者和民意知识分子一样，是新权力集团领导成员中的一员。作为政客，政治官僚中成员的利益相互混杂。他们面对许多压力，要求



为来自下层的资本主义创造空间，而且，也许他们中的某些人甚至在意识形态上对这一规划赞叹有加。例如，民主论坛（它组成了共产主义之后匈牙利第一届政府的核心）的一些成员，就喜欢玩弄“第三条道路”的观念，而有一种解释就认为，这种观念与来自下层的资本主义的理念十分相似。与此同时，所有中欧国家的政治官僚，都面对要求恢复原状的压力。这些压力中的大多数，都是基于意识形态或合法性的理由而提出的，而且，复原的政策在捷克共和国和东德已经获得极大成功。造成权力精英内部关系不稳定的另一个因素是，在后共产主义转型的早期，新政治官僚曾试图让前共产主义的专家治国论者离开他们的市民服务工作和经济领导岗位。捷克的清除法令和波兰的类似政策，以及共产主义后第一届匈牙利政府对许多最主要的经济专家的解雇，都是共产主义后的早些年里，围绕新权力精英的形成而发生的权力斗争的证据。不过最终，政治官僚们认识到，如果要想巩固自己的权力，它就必须对专家治国论者和管理者做出重大让步。因此，在最初的顾虑之后，新政治官僚支持了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规划。不过，如何具体地通过这一方式实现资本主义，仍然是一件有争议的事情。正如下列事件证明的那样，波兰的自由—保守联盟和匈牙利的爱国基督教政权之所以在第二次自由选举中失败，正是因为他们不能够与各个派系之间达成妥协，而前共产主义的政党和瓦茨拉夫·克劳斯（Václav Klaus）^①，却已经勉强完成了那些利益冲突部分的平衡，并相互之间达成协议。

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是可在相互交换的意义上使用“管理者”和“专家治国论者”这两个概念，但这确实有点简单化了。除了一方面可以将管理者和专家治国论者从知识分子中，以及政治官僚中分离出来之外，另一方面，管理者之间，专家治国论者和民意知识分子之间，也都有着明显的利益冲突。我们说的管理者，特别指的是公司的 CEO，尤其是工业企业中的 CEO。我们说的技术专家，指的是社会科学家、经济学家、管理层专家，以及在银行、市民服务机构、咨询公司中工作的金融专家。虽然管理者与来自上层的资本主义的利害关系也很深，但他们还是愿意看到它以一种渐进的方式实现。至少可以说，他们与休克疗法、激进货币主义以及牺牲和净化等意识形态的关系并不融洽。他们并不介意一个对工业政策进行系统

^① 瓦茨拉夫·克劳斯（1941～）曾任捷克斯洛伐克副总理，1993～1997年担任捷克共和国首任总理，1998～2002年任众议长，2003年当选捷克第二任总统。——译者注

阐述的政府，而且相对于削减预算和货币管制，他们更希望国家社会主义的补贴系统能够得以维系。

前共产主义政党在 1993 年重返波兰，在 1994 年重返匈牙利，因为他们能够，至少暂时能够，调和这些不同的利益，以及和如何沿着资本主义的道路继续前进有关的不同观点。在匈牙利，共产党的继承党不仅得到技术专家的选票，而且得到他们的政治和智力支持。匈牙利社会党在 1994 年大选中获胜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它被看做一个称职的政党，而它的主要竞选口号则是：“支持社会党就是支持称职者。”作为前共产党的继承者，它同样能够确保工业管理者的信心。这一继承来的政党许诺，它将在只有绝对需要的情况下才使用休克疗法，而且它并没有说它们将不会致力于净化的行动。它传递的信息是：继续经济的激进转型、私有化，以及金融整顿，但会对国有企业的需求、它们的管理者，甚至它们的工人给予关心和充分关注。

那么，来自上层的资本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吗？管理者和专家治国论者都声称：是。他们指出，社会主义晚期的来自下层的资本主义是一条死胡同。通过一种共生的方式，第二经济和新出现的私人部门，与国有经济共存，因此，不能指望从中产生出充满活力的发展，进而奔向完全独立的资本主义经济。

只要人们不与别的证据做比较，这些都是非常有说服力的主张。然而，在当代世界中，还有另一条道路，最成功的例子就是 1977 年以后的中国。正如现有证据可以证明的那样，中国就是自下而上地建设市场经济。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部门就是乡村工业。这一工业通常都是小型的；其中的新企业，要么是私有的，要么可以被描述为混合所有制形式，其中可以发现私人所有权的因素。根据中国官方的统计，大约 10% 的非农业国民生产总值（GNP），是由宽泛意义上的私营企业创造的；另外 40%，则来自统计上称为集体或地方所有的企业；剩下的 50% 仍然是由国有企业创造的。这也许低估了私营企业的规模，因为某些所谓的集体企业也许就是私营企业。不过，我们的观点是：私人部门仍然相对较小；它主要由雇佣新人的公司组成；它的生产效率格外高。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这个时候，公共企业的私有化还没有被采纳为官方的政策。在过去 10 年或 15 年里，在没有将它的公共部门私有化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已经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经济；它每年大约增长 10%，尽管事实上它的公共部门基本上处于萧条状态。很难不将中国经济惊人的成就，归功于它自下而上建设市场



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

经济的策略。^① 我们同时要补充的是，在这方面中国大陆效仿了中国台湾的经验。在 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台湾经济中大约一半掌握在公家的手中。与韩国不同，中国台湾将它经济发展的基础建立在家族商业的发展上，只有当这些家族商业积累了足够的资本后，台湾当局才开始将公共企业转移到私人的手中。

中国于 1977 年进入改革期之后，其经济政策的制定者曾认真地研究过波兰、南斯拉夫以及匈牙利的经济改革。在那些地方，正如有证据表明的那样，某些“来自下层的资本主义”正在发生。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没有任何一个东欧和中欧的国家像中国那样，为私人所有权开放那么大的空间，而且很少有人怀疑，中国朝市场方向前进的最初动力来自中欧。把中国的经验记在脑中，人们就会质疑，中欧自下而上的资本主义是否注定要失败。既然共产党的改革者对产权改革只是半心半意，而且不会走得太远，那么它可能不过是一个过渡现象，最终的结果仍然是走进一条死胡同。在中国，成功的关键是她为新的私人商业创造了空间；相反，东欧和中欧之所以停滞不前的原因，是那儿的改革者在是否允许适当的私人商业腾飞起来的问题上裹足不前——他们曾希望通过将决策下放给地方，以及用市场价格调节机制来修理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

在 1989 年，自下而上的资本主义是否就是不可能的？正如专家治国论者和知识分子曾经声称的那样，这一证据已足够对这一问题提出质疑。中欧选择了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并不是完全因为它优越的经济理性。相反，我们主张，这是 1989 年间阶级力量格局的反映。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被我们解释为后共产主义的一种策略。专家政治对官僚政治的胜利、它与知识阶层缔结松散联盟的能力，以及小有产资产阶级的缺陷，都是这种策略的结果。与此相似，在中国，自下而上的资本主义之所以得到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官僚政治和专家政治之间的平衡。如果当时中国的专家

^① 萨克斯 (Sachs) 和吴 (Woo) 指出，中国模式在中欧不可能被复制。中国之所以会沿着一条“双轨制” (dual-track) 的路径前进，是因为它没有过多的社会支出，以及只有很少的外国债务；因此，它可以为农业人口进入新兴私人商业提供渠道。参见 Jeffrey Sachs and Wing Thyee Woo (1996) “China's transition experience, Reexamined”. *Transitions* 7 (3-4): 1-5。乔包 (Csaba) 大体上同意萨克斯的观点，但是认为中欧的经济政治家们应该从中国社会组织的多样性中学到点什么。参见 László Csaba (1995)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form Strategy: China and Eastern Europe Compared*. Budapest: Koping Datory, Discussion Papers No. 34。

政治取代了官僚政治，中国可能也会采取彻底私有化的政策。

在与中国做过比较之后，我们要强调的是：将“中国道路”理想化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虽然它的经济发展的确令人震惊，但中国仍然是一个死板的、压抑的体系，而且还不清楚这一政治体系以什么方式与它的经济成功联系在一起。实际上，中国的政治威权主义也许会阻碍它的经济发展。^①出于这一原因，我们应该对中国的经济策略进行认真监测，从而评估出那些对中欧资本主义转型有意义的东西。

此外，在1989年，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很可能是中欧唯一可行的策略，而且，它也许大大加深了转型期间后共产主义的危机。虽然这一危机的严重程度在不同的国家有所不同，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在转型的最初五年间，大多数中欧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大约30%，大约三分之一的工作机会消失，通货膨胀了两位数。没有一个单独的原因，可以为这场经济灾难负全责；从社会主义经济中继承下来的问题、经济重建的困难，以及经济互助委员会（COMECON）^②的崩溃，都在其中扮演了角色。而“通过公司化的私有化”，则被作为休克疗法的核心加以贯彻，其结果却是导致普遍的痛苦。回想起来，对一个曾经90%都是公共经济的国家来说，宣布公共部门行将灭亡，可能确实不是一个好点子。在宣布所有的企业，不管效益如何，都将被私有化之后，国家私有化管理局设置了一系列障碍，以阻止这些企业的管理层继续往企业中追加投资。可实际上，它的结果是，管理者受到刺激，拼命从公共企业中捞取有价值的生产性资产，尽管那个时候这些企业仍然在国家的掌握之中。而且正如我们业已揭示的那样，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他们自己、他们的家庭成员和朋友，一些

① 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政治理论家接受了下面这一观点：在经济倒退的国家里，民主政治的结构并不适合促进经济发展；他们主张：官僚主义的威权主义体系，反而更适合于这项工作。例如，拉丁美洲问题研究者（Latin Americanist）就将中国的例子与皮诺切特（Pinochet，前智利总统，1973年通过军事政变上台，1990年卸任。——译者注）放到一起讨论。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芭芭拉·盖迪斯（Barbara Geddes）最近关于拉美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的比较研究，挑战了这一被广泛接受的想法。盖迪斯的数据显示，向民主化的转变有利于经济发展（参见 Barbara Geddes [1994] *Politician's Dilemma: Building State Capacity in Latin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联系上下文，我们仍不清楚，在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不过，我们的观点是，不应该假设中国的经济成功是政治威权主义的结果。

② 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是苏联组织建立的一个由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政治经济合作组织。——译者注



管理者开始成立转包合同的公司，并以非常低的价格，将公共企业中最有价值的资产出售给它们。结果是，母公司贬值，迅速走向破产。这都是管理层牟一己之利的做法，如果他们事先预见到一些外来的买家，或者他们自己会购买这些企业的话，那就会变本加厉。事实上，私有化导致撤资，以及工作机会的丧失和生产力的毁灭。也许其中的一些可以被称作“创造性毁灭”，因为它们清除了社会主义的废墟，为现代资本主义企业腾出了空间。然而，更多的毁灭，只不过是从小公司中抽取资源，而且经常是落入私人的口袋，或者成了管理者的炫耀性消费。

综上所述，在没有资本家的情况下建设资本主义，是自上而下创造资本主义的一种策略。它的发明者和实施者，是技术专家—管理精英、新政治精英、民意知识分子三者所组成的联盟。尽管付出了巨大的社会代价，但它毕竟实现了经济的重建，并且为市场和议会民主奠定了基本的制度基础。不过，我们并不相信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是中欧在1989年所能选择的唯一道路。实际上，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解释为什么在世界上的这个地方，资本主义以这种方式出现，而“精英格局”、“内部精英冲突”以及“阶级构成的失衡”，则是最为重要的因素。此外，中欧的社会结构仍然处于不断变动之中。从这一点来看，最重要的悬念是：一个本土的、持有恒产的、对目前的权力集团的霸权将构成挑战的大资产阶级，是否会出现？如果它出现了，它将在什么基础上运用自己的权力，它会由哪些行动者组成？我们相信，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取决于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平衡，以及它们未来斗争的可能结局。

四 结论

这本书并没有暗示说，有产阶级不会在中欧出现。我们也并不怀疑，一个完全制度化的私有产权——正如我们从西方知道的那样——正在形成中。无论如何定义，中欧各国都是资本主义。不过，我们要声称的是：私有产权和阶级关系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未来的资本主义行动者的性质。至于这本书所讨论的转型，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主张的那样，任何一个文化资本的持有者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都是一个转型的社会。文化资本在历史上的角色，经常是革命性的，而且看上去它也不可能将自己制度化为一个稳定体系的支配逻辑。实际上，文化资本的卡里斯玛式规则的常规化，要么将导向一个社会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等级秩序，要么将导

向一个经济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阶级社会，这几乎已经是一种铁律。

我们在这本书中已经提出了许多颇具雄心的主张。第一，我们提出了一个关于社会变迁的新理论。我们相信，通过用“把文化资本视为革命性的历史力量”这一观点取代他的卡里斯玛理论，我们“超越了韦伯化的韦伯”（out-Webered Weber）。第二，我们建议，将进化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新制度主义路径依赖理论，与我们关于轨迹调整（trajectory adjustment）的观点进行综合。第三，我们重建了布迪厄的理论，把它从一个对社会再生产的静态解释，变成一个动态的、能够解释社会变迁的比较历史理论。第四，在于尔根·柯卡“文化资产者”这一概念的启发下，我们重写了知识分子的历史。这是一门新社会学，它将知识分子界定为追求重塑社会的历史规划的一帮人：他们从资产阶级的先锋，变成无产阶级的先锋（反讽性地，成为新阶级），没想到最后，又重新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并且致力于第二代文化资产者的规划。最后，我们最有抱负的一点主张是，我们正在发起一种新的社会学范式，也就是新古典社会学。读者将会对这一观点有所保留，但让我们稍微将它拓展一下，让这场讨论变得更加有趣。

社会学的起源，就是要回答下面这一关键问题：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和特征是什么？社会学的经典理论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现代资本主义或者是一个奇迹，或者是一种必然的产物。在韦伯那里，不同行动者、情景和思想能够集合起来，以最为精致和复杂的构成形式，形成现代资本主义，简直就是一件令人惊异和不可思议的事情。不过，对某些生活在20世纪晚期的人来说，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体系的形成，看上去更像是一种规则，而不是一个奇迹；因为，他们既目睹了共产主义的垮台，也目睹了资本主义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遍地开花。对我们来说，如果资本主义都集中于一个单一的目的，也就是说，如果资本主义被相同的财产关系、一致的市场制度，以及到处完全相同的阶级关系形塑的话，那将会是一场奇迹。新古典社会学就是对这些古典问题的重新阐述。这些问题并不是“什么是资本主义转型的前提？”而是“资本主义转型的不同情况，如何塑造和多样化了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体系？”

所以，新古典社会学的规划，就是要解释资本主义的多样性，以及它们在起源和运作上的差异。做这件事可以有好几种方式。今天的许多社会学家，把关注点放到了前资本主义在制度上的遗产，以及它们如何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出现上。不过，在这本书里，我们将分析的聚光灯打向了别的地方。我们主张的是：资本家阶级——资产阶级——的形成，受到



在特定时空内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类型的深深影响。让我们更加明确地谈谈这里所说的“阶级形成”指的是什么。通过分析性地区分三个问题，我们想提供的是一个关于阶级形成的非目的论观点。^① 第一，一个资本家阶级得以形成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哪些不同的执行者（agents）、阶级派系，以及执行者的联盟，被牵涉到了资本家阶级的形成当中？第二，这些根本不同的群体，它们被带入资本家阶级关系中的模式是什么？换句话说，作为阶级行动者，他们将占据什么样的位置？他们在什么样的制度中施展拳脚？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这些执行者的精神和意识（consciousness）是什么？或者说，这些执行者的惯习是什么？

下面这些人，构成后共产主义时期相互斗争的执行者：前异议知识分子、前共产党的专家治国论者、小企业主、外国投资者、跨国金融和商业组织的技术专家，以及自由主义—民粹主义—前共产主义的政客。在这本书里，我们注意到，这些行动者之间的联盟和冲突在不停地转换，而且还不能确定谁将组成新的资本家阶级，这一阶级将会有多大的权力，以及这一阶级将会与其他有权的行动者，诸如政治精英、外国经济行动者这样的人，建立什么样的关系。

这些不寻常的行动者，在一个始终变动的制度环境中行动。这一制度环境，其实是各种混合所有权关系中的一种。后共产主义的中欧，确实存在与硬预算约束在一起的私有产权，但国有产权（它可能只是在名义上宣称要私有化）也存在。而且，还有许多混合所有权关系的组织，它们把责任推给国家，在复杂的交叉所有权关系中混淆责任，或者通过“转包合同卫星公司”来抽取收入。虽然有价格固定的供给和需求市场，但也有秘密的地下再分配，精明的前共产党官员在里面能够运用他们的旧关系网，使他们的公司免于受到硬预算的约束。政治制度也是在不断变动中。政党吸收党员的时候，仍然要看社会背景。共产党现在把自己看做社会民主党，但却执行最残酷的反劳工政策，为干部—资产阶级（cadre-bourgeoisie）服务。那些前反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虽然声称组成了一个新自由主义的政党，却发现他们在鼓吹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目标。左和右、保守的和自由的观点，仍然在重新协调之中。因此，新资本家阶级，以及后共产主义所有的其他的行动者的形成，仍然充满了竞争。最后，这一地带的最终面貌，取

^① Szelényi and Martin (1988) "The Three Waves of New Class Theories".

决于在一个新的全球资本主义环境中，在对这些制度性资源的争夺中，谁是赢家和输家。不过，与此同时，制度性遗产的负担，以及来自外部的创建新制度和废除旧制度的压力，也许会使某些行动者受益，而使其他人受损。正如我们在本书中过于详尽阐述的那样，问题的要害在于，行动者和制度是相互作用的。

最后我们认为，鼓舞这些行动者的精神、他们所认同的意识，以及引导他们的惯习，也是非常多样化的，有时候甚至是矛盾的。例如，顺着社会主义的梯子向上爬，就是一种惯习。这是一种党员官僚心智，它知道如何应付党组织，以及如何使用意识形态的口号。还有一种共产党改革派，尤其是专家治国论者的惯习，他们认为，如何把事情搞定才是最重要的，而不管什么黑猫白猫。也有一种前共产主义中产阶级的惯习，在共产主义时期，他们隐藏在“暂泊轨道”（parking orbit）中，在他们位于老布拉格或布达丘陵（Buda Hill）^①的资产阶级公寓中，“自生自灭”（internal exile），并且自始至终认为，“做事情的老办法”才是做事情的正确办法；在波兰和匈牙利，这一惯习也许是贵族的特征，而在捷克，它则是小资产阶级的特点。还有异议知识分子的惯习，它既有新左派对被压迫者和穷人的同情，也有对最为教条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如同新入教者般的虔诚，是一种混合的构成；知识分子以一种几乎受虐的方式，与这两种信奉所产生的二律背反做着斗争，努力说服自己相信这两种思想都是道德的，都是自己“生活在真实中”的方式。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指出，“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形成”是相因而生的；而且在前面，我们已经揭示了产生它的各种机制。不过我们的读者仍然很可能感到疑惑，后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究竟与别的资本主义有哪些不同？用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的话来说，就是“牛肉在哪里”。^②只要资本主义建成了，谁关心是谁建造的呢？然而，我们恰恰要

① 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素有“东方巴黎”之称，由位于多瑙河西岸的布达（Buda）、东岸的佩斯（Pest）和欧布达（Obuda）三个地区组成。其中，布达地区群山环绕、历史悠久，曾是资产阶级活动集中的地方。——译者注

② 对那些也许不曾密切关注美国竞选运动的非美国学者来说，要注意的是，这是1984年的总统选举中，沃尔特·蒙代尔援引的一条麦当劳的商业广告。在广告中，一个老太太去一家不属于麦当劳连锁的汉堡店，她看着对方的汉堡，问：“那么，牛肉在哪里呢？”蒙代尔用这个句子对他的竞争对手提出了质疑：你其实并没有规划。你问的正是：“牛肉在哪里？”（从字面上来翻译，这句话的意思是：牛肉在哪里？但实际上蒙代尔的意思是：你不要尽说空话，我们要问的是，实质性的东西在哪里？——译者注）



指出的是：资本主义的各个体系之间，确实有质的差异。

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完成这一工作。我们在这里能够提供的，只是一个基本的研究议题，它就是对资本主义进行比较研究的新古典社会学。它要比较的，是不同的资本主义体系，它们的阶级关系、制度安排和社会结构的特征，或者它们社会空间的形塑。曾有一套拿别的资本主义（例如拉美、日本和东亚的资本主义）与北美或者北大西洋观点做比较的丛书。这套丛书关注的，是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不同作用、财产关系的特点，以及阶级结构的特点。我们在这本书中所提出的后共产主义的研究类型，就建立在这一传统之上，不过对它有所拓展，而不是仅仅给资本主义的类型做地理上的命名。在表5-1中，顺着三个维度，我们提供了一个十分简化的纲要，比较了三种类型的资本主义：“传统核心”（the “Classic Core”）、“新核心”（the “New Core”），以及“后共产主义”（这一表格并没有包括世界上通常被认为是“边缘”^①，或“第三世界”，或“后殖民国家”的地方，因为那一现象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多样化，以至于即使用如此纲要性的方式，也不能做出完全的概括）。表5-1可以被理解为，我们在为比较资本主义研究定义“自变量”：集体行动者为之斗争的、限定了他们的“东西”是什么？行动者在其中持有的是哪一种惯习？他们如何“适应”现存制度，以及他们如何重新塑造它们？

同时要注意的是，表5-1应该在相互对比中加以理解。例如，如果我们提出，“传统核心”的工人阶级是“小规模的和组织良好的”，这指的是在与“新核心”和“后共产主义”的对比中所描绘的工人阶级。与30年前的情况相比，“传统核心”中的工人阶级在组织上已经衰落了很多，但与“新核心”和“后共产主义”中的工人阶级相比，它仍然是“组织良好的”。

那么，是什么塑造了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特征？从阶级关系的方面

^① 我们也试图摆脱世界体系理论的术语。核心、半边缘、边缘的思想，预先假定存在一个由不同部分组成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这样一个体系中，一个部分“剥削”另一个部分，一个部分的发展意味着另一个部分的停滞。我们的目标却与此大不相同：我们要将资本主义看做各种形式或类型，它们相互之间既是纵向又是横向联系在一起，但同时，每一个部分又拥有它自己的，至少是相对自主性的存在。

来说，后共产主义都是本土有产资产阶级弱小^①、知识阶层却很强大的社会，且后者已经成功抵制了将它职业化的历史压力。从制度安排的角度来看，后共产主义的社会可能由大而弱的国家来塑造——戴维·斯塔克已经将其称为后共产主义的“非发展国家”。它们的财产关系也很特别：虽然私有产权大体上来说正在形成，而且公共产权正在快速地撤退，但私有化也经常导致重组的资产、半政府的所有权以及混合所有权的出现。最后，从社会空间的决定因素来看，文化资本都处于支配地位，并且与社会资本相互补充；虽然经济资本的重要性也日益突出，但从决定权力和特权的分配这一点来看，它仍然是第三位的。

让我们使用表 5-1 中的对比，来简洁地阐述一下我们所认为的后共产主义结构的持久特征可能会是什么样。在几乎任何一个我们能够替中欧想象到的情节中，本土资产阶级都将是羸弱的。主要的原因是，即使在文化资产者已经完成他们的任务、一个持有恒产的资产阶级已经充分形成之后，知识分子仍然将是中欧社会中一个重要的部分。中欧知识分子将一直不停地为自己发明新的历史规划，亦即改造社会的新任务。在这一方面，后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将更类似于德国和法国，有着强大的知识分子传统，并且与日本或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资本主义有很大不同。

我们认为后共产主义的本土资产阶级将很弱小的第二个原因是，继承自共产主义时期的各种惯习，将妨碍未来的财产所有者走向独立自主。虽然我们尚不清楚新资产阶级的社会起源，但是我们知道，许多追求资产阶级地位的行动者，他们的惯习，深深地扎根于过去的共产主义。只要有一丁点可能，他们就不会成为熊彼特所说的企业家的完美典型。他们擅长的是钻空子，去寻找有权势的保护人，或者动员受他们救济的对象。考虑到社会资本延续的重要性，我们认为，在这一方面，后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会更加类似于日本或美国，而不是西欧。

我们认为后共产主义的资产阶级将很弱小的第三个原因是，与从封建关系中诞生出资本主义的其他国家相比，中欧各国的政权更有可能会影响资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例如在英国，资本家阶级的形成基本上是一个积

^① 写到国家和阶级时，我们使用了大/小（big/small）和强/弱（strong/weak）的区分。第一个指的是现象分布的范围；第二个指的是它的目标、它执行政策的能力。所以，一个国家可以是小的，但在执行它的政策时，却非常有效率。它也可能是大的，运转着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但这并不能保证它能够有效地征集税收、维持秩序、提供公共物品；因此，弱和大可以同时并存。



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

累问题。资本家行动者们积累资源，请求国家解除法律的限制，从而使得他们能够扩大和进一步享用他们的资本。相反，中欧的任务是私有化，而不是积累。积累发生在国家社会主义时期，而后共产主义的任务则是把它私有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能够使人一夜暴富，而这也许正是我们于1993~1996年间，在匈牙利中小企业所有权发展期间所看到的東西。而且，与东亚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它们干涉市场以创造经济增长），中欧的新家长统治看上去采取的是一条增值的增长策略，也就是说，强化家长统治的力量，而不是从一个有权势的资本家阶级中获得相对自主。所以，虽然中欧的政府并不一定很强（strong），但却非常大（big）。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国家社会主义垮台之后，反斯大林主义的后共产主义政府官僚仍然在成长，且经常以“私有化”官僚政治的形式出现。实际上，一些经济学家已经指出，从私有化中获得的收入，大概和管理私有化的消耗一样高——这是我们所说的大而弱的国家（a big, weak state）的一个好例子。简言之，我们现在对中欧的预测是：一个小而弱的持有恒产的资产阶级，在一个大而弱的国家的框架内运作，而这个国家又处在一个大而强的文化资产者的注视之下。

表 5-1 比较资本主义的新古典社会学的一项研究议题

		传统核心	新核心	后共产主义
阶级关系	有产阶级	规模大、强大	规模大、强大	规模小、软弱
	工人阶级	规模小、组织良好	规模小、组织不佳	规模大、组织不佳
	知识分子	规模大、职业化的	规模大、官僚化的	规模大、非职业化的、非官僚化的
制度	国家中的各种关系	不重要、弱	重要、强	重要、弱
	产权	界定良好的私人产权	私人产权与交叉产权互补	重组的资产，与衰败中的公共产权和正在兴起的私有产权共存
资本的分布	支配性资本	经济的	经济的	文化的
	被支配的资本	文化的	社会的	社会的
	从属性资本	社会的	文化的	经济的
例子		美国	日本	匈牙利
		英国	中国台湾	捷克
		法国	韩国	波兰

附录 I^① 数据来源：1989 年后 东欧的社会分层

1990 年，伊万·塞勒尼、索尼娅·塞勒尼和唐纳德·特雷曼在“1989 年后的东欧社会分层”的名目下，发起了一项大规模的比较调查计划。这项研究的资助来自国家科学基金会、苏联和东欧研究全国委员会、荷兰国家科学基金会、匈牙利国家科学基金会、捷克国家科学基金会、加州大学全球冲突和合作研究所、加州大学德国和欧洲研究中心、东欧研究学会美国委员会和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联合理事会。这一调查于 1993 ~ 1994 年在伊万·塞勒尼和唐纳德·特雷曼的指导下进行。

这是一个合作的计划，每一个国家的协调人每年大约聚会两次，来设计研究、完善问卷、调整田野工作的步骤以及田野工作后数据的处理，并分析数据。这些国家团队主要成员的情况被列在下面，而协调人的前面则标上了星号（*）。

保加利亚

* 迪米崔娜·彼得罗娃 (Dimitrina Petrova)，社会和环境研究所
茨维坦·马尔科夫 (Tsvetan Markov)，索菲亚大学

捷克共和国

帕维尔·马霍尼 (Pavel Machonin)，社会学研究所，捷克科学院
* 彼得·马特于 (Petr Mateju)，社会学研究所，捷克科学院
米兰·图伊克 (Milan Tucek)，社会学研究所，捷克科学院

① 拉里·金为这些附录的编纂提供了帮助。



匈牙利（协调人：伊万·塞勒尼）

安道卡·鲁道夫（Rudolf Andorka），布达佩斯经济学院和匈牙利全国科学基金会

卡特琳·豪纳克（Katalin Hanák），社会学研究所，匈牙利科学院

柯洛什·陶马什（Tamás Kolosi），匈牙利社会研究中心（TARKI）

柯瓦克·伊姆莱（Imre Kovách），政治学研究所，匈牙利科学院

劳达尼·亚诺什（János Ladányi），社会学研究所，匈牙利科学院

彼得·罗伯特（Péter Robert），匈牙利社会研究中心

蒂马尔·亚诺什（János Timár），Median^①

波兰

亨利克·多曼斯基（Henryk Domanski），社会学和哲学研究所，波兰科学院

卡齐米日·斯洛姆兹尼斯基（Kazimierz Slomczynski），俄亥俄州立大学和波兰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埃德蒙·符努克-利平斯基（Edmund Wnuk-Lipinski），政治学研究所，波兰科学院

* 雅克·瓦西莱夫斯基（Jack Wasilewski），杰格隆尼大学（Jagellonian University）和波兰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

俄罗斯

* 卢德米拉·卡库莉娜（Ludmila Khakhulina），俄罗斯公共舆论研究中心（VCIOM）

娜塔夏·叶赫舍娃（Natasha Yershova），俄罗斯公共舆论研究中心（VCIOM）

斯洛伐克

* 杨·邦卡（Jan Buncak），社会学研究所，斯洛伐克科学院

^① Median 是一家公共性的民意调查公司。——译者注

荷兰

* 哈里·甘泽布姆 (Harry B. G. Ganzeboom), 乌得勒支大学 (Utrecht University)

杨·范韦索普 (Jan van Weesop), 乌得勒支大学

美国

波洛茨·尤若夫, 拉特格斯大学

伊万·塞勒尼,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索妮娅·塞勒尼,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阿克斯·罗纳-塔斯, 加州大学圣迭亚哥分校

* 唐纳德·特雷曼,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生研究助理:

吉尔·伊亚儿

伊娃·佛多尔 (Éva Fodor)

埃里克·汉利 (Eric Hanley)

埃里克·科斯特罗 (Eric Kostello)

马太·麦克基弗 (Matthew McKeever)

莎拉·沙茨 (Sara Schatz)

谢尔盖·西比尔舍夫 (Sergei Sibirtsev)

自 1989 年以来, 东欧和中欧的后共产主义社会已经经历了大规模的社会变迁。这一调查的目的, 就是在后共产主义转型期间社会分层的逻辑中, 记录和分析这些变迁。尤其是, 我们试着去发现这一时期精英的人员构成是否发生了改变。为了调查这些问题, 我们首先在六个国家 (保加利亚、捷克、匈牙利、波兰、俄罗斯和斯洛伐克) 的成年人口中抽取了一个随机样本。接着, 由于我们对社会等级制中高层的变化尤其感兴趣, 我们在其中五个国家里抽取了过去和现在精英的样本。到了 1997 年的春天, 除了斯洛伐克 (那里的精英调查目前正在进行中), 所有国家中的调查数据都已经到手。下面, 我们将会对调查的这两个部分做一个简单的描述。需要注意的是, 这本书第四章中所分析的大量数据都来自捷克、匈牙利和波兰的精英调查, 少部分则参考了这些相同国家中的总



体样本。

I 总体样本

作为“1989年后东欧社会分层”规划中的一部分，样本调查于1993年和1994年在六个国家进行：保加利亚、捷克、匈牙利、波兰、俄罗斯和斯洛伐克。在每一个国家，我们通过私人访问，调查了大约5000个成年人口成员的全国概率样本。问卷重构了回答者的生活史，产生了一个包括他们的社会出身、职业、教育、党员历史，以及他们父辈和祖父辈的财产所有权在内的完整的活动史（activity history）。

要注意的是，虽然各国小组可以在问卷的末尾自由添加地方性的问题，但问卷的设计者要求，问题的措辞必须精确、可比较。只有当这些变动在全国环境中具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回答选项的变动才是被允许的（例如，不同的宗教分布）。为了确保比较，问卷被翻译成各国的地方语言，然后被回译成英语。接着，翻译回来的版本被一个含多种语言的小组作为一类用来比较，措辞中的不符之处就被改正过来。尽管我们有最好的设计，还是有一些次要的变动悄悄混进了问卷之中，但大部分因素是具有高度可比性的。

II 精英调查

作为“1989年后东欧社会分层”规划中的一部分，在所有国家中，我们也访谈了过去和现在的精英成员。

在每个国家，我们都抽取三份精英的随机样本。

党国精英样本是一个由1000人组成的随机样本，他们到1988年1月为止都还占据着党国精英的位置。

新政治和文化精英样本是一个由400人组成的随机样本，与那些被定义为党国精英的人所组成的名单类似，他们都是政治和文化决策位置的在职者，只不过在职的时间是1993年1月。

新经济精英样本由600家访谈企业的CEO组成，他们是从每一个国家3000家最大的商业组织（工业企业、商业和金融机构）中随机抽取出来的。

1. 定义精英总体

(a) 党国精英

在所有共产主义国家中，大多数被任命担任权威职务的人，需要首先被批准成为共产党员。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每隔固定的时间，就审议一次这些职位的名单，通常是每十年两次。简而言之，他们控制着这些位置的名单，或者将这项工作授权给中央委员会的各个机构。这些名单曾经作为“高度机密”文件，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中秘而不宣，但是现在，它们却能在党的档案中很容易找到。在这些名单中被隐藏起来的职位，就被叫做“党国精英”（*nomenklatura*）职位。

在不同的国家和时间里，“党国精英”这一概念有着不同的用法。不同国家的共产党对这些位置的不同数量和层次进行控制，而“党国精英”这一概念在中欧和东欧的文献中也以不同的面貌出现。出于这些原因，估计出每个国家曾经有多少“党国精英”的职位是十分困难的。如果我们将“党国精英”定义为所有那些党组织有权去否决任命的位置的话，那么一个非常庞大的人口比例都将有资格作为“党国精英”；例如，所有管理监督别人的职业和人员都将被归入这个定义。

由于这一原因，我们为“党国精英”选择了一个非常狭隘的定义。我们将“党国精英”的成员定义为：其职位需要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某一机构任命的在职者。这一机构可能是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一群被选举出来的、高贵的党员，每隔固定的时间，通常是一年不少于一次，作为党的一种“议会”，聚在一起开会）、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执行机构，其成员从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中选举产生，是一个固定的委员会，像议会政体的“内阁”一样，通常每周聚会一次），或者中央委员会各机构的书记，或者这些机构的其他官员（他们是附属于共产党的国会系统中的文职官员）。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中央委员会这一概念，既指的是共产党被选举出来的最高立法机关（例如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也指的是中央委员会的各个机构，包括书记处、不同部门的领导和官员，以及全职的党工（他们中的某些人也是被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出来的）。

还要注意的，“党国精英”的位置有两种类型。第一种，大多数“党国精英”是“职务”或者工作。例如，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书记或者部委的分管领导都是全职的工作。相反，其他的“党国精英”位置，是那



些被选举出来的在职者的位置，而这并不是他们的主要职务。第二种“党国精英”的位置甚至也许没有任何收入来源。一些议会议员就属于这一类别，国家科学院的某些成员也是如此。“党国精英”位置两种类型间的差异导致了一些有趣的后果。一个后果是，从他们自身工作的角度看，我们“党国精英”样本中的许多成员根本就不是精英。在议会议员，以及特别是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当中，人们就能够找到那些主要工作和收入来源是体力工作的个人。与此相似，科学院的某些成员在没有任何管理监督的情况下拥有日常职业工作。第二个后果是，一些人同时是好几个“党国精英”位置的在职者。例如，有些人可能同时是科学院的成员、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一所大学的校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如果同一个人被抽中超过一次以上，他被抽中多少次，我们就输入多少次他的数据。每一个国家的访谈小组都报告说，在他们的国家有好几打这样重合的选项。

1992年12月，从所有国家调查组而来的专家在布达佩斯聚会，审核这份“党国精英”名单。每个国家的调查组被要求带来尽可能多的、他们能够从党的档案中找到的不同时期的“党国精英”名单。

我们收到了这些名单，发现虽然它们很相似，但在不同时间和国家也有很大的变化。例如，在匈牙利，最长的“党国精英”名单起作用的时间是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到70年代早期，那个时候大约3000个位置被共产党监控。到80年代中期，这减少到大约600个。只有特大型企业管理者的任命需要中央委员会的批准。在波兰则相反，直到20世纪80年代，好几百个管理者的岗位仍然在“党国精英”的名单上。另一个例子是：匈牙利仔细地监控着武装力量和警察的任命，而波兰，党却在这些领域的人事上控制得很少。

出于所有这些原因，为了保证跨国的比较，我们发展出了一个“理想型”的“党国精英”名单。这一思想试图捕捉“共产党的思维逻辑”。在1992年布达佩斯的会议上，各国调查组就这份名单应该看上去像是一个什么样的概括性提纲达成了共识。我们决定广泛地铺开我们的网络，开发出一份包括我们所研究的各个国家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曾监控过的所有位置在内的名单。

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做出许多艰难的决定。第一，我们决定从总体中将军事领导人排除出去，即使在共产主义时期他们在大多数国家都是“党国精英”成员。这一决定的依据是，很难通过名字确认这些“党国精

英”成员（尤其是在克格勃和中欧各国相同组织的案例中）。此外，我们怀疑我们是否有能力去找到他们的住址，而且即使我们能做到，我们想这些人也不太可能愿意接受我们的访谈。

第二，在每一个国家里，界定谁属于“经济干部”的指导准则相对较少。在这里，我们决定用波兰作为基准，因为它是对“经济干部”界定得最为宽泛的国家。我们试图确认共产主义晚期400~500名最为重要的经济参与者。通过将每个国家中大约50个最为重要的公司中三或四个最主要的董事包括进来，我们做到了这一点。对于这份名单来说，我们还增加了200个“次为重要”的、拥有“专线电话”的国内公司。在共产主义国家，众所周知的，电话系统是靠不住的，所以，权力的主要中心通过一个特殊的、工作得更有效率的电话系统联系起来。专线电话的持有者，包括经济企业，都有一个高度机密的电话本。我们也将这个高度机密的电话本上所列企业的CEO作为我们“党国精英”总体的成员。

最后，在那些共产主义崩溃之后发生分裂的国家——在我们的案例中是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和俄罗斯——有一个附加的问题。我们指的是哪一个国家的“党国精英”呢？是捷克斯洛伐克还是仅仅指捷克？是苏联还是仅仅指俄罗斯？我们决定以捷克、斯洛伐克和俄罗斯共产党的“党国精英”为起点，开始我们的工作。因此，这个总体被界定为“民族国家的”，而不是“联邦的”党国精英。

(b) 目前的（1993年）政治和文化精英

与共产体制下的党国精英相比，对当前政治和文化精英总体的界定要模糊一些。对党国精英而言，在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时候，我们的共产主义集体意识可以得到客观地表现。我们可以说，这份党国精英名单告诉我们，在一个共产体制的政权里，人们认为这个国家里的哪些高层权力职位最为显赫。然而，在后共产主义体制下，却不存在这样一份关于最重要决策职位的指南；因此，我们决定改造党国精英的名单，让它在后共产主义的情境下发挥作用。以党国精英名单为出发点，我们删除了那些不再存在的职位（比如党务机构中的位置），然后增加了一些看上去其重要性与之前机构不相上下的新组织（比如，国家私有化管理局中的职位）

这种对当前政治和文化精英的界定并不完美。一些在转型过程中曾一度非常重要的位置并没有包括在内，其中最重要的例子莫过于显赫的牧师。虽有不妥，但我们并没有将神职人员归入我们对新精英的界定之中。另一个棘手的范畴，是国家科学院的院士。虽然他们曾是共产主义党国精英的



一个组成部分且党密切监控着那些可能被选入这个机构的人员，但在向后共产主义转型之后，这些人的权力和特权受到了极大地削弱。不过，出于可比性的考虑，我们还是将院士们留在了精英总体之中。作为这些决定的后果，与1998年党国精英的样本数相比，1993年的精英样本数缩小了很多，而党国精英的总体数则大概是当前新政治和文化精英总体数的两倍。

(c) 1993年时的新经济精英

我们将当前的新经济精英定义为每个国家里最大的3000家企业的CEO。我们之所以选择3000这个数字，是为了在分析时保证足够大的经济精英样本数，因为我们并不认为可以依赖全面总体样本（general population sample）来得到这些数据。相反，我们相信，1993年时未能挤进3000强的企业已经够多，这些企业的运营者可以在全民总体样本中得到充分地表现。

对最大公司的界定也颇费思量。我们要求各国的研究团队去咨询各自的统计机构并索取1992年时产值最高的3000家企业的名单。我们试图避免使用雇员数来衡量公司的规模，为的就是不让那些垂死的大型国有（或前国有）企业得到过度地表现，并确保我们能够挑选出那些虽然雇员人数相对较少但更为盈利的公司。我们曾经考虑过按照国有企业、被私有化的企业和私营企业（这个范畴指的是创业时就为私人所有的企业）这三个范畴分开抽取样本，但我们后来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对后共产主义国家产权关系的研究表明，真实的产权关系与纸上写的合法的产权有很大的不同。

2. 抽样程序

在1992年10月的布达佩斯会议上，我们决定，确定不同精英名单的细节需要由一个工作小组来承担。伊万·塞勒尼担任这个工作小组的领导，另外两位成员则包括MEDIAN的蒂马尔·亚诺什（János Timár）和来自政治历史博物馆的一名专家，拉斯洛·胡柏（László Hubai）。该小组以匈牙利为例，建立了一个“主精英名单”（详见本书中的附录II）。这份匈牙利“主名单”于1992年11月完成，并寄发给各国的研究团队。在开始他们的抽样流程之前，每一个研究团队在规定的期限内，将适应本国国情的“主名单”寄回UCLA。当这些“调试版本”得到在UCLA的研究领导者审阅和批准之后，各国团队才开始他们的抽样工作。

实际抽样的准备工作在所有的精英总体按照这个方法得以界定之后开

始。作为第一步，我们对总体中的所有职位进行“姓名确认”，也就是说，每个国家的团队要搞清楚每个职位的在职者的姓名。虽然就确认当下精英的姓名而言，这是一份相对较为容易的工作，但确认党国精英的姓名却是费时费力。在这项姓名确认流程结束之后，我们从每一个总体中抽取出一份随机样本。

精英的样本被划分为各个层级（strata）。在大多数国家的数据库中，这些层级被编码为不同的“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波兰和俄罗斯的团队则使用了更加详细的分类方法，亦即将精英们按“层级”编码。

针对“党国精英”，我们建立了如下的变量：

- i. 党务高干
- ii. 级别相对较低的党务官员
- iii. 议员；政府官员
- iv. 地方政府官员
- v. 群众组织精英
- vi. 经济组织精英
- vii. 文化、科研和宣传机构精英
- viii. 外交事务精英

当前政治和文化精英的层级如下：

- i. 议员、政府官员
- ii. 地方政府官员
- iii. 文化、科研和传媒机构精英

需要注意的是，从界定上来说，新经济精英是一个单独的层级，而且事实上，这个层级构成了一个单独的样本。

我们要求各国的团队将每一个样本看做是一个分层化的实体，因此，在地址无效、拒访或其他类似的情况发生时，我们可以用同一个层级中的其他对象来替换。在挑选出样本之后，下一步就是查找出每一个职位在职者的住址。对研究党国精英而言，这本身就是一项艰巨的研究任务。针对当前的精英，我们则使用他们的正式地址进行联络，然后与被访者预约何时何地适合去做访谈。

3. 田野工作

匈牙利和波兰的田野工作分别于1993年的晚春和初夏开始；在俄罗斯，田野工作则延长到了1993年的秋季和初冬。捷克共和国和保加利亚境



内的访谈在 1994 年间展开。斯洛伐克的田野工作当前（1997 年 4 月）正在进行。

我们的理解是，从事田野工作的访谈员也就是那些访谈全面总体样本的人；因此，在这项经验研究项目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受过良好的训练（我们要求每一个国家的团队从全民总体样本那里开始他们的研究）。不过，由于我们手上并不掌握详细的田野报告，因此，在没有书面报告的情况下，我们也不知道回复率到底有多少。我们的理解是，成功访谈率大约在 50% 左右。

大多数失败的访谈是由于联系方式错误、变更，以及调查公司无法找到对象当前的联系方式。我们被告知，寻访较低层级党国精英的联系方式尤其困难，其中最困难的，是那些大型企业的党委书记。虽然我们对样本的分层应该能够保证不同层级回应率的差异不会影响样本的代表性，但是我们的结果仍然有可能偏重于较高层级的党国精英。拒访率大约在 10% 左右，与全面总体中的拒访率相当。尚没有证据表明某一个特殊群体的拒访率尤其突出。执行田野工作的机构声称，一旦他们找到联系方式，他们就能很好地把握机会来完成访谈。就 1993 年时的新经济精英和高层人物而言，虽然安排访谈很费时，但在所有这些层级中，接受访谈的意愿却惊人得高。不过捷克共和国似乎是个例外。在经济精英中有 30% 的拒访率，而公务员中的拒访率则高达 80%（同样令人惊奇的是，同样是在捷克，民选官员的回应率却接近 100%）。

4. 跨国可比性的问题

经济精英

就我们目前所能评判的而言，抽样流程中最为严重的偏差发生在经济精英身上。

(a) 老经济精英

我们在捷克共和国的合作者并没有按照我们的设计开展工作，他们也没有确认谁在 1988 年时是经济精英。他们从现有的企业中抽取出一个样本，然后将“老经济精英”界定为那些 1988 年时在这些企业担任经理职务的人。结果是，我们没有办法从 1988 年的捷克经济精英中对流出率做出评估。

俄罗斯所提供的老经济精英样本数非常小，而且我们尚不清楚为什

么会是这样。我们也许可以从俄罗斯党国精英的总体规模上得出一点解释。在其他国家，党国精英的规模在3000~5000人之间，但在俄罗斯超过了1万人。由于各国的公司样本数相同，而俄罗斯的党国精英规模却很大，因此降低了在俄罗斯从中挑选出老经济精英成员的可能性。不管怎么样，我们没有理由去怀疑俄罗斯的样本在高级经济精英那里有很好的代表性。

(b) 新经济精英

波兰的做法与我们所设计的流程相差最大。Poles从区区600家大型企业中选出200家作为样本，并访谈了三位高级官员。其结果是，与其他国家的样本相比，波兰新经济精英样本中经理人所在的企业要大得多。

各国对企业规模的界定也有所不同。只有匈牙利按照年产值的大小界定了3000家最大型的企业。在捷克，企业规模按照雇员数来衡量，而在波兰和俄罗斯，产值、利润和雇员数被综合起来界定企业规模。在我们看来，每一个国家的团队都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来界定其所在国家最大的企业，但他们所能获得的统计资料各不相同，因此他们不得不在自己所能掌握的信息限度内开展工作。

党国精英和当前的政治和文化精英

在所有被调查的国家里，这些精英的总体似乎十分接近。我们可以察觉到的主要差别是，捷克的精英总体未能纳入外事官员；不过由于这是一个很小的范畴，因此似乎不会对新老政治和文化精英之间的可比性构成重大的冲击。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在捷克，党国精英中的国家官僚的代表性有很大不足。在其他国家，国家官僚占有所有精英样本的大约10%，但在捷克，这一数字只有2%。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首先，我们对保加利亚知之不多。保加利亚的数据库既没有“组”也没有“层级”变量；它只是标明了哪些被访者属于党国精英、新政治和文化精英以及新经济精英。在这一点上，我们很难去评价保加利亚在多大程度上严格遵守了抽样指南。其次，我们应该注意到，匈牙利、波兰和俄罗斯的数据可比性最强（当然，它们也存在问题，尤其是波兰对新经济精英的界定存在偏差）。第三，根据上述的可比性问题，我们建议，如果有人想继续拿捷克和保加利亚的数据与其他国家的数据做比较，就必须特别小心（关于跨国精英样本结构之间的比较，请参见表A）。



表 A 五个国家精英样本结构的比较数据
(访谈员实际完成的)

	保加利亚	捷克	匈牙利	波兰	俄罗斯
“党国精英”					
全体	899 (48.5%)	734 (37.3%)	812 (46.6%)	860 (48.7%)	850 (47%)
党的高层		55 (2.8%)	24 (1.4%)	45 (2.5%)	61 (3.4%)
党的基层		37 (1.9%)	132 (7.6%)	111 (6.3%)	94 (5.2%)
国家		47 (2.4%)	206 (11.8%)	171 (9.7%)	238 (13.1%)
地方		36 (1.8%)	39 (2.2%)	72 (4.1%)	16 (0.9%)
群众组织		15 (0.8%)	99 (5.7%)	64 (3.6%)	61 (3.4%)
经济		384 (19.5%)	102 (5.9%)	236 (13.4%)	61 (3.4%)
文化		154 (7.8%)	187 (10.7%)	118 (6.7%)	214 (11.8%)
外事		6 (0.3%)	23 (1.3%)	43 (2.4%)	105 (5.8%)
新政治和文化精英					
全体	561 (30.2%)	439 (22.3%)	353 (20.2%)	371 (21.0%)	366 (20.2%)
国家		159 (8.1%)	161 (9.2%)	190 (10.8%)	148 (8.2%)
地方		18 (0.9%)	33 (1.9%)	90 (5.1%)	79 (4.3%)
文化		262 (13.3%)	159 (9.1%)	91 (5.1%)	139 (7.7%)
新经济精英					
全体	394 (21.3%)	800 (40.5%)	578 (33.2%)	534 (30.3%)	596 (32.9%)
合 计					
混合精英样本	1854 (100%)	1973 (100.1%)	1743 (100%)	1765 (100%)	1812 (100.1%)

注：由于凑整，数字也许并不能合计成100%。

附录 II 精英总体的“总清单”

由拉斯洛·胡柏与伊万·塞勒尼和蒂马尔·亚诺什合作汇编

1992年2月

一 党国精英 匈牙利

截至1988年1月

I.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

- 1 中央委员会（包括政治局委员）…………… 合计107人
- 2 中央委员会各机构…………… 合计79人^①
 - 2.1 中央委员会书记（总书记1人；副书记1人；书记7人）
 - 2.2 宣传部（部长1人；副职4人；司局级分管领导7人）
 - 2.3 经济政策部（部长1人；副职4人；司局级分管领导6人）
 - 2.4 组织部（正职1人；副职3人；司局级分管领导3人）
 - 2.5 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正职1人；副职1人；司局级分管领导1人）
 - 2.6 外事部门（正职1人；副职4人；司局级分管领导1人）
 - 2.7 经济事务部门和党的内务部（正职1人；副职2人；司局级分管领导6人）
 - 2.8 政治和群众组织部门（正职1人；副职3人；司局级分管领导4人）

^① 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分工部门的正职也是上一级部门的副职。在这些例子中，他们被归为较高位置那一类。



2.9 科学、文化和教育部门（正职1人；副职2人；司局级分管领导4人）

2.10 中央控制委员会各机构（正职1人；副职1人）

2.11 《社会研究》杂志（正职1人；副职1人；司局级分管领导1人）

2.12 《党的生活》杂志（正职1人；副职1人）

3 州级党组织^①和拥有州级行政地位的其他组织 …… 合计227人

3.1 州级党的委员会

（第一书记19人；书记57人；部门正职114人，包括党校，亦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的院长们）

3.2 布达佩斯党委

（第一书记19人；书记4人；部门正职7人，包括党校，亦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的院长们；部门副职15人）

3.3 “州级”组织

（内务部党委：第一书记1人、书记2人；边境防卫部队党委：第一书记1人、书记1人；外交部党委：第一书记1人、书记2人；军队中党委：第一书记1人、书记1人）

4 党办企业主管 …… 合计5人

（报纸和期刊的出版公司；哥舒特出版社，亦即党的出版社；运输公司，以及处理党的公车的企业；Reflektor出版社，亦即哥舒特出版社商业性的子公司；Szikra印刷厂，亦即印刷党的文献和出版物的工厂）

5 中央党校 …… 合计28人

（校长1人；副校长2人；部门正职12人；非部门领导的教授13人）

6 党的研究机构的领导 …… 合计6人

6.1 党史机构

（主管1人；副主管2人）

6.2 社会科学机构

（主管1人；副主管2人）

7 各部委党委的书记 …… 合计14人

8 大企业党委的书记 …… 合计130人

^① 匈牙利的行政区划是，全国划分为首都和19个州，有22个州市，州以下设市、乡。首都布达佩斯。——译者注

(50 个最大的企业，以及所有包括在“专线指导”内的企业)

9 大学和学院党委的书记…………… 合计 72 人

总计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 668 个职位

II. 群众组织

1 工会…………… 合计 147 人

1.1 矿工工会

(主席 1 人; 秘书长 1 人; 副主席 2 人; 书记 3 人)

1.2 皮革工人协会

(主席 1 人; 秘书长 1 人; 副主席 3 人; 书记 2 人)

1.3 卫生工人协会

(主席 1 人; 秘书长 1 人; 副主席 2 人; 书记 3 人)

1.4 食品加工工业工人协会

(主席 1 人; 秘书长 1 人; 副主席 1 人; 书记 2 人)

1.5 建筑业、建筑材料生产和木材加工工业协会

(主席 1 人; 秘书长 1 人; 书记 3 人)

1.6 地方工业和市政管理中工人的工会

(主席 1 人; 秘书长 1 人; 副主席 1 人; 书记 3 人)

1.7 商业、金融和旅店、餐饮、旅游行业中工人的工会

(主席 1 人; 秘书长 1 人; 副主席 3 人; 书记 3 人)

1.8 公务员工会

(主席 1 人; 秘书长 1 人; 副主席 2 人; 书记 3 人)

1.9 运输工人的工会

(主席 1 人; 秘书长 1 人; 副主席 2 人; 书记 3 人)

1.10 农业、林业、水资源管理行业中个人的工会

(主席 1 人; 秘书长 1 人; 副主席 3 人; 书记 3 人)

1.11 艺术家、作家、演员工会

(主席 1 人; 秘书长 1 人; 副主席 7 人; 书记 2 人)

1.12 印刷、造纸工业和出版商业中工人的工会

(主席 1 人; 秘书长 1 人; 副主席 2 人; 书记 3 人)

1.13 教师工会

(主席 1 人; 秘书长 1 人; 副主席 2 人; 书记 2 人)

1.14 邮递员工会



- (主席 1 人；秘书长 1 人；副主席 1 人；书记 2 人)
- 1.15 服装业工人的工会
(主席 1 人；秘书长 1 人；副主席 2 人；书记 2 人)
- 1.16 出租车司机工会
(主席 1 人；秘书长 1 人；副主席 1 人；书记 2 人)
- 1.17 钢铁和电气工程工业中工人的工会
(主席 1 人；秘书长 1 人；副主席 2 人；书记 4 人)
- 1.18 铁路工人工会
(主席 1 人；秘书长 1 人；副主席 2 人；书记 2 人)
- 1.19 化工工人工会
(主席 1 人；秘书长 1 人；副主席 1 人；书记 2 人)
- 1.20 工会全国委员会 (SZOT)
(主席 1 人；副主席 5 人；秘书长 1 人；书记 4 人；SZOT 各部门正职 10 人)
- 2 匈牙利青年组织 (KISZ) 合计 127 人
- 2.1 KISZ 中央委员会
(105 名成员)
- 2.2 KISZ 中央委员会各机构书记
(第一书记 1 人；书记 6 人)
- 2.3 KISZ 中央委员会各机构的部门正职
(“社会阶层委员会”书记 6 人；“职能”部门正职 9 人)
- 3 匈牙利全国阵线的领导人 合计 13 人
(主席 1 人；副主席 8 人；秘书长 1 人；书记 3 人)
- 4 匈牙利全国妇女联合会 合计 7 人
(主席 1 人；副主席 6 人)
- 5 国家和平委员会 合计 7 人
(主席 1 人；秘书长 1 人；副主席 3 人；书记 2 人)
- 6 苏联—匈牙利兄弟会社 合计 10 人
(主席 1 人；秘书长 1 人；副主席 7 人；书记 1 人)
- 7 红十字会 合计 7 人
(主席 1 人；秘书长 1 人；书记 5 人)
- 8 科学和知识促进协会 (MTESZ) 合计 5 人
(主席 1 人；秘书长 1 人；副秘书长 3 人)

- 9 匈牙利人世界组织 合计 3 人
(主席 1 人; 秘书长 1 人; 副秘书长 1 人)
- 10 少数民族组织 合计 12 人
(斯洛伐克人、南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德意志人; 主席、秘书长、书记各 1 人)
- 11 科学工作者和专业人士的各种协会 合计 10 人
(律师、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医生协会; 主席和秘书长各 1 人)
- 12 匈牙利记者联合会 合计 5 人
(主席 1 人; 秘书长 1 人; 副主席 1 人; 书记 2 人)
- 13 作家协会 合计 8 人
(主席 1 人; 秘书长 1 人; 副主席 2 人; 书记 4 人)
- 14 匈牙利反法西斯主义者和抵抗战士联盟 合计 7 人
(主席 1 人; 秘书长 1 人; 副主席 4 人; 书记 1 人)
- 15 匈牙利先锋者协会 合计 4 人
(秘书长 1 人; 书记 3 人)

总计 (群众组织): 372 个职位

III. 国家管理机构

- 1 议会 合计 391 人
- 1.1 议员
(“全国名单”上 35 人; 来自个人选区的 352 人)
- 1.2 议会管理机构
(领导人 4 人)
- 2 共和国主席团^① 合计 21 人
(主席 1 人; 副主席 2 人; 书记 1 人; 成员 17 人)
- 3 部长会议成员 合计 17 人
(总理 1 人; 副总理 2 人; 部长 12 人; 中央计划办公室主任 1 人; 中央控制办公室主任 1 人)

①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实行的是集体国家元首的共和国主席团制度, 每届国民议会在其第一次会议上, 从议员中选出若干人组成主席团, 作为国家的集体元首。1989 年后国家元首改为国家总统制。——译者注



- 4 各部委 合计 268 人
- 4.1 部长会议秘书处
(国务秘书正职 1 人；副职 1 人)
 - 4.2 内务部
(国务秘书 1 人；副部长 5 人^①；部门领导人^②)
 - 4.3 建设和城市发展部
(国务秘书 1 人；副部长 3 人；部门领导人)
 - 4.4 国防部
(国务秘书 1 人；副部长 6 人；部门领导人)
 - 4.5 司法部
(国务秘书 1 人；副部长 2 人；部门领导人)
 - 4.6 工业部
(国务秘书 2 人；副部长 6 人；部门领导人)
 - 4.7 商务部
(国务秘书 3 人；副部长 2 人；部门领导人)
 - 4.8 环境和水资源管理部
(国务秘书 1 人；部门领导人)
 - 4.9 交通部
(国务秘书 1 人；副部长 3 人；部门领导人)
 - 4.10 外交部
(国务秘书 1 人；副部长 5 人；部门领导人)
 - 4.11 农业和食品加工部
(国务秘书 1 人；副部长 3 人；部门领导人)
 - 4.12 文化部
(国务秘书 1 人；副部长 5 人；部门领导人)
 - 4.13 财政部
(国务秘书 1 人；副部长 3 人；部门领导人)
 - 4.14 卫生和社会福利部
(国务秘书 1 人；副部长 1 人；部门领导人)

① 国务秘书也是部长的副手，但他们比普通的副部长有更多的权威。

② 用匈牙利语来说就是 főosztályvezető，一个部门包括好多处室；这些都是“处室领导的头”。

- 4.15 中央计划办公室
(国务秘书 1 人; 副部长 5 人; 部门领导数人)
- 5 有“全国性权威”的国家组织 合计 73 人
- 5.1 税收和金融控制办公室
(正职 1 人; 副职 2 人)
- 5.2 工资和劳动事务国家办公室
(正职 1 人; 副职 2 人)
- 5.3 宗教事务国家办公室
(正职 1 人; 副职 2 人)
- 5.4 青年和运动事务国家办公室
(正职 1 人; 副职 4 人)
- 5.5 中央地理办公室
(正职 1 人; 副职 1 人)
- 5.6 中央控制办公室
(正职 1 人; 副职 2 人)
- 5.7 中央统计办公室
(正职 1 人; 副职 3 人)
- 5.8 匈牙利国民银行
(正职 1 人; 副职 3 人)
- 5.9 匈牙利邮局
(正职 1 人; 副职 4 人)
- 5.10 匈牙利广播电台
(正职 1 人; 副职 2 人)
- 5.11 匈牙利证件办公室
(正职 1 人; 副职 2 人)
- 5.12 匈牙利新闻署^①
(正职 1 人; 副职 2 人)
- 5.13 匈牙利电视台
(正职 1 人; 副职 3 人)
- 5.14 民兵全国司令部

^① 匈牙利新闻署以及匈牙利广播电台的高管, 在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中均出现, 作者回信中的解释是, 他们既被界定为政治精英, 也被界定为文化精英。——译者注



- (正职 1 人；副职 3 人)
- 5.15 全国价格办公室
(正职 1 人；副职 2 人)
- 5.16 全国矿山办公室
(正职 1 人；副职 1 人)
- 5.17 全国气象服务局
(正职 1 人；副职 2 人)
- 5.18 全国度量衡办公室
(正职 1 人；副职 2 人)
- 5.19 工作安全全国委员会
(正职 1 人；副职 1 人)
- 5.20 科技发展全国委员会
(正职 1 人；副职 4 人)
- 5.21 全国改革办公室
(正职 1 人；副职 1 人)
- 5.22 社会安全全国办公室
(正职 1 人；副职 3 人)
- 6 地方政府领导人 合计 98 人
- 6.1 布达佩斯
(主席 1 人；副主席 5 人；秘书长 1 人)
- 6.2 19 个州
(每个州：州长 1 人；副州长 3 人；秘书长 1 人，合计 91 人)
- 7 检察官办公室 合计 24 人
- 7.1 首席检察官和他的三名副职
- 7.2 19 个州和布达佩斯的检察官各 1 名
- 8 法官办公室 合计 25 人
- 8.1 首席大法官和他的四名副手
- 8.2 19 个州和布达佩斯的法院院长各 1 名

总计 (国家管理机构)：917 个职位

IV. 经济部门

- 1 50 家最大型企业的 CEO 和他们的副手 合计 200 人
- 2 拥有“专线电话”的企业的 CEO 合计 250 人

3 大银行的 CEO 合计 7 人

总计（经济部门）：457 个职位

V. 文化、科学和大众媒体部门

- 1 全国性日报 合计 50 人
(主编及他们的副手; 大约 25 名驻外通讯员^①)
- 2 州级日报的主编 合计 21 人
- 3 匈牙利广播电台 合计 23 人
(台长 1 人; 副台长 2 人; 各部门主编 12 人, 8 名驻外通讯员)
- 4 匈牙利电视台 合计 35 人
(台长 1 人; 副台长 3 人; 负责经营和生产的主编 1 人, CEO 2 人; 负责编务的各部门主编 20 人; 8 名驻外通讯员)
- 5 匈牙利新闻署 (MTI) 合计 35 人
(执行经理 1 人; 副执行经理 2 人; 主编和各部门主管 12 人; 20 名驻外通讯员)
- 6 周刊主编 合计 15 人
- 7 月刊主编 合计 10 人
- 8 报业出版公司的 CEO 合计 24 人
(4 家全国性公司; 20 家州级公司)
- 9 出版社的主管 合计 20 人
- 10 匈牙利科学院 合计 285 人
(166 名院士; 76 名通讯院士; 各部门主管及其副手 20 名; 科学学位全国委员会领导人: 主席 1 人; 秘书长 1 人; 执行秘书 1 人; 12 家最重要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所的所长)^②
- 11 高等院校的管理官员 合计 147 人
(100 名大学校长及其副手; 47 名学院院长)
- 12 全国性文化机构的主管 合计 40 人
(比如国家档案馆、国家博物馆、国家图书馆、国家美术馆、国家大剧

① 为什么驻外通讯员 (foreign correspondents) 也可以被纳入这份名单? 塞勒尼在给译者的回信中解释说: 在欧洲国家社会主义政权中, 驻外通讯员是“级别很高的干部” (very high ranking cadres), 他们事实上都是在为情报部门服务。——译者注

② 注意: 在这里, 计数上发生了重复。各部门的主管和副主管一般也是科学院的院士, 所长也有可能是院士。



院、国家歌剧院等)

总计（文化、科学和大众媒体部门）：705 个职位

VI. 外事部门

- | | |
|---------------------------------------|---------|
| 1 驻各国大使 | 合计 96 人 |
| 2 外贸办公室的领导 | 合计 84 人 |
| 3 文化办公室的领导 | 合计 54 人 |
| 4 匈牙利驻各国际机构（联合国、经互会等）代表团的
领导 | 合计 6 人 |

总计（外事部门）：240 个职位

所有精英职位（“党国精英”）：截至 1988 年 1 月 1 日，3359 人

二 现在的政治和文化精英

匈牙利

截至 1992 年 9 月 30 日

I. 政治精英

- | | |
|---|---|
| 1 议会 | 合计 390 人
(议员 384 人，其中 2 人去世；议会管理机构的领袖 6 人) |
| 2 由议会选举的国家组织 | 合计 33 人 |
| 2.1 共和国总统府
(总统 1 人；办公厅主任 1 人) | |
| 2.2 宪法法院
(院长 1 人；成员 8 人；执行秘书 1 人) | |
| 2.3 中央金融控制局
(局长 1 人；副局长 2 人) | |
| 2.4 国有资产管理局
(局长 1 人；执行主任 1 人；成员 8 人) | |
| 2.5 首席法官办公室
(主任 1 人；副主任 2 人) | |

- 2.6 首席检察官办公室
(首席检察官 1 人; 副手 4 人)
- 3 政府成员 合计 29 人
(总理 1 人; 13 名部长, 以及不管部长 6 名)
- 4 各部委 合计 2950 人
 - 4.1 总理办公室
(政治秘书 4 人; 行政秘书 1 人; 名誉秘书 3 人; 副秘书长 4 人; 发言人 2 人; 办公室干事 1 人; 各个处室的头头)
 - 4.2 内务部
(政治秘书 1 人; 行政秘书 1 人; 副秘书长 3 人; 各个处室的头头)
 - 4.3 农业部
(政治秘书 1 人; 行政秘书 1 人; 副秘书长 4 人; 各个处室的头头)
 - 4.4 国防部
(政治秘书 1 人; 行政秘书 1 人; 副秘书长 3 人; 各个处室的头头)
 - 4.5 司法部
(政治秘书 1 人; 行政秘书 1 人; 副秘书长 4 人; 各个处室的头头)
 - 4.6 工业和商业部
(政治秘书 1 人; 行政秘书 1 人; 副秘书长 4 人; 各个处室的头头)
 - 4.7 环境和地区发展部
(政治秘书 1 人; 行政秘书 1 人; 副秘书长 4 人; 各个处室的头头)
 - 4.8 交通、通信和水资源管理部
(政治秘书 1 人; 行政秘书 1 人; 副秘书长 4 人; 各个处室的头头)
 - 4.9 外交部
(政治秘书 1 人; 行政秘书 1 人; 副秘书长 4 人; 各个处室的头头)
 - 4.10 劳动部
(政治秘书 1 人; 行政秘书 1 人; 副秘书长 2 人; 各个处室的头头)
 - 4.11 文化和教育部
(政治秘书 1 人; 行政秘书 1 人; 副秘书长 3 人; 各个处室的头头)
 - 4.12 对外经济关系部
(政治秘书 1 人; 行政秘书 1 人; 副秘书长 4 人; 各个处室的头头)
 - 4.13 社会福利部
(政治秘书 1 人; 行政秘书 1 人; 副秘书长 4 人; 各个处室的头头)
 - 4.14 财政部



- (政治秘书 1 人；行政秘书 1 人；副秘书长 4 人；各个处室的头头)
- 5 拥有“全国性权威”的国家组织 合计 79 人
- 5.1 税收和金融控制办公室
(主任 1 人；副主任 2 人)
 - 5.2 国家卫生服务局
(国家医师 1 人；国家药剂师 1 人)
 - 5.3 国家人口登记局
(局长 1 人)
 - 5.4 全国消费者保护局
(局长 1 人)
 - 5.5 频率控制局
(总干事 1 人)
 - 5.6 经济竞争办公室
(主任 1 人；副主任 2 人)
 - 5.7 军事工业办公室
(主任 1 人)
 - 5.8 海外匈牙利人办公室
(主任 1 人)
 - 5.9 边境控制指挥部
(全国总指挥 1 人)
 - 5.10 环境保护局
(局长 1 人；副职 2 人)
 - 5.11 中央地理办公室
(主任 1 人)
 - 5.12 中央统计办公室
(主任 1 人；副主任 3 人)
 - 5.13 中央军事司令部
(全国司令 1 人；总参谋长 1 人)
 - 5.14 匈牙利共和国信息中心
(主任 1 人)
 - 5.15 国家安全办公室
(主任 1 人)
 - 5.16 匈牙利国家银行

- (行长 1 人；副职 4 人)
- 5.17 匈牙利广播电台
(台长 1 人；副台长 1 人；执行主任 1 人)
- 5.18 匈牙利证件办公室
(代理主任 1 人；副职 1 人)
- 5.19 匈牙利新闻署
(署长 1 人；副职 1 人)
- 5.20 匈牙利电视台
(台长 1 人；副台长 1 人；执行主任 2 人)
- 5.21 空间研究办公室
(主任 1 人)
- 5.22 难民办公室
(主任 1 人)
- 5.23 国家少数民族办公室
(主任 1 人；副主任 1 人)
- 5.24 国家核能委员会
(主任 1 人；副主任 1 人)
- 5.25 国家矿业办公室
(主任 1 人；副主任 1 人)
- 5.26 国家旅游办公室
(主任 1 人)
- 5.27 国家赔偿办公室
(主任 1 人；副主任 1 人)
- 5.28 全国气象服务中心
(主任 1 人)
- 5.29 国家计量办公室
(主任 1 人)
- 5.30 国家工作安全委员会
(主任 1 人；副主任 1 人)
- 5.31 国家科技发展委员会
(主任 1 人；副主任 4 人)
- 5.32 全国警察指挥部
(总指挥 1 人；副职 2 人)



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

- 5.33 全国改革办公室
(主任 1 人; 副主任 1 人)
 - 5.34 国家社会保障办公室
(主任 1 人; 副主任 3 人)
 - 5.35 国家体育委员会
(主任 1 人; 副主任 1 人)
 - 5.36 国家水资源管理办公室
(主任 1 人)
 - 5.37 国家民防委员会
(全国总指挥 1 人)
 - 5.38 赌博监管局
(局长 1 人)
 - 5.39 全国火警指挥部
(全国总指挥 1 人)
 - 6 地方政府领导人 合计 97 人
 - 6.1 州议会
(州议会议长 19 人; 各州议会副议长 26 人^①; 州办公室干事 19 人)
 - 6.2 布达佩斯
(市长 1 人; 副市长 3 人; 办公室主任 1 人)
 - 6.3 州级市的市长 20 人
 - 6.4 共和国总统的地区代表 8 人
(匈牙利 19 个州划分成 8 个“地区”, 8 名代表分别监督着这 19 个州; 在州的层次上, 只有自治政府在运转, 而地区代表则监督自治政府机关的合法性)
 - 7 司法系统 合计 40 人
(州法院院长 20 人; 州检察长 20 人)
- 总计 (当前的政治精英): 954 个职位**
- II. 文化、科学和大众媒体机构**
- 1 全国性日报 合计 60 人

^① 在大多数州, 只有一名副议长, 但在贝凯什州 (Bekes) 有 4 名, 在索尔诺克州 (Szolnok) 有 3 名, 在佩斯州 (Pest) 有 2 名, 在维斯普雷姆州 (Veszprem) 有 2 名。

- (35 家日报的主编及他们的副手；25 名驻外通讯员)^①
- 2 非全国性日报 合计 23 人^②
- 3 匈牙利广播电台 合计 25 人
(台长 1 人；副台长 1 人；办公室经理 1 人；各部门主编 12 人，10 名驻外通讯员)
- 4 匈牙利电视台 合计 30 人
(台长 1 人；副台长 3 人；办公室经理 2 人；主编 16 人；10 名驻外通讯员)
- 5 匈牙利新闻署 合计 29 人
(总经理 1 人；副经理 2 人；主编 8 人；18 名驻外通讯员)
- 6 20 家主要周刊的主编 合计 20 人
- 7 15 家主要月刊的主编 合计 10 人
- 8 25 家主要报业出版公司的 CEO 合计 25 人
- 9 20 家主要图书出版公司的 CEO 合计 20 人
- 10 匈牙利科学院 合计 285 人
(166 名院士；76 名通讯院士；各部门主管及其副手 10 名；科学学位全国委员会领导人：主席 1 人，秘书长 1 人，执行秘书 1 人；20 家主要研究所的所长，其中 12 家是社会科学，8 家自然科学)
- 11 高等院校的管理官员 合计 147 人
(23 所大学，每个学校校长 1 名，副校长 3 名；41 所学院的院长)
- 12 全国性文化机构的主管 合计 40 人
- 13 主要的文化基金会 合计 3 人
- 总计（文化、科学和大众媒体部门）：708 个职位**

截至 1992 年 9 月 30 日，所有的政治和文化精英：1662 个职位

① 11 家全国性日报的名单被列了出来。

② 有 24 家这样的报纸，但有两家报纸的编辑是同一个人。

附录 III 匈牙利社会研究中心 制作的数据集

在第四章中，我们使用了匈牙利两个不同层次公司的数据集（data sets）。这两个数据集都是由匈牙利社会研究中心（TARKI）制作的，并由沙基·玛蒂尔达（Matilda Sági）提供给我们。

匈牙利社会研究中心的第一组数据完成于 1993 年的秋天。这是一组随机样本，它由所有的公司（包括霍彭施泰特商业注册簿中的公司）组成。其中成功的完整访问有 1001 个。这些访问的对象都是 CEO，而问卷则与塞勒尼和特雷曼在“1989 年后的东欧社会分层”这一项目中使用的问卷非常相似。不过，正如我们在第四章中已经指出的那样，在测量公司层面的财产关系方面，TARKI 的问卷有了很重要的改进。

1996 年秋天，TARKI 再次从霍彭施泰特商业注册簿中随机抽取了一组公司做调查，但这一次，他们只是关注雇员在 50 人及其以上的企业。他们成功完成了 290 份问卷，这些问卷与他们在 1993 年调查中使用的非常相似，虽然并不完全相同。与 1993 年的调查不同，在 1996 年的时候，他们还访谈了一些不是 CEO 的高层管理人员。问题涉及公司的活动和财产关系，但并未涉及被访者的社会背景或当前的社会结构位置。

附录IV 论反讽：新古典社会学引论^{*}

本文提供了一份新古典社会学的引论。新古典社会学应该理解为，以哈贝马斯式的方式，对古典理论家们——尤其是韦伯——所概念化的社会学基础观点进行重建。本文将东欧和中欧的案例作为实验室，反对那种单一的、同质化的全球化逻辑的观念。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我们所看见的资本主义的形式和目的，都呈现一种显著的多样性。而不管是有关“网络”和“嵌入”的社会学理论，还是理性行动的经济模型，都没有充分理解这种多样性。因此，新古典社会学的进路，命令我们对资本主义进行经验性的比较研究，而一种“反讽的”、历史的分析进路，则表明了对资本主义诸种可能性进行内在批判。

一 社会主义垮台之后的社会理论： “西方社会学危机”的再思考

国家社会主义的瓦解对社会学，尤其是社会学中的批判分析传统提出了挑战。社会学和社会主义是19世纪社会大变动时期出生的双胞胎，而且它们最初的观点共享相同的前提假设。尤其是，它们都对市场的混乱持批判态度，都提倡在社会科学的帮助和启示下，将社会的集体理性秩序作为一种替代选择。社会学和社会主义的密切关系在圣西门和孔德的著作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他们都想建立一种在知识和精神上更加优越的社会秩序。

* 本文原发表于《论题十一》杂志 [Eyal, Gil, Iván Szélenyi and Eleanor Townsley (2003) "On Irony: An Invitation to Neoclassical Sociology", *Thesis Eleven*, May, Number 73: 5-41]，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对本书第五章中提出的“新古典社会学”的主张做了非常重要的补充和完善。经作者允许，我们移译了这篇文章，并承蒙李康先生校对了初稿，在此表示感谢。

这在马克思和涂尔干的著作中表现得也很明显。对后两位思想家来说，正像社会主义提供了一套针对资本主义的替代性选择一样，社会学理论形成了一项针对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替代性选择。古典社会学的另一支，以韦伯为代表，对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却并没有那么乐观。从个体自由的视角出发（后来的思想家如穆勒 [Mill]^① 和波普尔也是这么做的），韦伯对集体主义的理想型进行了批判性的审视。不过，虽然并不同意社会主义的诉求，韦伯还是与马克思和涂尔干分享了相同的批判性观点，亦即，业已意识到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可能性。

在《西方社会学面临的危机》一书中，阿尔文·古尔德纳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关于社会学的分析：在古典社会思想家之后，社会主义和社会学之间这种成问题的关系，是如何延续到 20 世纪的（Gouldner, 1970）。的确，对许多知识分子来说，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actually existing socialism）的残忍和苍白使得社会主义的观点失去了光泽。但尽管如此，古尔德纳的分析指出，20 世纪实证主义和批判性社会科学之间的分裂，恰恰是在如下议题上的一种区分：如何相互衡量社会主义的现实与可能。一方面，20 世纪的实证主义者倾向于将他们对“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阴暗面”的憎恶，转化成对资本主义不加批判地接受和辩解。这里所说的实证主义，意思已经和原来不同：对孔德来说，“实证主义”是对“否定主义”（negativism）的据斥，是一种召唤，号召人们勇敢地去思考可能更加美好的世界；而对 20 世纪的实证主义者来说，实证主义将现有世界作为唯一的可能加以描写和正当化。另一方面，批判性社会科学对“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展开了批判，但并不是从事物现有秩序的观点出发，而是以与“真实社会主义”（true socialism）有关的观点为基础。诸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这样的理论家主张，东欧和中欧的社会并不符合社会主义理想型的标准，它们是尚未充分发育的“社会主义”，或者，更糟糕的，它们是某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在这样的情况下，古尔德纳认为，现实和可能性之间曾有的富有生产性的张力，现在已经分成两个部分，要么是对迟钝的现实的片面强调（实证主义），要么则是对抽象的可能性的片面强调（批判性社会科学）——它们两者都丧失了任何批判的维度。

我们认为，古尔德纳要寻找将社会学从实证主义和批判性社会科学的

^① 原文如此，这可能是作者对穆勒的一种误读。——译者注

僵局中拯救出来的方法，又一次显得意义重大。但我们之所以这样认为的理由，却与古尔德纳多少有点不同。在1970年，和许多其他社会科学家一样，古尔德纳相信，他正在目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融合——丹尼尔·贝尔将其称为“后工业社会”（Bell, 1973）。古尔德纳认为，在这种融合中，关于社会学的批判性想像力已经消失。实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划分被超越了，它们相互之间变得相似，因为它们都是新阶级的兴起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而由知识分子组成的新阶级，最终将取代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这两种社会中的支配阶级。^①这就是“西方社会学面临的危机”：社会学不仅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失去了它曾经掌握的批判性视点，而且还失去了可以占据这一视点的行动者，亦即曼海姆所说的在社会上无所依附的知识分子。

虽然如此，古尔德纳还是主张，社会学传统的批判潜力是可以被重建的。在对青年黑格尔派学者以及他们对黑格尔哲学的重新激进化（reradicalization）做出一番比较之后，他指出，社会学的激进潜力，在于它对自反性（reflexivity）的坚持——也就是说，以知识分子自己的“批判性话语文化”的价值和武器，来针对知识分子自己。如果他或她能够致力于将自反性作为第一原则，即使是利己主义的社会科学家，也能够提出与更美好的社会有关的激进观点，因为自反性意味着，将他或她自己的利益和推理模式（reasoning modes）暴露在自我批判性的审视之下。

我们认为，从古尔德纳那里，我们会获益良多。他所描述的社会学的危机已经到来，虽然并不完全是以他所预见的方式。资本主义并没有与社会主义中途相会（在社会民主主义如日中天的时候，似乎将会如此），相

^① 古尔德纳认为，新阶级的权力来自他们对专业化职业知识的垄断，以及他们对文化合法化手段（means of cultural legitimation）的控制，他将后者称为“批判性话语文化”（culture of critical discourse, CCD），并定义为“一套历史演变下来的规则，是一种话语的基本原则，（1）它所关心的是对其言论的正当化，但是，（2）它的正当化方式（justification mode）并不是通过诉求权威来进行的，并且，（3）它更倾向于仅仅依靠提出的观点，就使听众自愿接受”（Gouldner, 1979: 28）。古尔德纳认为，“批判性话语文化”是知识分子阶级身份的基础，它经常因为反对传统权威和社会制度而受到指责。在西方，“批判性话语文化”被客体化为“文化资本”，它以各种凭证为表现形式，而且通过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高度成功的意识形态而获得了正当化。于是，新阶级在社会事务中的分量日益增加。新阶级的成员成为现代国家、经济体和大学的运转中关键的组成部分。在这些机构中，知识已经变得不可或缺，而老资产阶级的权力正在逐渐减弱。因此，新阶级的成员处在一个几乎不用担心自己报酬的位置上，他们要表达自己的需求，他们要破坏、推翻、滋扰旧的有钱阶级（Gouldner, 1979: 19-20）。



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

反，与过去 50 年相比，21 世纪西欧和北美的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离得更远了。而与资本主义在中途相会相反（东欧共产主义改革时期似乎将会如此），后共产主义社会采取了一系列广泛的新策略来打造资本主义。实际上，20 世纪两个主要的社会体制的趋同并没有发生，相反，21 世纪在全球范围内，向我们展示了许多眼花缭乱的资本主义。唯一的例外，是两个微小的、垂死的实际存在的共产主义孤岛：古巴和朝鲜。所以，世界历史并没有沿着古尔德纳（以及其他许多人）所预言的轨道走下去。不过，可以保证的是，这个世界确实已经不再被划分为两个相互竞争的社会体制，而且在后共产主义的情境下，社会学正在显出“危机”的征兆。

21 世纪资本主义支配性的意识形态是全球化：这种世界观断言，只存在一种单一的全球资本主义逻辑。因而，社会学之所以丧失它的批判性观点，并不是因为古尔德纳所预言的马克思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趋同，而是因为这种铁板一块似的全球化观念，回避了批判性观点的思想。因此，这是一种双重的危机，因为正是这种批判性观点，将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区别开来。

在这样一个似乎由资本主义市场和自由主义文化的全球化逻辑支配的世界中，社会学努力使自己的研究对象、方法和社会角色独具特色。事实上，当代社会学的许多分支，都有意识地要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支配的替代性选择。例如，经济社会学强调嵌入性；网络分析学者声称将论证市场是如何由社会关系的网络所组成的；而新制度主义社会学家，则强调各种经济关系习俗化的和组织上的根基。但我们要指出的是，即使是过去最为实证主义的社会学，以及那些被认为最反对社会主义或者最没有政治性的理论家，也会通过明确或含蓄地批判纯粹基于市场的社会秩序，而有别于经济学。例如，帕森斯就强调了社会化和文化之于经济私利的重要性，而自由主义思想家总是对他关于“社会系统”的观点中集体主义和建构理性的成分持怀疑态度（Wagner, 1994）。于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是实证主义社会学从社会主义中“逃跑”的路线，也分享了这一学科的批判传统。社会学认为社会实在（social reality）与市场的运作截然不同，而且比它更加根本；在此基础上，这一学科能够指向一种超越现状的替代性选择。然而，随着社会主义的垮台，即使实证主义的“逃跑路线”也面临被社会主义玩笑颠覆的危险；也就是说，社会主义不过是从资本主义出发绕了个远路，又回到资本主义，或者说，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是从自由主义政

治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绕了个远路之外，社会学就什么也都不是了。

最能体现这种可怕的可能性的，就是“理性选择”理论的上升趋势，这一理论威胁要将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区别抹去，把它们两者都融合进一种系统性的“关于社会范畴的经济描述”中去（Gordon, 1991）。理性选择理论将所有建立起来反对它的辩护性概念（嵌入性、网络、制度）容纳进来，把它们边缘化，亦即把它们统统吸收到理性行动者的计算最大化中。在一个没有了“实存社会主义”的世界里，新自由主义版本的资本主义似乎极大地统治了全球。于是，经济行动者不再是嵌入的了，制度是有意设计的；传统、路径依赖和网络纽带被明码标价；所有这些，都可以与最大化的计算法相吻合。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社会学实证主义的“逃跑路线”似乎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最终又会回到起点。资本帝国主义与“理性选择”的理论帝国主义惺惺相惜，两者都指向一个单一的资本主义目的地：历史的终结。

社会学应该接受胜利的资本主义这一观点吗？社会主义之后的社会学必须丢掉它的分析对象和批判视角吗？我们认为不是。相反，我们认为，社会主义之后社会学的危机，为我们重建这一学科的批判视角提供了机会。它给了社会学以盘点和重建它的古典遗产的机会；这一次，人们将摆脱资本主义对抗社会主义的截然对立，用由反讽性的自我反思（ironic self-reflection）所构成的批判性权力来武装自己。就像20世纪70年代面对大规模的全球性市场失灵时，经济学重返它的古典根基以重组这一学科一样，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垮台的阴影下，社会学也许可以有效地重返它的古典根基以重组自身。在经济学中，上述重返暗指的是回到关于利己主义个体的观点上去。然而，在社会学中却完全相反，这一重返意味着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现代性，或者说，资本主义的起源是什么？因此，我们并不是要浅薄地将古典传统当作一个“工具箱”，凭一时的兴趣从中提取概念和洞见。相反，我们打算对古典社会学思想家基础性的批判观点进行一番重建（我们是在哈贝马斯的意义上使用“重建”这一术语的，参见 Habermas, 1990）^①。

① 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一书中，对“现代性”进行了重建（哈贝马斯，2005，《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而“新古典社会学”的抱负之一，也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进行比较研究，来“重建”人们对于“现代性”或资本主义的理解。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作者的动机和哈贝马斯不谋而合。——译者注



我们所说的“新古典社会学”（neoclassical sociology）与“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有着很大的不同。后者假定只存在一种单一的资本主义逻辑和单一模式的理性人类行动，而前者则是批判性社会分析的领域，其探究问题的方法是反讽性的。^①以古尔德纳的分析为出发点，我们发现反讽（irony）——只要它根植于自我讽刺之中——总是在自反性的模式中进行的。致力于反讽的研究者，在他或她的分析开始之前，都要悬置自己关于世界的价值、判断和知识，并且将“他者”视为有效的观点。只有理解到他或她自己的价值，以及别人的价值是相关的，研究才能开展；也就是说，这些价值只有在相互的关系中，抑或换言之，只有在相互的对话中才存在，才有意义。这就是反讽方法的自反性前提假设（the reflexive premise of the ironic method），或者用曼海姆的术语来说（Mannheim, [1936] 1985），这就是关系性的分析（relational analysis）。反讽分析的目的，就是通过描述和构成各种立场及其决定机制的关系，展示这些立场及其决定机制的暂时性特征。^②因此，反讽起步于自反性，但并不会止步不前。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仍然是反讽分析的目标（这是一个在主体和客体、他我和本我的对话中追求的目标）。实际上，对批判性社会分析来说，这就是反讽的激进假设。恰恰是因为他或她并不需要一个“批判的视点”，所以，并不要求反讽分析必须形成一个积极的陈述，以提出最值得期望或最好的解决方案。反讽分析唯一必须做的事情，是劝说其他人相信，还有一系列可能的解决方案，而且对于那些值得期望的解决方案的领会方式和排序方式也是多重的。因此，反讽是严肃或认真（earnest）的反面。严肃认真（seriousness）意味着相信一种至高无上的立场。反讽分析家并不占据这种道德优势，而且他们要劝服别人也不要占据那种优势。因此，幽默或

① 新古典经济学是严肃的，并且反对反讽：只存在唯一的事实和唯一的系统；资本主义只有一个逻辑，以及一系列用经济理性的方式行动的规则，那些不遵循这些规则的人，是“非理性的”。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正是在我们于这篇文章中使用这个词汇的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竟然共享了单一的全球性资本主义逻辑这一假设。这两派思想的唯一区别是，前者认为这一逻辑令人不快，后者则认为这是值得期待的发展。相反，新古典社会学的前提假设是，资本主义有着多重的终点。不管俄罗斯正在出现的资本主义是否会与我们所知的美国或西欧的资本主义趋同，它都必须在经验上加以探讨，而不是由理论推断来做出想当然的推测。

② 这就是我们的理解与关于反讽的后现代分析相会合的地方。可参见赫奇恩的著作（Hutcheon, 1992, 1995），尤其是他关于前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反讽之间区别的讨论。

笑话成为反讽分析中重要的工具。^① 不过，反讽与犬儒主义截然不同。再次援引曼海姆的术语，我们要说的是，犬儒主义的立场是相对主义的（relativist），而反讽分析则是关系主义的（relationist）^②；在这里，我们的意思是说，反讽分析接受多重事实的可能性，而每一种事实与假话毕竟还是不同的。

这篇文章是“新古典社会学引论”，因此，也是针对反讽分析的一篇引论。当我们创造“新古典社会学”这一术语的时候，我们想，我们并不是在发明一个新的探索领域。^③ 相反，我们只是要展现，如何考察和批判社会学对没有社会主义的世界，尤其是经济学始终有力的挑战所做出的反应。在这一努力下，我们试图发现一种平衡肯定性视角和批判性视角之间二元对立的方式，而自这一学科诞生起，这种二元对立就一直是它的特征。最后，本文剩下的部分，将提出三个因苏东社会主义的死亡所引发的相互关联的问题，其中每一个问题都为一种重建的新古典社会学指出了方向。

第一，社会学家该如何思考后社会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我们如何能够避免把资本主义具体化为一个单一的、同质性的全球化逻辑？我们认为答案就是，重建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的概念，也就是说，通过比较的方法，将资本主义概念化为一种由各种形式和目的组成的多重状态。

第二，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终结，意味着阶级分析的终结吗？我们是不是应该接受阶级正在消失或者已经死亡的声明（Inglehart and Rabier, 1986; Pakulski and Waters, 1996）？我们并不这样认为。相反，我们认为，在东欧发生的向资本主义的转型，为重建阶级分析提供了令人激动的新素

① 笑话的典型形式，是有一个问题，听众事先假定了一个平淡无奇的答案；而一个好的笑话，要提供出其不意的回答，这个回答要与听众原先在头脑中的那个答案一样貌似有理。当 he 或她不能理解这些笑话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人缺少幽默感。一个没有幽默感的人，是严肃认真的，并且坚持认为 he 或她自己的信念不可以被当作笑料，he 或她的立场不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质疑。这就是为什么没有自我讽刺，我们就无法将反讽概念化的原因。如果一个人失去了关于自己和自己立场的幽默感，那么也就没有反讽或自反性可言。

② “关系主义”是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基本方法论，其目的之一，就是避免陷入“相对主义”的陷阱。这一概念强调了特定情境中所有意义因素之间的相互指涉，并且指出，对任何意义因素的提取，都应该通过既定思维框架中的这种交互性的相互关系来实现。后来者如布迪厄，则试图用“关系主义”的方法论，来克服结构与能动、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对立。——译者注

③ 事实上，我们要感谢倪志伟（Victor Nee）提供了“新古典社会学”这一术语。



材，并且提出了有关集体行动者的“阶级性”（classness），以及社会变迁中知识分子的角色这两方面的重要问题。

第三，在社会主义替代性选择缺席的情况下，一种批判性的社会科学还有可能吗？对社会主义的遗弃必然意味着对知识分子社会批评家角色的遗弃吗？我们同样不这样认为。我们不能撤退到社会学技术员的位置上，或者使社会学萎缩成道德批判。相反，我们建议，持目的论的知识分子们的消失，是一场让人清醒的经历，它可以被用来阐明一种批判性知识介入的新模式，亦即反讽。

二 社会学家该如何思考后社会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

新古典社会学的基本假设是，既然使用社会科学的工具再也无法测出一种社会主义替代的可能性，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对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和目的进行比较分析。这也是《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一书的核心主张。这本书分析了匈牙利、波兰和捷克三国由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不过，在转到关于资本主义比较研究的框架之前，我们将重访一个问题：如何思考后社会主义世界中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一）社会主义替代的缺席和资本主义的性质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替代性选择的可能性已经不能再作为批判性社会科学的基础，因为我们当前并不能从经验上察觉这种替代性选择。我们的前提假设是，批判性社会科学应该以察觉“真实的替代性选择”（real alternatives）为基础，而只有当社会行动者（而不是社会科学家）致力于一种在经验上看得见的、具有“突生性”的集体行动（亦即指向一种替代性社会秩序的集体行动）的时候（Williams, 1980: 32-49），某种社会选择才可以被认为是真实的。这种立场是经验主义的，却并非实证主义的，因为现实实际上是实践（praxis），而我们以及我们的分析都被卷入其中。我们只是增加了一条经验方面的温和告诫：社会性的转型实践必须有一群可以辨认的社会行动者。

在当前的历史时刻，我们发现，没有什么集体行动者愿意将建设社会主义当作自己的规划。不仅工人们不再构成受到动员去争取社会主义的阶

级行动者，^①即使是知识分子也不再对建设社会主义感兴趣。^②实际上，作为一个经验上的事实，我们观察到，无论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东欧的前社会主义社会，知识阶层中最先锋的部分，其个人思想恰恰表明，他们都经历了社会主义理想的幻灭。虽然在历史上他们曾与建设社会主义发生过关联，但是现在，幻灭感在知识分子身份和世界观中渗透得如此深入，以至于我们认为，在可以预见到的未来，这些阶级群体将不太可能成为社会主义规划的执行者。

要搞清楚，我们并不是在主张，近期社会主义替代的缺席意味着社会主义在原则上就不再可能，或者在我们无法见到的某个未来时点上，社会主义不会被建立起来。我们并没有能预测未来的水晶球，而社会科学在预测方面向来纪录不佳。我们也并不认为，社会主义替代性选择的缺席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已死或者没有了意义。相反，在这样一个由资本主义金融市场支配的世界中，千百万人的生计，都要视神秘的股票和通货运动而定。在对资本主义进行伦理批判方面，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只要不再要求将建设社会主义的实用性合法化——不管是以古拉格劳改营^③，还是无效率的社会主义计划编制的形式——马克思主义也许会经历一场复兴。我们的观点只是说，在最近的将来，尤其是在东欧，找到一群被动员起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集体行动者，其可能性微乎其微。

如果说在新的世界秩序中，近期并不存在一个社会主义的替代性选择是正确的话，那么，是不是就可以得出结论说，那个单一的、同质性的、全球逻辑的资本主义就是“唯一选择”？我们并不这样认为，因为接

-
- ① 我们并不否认资本主义剥削的现实，或者要暗示说工人阶级已不再存在或正在消失。不过，在当代东欧，我们确实发现工人阶级已经被去动员化了，他们几乎没有能力采取集体行动。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当工人阶级确实在采取集体行动的时候，他们所努力的，是工会斗争，而不是营造革命性的阶级意识。关于这一点，可参见我们在《美国社会学杂志》最近的集评上对麦克·布洛维的回应，已收入本书（Eyal et al., 2001）。
- ② 我们认为，到目前为止的历史记录都清楚地表明，没有知识分子阶层或者至少一个大型宗派的集体行动，社会主义的规划就不可能实现。还没有哪个历史案例可以证明，工人阶级能够在没有激进知识分子的支持下，贯彻和实现一项社会主义的规划。但另一方面，却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即使在工人阶级并不存在的情况下，激进知识分子阶层也能够成为贯彻和实现一项社会主义替代方案的阶级行动者。在这里，我们倚重了将社会主义分析为知识阶层“新阶级”的创造的丰富传统（参见 Bakunin, 1966; Djilas, 1957; Gouldner, 1979; Konröd and Szelényi, 1979; Machajski, 1937; Nomad, 1937, 1959）。
- ③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苏联设立了许多劳改营。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小说《古拉格群岛》出版后，这些劳改营遂被西方称作“古拉格”（Gulag）。——译者注



受这样的一个命题既天真又无视历史。相反，沿着韦伯提供的路数（[1904-1905] 1958: 13-31），我们指出，资本主义可以通过许多形式实现，而且，今天的社会学家所要面对的批判性任务，正是对多重的“资本主义”及其后果做出比较分析。

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行动的一般性定义，可以被当作“建造”资本主义比较分析的“材料”：如果一种行动旨在通过和平手段获得利润，而且运用理性标准去衡量支出和所得，它就是资本主义的。在这一定义中，并不需要其他更加具体的关于资本主义的标准。于是，一种经济体制是否是“资本主义的”，是一个程度问题，而就它被组织起来以理性地算计成本和收益这一点来说，它更加偏向资本主义。当然，既然算计（calculation）是一项社会实践，那么，资本主义理性化就意味着有许多再生产它们的社会制度以及与之相应的一套生产关系。其中通常包括生产资料中的个人私有财产、直接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以及价格调节市场（Weber, [1915-1921] 1978: 915, 1393-1395; [1927] 1981: 276-278; Callon, 1998）。但是，资本主义经济行动也可以在财产权并非完全私有的情况下产生，在那里，劳动者并没有与生产资料相分离，或者处于价格调节市场之外（Weber, [1904-1905] 1958: 13-31; [1915-1921] 1978: 635-640, 1393-1395; [1927] 1981: 335-336; Polanyi, [1944] 1957）。因此，这就为思考资本主义的多重形式提供了可能。这些多重形式，是历史上各种因素的特殊集合，它们在人们能够理性地做出经济算计的类型和程度上，各不相同。

这种对资本主义的理解，与韦伯其他的主张之间有一种张力。韦伯还认为，就这些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的结合来说，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是最为理性或强有力的。毕竟，他有一个著名的命题认为，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是一个行动者被关在里面的“铁笼”，笼子就是个体私有财产权和自我调节市场，而这些安排则为最为理性的逐利行为提供了准备。在这里，韦伯强烈地将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功能暗示为历史的终点（terminus），而这恰恰是我们与韦伯的分析分道扬镳的地方。事实上，我们认为，韦伯在经验上犯了个错误，资本主义并没有像“铁笼”隐喻所暗示的那样属于单线发展。就在韦伯逝世后不久，一些他认为是资本主义发展最高形式的必要特征（比如自我调节市场）就被大规模的调节性国家干涉取代了，或者至少被边缘化了（Polanyi, [1944] 1957）。50年以后，自我调节市场再次取得了支配地位，而这要归功于对福利国家的攻击以及新古典经济学的影

响。但这一切所发生的情境，与韦伯曾经想象的已彻底不同。今日的情境是：有了巨大改变的财产关系、大型公司、股票持有、机构所有权，以及共同基金或养老基金资本（Bell, 1973; Gates, 1998）。所以，虽然我们遵循了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分析的解释性历史进路，但我们认为，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的一般性概念必须被重建。^①

这就是我们在自己的著作中所做的工作：对东欧和中欧向资本主义的转型做出比较，探索各种因素在不同个案中的具体组合方式。具体而言，我们描写和分析了各种财产所有权之间的相互关系、国家调节和计划的手段和程度、资本和劳动力市场发展的程度、福利国家各种制度以及剩余劳动力处置的性质、知识分子算计技术的可利用性、组织内部关系的性质、资本主义行动者的类型以及他们阶级性的程度、将逐利行为合法化的模式。^② 在这里，我们采纳了韦伯（Weber [1903-1917] 1949: 33-39）关于多重理性的假设，而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体化的资本主义理性；我们追随的，是他对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t）解释模式的方法论承诺，而不是进化论的说明模式（Weber [1903-1917] 1949: 50-112）。在这一基础上，我们提出了一个比较的框架，用来分析资本主义形式和关系的多样性；而且我

① 正是这一理论选择，将我们作为新古典社会学家的立场与韦伯作为一名古典社会学家的立场区别开来。韦伯的立场，从多重理性和轨道，滑动到一个单一的资本主义历史终点，是他受到历史限制的症候。第一，这反映了他的西方优越感，以及背后的欧洲对世界其他地区的霸权；第二，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反映，他相信他面对的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政治选择。韦伯并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自由资本主义的拥护者，他更适合被概括成“绝望中的自由主义者”，他完全知道实现自由资本主义将必须付出什么样的代价（Mummsen, 1984）。但是，面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选择，他还是选择了前者。这在他晚年关于俄国社会主义的评论中表现得十分明显（Weber [1905-1906, 1917] 1995），但我们也认为，这一政治两难影响了他对资本主义的描述，驱使他将资本主义描写得比他基于经验分析所看到的更加可怕和无法逃脱。由于在我们写作的时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对立已经不那么紧迫，我们认为，社会学不应该再受到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这一强求逻辑的限制。

② 这些集合在概念上的地位，与较早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所称的“社会构成”（social formations），以及今天的“调节学派”（regulation school）所称的“调节模式”（modes of regulation）并没有太大的不同（Harvey, 1989: 121-122）。然而，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韦伯的方法论为比较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加灵活的分析框架。诸如“积累体制”（regimes of accumulation）这样的概念倾向于假设，由于各个行动者试图根据他们处理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危机趋势的模式，来区别不同的经济类型，因此，在他们背后，还有一套正在运转的系统性原则，使他们的不同反应成为一个整体。从方法论上来说，这意味着实际的个案必须与各种“类型”相对应。相反，在韦伯主义（Weberian）的方案中，人们将实际个案与分析上的类型学相比较，目的是评估每一个个案中各种情况的可能后果，探讨它们是如何影响经济行动者的理性的（Roth, 1971）。



们认为，面对历史终结论的胜利宣言，如果我们试图追求一门批判性的社会学，这样一个框架就是完全必要的。

(二) 全球化—趋同命题

自 1989 年以来，新自由主义大众作家和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新正统观念，已经将“全球化”这一概念解释为：它意味着向单一的同质性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趋同的过程。他们认为，这一体系将受到全球竞争市场统一的系统性逻辑的统治，受到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经济机构的支持。这套接近于新自由主义学说的系统逻辑，削弱了国家的力量，淡化了不同国家经济体之间区别的意义，将它们无情地推向了趋同的方向 (Ohmae, 1995; Reich, 1992; Schmidt, 1995)。^① 我们认为，这种“趋同全球化命题” (globalization-as-convergence thesis) 无论在概念上还是经验上都有好几个缺陷。

第一，这一貌似有理的主张，严重依赖于默认的“历史之终结”。这一思想认为，全球化的过程对后现代时期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它由以前并不存在的因素来驱动；而且这一过程不可逆转。这一观念是错误的。即使粗略地扫一眼历史上的记录，我们也能够知道，我们今天正在目睹的一切，即使不说是一种程度更大的循环现象的话，也最多是全球化的第二次轮回 (Hirst and Thompson, 1996; Schumpeter, [1942] 1976; Wallerstein, 2000; Weiss, 1998)。从 19 世纪晚期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全球化的过程都在全力运转。在这一时期，你可以目睹外贸量的迅猛增长、国际流通市场的兴起，以及不同大陆之间大规模的劳工移民运动。然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观察到，从那以后不久，这些过程就发生了逆转，甚至被阻断，或者至少是由于保护主义的增长、限制移民以及国家干预的原因，而放缓了 (Polanyi, [1944] 1957)。人们现在并没有理由认为，这一切不会再来

^① 在意识形态阵营的左翼，对“趋同全球化命题”的接受，已经变得更加复杂，而且我们也无法在这里公正地对其做出评判。某些人，尤其是世界体系理论家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家，曾经详细阐明过一套类似的观点（虽然比较黯淡）：统一的系统性的全球资本主义正在征服全球，并且会使马克思的预言最终实现。这一观点尤其适合乌托邦社会主义，后者在与关于资本主义的反面乌托邦观点 (dystopic view) 的对比中，获得了力量；而且，有争议的是，它很适合鼓舞最近发生在西雅图以及世界各地针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攻击。但是，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却对趋同性命题很是怀疑，而且事实上为我们反对这一命题提供了“弹药”。关于这一内部争论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可参见 Hirst and Thompson (1996)。

一次；事实上，有许多指标显示，它已经正在发生。强有力的反全球化的运动，正在回击当前这一轮的全球化浪潮。例如，在上一个十年里，我们已经目睹了更多新民族国家的建立，其数量超过以前任何一个单独的十年期（Mann, 1997）。另外，民族冲突业已增加，而且在各个地方，民族意识大概都正在加强。强大的区域性趋势，也反对无拘无束的全球资本主义。例如，关于商品贸易，就有证据显示，我们正在目睹的根本就不是全球化，而是区域性集团的形成（如北大西洋自由贸易区、欧盟、东盟等），在区域性集团之间，有的只是最小限度的贸易（Fligstein, 2000；Hirst and Thompson, 1996；Weiss, 1998）。

至于全球化命题，当它被应用到国际流通市场和金融资本运动中的时候，可能是最为正确的。这些确实已经是全球性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是即时的；也就是说，它们收缩了经济行动的时空范围（Giddens, 1998；Harvey, 1989；160 - 172, 284 - 307）。但是，即使在这里，我们也没有发现有证明表明，趋同乃由资本主义非个人经济逻辑本身所推动。相反，最近一轮的集中，乃是国际经济机构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操纵的。而且，虽然国际金融市场对东南亚各国施加了强大的压力，但这一有助于金融制度更趋同质性的压力，其指导方向，却是通过具体的行动者、关于危机本质的理论，以及由美联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展起来的关于“透明度”的修辞来形塑的，其目的就在于消除这些国家现有政策的合法性（Stiglitz, 1999）。在这样的情境中，我们根本不可能在经验上检验“趋同全球化命题”，因为在界定它声称要解释的情景方面，这一理论本身已经扮演了一个核心的角色，塑造了它所预言的那个后果。

简言之，虽然我们绝非上述论题的专家，但我们注意到，它们对“趋同全球化命题”提出了质疑。此外，在我们确实比较擅长的领域，也就是关于1989年之后东欧和中欧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分析中，我们发现了非常有力的证据，来反对关于全球资本主义的一元观点。

（三）中欧和东欧：历史的实验室

在非常现实的意义上，东欧和中欧各国很适合作为20世纪90年代全球资本主义的实验室。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家曾经被给予不受约束的自由，来推行他们的资本主义蓝图，而且他们也欣然为之。然而，这个实验室非但远远没有生产出一个单一的、同质性的结果，反而生产出了众多颇见差异的资本主义体制。例如，东欧和中欧的前社会主义社会在吸收外资和从



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

事外贸方面的程度，各不相同，因此，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是“全球性的”这一方面，它们恰恰是不同的。因此我们发现，同质化和趋同并没有发生，相反，前社会主义世界向资本主义的转型，呈现出发散性的特征。^①

在我们的著作中，我们试图解释这种多样性。我们认为，将不同国家的转型区别开来的关键性因果机制，是共产主义晚期支配阶级中的内部阶级冲突。对中欧和东欧不同国家随后在转型和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差异来说，这些内部阶级冲突的后果是决定性的。因为它们可以解释，在每一个个案中，是谁领导了转型，以及他们试图建立一个什么样的资本主义。

在俄罗斯，而且很大程度上包括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共产主义晚期支配阶级中获胜的群体是党员官僚集团。在向资本主义转型期间，这些人将他们的政治公职转变成私人财产。他们对建设资本主义的各种制度（比如劳工和资本中的自由市场）兴趣不大，而且大概能力也不强。所以，在这些国家中，我们发现了“没有资本主义的资本家”（capitalists without capitalism）：在转型的过程中，前共产党官员积聚私人财富，现在却得在市场制度虚弱或不起作用的情境下运转这些财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个案是俄罗斯，在那里人们可以发现，一个强大的持有恒产的资产阶级，在一个货币动荡不停、市场被以物易物代替、将工人变成农奴的环境中，运转他们的财富（Bonnell, 1999; Burawoy and Krotov, 1992; Woodruff, 1999）。其结果，就是布洛维（Burawoy, 1996）所说的“内卷化”（involution）：这是一种改制形式，它强迫人们接受来自上层的资本主义，生活于其中的前资本主义的行动者和机构，使用物物交换、家庭生产以及依附一庇护关系等方式，要么将自己与市场的逻辑隔绝开来，要么采取防御措施，以适应这种压力。用波兰尼的术语来说（Polanyi, [1944] 1957），市场制度的失灵或脆弱，通过互惠制度得到校正；在互惠制度中，经济关系“嵌入”于一种与市场 and 货币“脱嵌”逻辑（disembedding logic）方向相反的运动当中。

相反，中欧各国经历的是一个不同的转型过程，而且，与东欧的倒退相比，它们似乎被导向了一个不同的方向。在匈牙利、波兰、捷克，以及

^① 对这种转型道路多样性的解释，可参见 Fish (1998) 和 King (2000)。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并不认为，东欧和中欧向资本主义转型的多样性，像有的作者所暗示的那样，反映了社会主义时期之前各种差别的“复归”（例如 Rothschild, 1989）。

程度稍轻一点的斯洛伐克和波罗的海诸国，支配阶级中的官僚集团并没有在共产主义晚期的内部阶级冲突中获得胜利。相反，官僚集团被由专家治国论者、前异议知识分子、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主义企业中间管理层成员组成的联盟击败。就它的性质来说，这一联盟无法致力于将政治公职大规模地转化成私人财产。这是因为，这一联盟中的许多成员，在共产主义时期从未担任过任何政治公职，而那些有过政治公职的人，则受到了限制，比如联盟这一事实，以及尤其是自由媒体和民主选举出来的议会的监督。与此同时，统合这一知识分子联盟的，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结合，其基础乃在于认为建立市场制度是一项伦理使命，是将社会从共产主义的罪恶中净化出来的手段。因此，在中欧的转型社会中，我们可以看到劳工和资本市场的初步发展，对货币稳定和价格自由化的着力强调，而财产权的转型则相对缓慢。在转型的早期，人们创造出混合的所有权，给予经理人广泛的行动自由来控制企业。与此同时，政府仍然以最终支持者的身份发挥作用，尤其以援助的名义，对“私有化”的企业给予支持。^① 随后，这些国家发现，管理者和专家治国论者的联盟与外商合伙人之间达成有利可图的生意。这些外国合伙人接管了新近私有化的企业，然后在那些现在已经是外资所有的企业中，给管理者和技术专家安排了薪水丰厚的管理职位。不过，在所有权关系发生上述变动期间，我们要强调的是，本土的资产阶级是缺席的。这是中欧转型一个非常独特的方面，尤其是拿它与诸如俄罗斯这样的国家中掠夺资本家阶级的成长做对比的时候，更是如此。在中欧存在的，是在外的资本家阶级，他们以跨国公司所拥有的外国所有权为表现形式，但它是与还控制着政权的本土技术专家和管理者形成了联盟。由于这些国家很快就发展出各种市场制度，但却没有一个本土的持有恒产的资产阶级，因此我们主张，中欧的转型生产出了一种“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它所导致的发展策略，不是一种“内卷化”，而是一种“依附型发展”（Evans, 1979）：在政府的鼓励下，大多数的经济发展都发生在出口导向的外资企业中。虽然国内市场仍然发展适度，但这些国家都正在经历一场由出口所引导的工业化，尤其在高科

① 戴维·斯塔克将其成为“重组的资产”（Stark, 1996），而我们在别的地方（Eyal et al., 1997）则将其作为“管理主义”予以分析。现在回顾起来，它似乎已经成为转型特殊策略的瞬时景象。关于这一点，可参见 Hanley 等（2002）



技部门。^①

从东欧和中欧这个对研究者来说最幸运的历史实验室中，我们得出结论：起源、轨迹，以及最重要的，阶级行动者，在塑造从社会主义转型中生产出来的资本主义类型方面，都事关重大。我们得出的进一步结论是，这一证据对单一的、同质性的全球资本主义主张提出了质疑。需要澄清一点，我们并不否认，在未来的某一时点上，这些社会有可能按照新自由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观点汇合到一起，但致力于这种推测，是未来学的事情，而不是社会学的。在我们看来，“趋同全球化命题”在认识论上的地位，与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替代的坚持是一样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经验上的证据可以支持它们。实际上，所有经验证据都指向了相反的方向：东欧、中欧，甚至中国，其间的差异现在比20或50年前更大。^②

（四）社会学的反应：网络分析、嵌入性和新制度主义

针对社会主义垮台所引发的危机，主流社会学的反应（亦即由新制度主义社会学和网络分析所提供的反应），恰恰没有理解资本主义形式在历史上复杂的多样性。这些视角主张，存在一个更具体和更根本层面的社会实体，新古典经济学所理论化的抽象市场机制“嵌入”于其中；这一层面的实体由网络、习俗、模仿（imitation）和习惯（habits），而非个体理性最大化的行动或者供给和需求的力量所组成（例如，可参见 Granovetter，

① 这尤其适合用来描绘匈牙利的情况；没有哪一个类似大小的国家，拥有匈牙利那么大规模的外国所有权。似乎正是这些外国所有权，导致该国高水平的经济增长。在这一方面与匈牙利最接近的，是波兰和捷克；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以及波罗的海三国，则尚有些差距。

② 越南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案例，进一步支持了我们关于资本主义形式多样性的主张。这些国家采取了与东欧和中欧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推进转型，而且它们已经取得了不平凡的成就。简单地讲，东中欧和越南等的区别，是“来自上层的资本主义”和“来自下层的资本主义”的区别。对前者来说，中欧和东欧各国所采取的转型战略，是优先将大型国企私有化或者重组，这一优先性意味着，转型的过程乃是处于支配阶级中胜利者的控制之下。另一方面，在越南，重点并不是国有部门的转型，而是鼓励“来自下层”的企业家在特殊指定的“发展地带”中出现，同时享受外国投资的好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创造出“社会主义企业家”（Szelényi, 1988）的高度成功的战略，靠的是这样一种政治环境：共产党仍然掌握国有部门，并且保护正在出现的私有部门。另一个促使经济发展加快的环境，是外资的流入，尤其是来自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这些规模相对较小的地方。于是，讽刺性的是，中国大陆的市场经济发展，似乎遵循的是“二战”之后中国台湾的发展类型：在紧紧控制外国投资流入的背景下，政府激励小型商业部门的发展。这与1989年之后中欧或东欧的情形几乎没有相同之处。而且，这三种类型，没有一个符合新自由主义版本，后者在今天被奉为全球性规则，是一种认为所有的体制都正在趋同的模式。

1985; Meyer and Rowan, 1977; White, 1992)。然而，正像早先所清晰表示的那样，我们认为，新制度主义社会学（neo-institutionalist sociology）和网络分析（network analysis）的回应是社会学实证主义在当代的“逃跑路线”，而且就其本身而言，作用十分有限。这些进路之所以是实证主义的，是因为它们对于后社会主义时代社会学危机的反应，将社会学的事业界定为对某些无时间性的社会机制（例如网络和互动）的研究。这一策略回避了我们所主张的批判社会学的主要任务：生产出一种对我们时代历史特殊性做出回应的分析。

正像早期的社会学实证主义从社会主义替代选择中获得活力一样（虽然很含蓄，也不被承认），我们认为，新制度主义社会学和网络分析也做出了含蓄的和不被承认的让步：社会主义的替代选择不再存在。帕森斯那样的思想家的宏大社会系统已随风而去，取而代之的，是新制度主义社会学和网络分析撤回到了具体的、日常的、人际的以及习惯性的分析层面。因此，他们并不争论理性的意义是什么，而是否认其重要性，并强调盲目的模仿（Meyer and Rowan, 1977）；他们并不争论关于资本主义单一逻辑的观点，而是完全回避这一话题，并强调嵌入性（Granovetter, 1985）；他们对阶级消失的宣言无动于衷，而是把关于社会结构的观点，萎缩成关于“网络”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我们认为，所有这些智识上的选择，都包含了对“理性选择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含蓄让步：在有限理性的假定下（Simon, 1982），模仿是理性的；网络是被最大化的个体操纵的资产；而嵌入性不过是在理性选择旁边加了个括号，亦即假设“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是平等的……”

东欧向资本主义的转型，为评估这些实证主义进路的效用和批判潜能提供了经验性的实验室，就像它为“趋同全球化命题”所做的那样。所以，举例来说，如果我们将新制度主义社会学和网络分析应用到对诸如俄罗斯这样的案例分析中（在那里，有资本家却没有发育完全的资本主义），我们就会发现，通过网络、嵌入性和互惠，经济整合正在发生，这正好与新制度主义和网络分析的进路中所着力突出的机制吻合。然而，我们认为，这并不是对这些进路的一个辩护。正相反，它揭示出，这些进路缺乏批判性的历史意义。这些实证主义的分析没有注意到在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背景下，嵌入性和网络的社会历史后果。这样的分析不太可能观察到，俄罗斯的经济系统是在一条朝着政治资本主义的内卷化的经济发展道路上前进（这种类型，就像韦伯所分析的19世纪的普鲁士一样）。而且，



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

在这样的环境下，政治文化很有可能成为威权主义，并被用来反对自由民主制度的发展（Schluchter, 1985）。我们的观点是，虽然人们有可能在某种抽象的层次上，把嵌入性和网络作为经济行动的恒定状态，但这一进路不可能提供历史的洞见，也不可能支持那种在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及其后果间进行历史比较的研究；而如果社会学要想继续它的批判使命，这种比较研究就是它最有意义的议程。

在另一方面，我们认为，关于嵌入性和网络的社会学理论倾向于将社会行动者的性质当作给定的或没有问题的。在这一点上，这些理论很像新古典经济学。它们中没有一个认真考虑了在中东欧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过程中社会行动者，尤其是集体行动者的角色。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家（以及很多社会学家）认为转型的核心议题是“制度建设”（institution building）。他们认为，如果设计出正确的制度，完美地从西方拷贝经验，就能保证向市场资本主义的平稳过渡。直到今天为止，新古典经济学家仍然在努力为他们的转型项目失灵做无休止的辩护（Aslund, 1995）。另一方面，网络分析的核心议题是“路径依赖”。在这里，焦点是：与共产主义时期相联系的残存的网络和制度，如何限制了“纯粹的”市场关系的发展（Stark, 1992）。不过，在关于行动者的分析缺席的情况下，“路径依赖”仍然是一个迟钝的概念，无法说明为什么中欧的经济富有活力，而东欧的经济却停滞不前。因此，与这两种视角不同，我们对资本主义进行比较分析的进路，聚焦于行动者。我们主张，那些正视和执行资本主义计划的行动者的社会位置、轨迹、世界观、身份及其联盟，很大程度上已经决定了这些国家中业已出现的资本主义的类型。

（五）比较资本主义

我们关于当代东欧和中欧资本主义的比较研究也暗示：我们将自己的批判聚焦于资本主义的历史；也就是说，从历史上关于后社会主义的新角度出发，重读我们认为自己所知道的西方资本主义。我们并不是在说，随着社会主义的死亡，资本主义已经变得更加多样化，毋宁说，我们所主张的是，我们更有能力来看见和正确评价它的多样性。在以前，社会主义替代选择的存在，掩盖了资本主义多样性的重要价值。所以，虽然在过去，有很多尚健在的学者都曾论证过资本主义发展轨迹的散发性和独特性，比如在日本和东南亚（例如，Dore, 1973），但这些区别都未被充分理论化。

马克思主义世界体系理论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理论的支配地位，意味着这些丰富的历史说明从没有被用来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发散道路进行持续的比较，而且，它们也没有在理论上被整合进18世纪关于资本主义的概念中。实际上，与比较民主主义和威权主义政治制度领域中的理论发展（例如，O'Donnell and Schmitter, 1986）相反，我们要说的是，比较资本主义领域中的理论发展沉闷无趣（一个例外，可参见 Fligstein, 1996）。

不过，随着社会主义的崩溃，我们认为，比较资本主义的领域将启示一门新的批判性社会科学。过去曾有一种强求的逻辑，它规定一个人要么支持资本主义，要么支持社会主义，而不管它们的多样性和代价是什么。现在则不同了，随着社会主义的垮台，我们从这种错误的二元对立中解脱了出来。现在我们承认，区别出不同的社会类型和社会发展过程并且描绘出它们的可能后果，具有重大价值。在这一方面，我们追随了韦伯的做法。面对他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韦伯曾对世界上和历史中不同的资本主义构成进行比较，以努力做出一种紧迫性的政治选择（a pressing political choice）。具体而言，韦伯曾想展示，政治资本主义（不管是它的古代形式，还是标志了当时他所生活的德国社会之特征的普鲁士版本）给社会发展强加了沉重的代价，阻碍了工业化和政治自由主义的进程。在俄罗斯政治资本主义的当代形式这一方面，我们倾向于分享韦伯那严肃的判断。像韦伯一样，我们也认为政治资本主义的社会代价是沉重的。我们相信，这就是批判性社会理论能够和应该提供的那种算法（calculus）；通过使用经验性社会科学的工具，社会行动者能够评估和自己有关的不同社会安排和行动过程的成本和收益。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我们还将回来继续讨论批判社会学的社会角色。

三 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终结 意味着阶级分析的终结吗？

“历史终结论”的另一个受害者是阶级分析（class analysis）。我们到处都听到有人说，阶级正在衰落或者死亡，而东欧向资本主义的转型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准确的说法是，社会主义的崩溃不仅对马克思主义而且对社会学丰富的阶级分析传统提出了挑战。主要原因就在于，后共产主义的转型是历史上第一次在一个曾经废除了私有产权，甚至连私有财产阶级的萌芽都没有的社会里发展出了资本主义。这也是我们著作的核心困惑，



以及我们将其冠以《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这一标题的原因。这一标签最为合适地描述了中欧的案例，但也能够识别 1989 年以后，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早期阶段中的普遍情况。过去关于向资本主义转型的理论，几乎没有对这一独特的情形提供任何洞见，因为它们总是假设，在一个资本主义系统建立之前就存在一个有产阶级。例如，关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争论，就围绕下面这一问题展开：这一转变过程中的行动者（agent）是城市商业资产阶级，还是土地经营贵族？（Ashton and Philips, 1985; Dobb, 1946; Holton, 1985; Sweezy, 1942）在后共产主义转型开始时，这样的行动者在哪里都是缺席的，而且事实上，很久以后他们才在中欧出现。于是，在后共产主义的情境下，对于资本主义的出现来说，阶级分析似乎将没有什么意义。在分析的空白地带，“历史终结论”再一次地冲了进来。它宣布，将阶级的终结当成转型的主要问题，我们应该如何设计出正确的资本主义制度来培育企业家身份和市民社会？与此相反，我们提出了这一经验性的问题：谁是塑造转型的行动者和力量？

我们主张，这一关于行动者的问题是关键；事实上，我们这本书的核心主张就是，中欧向资本主义的转型就是一项知识阶层的阶级规划。^① 虽然在向资本主义的转型中，某些知识分子和专家治国论者已经扮演起尚未出现的有产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这一角色，但我们认为，这些知识分子还是最好被概括成“文化资产阶级分子”，或者“文化资产者”（Kocka, 1993）。在这一点上，我们指的是，知识分子中的这些派系之所以可以被界定为阶级行动者，更多是因为他们所掌握的文化资本而非经济资本的结构特征，以及建造一个资产阶级文明的历史规划，亦即建设资本主义市场制度、自由民主体制、法治和市民社会。

这一关于“文化资产阶级分子”的概念，要求我们通过两种方式打破传统的阶级分析。首先，在第一种阶级分析的传统中，当知识分子表现出反资本主义或后资本主义的特征时，他们通常都被视为“新阶级”来进行分析。“新阶级”这一概念，要么被应用到对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体制中的角色的分析上（Djilas, 1957; Konrád and Szelényi, 1979; Machajski,

^① 我们之所以在这里集中关注中欧，而将东欧和俄罗斯的情况（亦即“没有资本主义的资本家”）排除在外，是因为后者所引出的谜团要小一些。那些将自己转变成私人资本家的“党国精英”成员所扮演的角色，允许我们将他们视为正在形成中的资本家阶级。如果读者熟悉关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讨论，就很容易将这批人类比为那些利用他们在旧政权中的职位，将自己转变成食利资本家的包税贵族与官员（Staniszkis, 1991）。

1937), 要么被应用于资本主义内部, 用来分析知识分子作为颠覆性的力量出现这一情形 (Bell, 1973; Burnham, 1941; Gouldner, 1979)。在有些情况下, 比如知识分子并没有站在反对资本主义规划的立场上, 或者鼓吹资本主义的时候, 这些就被当作知识分子并没有组成一个阶级的证据, 因为他们并不能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行动 (例如, Brint, 1985)。其次, 在第二种社会学传统中, 阶级被定义为其利益根植于经济系统的集体行动者, 他们的位置, 要么从财产关系, 要么从市场位置这些方面得到界定。在这一视角看来, 区隔的文化标志在阶级结构化 (class structuration) 中至多扮演第二位的角色 (Giddens, 1973: 99 - 117)。关于文化资产阶级分子的观点, 打破了阶级分析中的这两种传统, 并且指向了某种重述。第一, 我们主张, 将文化资本视为阶级位置的一个基础, 意味着一种更一般性的关于“阶级性” (classness) 的概念, 它的应用范围, 远远不止对东欧和中欧转型的分析。第二, 我们指出, 将知识分子视为资本主义的行动者, 意味着更多地关注知识分子发挥的特殊权力, 亦即话语, 并且在此基础上,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重新思考知识分子在社会变迁中的角色。

(一) 阶级性

再一次地, 我们将“阶级性”这一观念追溯到韦伯那里, 将他关于“阶级” (class) 和“等级” (rank) 的区分 (他用它们作为描述社会结构的替代性概念) 作为我们的出发点。“等级”指的是一个由“政治集团” (estates) 构成的社会, 而“政治集团”则被理解为用私人的忠诚和顺从来连接成员的等级制度, 其中, 通过法律和传统, 人们在生活中的地位是相对固定的。相反, “阶级社会”由阶级组成。阶级被界定为由没有形成共同体 (community)^① 的行动者 (actors) 组成的范畴, 其成员并未通过个人纽带相互束缚在一起, 或者通过法律和传统而被固定在某个地方。毋宁说, 在阶级社会中, 行动者表现出在共享的市场位置 (shared market position) 的基础上采取行动的可能性。这种在概念上的区分, 可以被描绘成一种连续统 (continuum)。如果在界定一个共同体中个体成员资格的方面, 有非常清晰和有约束力的接纳与排斥规则, 那么, 这个人就更接近于这个连续统的“等级”一端; 如果这样的规则并不存在, 而个体仍然用一种以共享利益为基础的一致方式来进行

^① 我们在韦伯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



动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更接近于这个连续统的“阶级”一端。在特殊的经验环境中，社会行动者也许会被他们在这个连续统中的不同位置，亦即他们不同程度的“阶级性”或“等级性”（rankness），刻画出不同的特征。

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我们建议，韦伯对等级和阶级的分析性区分，通过布迪厄关于不同资本类型的理论可以得到有益的阐发（Bourdieu, [1983] 1986; Eyal et al., 1998: 66 - 70）。因此，等级社会可以被理解成这样一种分层秩序，其中社会资本处于支配地位。毕竟，“政治集团”是一种由依附—庇护关系组成的等级网络，其中的个体根据先赋社会特征来运转。相反，阶级社会可以被界定成一种经济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分层秩序，而且具有符号权力的，是钱而不是高贵的出身，它们设定所有其他资本类型的兑换率。

文化资本怎么样呢？我们的主张是，文化资本在等级—阶级连续统中占据着中间位置。一方面，一种文化资本占据支配地位的分层秩序通常会引起类似“政治集团”的分组（groupings）。这样的群体通常通过某种形式的资格认证确立职业封闭，培育出各种经过精心设计的内部等级制。一旦实现这些目标，资格证书的功能就可以归为授予其持有者各种好处和特权（Collins, 1979）。当然，这种资格认证必须首先完成竞争，而且要得到精英统治的意识形态的承认；而就这种意识形态来说（古尔德纳将其称为“批判性话语文化”），知识分子类似于一个阶级。也就是说，他们是集体行动者，但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不是具体的纽带，而是抽象的关系和可能共享的利益。因此，我们主张，因为知识阶层是一个通过对文化资本的占有而得以界定的范畴，所以，它应该被视为阶级行动者，尽管是阶级性程度相对较低的阶级行动者。

恰恰是这种“等级”和“阶级”之间的社会位置，描述了知识阶层矛盾性的混合性质，并且使得集体行动者有了巨大的改造潜力。后者在共产主义社会晚期可以看得十分清晰：知识阶层可能成了唯一有能力或者有兴趣致力于将社会主义转型到资本主义的行动者；也就是说，将一个掌握社会资本（表现为被授予最有利条件的党员身份和党的网络纽带）的等级秩序，转变成一个文化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经济资本日渐上升的阶级社会（尽管阶级性程度较低）。

（二）资本主义转型中的知识分子

中欧的知识分子是如何成为资本主义的行动者的？在什么意义上，资

本主义是一项知识分子阶级的规划？这是一个违反直觉的困惑，尤其当我们回想起许多中欧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他们的生涯早期都曾是社会主义的热心支持者，而今天却热心于资本主义的时候，更是如此。他们中的许多人，作为“新左派”知识分子、对效率和科学计划感兴趣的专家治国论者，或者作为在共产党内工作的改革派，曾经致力于改革社会主义这一目标。因此，这也许会引诱人们将当前中欧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热情看做是一种“欺诈”（bad faith）；人们也许会说，他们只不过是给资本主义提供服务的受雇用的理论家，以换取经济上的保障。出于三种原因，我们认为应该对这种引诱进行抵制。第一，在后共产主义转型期间，并没有什么要求知识分子提供服务的支配性的资本家阶级。此外，中欧知识分子可能也是人们所能见到的最强大的知识阶层，他们掌握了更多的官方职务，比以前任一时期都拥有更大的社会权力。第二，并没有什么内在的原因，使得资本主义需要这些中欧知识分子所表达的这种伦理辩护。资本主义是一套自我合法化的系统，它可以在不需要工人或企业家相信它的道德优越性的情况下“运转”。因此，对资本主义优越性的道德热忱和信仰，之所以会成为后共产主义转型的标志，必须被追溯到中欧知识分子自身的个人生平和世界观上去。而这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观点：对这些个人生平和世界观的分析显示，不仅是个别身居高位的知识分子在鼓吹资本主义，而且资本主义已经成为知识阶层的一项阶级规划，亦即一项建设新的社会秩序的集体行动。

中欧的知识分子对改造性的社会规划并不陌生。30年前，社会主义知识分子进行了一次集体性的规划，其目的在于改革社会主义，让它变得人道化。他们试图成为一个合理化的社会主义的新支配阶级，作为相信目的论的再分配者（teleological redistributors）来行使权力（Konrád and Szelényi, 1979）。慢慢地，他们从这个规划中走了出来。因为他们逐渐认识到，只要社会主义的官僚政治存在一天，这种合理化就不可能。只有慢慢走出这一失败的阶级规划，在经历几十年的协商、冲突和斗争过程之后，中欧的知识阶层才开始赞同建设市民社会和资本主义的规划。通过分析这一过程，我们指出，当前知识阶层的资本主义规划之所以能够被采纳，其原因和社会主义规划如出一辙。那就是，建设资本主义的规划之所以被实行，并不是为了其他阶级的利益，而恰恰是因为中欧的知识阶层正在寻找一种新的社会角色和维持文化资本价值的新途径（Eyal et al., 1998: 46 - 85, 135 - 142）。



为了完整地详细阐述这一论点，我们需要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知识分子的阶级权力。之前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分析，往往倾向于狭隘地思考文化资本的“保值”（valorization）现象，将它与社会封闭联系起来。这种社会封闭，以对比较深奥的话语的垄断为基础。这种关于知识分子权力和知识分子阶级能力的理解，显示了在追求职业自主性，以及市场资本主义中专业服务商品化之间，存在着持续的冲突（Gouldner, 1979: 18 - 27）。于是，社会主义似乎更有助于知识分子阶级的形成，因为再分配（它也是一种经济剥削的机制）同样为知识分子创造了可以作为核心计划者的位置，从而垄断深奥的、目的论性质的话语（Djilas, 1957; Konrád and Szelényi, 1979）。不过我们认为，在这两种情况下，这种对文化资本保值的分析是有限的。毕竟，文化资本是话语。对于作为资本来运作（亦即可以被兑换和积累）的话语来说，垄断（亦即限制没有资格的成员进入）仅仅是状态之一。另一种状态是某种程度的慷慨（generosity）。也就是说，话语要想像资本那样发挥作用，就必须能够说服最大数量的言说者（speakers）采用它的规则、用它的语言说话、利用它所提供的视角，以及用它的方式来摆出问题、证明其主张的正当性（Foucault, 1982; Gouldner, 1979; Rose, 1992）。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认为，中欧的知识阶层之所以成为一个“文化资产者”，并且从事建造资本主义和市民社会的规划，是因为他们发现，在这样的一个规划中，他们有可能详细阐发一种新的、强有力的理性话语。在转型的过程中，中欧的知识阶层推行了许多关于理性的新标准，并且说服了其他的行动者，用他们发明的新语言说话。正是通过这一方式，知识阶层作为阶级行动者，在中欧向资本主义的转型中，占据了舞台的中央（Eyal, 2000）。

（三）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关于社会变迁的理论

将话语作为知识分子阶级权力的基础来理解，牵涉到经典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关于社会变迁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据敌对阶级之间针对经济利益的斗争来解释社会变迁，而韦伯主义的理论则众所周知比较含糊，提供了一个关于“卡里斯玛”的模糊观点，认为它是历史上的革命力量。在我们的著作中，我们对这些命题进行了综合和修正：正如马克思主张的那样，社会变迁确实是由冲突中的阶级造成的；但社会变迁的“承载者”通常都是知识分子阶级行动者（intellectual class actor），尤其是，知识分子运用文化资本首开变迁之风——在这里，文化资本的功能和韦伯所主张的

卡里斯玛是一样的。

文化资本怎么能够像卡里斯玛一样呢？首先，因为文化资本在等级和阶级之间占据了中间的位置，所以，经由占有文化资本而得到界定的群体，也许就会发展出集体性的利益，要么，在于以等级为基础的分层秩序，要么，在于以阶级为基础的分层秩序。换言之，在任何一个给定的分层体系中，知识分子总是对相反的分层原则感兴趣。所以，例如，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秩序的批判经常以呼吁业绩和才干为基础，而他们对阶级社会的批判经常基于社会封闭的意识形态，比如专业自主性或者学术自由。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两种知识分子作为集体行动者发挥作用的阶层秩序中，他们阶级性（或者“等级性”）的程度都比较低。这为革命性转变中知识分子那基础性但短暂的阶级权力提出了一种解释：由于文化资本的持有者组成的是一个组织程度较弱的集体行动者，于是，组织得更好的行动者最后总是取代了他们的位置。^①

其次，就文化资本作为话语这一性质来说，它的这种改造能力，亦即卡里斯玛型能力至关重要。发明一种新的话语往往会产生革命性的后果，因为它强加了一种言说和感受世界的新模式；它拥有一种“创造世界”（world-making）（Bourdieu, 1987a; Goodman, 1978）和“毁灭世界”（world-destroying）的力量。与此同时，话语还强加了一种关于何为真实世界的特定观点，它同时给新社会行动者分类、命名，并行使权力。通过这一方式，话语将世界划分成真实的和虚假的、未来的先驱和过去的老古董。那些用旧方式说话的人，突然之间发现自己被指责成不具道德和理性的人。这还不单是说他们表达了一种不同的意见，而是说他们在最深层的意义上不具备资格能力，因为他们并没有用这种新的话语说话——也就是说，他

① 文化资本的持有者是真正的马克思所说的“普遍阶级”（universal class），因为在革命之后，他们倾向于废除自己以及他们的阶级统治。他们也可以被理解成韦伯所说的历史上的“扳道工”（switchmen），亦即将各种文明由某种社会结构形式和分层原则转换成另一种社会结构形式和分层原则，但是，当火车越过轨道的时候，他们又会站在后面。他们的阶级权力从来没有持续下来。因此，当古尔德纳主张知识分子是一个“有缺陷的普遍阶级”的时候，他是正确的；但在解释原因的时候，他又是错误的：他认为，知识分子之所以有缺陷，是因为他们是利己主义的，试图建立他们自己的阶级支配（Gouldner, 1979: 83-85）。我们则指出，他们之所以有缺陷，恰恰是因为相反的原因，因为作为一个阶级来说，他们的组织很弱，不可能长期维系他们的阶级统治。



们并不了解真正的“真理”。^①由此观之，作为话语的文化资本何以能够生产出激进的变迁已经很清楚：它和韦伯曾描述过的卡里斯玛的暴发是一回事。它甚至有可能说明，韦伯为什么含糊不清地坚持认为，卡里斯玛型的个体在社会变迁中是非常重要的。话语，虽然是一种集体性的产物，但却倾向于使某种特定的代言人，亦即作为其卡里斯玛品质人身体现的大师，变得神圣化。因此，正如韦伯所察觉到的那样，一个卡里斯玛型的个体，经常会引发知识分子阶级的形成，以及改造性话语的表达——这就像很难去否认像毛泽东这类人的重要性一样。

不过，正如卡里斯玛的角色是暂时性的一样——变迁被迅速地制度化，革命背叛了它的子民——文化资本的统治也是短暂的。文化资本的权力是话语的权力，而话语，正像福柯解释的那样，不可能被占有。关于真理的权力，是这样东西：真的范畴也会受其支配，但新的真理、新的观点、新的反思性转折，早晚都会来挑战刚才那个真理。它越是被宣扬、重复和神圣化，对那些熟识批判性话语文化规则的人来说，就越没有说服力。因此，在中欧的转型中，知识分子刚刚实现他们的历史使命，新社会结构刚刚就位，领导这场转型的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力就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知识分子慢慢地被赶回到他们原来的位置上，只是作为一个拥有相对特权的政治集团中的成员。一旦如此，知识分子之间互相争论的空间又再次打开。作为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②，他们使自己成为各种不同阶级中的一分子，而话语的多重性也再次出现。在这样的环境下，与转型时期相比，知识分子的阶级性甚至更低，但相对的，他们对伦理上细微差别的辨识能力，却大大增强了。在这一点上，我们曾推介过的反讽性批判也成为可能。所有这一切，都描绘了知识阶级的“普遍”特征：他们的统治，建立在文化资本丰富却短暂的权力的基础上，因此，在他们占据支配地位

① 布迪厄将其称作“符号暴力”，而且，在刻画法西斯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对权力的假设的特征方面，它看起来似乎是不证自明的。不过，我们也观察到，在共产主义垮台之后的中欧，掌权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那些不同意他们的人的态度，往往也是偏执的：他们立刻对那些反对者实施严惩，把他们当作是不称职者、过去的老古董、倒退回共产主义或者极权主义者（一个很好的例子，可参见 Klaus, [1991] 1992）。发现这种获得胜利的新符号暴力是“自由主义”的话语，无疑是一种反讽。

② “有机知识分子”以及相对应的“传统知识分子”是葛兰西提出的一对著名概念。所谓的“有机知识分子”，强调的并不是“知识”分子，而是知识分子的参与职能，他们可以为民众创造新的“共识”、执行教育和对话的职能，亦即在市民社会中赢得“文化领导权”的胜利。——译者注

的同时，注定要将自身废除。

这种对社会变迁理论的重释和综合，突显了布迪厄的观点：阶级最主要的是“纸上的阶级”（classes on paper）。人们不应该过分强调阶级形成中的结构条件，而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布迪厄称之为“符号暴力”）同样重要（Bourdieu, 1991）。在从社会主义等级秩序向资本主义阶级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我们就看到了这一点：我们发现，当知识分子命题、归类和打造新阶级和阶级位置的时候，他们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不过，马克思主义者也许会争辩，知识分子只是看上去在创造阶级（make classes），但事实上，早先社会已经孕育了这些阶级，知识分子只是一群为这些阶级代言，或者谈论他们的空想家而已。我们发现，这种观点并不可信。这样的分析，也许可以很好地概括法国或者其他古典资产阶级革命中知识分子的角色，但是，对1989年的革命，甚至布尔什维克革命来说，它却是明显不准确的。在1989年之后中欧向资本主义的转型中，在知识分子的集体行动之前，并不存在资本家阶级。相反，资本家阶级是被这些知识分子发明和呼唤出来的。我们并不是在玩什么后现代。我们并不是在说，只要你给他们取个名字，阶级就会形成，而不需要必要的结构条件；但严格说来，这些结构条件并不需要将阶级的存在包含在内，即使是胚胎形式的阶级也是如此。到了20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已经陷入深层结构性危机，而这一危机，成了知识分子新批判性话语形成的物质基础。但是，如果有人主张，那个时候“党国精英”已经成为一个初期的持有恒产的资产阶级，而知识分子正在无意地阐明他们未来的利益，那将是非常幼稚和容易引起误解的。在共产主义社会晚期的背景下，事实上要求人们有一种非常出色的想像力，来发明一种关于新资产阶级的思想。事实上，在1980年，任何人如果暗示，东欧在10年之内将会发生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他们都会被一笑置之，即使是西方的反共分子和社会科学中最出色的人物也不例外。所以，必须搞清楚：强调话语权力在阶级形成中的角色，并不意味着阶级并不重要，也并不是精心虚饰、拐弯抹角地说阶级正在消失。相反，我们所提出的，是阶级分析的复兴，它将话语确定为阶级形成过程中的核心环节。

（四）另一个例子：20世纪资本主义中的阶级分析

我们关于社会变迁中阶级概念和知识分子角色的再思考，同时也暗示了一种对西方资本主义中知识分子阶级行动性质的历史再分析。使用我们



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

的分析框架，我们能够拓展关于知识分子阶级行动的分析，不仅将其当作是反资本主义煽动下爆发的宣言，而且当作是知识分子在致力于改革和使资本主义理性化的过程中，所爆发的宣言。

相关的一个案例，就是20世纪早期管理主义在美国的兴起。请原谅我们不同意伯纳姆的观点（Burnham, 1941），我们认为，这一案例的意义不在于说管理者做好了准备，要从资本家手中夺权并且确立他们自己的阶级支配，相反，管理者的目标是说服其他所有阶级行动者一起使用新的管理主义的话语说话，从而将资本主义理性化（Shenhav, 1999）。从这一视角来看，伯利和米恩斯的主张（Berle and Means, 1931），以及20世纪60年代围绕所有权和控制的争论（Zeitlin, 1974），都跑题了。管理者的权力，并不仅仅建立在他们限制话语的能力上（当然最初不是这样），因此，关于“控制”的事实并不必然是管理者权力中最有意义的面向。毋宁说，与管理革命相关的，是对管理主义话语的宣传和推广；它涉及劝说所有者、工会主义者，以及其他每一个人来言说管理主义的话语。通过这一方式，管理主义改变了阶级力量的平衡，因为它在资方和劳方之间插入了管理者，使劳资双方的阶级性都减弱了。所有者和工人之间新的协商焦点变成“生产力”，而且随着工资的增长，它开始与生产力增长勾连起来（Block and Burns, 1986）；也就是说，管理者作为“生产力的专业人士”出现，他们测量和培育生产力的增长，将它组织起来，激发工人去实现它，等等。与此同时，阶级斗争被分解成两部分：一是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就理性管理和效率的议题所展开的斗争，二是管理者和工人之间关于纪律、动机和知识的斗争。这就是管理者试图使资本主义理性化的方式：资本家自己组织资本霸权对抗对立面。

但不能就此推论，只是因为管理者未能从资本家手中夺取阶级权力，管理主义就是一项失败的新阶级规划（Martin and Szelényi, 1988）。我们的主张正好与之相反。就像新古典社会学的视角允许我们将知识分子视为当代中欧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以及现代性的共同缔造者那样，通过改变各竞争性阶级的阶级性，20世纪早期美国的管理主义运动有效地施加了自己的新话语，改变了各阶级力量的平衡，可以被视为一项成功的阶级规划。在这两个案例中，社会主义替代性选择的缺席，使得我们可以广泛地思考知识分子的阶级权力和他们在社会变迁中的角色。这一新古典视角使得我们可以看见，知识分子的集体行动并不总是旨在超越资本主义，也旨在将其转型和合理化多样化的形式与目的。

四 没有了社会主义替代性选择的 批判性社会科学可能实现吗？

从我们的分析中，人们会得出结论说批判社会科学已经不再可能吗？没有了社会主义者关于古典理论的看法，我们还能够从事批判性社会科学吗？或者说，我们需要创造出—个“真实的社会主义乌托邦”，从而为—门新的批判社会学奠定基础吗？我们的回答是：社会主义替代性选择的消失其实为批判性社会科学提供了—个绝好的机会。这意味着社会学家（以及—般意义上的批判知识分子）不再有义务或者诱惑，在某种正在出现或者实际存在的社会秩序中，扮演高贵的教士—角。事实上，我们现在有机会将后社会主义知识分子降级了的要求和渴望，转变成—种新的知识分子力量——欣然领受反讽的批判力量。

这种新型的批判性想像力，并不是少数不满的知识分子的一时之兴。它是我们在上面曾分析过的集体经历所提供的、在历史上早已决定了的客观机会；这种集体经历已经将许多前批判知识分子转变成资本主义的空想家，剩下的其他许多人则成为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我们指出，“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幻灭，—相同的经历同样能够激发出—种新型的批判性反思。这在当前显得尤其重要，因为在深陷困境的有关转型的改造话语中那些截然二分正在消散，开始让位于各种细微差别程度更大的观点所表现出来的多重性。现在，我们应该将关于转变的态度悬置起来而自问：如果我们曾经长时间地信仰（民主的、自我管理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但是现在却认为我们在根本上就是错误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再次犯错呢？过去给我们上的真实—课，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将我们的知识分子迷恋或者我们自己看得过于认真？

在1961年，在共产主义经历了足够长的时间，关于它的改造话语的截然二分正在削弱的时候，拉·科拉柯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在—篇评论中提出了这样—个问题：在—个“成熟”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知识分子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认为，当我们在社会主义垮台的阴影下，来探询批判性社会科学的可能性的时候，他的那篇评论再—次切合了时宜。

科拉柯夫斯基区分出三种知识分子可以扮演的角色：教士（priest）、爱说笑话的人（jester）和哲学王（philosopher king）。教士通常是批判性的，因为他或她的专长，就在于发展出—种乌托邦式的或超验的观点，描



绘出一种更加合意、更加理性、在道德上更加优越的社会，然后与现实社会形成对照。^① 不过，教士的视角并非唯一可能的批判视角。“爱说笑话的人”生产出反讽性的批判，但它与教士的愤怒不同，它的指向是经验性的，而非道德性的，因此，它提供的是一种内在的批判（immanent critique）而非先验的批判。^② 作为内在的批判，“爱说笑话的人”的分析从来不用一种关于更加理性或更加正义之社会的观点，来与现实社会做对比。相反，“爱说笑话的人”揭露当前的专横霸道，强调那些看上去合理、必然、公正和纯粹的现象，其实是意外的、暂时的、荒谬的和混合的（Jacobs and Smith, 1997）。与教士和“爱说笑话的人”都不同，哲学王代表了作为统治者的知识分子，他们试图把头脑中想象出来的完美政体，强加到人间。与教士相似的是，哲学王也提供超验，但与教士不同的是，哲学王并不扮演批判性的角色。“爱说笑话的人”与哲学王的区别更大：前者不仅仅是批判性的，而且由于他们是经验性的，因此也是非超验性的。

可以被增加到科拉柯夫斯基的类型学当中的第四种知识分子，是工程师（engineer），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韦伯关于“术士”（magician）的理想型（Weber, [1922] 1964; Bourdieu, 1987b）。我们认为，大多数美国社会科学家就是这样看待自己的。在技术态度也是经验性的这一意义上，术士/工程师与“爱说笑话的人”结成同盟，从而反对哲学王和教士的超验姿态。但是，术士/工程师在好几个方面也与“爱说笑话的人”有所不同。正如韦伯所注意到的那样，术士受到客户要求的严格限制，从而必须实现他们特殊的请求。这也是工程师所面临的情境。相反，“爱说笑话的人”却不需要对特定客户的特殊要求做出回应，他们要面对的，是公众；他们的任务，是让公众感到震惊，去明确表达公众尚未想象到的思想，或者去大声说出公众不愿意承认的事实。术士或者工程师要想保护他们自己不受客户要求限制的唯一方式，就是借助他们复杂和深奥的专门知识，亦即他们复杂的模型和技术。因此，术士/工程师必须非常严肃地对待自己以及他

① 正像科拉柯夫斯基所说的那样：“教士是绝对事物（the absolute）的护卫者，他维系了人们对最终的和显而易见的事物的迷信，因为它们都被传统承认，并包含在传统当中。”（Kolakowski, [1961] 1968; 33）

② 正像科拉柯夫斯基所明确表示的那样：“‘爱说笑话的人’是这样一种人，他迁入一个好的社会中，却不属于它，而且用无礼的方式对待它；他怀疑所有似乎不证自明的东西。他……以局外人……的眼光进行观察，目的是揭开显而易见的事物背后并不显见的东西，揭开最终事物背后尚未终结的过程……”（Kolakowski, [1961] 1968; 33 - 34）

们的模型，而这又削弱了他们自我讽刺的能力。我们认为，对大多数的实证科学来说，这是一项公正的描述。虽然实证科学是批判性新古典社会学的盟友，但却难以让自己的根本假设服从于详细审查或反讽性自我反思。

图1试图系统性地综合我们对不同种类知识分子角色的区分。从韦伯《宗教社会学》(Weber, [1922] 1964)一书中的角色类型学开始，我们沿着布迪厄关于教士、哲学王、术士和“爱说笑话的人”的理想型的分析(Bourdieu, 1987b)，试图概括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场域的特征。文化生产场域可以通过两组关系的交叉来进行描述。

第一组关系是批判性和肯定性(affirmative)位置之间的矛盾。它反映了两种人之间的张力，一种是接近世俗权力(temporal power)的人，在这里我们指的是思想之外的政治权力；另一种是那些仍然主张牧养权力(pastoral power)的人，这种权力被理解成从文化资本要求中兴起的思想权力，或者，如古尔德纳可能会说的那样，这是一种从对批判性话语文化的优先把握和承诺中兴起的权力。哲学王和术士总是涉足世俗权力，或者作为独裁者和技术员，或者作为党派的智囊。相反，“爱开玩笑的人”和教士并不渴望世俗权力，却对现状给予清晰的批判，他们试图通过论点中纯粹的思想力量，来影响其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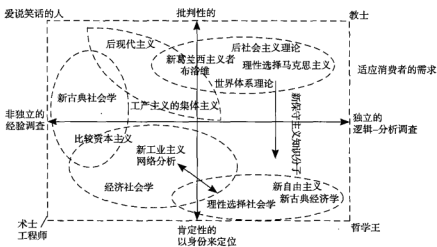


图1 社会主义垮台阴影中的社会科学调查场域

这张图中并没有出现“先知”。“先知”描绘的是社会变迁时期掌握文化资本的卡里斯玛型人物；在那个时候，知识生产场域中社会关系的特征，都暂时失效了。



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

第二种塑造社会文化调查场域结构特征的关系，是文化“商品”的供给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利益矛盾。所谓文化商品，我们指的是知识分子实践的产物，比如知识、救赎、专业服务、技术专长或者艺术。一般来说，这些商品的供给者感兴趣的，是从需求中独立出来（independence from demand）。供给者想塑造消费者的口味，但他们并不想迎合特殊客户的要求。这本来就是教士和哲学王所做的事情，他们告诉人们应该立志去做什么，或者，试图使人们皈依他们的观点，相信来世的救赎或者纯粹的美学理念。相反，文化商品的消费者所感兴趣的，是满足他们的需求和愿望。消费者喜欢让他们的口味来塑造知识分子的产品。这就是术士/工程师和“爱说笑话的人”的工作背景：通过提供世间的拯救或者娱乐，他们迎合了大众或者特殊客户的需求。因此，与教士和哲学王不同，术士和“爱说笑话的人”更加依赖于客户的需求。

一旦对知识生产的场域做出界定，我们就能够利用它对各种各样的研究议程和学术方案进行归类；在分析中欧和东欧向资本主义的转型，以及更一般性的当代社会历史调查场域中，这些议程和方案都在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在这里，我们尤其倚重麦克·布洛维关于理论视角的新分类，不过需要道歉的是，我们的观点与他多少有所不同。^① 我们辨别出四到五种范式，而且坦率地承认，这些范式的边界是模糊的，这也正是我们将它们画成模糊的、延伸的、交叉的椭圆形的原因。实际上，“范式”这一术语并不非常合适，因为这些分组中的每一个，都同时指涉了研究计划，知识分子的具体群体，知识分子的方案，这些计划、知识分子、方案的历史轨迹，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这些东西相互之间的互动。不过，这些归类构成了一套相对好理解的、连续的调查线索，由知识分子个人生平组成的群体，以及长期以来的知识分子方案。

将后社会主义理论（postsocialist theory）作为起点，我们将看到，它是批判性的和乌托邦式的，因为它仍然与政治权力离得很远，而且试图塑造消费者的口味。在上个世纪，它所绘制出来的轨迹是向上的：从接近哲学王的位置，跑到了更加接近教士的角色。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持久批判，以及与斯大林主义和其他实存社会主义的陋习所做的斗争中，后社会主义理论仍然坚决反对任何对现状的肯定。不过，与此同时，后社会主义理论也

^① 这些分类法来自中欧大学（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的一份课程大纲，布洛维与我们慷慨分享。

许正在变得更加依赖于消费者的口味，并因此在它的方法上变得更加经验性。过去它曾忽视消费者，只是关注自己的代价，而现在，它需要与在社会科学调查场域中占据大量批判性空间的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及从业者结成同盟。

与后社会主义不同，我们认为新自由主义就是哲学王在当代的表现形式。因此，当新古典经济学家和货币主义者在声称什么是真实和有效的东西的时候，东欧的新自由主义异议人士，以及美国的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则在共同表示，他们知道什么是道德的东西。作为社会科学家，这些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对规定这个世界并不感兴趣，如果我们把目光从经济学家转到社会学的理性选择思潮，这一点尤其正确。虽然这些知识分子仍然是无情的、非批判性的，但他们采纳“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并不是因为这有助于他们强加关于世界的观点，而是因为它能生产出经验性的结果。在这里，他们表现出愿意迎合消费者口味的意愿，正是这一点，将他们自己与新古典经济学中那些在理论倾向上有哲学王特征的同事区别开来。

下面我们转向新古典社会学，我们将自己定位在这个位置上。我们注意到，在如何看待现状方面立场多异，因此，许多知识分子都可以被纳入这个分组。虽然某些新古典分析家是“爱说笑话的人”，而且对现状的批判也很尖锐（这里我们想到的是诸如福柯那样的学者），但其他的新古典分析家则更具肯定性，更加愿意与世俗权力发生联系并且扮演技术专家的角色。不过，将这些立场联合起来的，是他们都反对任何思想诉求，说他们代表别人，或者告诉别人该做什么。新古典社会学声称为社会行动者提供有用的分析工具，不是因为他们要驱散神秘化，而是因为他们允许社会行动者去衡量、计算和说明他们的生活和社会世界。

与批判性的新古典社会学相似，在没有声称代表社会行动者或消费者的情况下，后现代主义也尽力表现出它对内在批判的承诺。不过，后现代主义批判的危险是，它可能萎缩成犬儒主义。按照我们的理解，反讽和犬儒主义之间的区别是，反讽是对话性的（dialogic），而犬儒主义则是独白性的（monologic）。犬儒主义觉得没有任何人可以交流，而反讽则希望将对话者从他们业已接受的真理中赶出来，从而交谈得更加深入。这就是为什么后现代主义被放在“独立于消费者”和“依赖消费者”之间：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对塑造消费者的口味并不感兴趣，但另一方面，它也不愿意倾听或迎合客户。这在更加模糊晦涩的文化研究这一边，尤其正确。不过，后现代主义一般来说还是批判性的，虽然它的某些“怎么都行”（every-



thing goes) 的修辞^①有可能下降成对现状的肯定。因此,我们将后现代主义以对角形式斜置于社会科学场域。

除了这四种从布洛维最近的分类中取出的“范式”之外,我们还增加了第五种分组:经济社会学。从许多方面来看,我们认为,在由于社会主义的垮台而卷入进来的调查空间中,与“后现代主义”相比,这是一个更加重要的范式(事实上,我们是带着某些担忧将后现代主义纳入进来的,因为在这一特定表现图式的许多方面,经济社会学的批判性一面正是“后现代主义”。但不管怎么说,这两者都试图回避现代性的二元对立,在市场和计划、理性和非理性等二元对立之间寻找到一种“第三条道路”)。我们同时在图1中画了一些箭头,以传达一种动态的感觉,就像个体和概念沿着特定的轨迹流动一样。例如,随着新保守主义者在20世纪从托洛茨基主义滑动到新自由主义的道路上,他们就被显示成从这个场域中的批判性空间下降到肯定性空间。箭头还表示某些跨越分界线的相互作用。比如,经济社会学和理性选择理论的某些概念,就是“成双成对的”,每一个都映射了对方,并因此相互加强。

在回顾了图1中所展现的社会文化研究场域中的各种可能性之后,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结束的阴影下,新古典社会学和反讽的方法,为一门批判性的社会科学提供了最有竞争性的和最为多产的视点。重要的是,我们对反讽的感觉十分舒服,因为它使我们摆脱了普世主义的道德姿态。虽然教士也许会争辩说,我们在道德上不负责任,但我们的回应是:“爱说笑话的人”的立场其实比教士更加严肃,因为前者所遵循的,是一种有别于后者统领性的信念伦理的责任伦理(Weber, [1906] 1958: 143)。被教士打上不负责任的标签的东西,在我们的理解中,恰恰是可以体察人们错误的反讽能力。“爱说笑话的人”所说的最好的一个笑话,总是指向他或她自己。他或她从来不高看自己,所以,与教士所能达到的程度相比,他或她的批判立场也因此更加灵活,更能包容细微的差别。不管教士的目的是多么高贵,他或她都不可能逃避劝说人们的负担;他们试图使人们相信,乌托邦未来的道德优越性值得付出某种牺牲。相反,作为反讽性的批判,

^① 语出奥裔美籍哲学家费耶阿本德(1924-1994)。费耶阿本德主张多元方法论,肯定非理性方法在推动科学进步中的作用,并且提出“怎么都行”的原则,也就是说,只要能开发人的创造力,能促使理论不断增生,并在增生过程中允许人们自由抉择,那么什么方式、方法、途径都可以使用。——校译者注

新古典社会学的承诺很简单：批判理论家不会把他或她的目光从人们为途中的每一步所做出的牺牲上移开。他或她虽然不会在前面把“全体教民”（flock）推向“应许之地”（Promised Land）^①，但他们会耐心地描述每一步的社会代价，以及是谁在承受它们。这意味着，社会科学家必须留意现在的开放性，亦即留意现在所包容的多重轨迹——就像他们在“多重资本主义”的框架中所做的一样。

总结一下：批判理论家的任务，是在经验上描述和评价与社会发展有关的可能性替代轨迹；去展示，已经存在的东西，并非不可避免；去指出，行为中的替代方式，对社会行动者来说是开放的；去阐明这些行为方式的代价和后果；并且在不假定哪一个是正确的或合意的情况下，做所有这一切。一门批判性的社会科学理论，将这项工作留给社会行动者自己，让他们自己去衡量，他们是否愿意为特定的行动过程付出代价。换言之，反讽性批判的目标，是使现在的恣意横行曝光，揭露它混合的和偶然的起源（Foucault, 1977），而不是试图命令社会行动者去做什么。这种反讽的目的，是在对话开始之前，对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事情提出质疑，使得公共性的对话丰富充实起来；这就是“爱说笑话的人”的角色。正如哈贝马斯所主张的那样（Habermas, 1972），由社会科学所表现出来的人类旨趣，是批判性的沟通（critical communication）——这是一项在社会科学家和社会行动者之间进行交流和对话的规划；在部分意义上，它意味着通过增加社会行动者的反思能力，来增长理性。通过这种努力，反讽能够很好地帮助社会科学家，因为它要求他或她致力于持续的自动批判（auto-critique）：不要高看自己，对对话的可能性保持开放。

^① 典出《圣经》，“应许之地”是上帝许诺给亚伯拉罕的福地。作者在这里借用了前面“教士”的隐喻，把人民暗喻成教士引导和管辖下的“教徒”。——译者注

术语索引

A

- accident insurance 事故保险
"action from afar" "远距离行动"
actor 行动者
advanced capitalist managerialism 发达资本主义的管理主义
agency 能动作用
agent 能动者
anti-bourgeoisie project 反资产阶级规划
anti-capitalism 反资本主义
anti-communist dissident intelligentsia 反共异议知识分子阶层
anti-Nazism 反纳粹主义
anti-politics 反政治
Anti-Semitism 反犹太主义
anti-Stalinism 反斯大林主义
aristocracy 特权统治阶级
Ausbildung (training) 培训
Austria 奥地利
Austro-Hungarian regime 奥匈政权
authenticity 真实性
authority 权威

B

- bail-outs 脱困

- Bangladesh 孟加拉国
Beamtenbürgertum 官员中的资产阶级
Belarus 白俄罗斯
Berufsbildung (professional training) 职业培训
Bildung 教育和文化
Bildungsbürgertum 文化资产者
abandonment 放弃
class formation post-communism 后共产主义的阶级形成
first Bildungsbürgertum 第一代文化资产者
second Bildungsbürgertum 第二代文化资产者
bildungsbürger 文化公民
Bildungsphilister 文化市侩
Board of Directors 公司董事会
bourgeois liberalism 资产阶级自由主义
bourgeoisie 资产阶级分子/布尔乔亚
bourgeoisie society 资产阶级社会
cultural 文化资产阶级分子
economic 经济资产阶级分子
France 法国资产阶级分子
grande bourgeoisie 大资产阶级分子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capitalist agents 关于资本主义行动者的历史社会学

petty 小资产阶级分子
 propertied 持有恒产的资产阶级分子
 (有产资产阶级分子)
 urban 城市资产阶级分子
 bourgeoisies 资产阶级
 budget constraints 预算约束
 budget-bargaining 预算—讨价还价
 Bulgaria 保加利亚
 bureaucracy 官僚政治
 neo-Stalinist 新斯大林主义官僚政治
 Stalinist 斯大林主义官僚政治
 bureaucratic-technocratic class theories 政治官僚—技术专家的阶级理论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市民社会
Bürgers 市民
Bürgertum 市民(复数)
 business ownership 厂商所有权
 buy-outs 收购

C

cadre-bourgeoisie 干部—资产阶级
 cadres 干部
 capital 资本
 academic 学术资本
 artistic 艺术资本
 classes and elites 阶级和精英的资本
 conversion 资本转换
 cultural 文化资本
 different types 资本的各种类型
 economic 经济资本
 forms 资本形式
 human 人力资本
 political 政治资本
 private 私人资本

social 社会资本
 symbolic 符号资本
 capitalism 资本主义
 advanced 发达资本主义
 advanced West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
 American 美式资本主义
 comparative 比较资本主义
 comprador 买办资本主义
 corporate 法团资本主义
 East Asia 东亚资本主义
 family 家族资本主义
 from above 来自上层的资本主义
 Japanese 日式资本主义
 laissez-faire 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
 late 晚期资本主义
 Latin American 拉美式资本主义
 liberal 自由资本主义
 managerial 管理资本主义
 market 市场资本主义
 modern 现代资本主义
 North American 北美资本主义
 North Atlantic 北大西洋资本主义
 post-communist 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
 productive 生产性资本主义
 to socialism transition 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型
 political 政治资本主义
 capitalism-by-design 设计资本主义
 capitalist managerialism 资本主义的管理主义
 capitalists 资本家
 Cassandra complex 复杂的凶兆预言者
 charisma 卡里斯玛
 Charter 卡特尔
 Chicago School 芝加哥学派



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

- China 中国
- civil society 市民社会
- discourse 市民社会的话语
- ideology 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
- and monetarism 市民社会和货币主义
- civilization 市民化
- clan 宗族
- class relations 阶级关系
- class society 阶级社会
- class stratification 阶级分层
- class structure 阶级结构
- Classical Core 传统核心
- clergy 神职人员
- clientelism 庇护主义
- close hands-on management 事必躬亲的管理
- COMECON 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
- Communist Party 共产党
- Central Committee 中央委员会
- Hungary 匈牙利共产党
- Poland 波兰共产党
- as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作为社会民主党的共产党
- Communist Youth League 共产主义青年联盟
- compradore bourgeoisie 买办资产阶级分子
- compradore capitalism 买办资本主义
- compradore intelligentsia strategy 买办知识阶层的策略
- confession 忏悔
- constructivism 建构主义
- "contract with America" "与美利坚的契约"
- cooperatives 合作社
- corporate capitalism 法团资本主义
- corporatization 公司化
- corruption (贪污) 腐败
- cross-ownership 交叉所有权
- countersélection 逆向选择
- cultural bourgeoisie 文化资产阶级分子
- 也可参见 second Bildungsbürgertum 第二代文化资产者
- cultural elite 文化精英
- post-communist managerialism 后共产主义管理主义的文化精英
- culture 文化
- as capital and symbolic domination 作为资本和符号支配的文化
- of critical discourse 批判性话语文化
- Hungary 匈牙利文化
- Czech Republic 捷克共和国
- business ownership 捷克的厂商所有权
- consolidation bank 银行合并
- elite sample 捷克的精英样本
- field work 捷克的田野工作
- home ownership 捷克的家庭所有权
- lustration law 净化法
- occupational destination 职业终点
- occupational origins 职业起点
- party membership 捷克人的党员身份
- petty bourgeoisie 捷克的小资产阶级
- retirement age 捷克人的退休年龄
- D**
- diffuse ownership 混合所有权
- diligence 勤奋
- dissident intelligentsia 异议知识分子

阶层

- dissidents 异议人士
 dominant class 支配阶级
 dual-stratification system 二元分层体系

E

- East Germany 东德
 economic fraction 经济部门
 economic rationalism 经济理性化
 elite population 精英总体
 master list 总清单
 embourgeoisement 资产阶级化
 employee ownership 雇员的所有权
 England 英国
 European Bank of Reconstruction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evolution 进化
 evolutionary theory 进化论

F

- family businesses 家族企业
 family capitalism 家族资本主义
 family spheres of influence 家族的影响范围
 fascism 法西斯主义
 feudal socialism 封建社会主义
 feudalism 封建主义
 to capitalism transition 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
 finance managers 金融经理人
 foreign affairs (Hungary) 匈牙利外交事件
 foreign investment 外国投资
 foreign ownership 外资所有权
 former Yugoslavia 前南斯拉夫

France 法国

- artisans and merchants 法国的工匠和商人
 French Revolution 法国大革命
 Frankfurt national assembly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Frankfurt School 法兰克福学派
 freedom fighters 自由斗士

G

- gentry 贵族
 govern-mentality 治理心智
 government bail-outs 政府脱困
 grand coalition 广泛的联盟
 Great Transformation 《大转变》
 gross national product (GNP) 国民生产总值
 Grundrisse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

H

- habitus 惯习
 home ownership 家庭所有权
 Hoppenstadt bussiness register 霍彭施泰特商业注册簿
 Horthy regime 霍尔蒂政权
 human capital 人力资本
 human rights 人权
 Hungary 匈牙利
 anti-Stalinist movements 反斯大林主义运动
 Budapest Bank 布达佩斯银行
 Citizens' Bank (Polgári Bank) 市民银行
 Democratic Forum 民主论坛
 dental system reform 中央系统改革



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

- Free Democrats 自由民主党
Patriotic-Christian regime 爱国基督教政权
reform communism 改良共产主义
retirement age 匈牙利人的退休年龄
Socialist Party 社会主义党
socialist values 社会主义价值观
Socialist Workers' Party 社会主义工人党
socialist-liberal government 社会自由党政府
state administration 国家行政部门
TARKI data 匈牙利社会研究中心数据

I

- industrial managers 产业经理人
inflation 通货膨胀
intellectuals 知识分子
intelligentsia 知识阶层/知识界
New Class project 新阶级规划
inter-elite struggles 内部精英斗争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nvolution 内卷
Italy 意大利

J

- Japan 日本
Japan capitalism 日式资本主义

K

- Kádárist technocracy 卡达尔主义的专家政治

- Keynesianism 凯恩斯主义
KGB 克格勃
kleptocracy 盗贼统治

L

- laissez-faire capitalism* 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
late capitalism 晚期资本主义
late socialism 晚期社会主义
Latin American capitalism 拉美式资本主义
Leninism 列宁主义
“living within the truth” “生活在真实中”
lustration 净化

M

- managerial mentality 管理心智
managerial ownership 经理人所有权
managerialism 管理主义
“mandarin” professors “官僚”教授
market transition theory 市场转型理论
Marxism 马克思主义
rational choice 马克思主义的理性选择
Marxism-Leninism 马克思列宁主义
Marxists 马克思主义者
mass organizations (Hungary) 匈牙利群众组织
middle class 中间阶级
Ministry of Finance 财政部
modernity 现代性
modernization 现代化
monetarism 货币主义

N

-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国家科学院
 National Privatization Agency 国家私有化管理局
 national privatization fund 全国性私有化基金会
 Nazism 纳粹主义
 negation of negation 否定之否定
 neo-liberalism 新自由主义
 neo-Marxism 新马克思主义
 neoclassical economics 新古典经济学
 neoclassical sociology 新古典社会学
 Netherlands 荷兰
 New Core 新核心
 New Class project 新阶级规划
 New Democratic Party (United States) (美国的) 新民主党
 New Left 新左派
 nomenklatura 党国精英(红色贵族)
 North Korea 朝鲜
 nouveaux riches 新富

O

- objectivism 客观主义
 occupational destination 职业终点
 occupational trajectories 职业轨迹
 October Revolution 十月革命
 opinion-making intelligentsia 塑造舆论的知识分子
 ownership 所有权
 diffuse 混合所有权
 employee 雇员所有权
 foreign 外资所有权

- home 家庭所有权
 managerial 经理人所有权
 private business 私营企业所有权
 quasi-government 半政府所有权
 recombinant 重组的所有权

P

- parasitic satellite firms 寄生性卫星公司
 pastoral power 神权权力
 paternalism, neo-Stalinist 家长作风, 新斯大林主义的家长作风
 patriotic-religious Right 右翼爱国—宗教人士
 petty bourgeoisie 小资产阶级分子
 Poland 波兰
 anti-Stalinist movement 波兰的反斯大林主义运动
 Martial Law 净化法
 Politburo 政治局
 political capitalism 政治资本主义
 political fractions 政治部门
 politocracy 政治官僚
 popular class 大众阶级
 post-communism 后共产主义
 Prague Spring 布拉格之春
 privatization 私有化
 spontaneous 自发私有化
 privileged 特权
 productive capital 生产性资本
 proceduralism 程序主义
 proletariat 无产阶级
 propertied class 有产阶级
 property ownership 财产所有权
 property relations 财产关系
 property rights 财产权
 Prussia 普鲁士



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

purification 净化

Q

quasi-government ownership 半政府所有权

R

radicalism 激进主义

rank and class 等级和阶级

distinction 等级和阶级区隔

duality 等级和阶级的二重性

rank order 等级秩序

rational choice theory 理性选择理论

rationalism 理性主义

rationalization 理性化

recombinant property 重组的资产

reform communism 改良共产主义

reform communist technocracy 共产党改革派专家治国论者

retirements trends 退休趋势

rituals 仪式

Romania 罗马尼亚

round-table negotiations 圆桌谈判

rule of law 法治

Russia 俄罗斯

S

sacrifice 牺牲

scientific socialism 科学社会主义

second (underground) economy 第二经济, 地下经济

self-employment 自我雇佣

self-management 自我管理

self-ownership 自我所有权

Serbia 塞尔维亚

shock therapies 休克疗法

Slovakia 斯洛伐克

social agents 社会能动者

social change 社会变迁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社会民主党

social network 社会网络

social origins 社会起源

social space 社会空间

social stratification 社会分层

socialist clientelism 社会主义的庇护主义

socialist manager 社会主义经理人

socialist petty bourgeoisie 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分子

socialist technocracy 社会主义专家政治

Sonderweg 特殊道路

South Korea 韩国

Soviet Marxists 苏式马克思主义者

space structure 空间结构

spontaneous privatization 自发私有化

State Privatization Agency 国家私有化管理局

state socialism bureaucracy 国家社会主义官僚政治

state socialism managers 国家社会主义经理人

state socialism technocracy 国家社会主义专家政治

status hierarchies 地位等级制

stocks and bonds 股票和公债

“Strata” 地位

subterranean redistribution 暗箱式再分配制度

symbolic mastery 符号控制

T

Taiwan 台湾

TARKI 匈牙利社会研究中心
 technoeracy 专家政治
 "Third Road" "第三条道路"
 traditional societies 传统社会
 trajectory adjustment 轨道调整
 transition thoery 转型理论
 transitology 转轨学说

U

Übermensch 超人
 UCLA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nemployment 失业
 United States 美国
 urban bourgeoisie 城市资产阶级分子

V

Vebürgerlichung 资产阶级化

village industry 乡村工业

W

Weltanschauung 世界观
 West German 西德
 West Europe 西欧
 Westernization 西化
Wirtschaftsbürgertum 经济资产者
 working class 工人阶级
 World Bank 世界银行

Y

Yugoslavia 南斯拉夫

Z

Ziwigesellschaft 市民社会

人名索引

A

- Anderson, Perry 佩里·安德森
Andorka, Rudolf 鲁道夫·安道卡
Antall, Prime Minister 安塔尔总理

B

- Beaumont, Gillian 吉莉安·博蒙特
Becker, Gary 加里·贝克尔
Bell, Daniel 丹尼尔·贝尔
Bence, G. 吉奥尔吉·班采
Berle, Adolf 阿道夫·伯利
Bloch, Mark 马克·布洛赫
Böröcz, Jozsef 波洛茨·尤若夫
Bourdieu, Pierre 皮埃尔·布迪厄
Brezhnev, L. I. 列·伊·勃列日涅夫
Budaj, Jan 杨·布达

C

- Clinton, Bill 比尔·克林顿
Collins, Randall 兰德尔·柯林斯
Csaba, László 拉斯洛·乔包
Csurka, István 伊斯特万·楚尔高

D

- Dahrendorf, Ralf 拉尔夫·达伦多夫

- Djilas, Milovan 米洛万·吉拉斯
Domanski, Henryk 亨利克·多曼斯基
Domhoff, William 威廉·多姆霍夫

E

- Eyal, Gil 吉尔·伊亚尔

F

- Fligstein, Neil 尼尔·弗里格斯坦
Fodor, Éva 伊娃·佛多尔
Foucault, M. 米歇尔·福柯
Frankin, Benjamin 本杰明·富兰克林
Friedman, Milton 米尔顿·弗里德曼
Frydman, Roman 罗曼·弗莱德曼

G

- Ganzeboom, Harry 哈里·甘泽布姆
Garton-Ash, Timothy 提摩西·贾顿-阿什
Geddes, Barbara 芭芭拉·盖迪斯
Gershenkron, Alexander 亚历山大·葛申容
Gierek, Edward 爱德华·格瑞克
Goethe, J. W. von 约翰·沃尔夫冈·歌德
Goffman, Erving 欧文·戈夫曼
Gorbachev, Mikhail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Gouldner, Alvin 阿尔文·古尔德纳
Grandes Ecoles, Les 勒·格兰迪斯·埃科勒

H

Hanák, Katalin 卡特琳·豪纳克
Hankiss, Elemér 艾勒梅·汉基什
Hanley, Eric 埃里克·汉利
Havel, Václav 瓦茨拉夫·哈维尔
Hayek, F. 冯·哈耶克
Hlinka, Andrej 安德吉·希林卡
Hindle, Jane 简·欣德
Horn, Gyula 霍恩·久劳
Hubai, László 拉斯洛·胡柏
Husák, Gustav 古斯塔夫·胡萨克

J

Jaruzelski, Wojciech 沃依切赫·雅鲁泽尔斯基

K

Kádár, János 卡达尔·亚诺什
Kant, I. 伊曼纽尔·康德
Kavan, Jan. 杨·卡万
Khrushchev, N. 尼基塔·赫鲁晓夫
King, Larry 拉里·金
Kis, J. 杨·基什
Klaus, Václav 瓦茨拉夫·克劳斯
Kocka, Jürgen 于尔根·柯卡
Kostello, Eric 埃里克·科斯特罗
Kováček, Imre 柯瓦克·伊姆莱
Kuron, J. 库隆

L

Lenin, V. I. 符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Lukács, György 捷尔吉·卢卡奇
Ladányi, János 劳达尼·亚诺什

M

Machonin, Pavel 帕维尔·马霍尼
Mannheim, Karl 卡尔·曼海姆
Marcuse, Herbert 赫伯特·马尔库塞
Markov, Tsvetan 茨维坦·马尔科夫
Martinsen, Dahl 达尔·马丁森
Marx, Karl 卡尔·马克思
Mateju, Petr 彼得·马特于
Matilda, Sógi 沙基·玛蒂尔达
Mazowiecki, T. 马佐维耶茨基
McKeever, Matthew 马太·麦克基弗
Means, Gardiner 加德纳·米恩斯
Meciar, Vladimír 基米尔·麦恰尔
Milosevic, S. 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
Modzelewski, K. 卡罗尔·莫泽莱夫斯基
Mondale, Walter 沃尔特·蒙代尔

N

Nagy, Imre 纳吉·伊姆莱
Natasha, Yershova 娜塔夏·叶赫舍娃
Németh, Miklós 内梅特·米克洛什

P

Palach, Jan 杨·帕拉赫
Petrova, Dimitrina 迪米崔娜·彼得罗娃
Plechanov, G. V. G. V. 普列汉诺夫
Polányi, Michael 迈克·波兰尼

R

Runciman, Walter 沃尔特·伦西曼

S

Schatz, Sara 莎拉·沙茨



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

Schiller, J. C. F. von 约翰·克·冯·席勒
Schumpeter, J. 约瑟夫·熊彼特
Sibirsev, Sergei 谢尔盖·西比尔舍夫
Siklova, Jirina 伊芮娜·西克诺娃
Slomeczynski, Kazimierz 卡齐米日·斯洛
姆兹尼斯基

Smith, Adam 亚当·斯密
Solzhenitsyn, A. I. 亚历山大·I. 索尔
仁尼琴

Stalin, J. 约瑟夫·斯大林
Staniszki, Jadwiga 雅德维佳·斯坦尼
茨基斯

Stark, David 戴维·斯塔克
Surányi, G. 苏兰尼
Szalai, Erzsébet 厄吉贝特·萨莱伊
Szelényi, Iván 伊万·塞勒尼
Szelényi, Szonja 索妮娅·塞勒尼

T

Tamáás, Kolosi 柯洛什·陶马什
Timár, János 蒂马尔·亚诺什
Torgyán, Jozsef 托尔贾恩·尤若夫
Townesley, Eleanor 艾莉诺·汤斯利

Treiman, Donald 唐纳德·特雷曼
Trotsky, Leon 利昂·托洛茨基
Tucek, Milan 米兰·图伊克

U

Uhl 乌尔

V

Vági, Gábor 卡博·瓦基
Voslensky, Michael 沃斯伦斯基

W

Wagner, Peter 彼得·瓦格纳
Wasilewski, Jack 雅克·瓦西莱夫斯基
Wałęsa, Lech 列赫·瓦文萨
Weber, Marx 马克斯·韦伯
Windolf, Paul 保罗·温多夫
Wnuk-Lipinski, Edmund 埃德蒙·符努
克-利平斯基

Z

Zeitlin, Maurice 莫里斯·蔡特林

参考文献

- Abrams, Bradley F. (1995) 'Morality, Wisdom and Revision: the Czech Opposition in the 1970s and the Expulsion of the Sudeten Germans'.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9(2): 234–55.
- Alexander, G. and G. Skapska (eds) (1994) *A Fourth Way? Privatization, Property and the Emergence of New Market Economies*. London: Routledge.
- Andorka, Rudolf (1994) 'Magyarország a társadalmi jelzőszámok tükrében' (Hungary in the light of social indicators). In *Társadalmi Riórt 1994*, ed. Rudolf Andorka, Tamás Kolosi and György Vukovics. Budapest: TARKI.
- Andorka, Rudolf and Hedvig Lehman (1996) 'Az átmenet politikai következményei'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transition). pp. 500–27 in *Társadalmi Riórt 1996* (Social Report 1996), ed. Rudolf Andorka, Tamás Kolosi and György Vukovics. Budapest: TARKI.
- Anderson, Perry (1974a) *Passages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 London: Verso.
- Anderson, Perry (1974b)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London: Verso.
- Anderson, Perry (1992) *English Questions*. London: Verso.
- Anderson, Perry ([1976] 1992) 'The Notion of Bourgeois Revolution'. pp. 105–18 in *English Questions* by Perry Anderson. London: Verso
- Arató, Andrew (1981) 'Civil Society Against the State: Poland 1980–81'. *Telos* 47(Spring): 23–47
- Arató, Andrew (1994) 'Revolution and Restoration: On the Origins of Right-Wing Radical Ideology in Hungary'. pp. 99–119 in *The New Great Transformation,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East-Central Europe*, ed. C. Bryant and E. Mokrzycki. London: Routledge.
- Aslund, Anders (1985) *Private Enterprise in Eastern Europe: The Non-Agricultural Private Sector in Poland and the G.D.R., 1945–1983*.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Aston, T.H. and C. H. E. Philips (1985) *The Brenner Deb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tkinson, A.B. and John Mickleright (1992)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akunin, N. (1966) 'Marx, the Bismarck of Socialism'. pp. 80–97 in *Patterns of Anarchy*, ed. L. Krimmerman and L. Perry. New York: Anchor Books.



- Balzer, H. (ed.) (1996) *Russia's Missing Middle Class: The Professions in Russian History*. Armonk, NY: M.E. Sharpe.
- Bauer, Tamás (1981) *Tervezgazdaság, beruházás, ciklusok* (Planned economy, investments and cycles).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iadó.
- Bauman, Zygmunt (1974) 'Officialdom and Class: Bases of Inequality in Socialist Society'. pp. 129–48 in *The Social Analysis of Class Structure*, ed. Frank Parkin. London: Tavistock.
- Bayard, C. (1992–93) 'The Changing Character of the Prague Intelligentsia'. *Telos* 94(Winter): 131–44.
- Bell, Daniel ([1973] 1976)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 Benda, Václav (1991) 'The Parallel Polis', pp. 35–41 in *Civic Freedom in Central Europe*, ed. Gordon Skilling and Paul Wilson. London: Macmillan.
- Benda, Václav, Milan Simecka, Ivan M. Jirous, Jiri Dienstbier, Václav Havel, Ladislav Hejdanek, and Jan Simsa (1988) 'Parallel Polis, or An Independent Society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n Inquiry'. *Social Research* 55 (1–2): 211–60.
- Berend, Ivan (1998) *Decades of Crisis: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before World War II*.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erle, Adolf and Gardiner Means ([1931] 1968)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 Bian, Yanjie and John Logan (1996) '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Power: the Changing Stratification System in Urba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5): 739–58.
- Blackbourn, David and Geoff Eley (1980) *Mythen deutscher Geschichtsschreibung. Die gescheiterte bürgerliche Revolution von 1848*. Frankfurt and Berlin: Ullstein.
- Blackbourn, David and Geoff Eley (1984) *The Peculiarities of German History: Bourgeois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Nineteenth-Century German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loch, Mark (1961) *Feudal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 Bloomstein, Hans and Michael Marrese (eds) (1991) *Transformation of Planned Economies: Property Rights Reform and Macroeconomic Stability*. Paris: OECD.
- Böröcz, Jozsef (1992) 'Dual Dependency and Property Vacuum: Social Change on the State Socialist Semiperiphery'. *Politics and Society* 21(1): 77–104.
- Böröcz, Jozsef (1993) 'Simulating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Property Change under Prolonged Informality in Hungary'. *Archives Européenne de Sociologie* 34(1): 81–107.
- Böröcz, Jozsef and Ákos Rona-Tas (1995) 'Small Leap Forward: Emergence of New Economic Elites'. *Theory and Society* 24(5): 751–81
- Bourdieu, Pierre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ourdieu, Pierre ([1983] 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pp. 241–58 in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ed. John G. Richardson.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 Bourdieu, Pierre (1984) *Distinction: A Sociologic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ourdieu, Pierre (1987) 'What Makes a Social Class? On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Existence of Social Groups'. *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 32: 1–18.
- Bourdieu, Pierre ([1984] 1988) *Homo Academicu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ourdieu, Pierre (1990) *The Logic of Practi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ourdieu, Pierre ([1987] 1990) *In Other Words: Essays Toward a Reflexive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ourdieu, Pierre ([1989] 1996) *The State Nobil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ourdieu, Pierre and Jean-Claude Passeron (1977)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London and Newbury Park, CA: Sage.
- Bourdieu, Pierre and Loïc Wacquant (1992)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van Brabant, Jozef M. (1992) *Privatizing Eastern Europe: The Role of Markets and Ownership in the Transition*. 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Brom, Karel and Michael Orenstein (1994) 'The Private Sector in the Czech Republic: Government and Bank Control in a Transitional Economy'. *Europe-Asia Studies* 46(6): 893-928.
- Brüggermeier, Franz-Joseph (1990) 'Der deutschen Sonderweg'. pp. 244-9 in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in Deutschland*, ed. Lutz Niethammer. Munich: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 Bryant, C. and E. Mokrzycki (eds) (1994) *The New Great Transformation: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East-Central Europe*. London: Routledge.
- Bunce, Valerie (1995a) 'Comparing East and South'. *Journal of Democracy* 6(July): 87-100.
- Bunce, Valerie (1995b) 'Should Transitiologists Be Grounded'? *Slavic Review* 55(Spring): 111-27.
- Burawoy, Michael (1994) 'Why Coupon Socialism Never Stood a Chance in Russia: The Political Conditions of Economic Transition'. *Politics and Society* 22(4): 585-94.
- Burawoy, Michael (1995) 'From Sovietology to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pp. 72-102 in *Beyond Soviet Studies*, ed. Daniel Orlovsky.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Burawoy, Michael (1997) 'What is Russia and Where is it Going? Towards a Theory of Economic Involu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mparative Social Analysis Workshop, UCLA, January.
- Burawoy, Michael and Pavel Krotov (1992) 'The Soviet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to Capitalism: Worker Control and Economic Bargaining in the Wood Industr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7(1): 16-38.
- Burawoy, Michael and Pavel Krotov (1993) 'The Economic Basis of Russia's Political Crisis'. *New Left Review* 198(March-April): 49-69.
- Burawoy, Michael and János Lukács (1992) *The Radiant Past: Ideology and Reality in Hungary's Road to Capit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urchell, Graham, Colin Gordon and Peter Miller (eds) (1991) *The Foucault Effec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urnham, James ([1941] 1962)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Campbell, John (1992) 'The Fiscal Crisis of Post-Communist States'. *Telos* 93(Fall): 89-110.
- Campbell, Robert W. (ed.) (1994) *The Post-Communis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Essays in Honor of Gregory Grossma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Carlo, Antonio (1974) 'The Socio-Economic Nature of the USSR'. *Telos* 21(Fall): 2-86.



- Caute, D. (1988) *The Fellow-Travelers: Intellectual Friends of Communism*.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Chiesa, Giulietto and Douglas Taylor Northrop (1993)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Political Change in the Soviet Union 1987-1991*. Hanover and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 Chirot, Daniel (ed.) (1991) *The Crisis of Leninism and the Decline of the Left*. Seattle, WA: Washington University Press.
- Chvatik, Ivan (1992-93) 'The Solidarity of the Shaken'. *Telos* 94(Winter): 163-6.
- Clarke, S. (1992) 'Privat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Russia'. *New Left Review* 196(November-December): 3-27.
- Coffee, John C. Jr (1988) 'Shareholders Versus Managers: The Strain in the Corporate Web'. pp. 77-134 in *Knights, Raiders, and Targets: The Impact of Hostile Takeover*, ed. John Coffee Jr, Louis Lowenstein and Susan Rose-Ackerm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hen, Jean and Andrew Arató (1992)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Collins, Randall (1979) *The Credentialling Societ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Collins, Randall (1995) 'Predictions in Macrosociology: The Case of Soviet Collaps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0(6): 1552-93.
- Connor, Walter and Piotr Ploszajski (1992) *The Polish Road From Socialism*. New York: Sharpe.
- Conze, Werner and Jürgen Kocka (eds) (1985-92) *Bildungsbürgertum im 19. Jahrhundert*, vols. 1-4. Stuttgart: Klett-Cotta.
- Crawford, B. (ed.) (1995) *Markets, States, Democrac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st-Communist Transforma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Csaba, László (1994) *Privatization, Liberalization and Destruction: Recreating the Market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Sydney: Dartmouth.
- Csaba, László (1995)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form Strategy: China and Eastern Europe Compared*. Budapest: Koping Datorg, Discussion Papers No. 34.
- Csurka, István (1993) 'Önátvilágítás' (Self-lustration) *Magyar Forum* 30 June.
- Dahrendorf, Ralf (1959) *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Dahrendorf, Ralf (1990)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s in Europe*. London: Times Books.
- Defert, Daniel (1991) "'Popular Life" and Insurance Technology'. pp. 211-34 in *The Foucault Effect*, ed. Graham Burchell, Colin Gordon and Peter Mill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jilas, Milovan (1957) *The New Class: 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 Dobosiewicz, Zbigniew (1992) *Foreign Investment in Eastern Europe*. London: Routledge.
- Domanski, Henryk (1995) 'Occupational Mobility Careers in Six East European Countries: Basic Continuities'. *Polish Sociological Review* 112(4): 304-24.
- Domanski, Henryk (1997) 'Constant Fluidity and Rise in Total Mobility Rates: Social Mobility in Six East European Nations'. *Polish Sociological Review* 2.
- Domhoff, G. William (1967) *Who Rules America?*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 Domhoff, G. William (1970) *The Higher Circles: The Governing Class in America*. New York: Random House.

- Domhoff, G. William (1986) *Who Rules America Now? A View from the 1980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Earl, John S., Roman Frydman and Andrzej Rapaczynski (eds) (1993) *Privatization in the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Studies of Preconditions and Policies in Eastern Europ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Earl, John S., Roman Frydman, Andrzej Rapaczynski and Joel Turkewitz (1994) *Small Privatiz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tail Trade and Consumer Services in the Czech Republic, Hungary and Poland*.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 Ehrenreich, Barbara and John Ehrenreich (1977) 'The Professional-Managerial Class'. *Radical America* 11(March-April): 7-31.
- Einhorn, Barbara (1993) *Cinderella Goes to Market: Citizenship and Women's Movements in East Central Europe*. London: Verso.
- Eisenstadt, S.N. (1992) 'The Breakdown of the Communist Regimes and the Vicissitudes of Modernity'. *Daedalus* 121(2): 21-41.
- Eley, Geoff (1980) *Reshaping the German Right: Radical Materialism and Political Change after Bismarck*.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Eley, Geoff (1992) *From Unification to Nazism: Reinterpreting the German Past*. Boston, MA: Allen & Unwin.
- Ely, J. (1992) 'The Politics of "Civil Society"'. *Telos* 93 (Fall): 173-91.
- Engelhardt, Ulrich (1986) 'Bildungsbürgertum'. *Begriffs- und Dogmengeschichte eines Etiketts*. Stuttgart: Klett-Cotta.
- Erdei, Ferenc ([1976]1988) 'Hungarian Society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pp. 7-94 in *Selected Writings* by Ferenc Erdei.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 Estrin, Saul (ed.) (1994) *Privatization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London: Longman.
- Estrin, Saul, Josef C. Brada, Alan Gelb and Inderjit Singh (eds) (1995) *Restructuring and Privatization in Central Eastern Europe: Case Studies of Firms in Transition*. Armonk, NY: Sharpe.
- Evans, Peter, Dietrich Rueschemeyer and Theda Skocpol (eds) (1985)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wald, François (1991) 'Insurance and Risk'. pp. 197-210 in *The Foucault Effect*, ed. Graham Burchell, Colin Gordon and Peter Mill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Eyal, Gil and Eleanor Townsley (1995) 'The Social Composition of the Communist Nomenclatura: A Comparison of Russia, Poland, and Hungary'. *Theory and Society* 24(5): 723-50.
- Eyal, Gil, Iván Széclényi and Eleanor Townsley (1997)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 The Theory of Post-Communist Managerialism'. *New Left Review* 222(March-April): 60-92.
- Fehér, Ferenc (1982) 'Paternalism as a Mode of Legitimation in Soviet-Type Societies'. pp. 64-81 in *Political Legitimation in Communist Societies*, ed. T.H. Rigby and Ferenc Fehér. London: Macmillan.
- Fehér, Ferenc, Agnes Heller and Gyorgy Markus (1983) *Dictatorship Over Need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Ferge, Zsuzsa et al. (1995) *Social Costs of Transition. International Report*. Vienna: Institute of Human Studies.
- Fichte, Johann Gottlieb ([1807-08]1944) *Reden an die deutsche Nation* (Addresses to the German Nation) Leipzig: F. Meiner.



- Fidelius, Petr [Petr Pithar?] (1992) 'The Mirror of Communist Discourse'. pp. 193–204 in *Goodbye, Samizdat: Twenty Years of Czechoslovak Underground Writing*, ed. Marketa Goetz-Stankiewicz.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Fligstein, Neil (1990)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rporate Control*.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Fligstein, Neil (1995) 'Networks of Power or the Finance Conception of Control?'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0(4): 500–03.
- Fligstein, Neil and Peter Brantley (1992) 'Bank Control, Owner Control, or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Who Controls the Large Modern Corpor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8(2): 280–307.
- Fodor, Éva (1997a) 'Gender in Transition: Unemployment in Hungary, Poland and Slovakia'.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11(3): 470–500.
- Fodor, Éva (1997b) *Power, Patriarchy and Paternalism: An Examination of the Gendered Nature of State Socialist Authority*.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CLA.
- Foucault, Michel (1978)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Foucault, Michel (1983) 'The Subject and Power'. pp. 208–26 in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ed. Hubert L. Dreyfus and Paul Rabinow.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oucault, Michel (1984) *The Use of Pleasure*. Harmondsworth: Penguin.
- Foucault, Michel (1991) 'Governmentality'. pp. 87–104 in *The Foucault Effect*, ed. Graham Burchell, Colin Gordon and Peter Mill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oucault, Michel (1993) 'On the Beginnings of the Hermeneutics of the Self'. *Political Theory* 21(2): 198–227.
- Fretzel-Zagorska, J. and Zagorski, K. (1989) 'East European Intellectuals on the Road to Dissent'. *Politics and Society* 17(March): 89–113.
- Friedman, Milton (1959) *A Program for Monetary Stability*.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 Friedman, Milton (1962) *Capitalism and Free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rydman, Roman, Cheryl W. Gray and Andrzej Rapaczynski (1996)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Central Europe and Russia*.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 Frydman, Roman, Kenneth Murphy and Andrzej Rapaczynski (1996) 'Capitalism with a Comrade's Face'. *Transitions* 2(2): 5–11/Az elvtársi arcú kapitalizmus'. *Magyar Hírlap*, 8 March, p. 9.
- Frydman, Roman, Andrzej Rapaczynski and John S. Earle (1993) *The Privatization Process in Central Europe*.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 Fukuyama, Francis (1992)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 Furet, François (1975) 'The Catechism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pp. 61–97 in *The Soci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Debate on the Role of the Middle Classes*, ed. Ralph W. Greenlaw. Lexington, MA: D.C. Heath.
- Galbraith, John K. (1967) *The New Industrial State*.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 Garcelon, Mac (1997) 'The Estate of Change: The Specialist Rebellion and the Democratic Movement in Moscow, 1989–1991'. *Theory and Society*, vol. 26: 38–85.
- Geddes, Barbara (1994) *Politician's Dilemma: Building State Capacity in Latin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eertz, Clifford (1963) *Agricultural Involvement: 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ellner, Ernest (1994) *Conditions of Liberty: Civil Society and its Rivals*. Harmondsworth: Penguin.
- Gerschenkron, Alexander (1966)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lasberg, Davita Silfen and Michael Schwartz (1983) 'Ownership and Control of Corporation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9: 311–32.
- Glasman, M. (1994) 'The Great Deformation: Polanyi, Poland and the Terrors of Planned Spontaneity'. *New Left Review* 204(March–April): 59–86.
- Goetz-Stankiewicz, Marketa (ed.) (1992) *Goodbye, Samizdat: Twenty Years of Czechoslovak Underground Writing*.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Gouldner, Alvin (1979) *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Class*. New York: The Continuum Publishing Corporation.
- Gowan, Peter (1995) 'Neo-Liberal Theory and Practice for Eastern Europe'. *New Left Review* 213(September–October): 3–60.
- Gowan, Peter (1996) 'Eastern Europe, Western Power and Neo-Liberalism'. *New Left Review* 216(March–April): 129–40.
- Granovetter, Mark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3): 481–510.
- Greenlaw, Ralph W. (ed.) (1975) *The Soci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Debate on the Role of the Middle Classes*. Lexington, MA: D.C. Heath.
- Hajnal, László (1996) 'Visszaállamosították a Polgári Bankot' (The Civic Bank was re-nationalized), *Magyar Hírlap*, 31 December.
- Hankiss, Elemér (1990) *East European Alternativ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Hanley, Eric (1996) 'Self-Employment in Post-Communist Eastern Europe: The Emergence of a New Petty Bourgeoisi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CLA.
- Hanley, Eric (1997) *Privatization and Marketization in Eastern Europe*.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CLA.
- Hanley, Eric and Petr Mateju (1998) 'The Making of Post-Communist Elites in Eastern Europe: A Comparison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lites in the Czech Republic, Hungary and Poland'. Forthcoming in *Eliten im Wandel*, ed. Magarditsch Hatschikjan and Franz-Lothar Altman. Munich: Oldenbourg Verlag.
- Hanley, Eric and Iván Szelényi (1996) 'Changing Social Structure During Market Transition: The Case of Central Europe'. Paper presented to the workshop on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the Reform of the State*.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 Hanley, Eric, Natasha Yerushova and Richard Anderson (1995) 'Russia: Old Wine in New Bottle? The Circula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Russian Elites, 1983–1993'. *Theory and Society* 24(5): 639–68.
- Hausner, J. (1992) *Populist Threat in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ist Society*. Warsaw: Friedrich–Ebert Foundation.
- Hausner, J. and G. Mosur (1993) *Transformation Processes in Eastern Europe: Western Perspectives and the Polish Experience*. Cracow: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tudies.
- Havel, Václav (1985)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pp. 23–96 in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ed. John Keane. London: Hutchinson.
- Havel, Václav (1986) 'Politics and Conscience'. pp. 136–57 in *Václav Havel or Living in Truth*, ed. Jan Vladislav. London: Faber & Faber.



- Havel, Václav (1988) 'Anti-Political Politics'. pp. 381–98 in *Civil Society*, ed. John Keane. London: Verso.
- Havel, Václav (1993) *Summer Meditations*. New York: Vintage.
- Havel, Václav (1994) 'Article 202'. pp. 1–16 in *Chronicles from Prague*, ed. John Miller and Kirsten Miller.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Books.
- Hejdanek, Ladislav (1985)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and Socialism in Eastern Europe'. pp. 141–51 in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ed. John Keane. London: Hutchinson.
- Holton, R.J. (1976) *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Holy, Ladislav (1996) *The Little Czech and the Great Czech N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orn, Erich (1996) 'Tschechische Banken haben zu viel Macht' (The Czech Banks Have Too Much Power) *Die Presse*, 20 June, p. 17.
- Horváth, Ágnes and Árpád Szakolczay (1992) *The Dissolution of Communist Power: The Case of Hungary*. London: Routledge.
- Huang, Philip (1990) *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350–1988*.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Jorgensen, Knud Erik (1992) 'The End of Anti-Politics in Central Europe'. pp. 32–60 in *Democracy and Civil Society in Eastern Europe*, ed. Paul G. Lewis. London: Macmillan.
- Jowitt, Kenneth (1983) 'Soviet Neo-Traditionalism: The Political Corruption of a Leninist Regime'. *Soviet Studies* 35(3): 275–97.
- Jowitt, Kenneth (1992) *New World Disorder: The Leninist Extinc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Keane, John (ed.) (1985)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London: Hutchinson.
- Kennedy, Michael D. (1991) *Professionals, Power and Solidarity in Poland: A Critical Sociology of Soviet-Type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enway, Peter and Eva Klvacova (1996) 'The Web of Cross-Ownership among Czech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Europe-Asia Studies* 48(5): 797–809.
- King, Larry (1997) *Pathways from Socialism: The Transformation of Firms in Hungary, the Czech Republic and Slovakia*.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CLA.
- Klaus, Václav (1989) 'Socialist Economies, Economic Reforms and Economists: Reflections of a Czechoslovak Economist'. *Communist Economies* 1(1): 89–96.
- Klaus, Václav (1991) 'Radical, Realistic Economics: An Interview with Václav Klaus'. pp. 157–65 in *After the Velvet Revolution: Václav Havel and the New Leaders of Czechoslovakia Speak Out*, ed. Tim. D. Whipple. New York: Freedom House.
- Klima, Ivan (1985) *My Merry Mornings*. London: Readers International.
- Klima, Ivan (1994) *Judge on Trial*. New York: Vintage.
- Kocka, Jürgen (ed.) (1981) *Angestellte in europäischen Vergleich*.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 Kocka, Jürgen (1985) 'Einleitung'. pp. 9–26 in *Bildungsbürgertum im 19. Jahrhundert*, Vol. 1, ed. Werner Conze and Jürgen Kocka. Stuttgart: Klett-Cotta.
- Kocka, Jürgen (ed.) (1986a) *Arbeiter und Bürger im 19. Jahrhundert: Varianten ihres Verhältnisses im europäischen Vergleich*. Munich: Oldenbourg.
- Kocka, Jürgen (1986b) 'Problems of Working-Class Formation in Germany: The Early Years, 1800–1875'. pp. 279–351 in *Working-Class Formation*, ed. Ira Katznelson and Aristide Zolber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ocka, Jürgen (ed.) (1987a) *Bürger und Bürgerlichkeit im 19. Jahrhundert*.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 Kocka, Jürgen (1987b) 'Einleitung'. pp. 7–20 in *Bürger und Bürgerlichkeit im 19. Jahrhundert*, ed. Jürgen Kocka.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 Kocka, Jürgen (1987c) 'Bürgertum und Bürgerlichkeit als Probleme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von späten 18. zum frühen 20. Jahrhundert'. pp. 21–63 in *Bürger und Bürgerlichkeit im 19. Jahrhundert*, ed. Jürgen Kocka. Göttingen: Vandenhoeck und Ruprecht.
- Kocka, Jürgen (1988a) *Bürgertum im 19. Jahrhundert: Deutschland im europäischen Vergleich*. Munich: Deutsche Taschenbuch Verlag.
- Kocka, Jürgen (1988b) 'Bürgertum und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in 19. Jahrhundert. Europäische Entwicklung und deutsche Eigenarten'. pp. 11–78 in *Bürgertum im 19. Jahrhundert*, vol. 1, ed. Jürgen Kocka. Munich: Deutsche Taschenbuch Verlag.
- Kocka, Jürgen (1988c) 'Bürgertum und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im 19. Jahrhundert. Europäische Entwicklung und deutsche Eigenarten'. In *Bürgertum im 19. Jahrhundert*. vol. 1, ed. Jürgen Kocka and Ute Frevert. Munich: Deutsche Taschenbuch Verlag.
- Kocka, Jürgen (1989) 'Bildungsbürgertum: gesellschaftliche Formation oder Historikerkonstrukt?' pp. 9–20 in *Bildungsbürgertum im 19. Jahrhundert*, vol. 4, ed. Werner Conze and Jürgen Kocka. Stuttgart: Klett-Cotta.
- Kocka, Jürgen (1990) *Weder Stand noch Klasse: Unterschichten um 1800*. Bonn: Dietz.
- Kocka, Jürgen (ed.) (1993) *Bourgeois Society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Oxford: Providence.
- Köhler, Ernst (1970) *Bildungsbürgertum und nationale Politik*. Bad Homburg: Atheum.
- Komarek, Martin and Jana Kasalova (1994–95) *GEN: 100 Cechu Dneska*. Prague: Fischer.
- Konrád, György (1984) *Antipolitics*. London: Quartet.
- Konrád, George and Iván Szelényi (1979) *The Intellectuals on the Road to Class Power*. New York and 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 Konrád, George and Iván Szelényi (1991) 'Intellectuals and Domination under Post-Communism'. pp. 337–61 in *Social Theory for a Changing Society*, ed. James Coleman and Pierre Bourdieu.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Kornai, János (1980) *Economics of Shortage*. New York: Elsevier North-Holland.
- Kornai, János (1990a) *The Road to a Free Economy: Shifting from a Socialist System*. New York: Norton.
- Kornai, János (1990b) 'The Affinity Between Ownership Forms and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The Common Experienc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4(3): 131–47.
- Kornai, János (1992)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ornai, János (1994) 'Transformational Recession: The Main Cause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9(1): 39–63.
- Koselleck, Reinhart (1990) 'Einleitung – Zur Anthropologischen und Semantischen Struktur der Bildung'. pp. 11–46 in *Bildungsbürgertum im 19. Jahrhundert*, vol. 2, ed. Werner Conze and Jürgen Kocka. Stuttgart: Klett-Cotta.
- Koselleck, Reinhardt, Ulrike Spree and Willibald Steinmetz (1991) 'Drei bürgerliche Welten? Zur vergleichenden Semantik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in



- Deutschland, England und Frankreich'. pp. 14–58 in *Bürger in der Gesellschaft der Neuzeit*, ed. Hans-Jürgen Puhle.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 Krasnodebski, Zdzislaw (1993) 'Longing for Community: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 of Politics and the Dilemmas of European Culture'.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8(3): 339–53.
- Kuczynska, Teresa (1992) 'The Capitalists Among Us'. *Telos* 92(Summer): 159–63.
- Kusa, Zuzana (1994) 'To Be of Bourgeois Origins: An Insurmountable Stigma?' (On the Erosive Power of Social Networks in the Period of Communis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XIII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Bielefeld, Germany.
- Kusy, Miroslav (1985) 'Chartism and Real Socialism'. pp. 152–77 in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ed. John Keane. London: Hutchinson.
- Laki, Mihály (1993) 'The Chances for the Acceleration of Transition: The Case of Hungarian Privatization'.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7(3): 440–51.
- Laki, Mihály (1994–95) 'Opportunities for Workers' Participation in Privatization in Hungary: The Case of the Eger Flour Mill'. pp. 15–39 in *Participation and Changes in Property Relations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 ed. Mihály Laki, Julia Szalai and Ágnes Vajda. Budapest: Active Society Foundation.
- Laki, Mihály, Julia Szalai and Ágnes Vajda (eds) (1994–95) *Participation and Changes in Property Relations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 Budapest: Active Society Foundation.
- Lampe, John (ed.) (1992) *Creating Capital Markets in Eastern Europe*. Washington, DC: The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 Lane, David (ed.) (1995) *Russia in Transition: Politics, Privatization and Inequality*. London: Longman.
- Langewische, Dieter (1989) 'Bildungsbürgertum und Liberalismus im 19. Jahrhundert'. In *Politischer Einfluss und Gesellschaftliche Formation*, ed. Jürgen Kocka. Stuttgart: Klett-Cotta.
- Latour, Bruno (1987) *Science in Action: 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epsius, M. Rainer (1992) 'Das Bildungsbürgertum als standische Vergesellschaftung'. pp. 8–18 in *Lebensführung und standische Vergesellschaftung*, ed. M. R. Lepsius. Stuttgart: Klett-Cotta.
- Levitas, A. and P. Strzalkowski (1990) 'What Does "Uwłaszczenie Nomenklatury" (Propertization of the *Nomenklatura*) Really Mean?' *Communist Economies* 2(3): 413–16.
- Lincoln, James R., Michael L. Gerlach, and Peggy Takahashi (1992) 'Kereitsu Networks in the Japanese Economy: A Dyad Analysis of Intercorporate T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7(5): 561–85.
- Machonin, Pavel (1996a) 'Modernization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Czech Republic'. *Czech Sociological Review* 4(2): 171–86.
- Machonin, Pavel (1996b) 'Social Metamorphoses'. pp. 111–226 in *Czechoslovakia 1918–1992: A Laboratory for Social Change*, ed. J. Krejci and Pavel Machoni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Machonin, Pavel and Milan Tucek (1994) 'A Historical Comparison of Social Structures in the Czech Republic in 1984 and 1993'. *Czech Sociological Review* 2(2): 149–72.
- Major, Ivan (1993) *Privatization in Eastern Europe: A Critical Approach*. Brookfield, VT: Edward Elgar.

- Manchin, Robert and Iván Szelényi (1987) 'Social Policy under State Socialism'. pp. 102–39 in *Stagnation and Renewal in Social Policy*, ed. Gosta Esping-Anderson, Lee Rainwater and Mary Rein. White Plains, NY: Sharpe.
- Mankiw, Gregory N. (1990) 'A Quick Refresher Course in Macro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8(4): 1645–60.
- Mannheim, Karl (1985) *Ideology and Utopia: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San Diego, CA: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 Marer, Paul (1993)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pp. 173–88 in *Making Market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Post-Soviet States*, ed. Shafiqul Islam and Michael Mandelbaum.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 Martin, Bill and Iván Szelényi (1987) 'Beyond Cultural Capital: Towards a Theory of Symbolic Domination'. pp. 16–49 in *Intellectuals, Universities and the State in Western Societies*, ed. Ron Eyerman, Lennart G. Svensson and Thomas Söderqvist.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artinsen, Kare Dahl (1995) 'From Impotence to Omnipotence: The State and Economic Transition; 1989–1994'. *Bohemia* 36: 330–61.
- Marx, Karl ([1848]1978)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pp. 469–500 in *The Marx-Engels Reader*, 2nd edn., ed. Robert C. Tucker. New York and London: W.W. Norton.
- Marx, Karl (1919)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Hamburg: Meissner.
- Marx, Karl (1970)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rx, Karl (1974)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Berlin: Dietz.
- Mateju, Petr (1997a) 'In Search of Explanations for Recent Left-Turns in Post-Communist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ublic Policy* 7: 43–82.
- Mateju, Petr (1997b) 'Who Votes Left After the Fall of Commun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32.
- Mateju, Petr and Nelson Lim (1995) 'Who Has Gotten Ahead After the Fall of Communism? The Case of the Czech Republic'. *Czech Sociological Review* 3(2): 117–136.
- Mesezníkov, Grigorij and Sona Szomolanyi (eds) (1994) *The Slovak Path of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Bratislava: Interlingua.
- Mészáros, István (1970) *Marx's Theory of Alienation*.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 Meyers Enzyklopaedisches Lexikon* (1972–7) vols 4, 5, 24. Mannheim: Lexikon Verlag.
- Miller, John and Kirsten Miller (1994) *Chronicles from Pragu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Books.
- Miller, Peter and Nikolas Rose (1990) 'Governing Economic Life'. *Economy and Society* 19(1): 1–31.
- Mizsei, Kálmán (1992) 'Privatization in Eastern Europ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oland and Hungary'. *Soviet Studies* 44(2): 283–96.
- Mladek, Jan (1993) 'The Different Path of Privatization: Czechoslovakia'. pp. 121–46 in *Making Market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Post-Soviet States*, ed. Shafiqul Islam and Michael Mandelbaum.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 Moore, Barrington (1966)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Boston, MA: Beacon Press.



- Musil, Jiri (ed.) (1995) *The End of Czechoslovakia*.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 Mizruchi, Mark (1982) *The American Corporate Networks, 1904-1974*. Beverly Hills, CA: Sage.
- Mizruchi, Mark and Michael Schwartz (1987) *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Busine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osse, Georg (1990) 'Das deutsche-jüdische Bildungsbürgertum'. pp. 168-80 in *Bildungsbürgertum im 19. Jahrhundert*, vol. 2, ed. Werner Conze and Jürgen Kocka. Stuttgart: Klett-Cotta.
- Nee, Victor (1989)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5): 663-81.
- Nee, Victor (1991) 'Social Inequalities in Reforming State Socialism: Between Redistribution and Markets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6(3): 267-82.
- Nee, Victor (1996) 'The Emergence of Market Society: Changing Mechanisms of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4): 908-49.
- Nee, Victor and P. Lian (1994) 'Sleeping with the Enemy: A Dynamic Model of Declining Political Commitment in State Socialism'. *Theory and Society* 23(2): 253-96.
- Nee, Victor and Rebecca Matthews (1996) 'Market Transition and Societal Transformation in Reforming Socialism'.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2: 401-36.
- Niethammer, Lutz (1990) 'Einführung -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als Projekt'. pp. 17-40 in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in Deutschland*, ed. Lutz Niethammer. Munich: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 Offe, Claus (1991) 'Capitalism by Design? Democratic Theory Facing the Triple Transition in East Central Europe'. *Social Research* 58(4): 865-92.
- Offe, Claus (1994) *Der Tunnel am Ende des Lichts*. Frankfurt: Campus Verlag.
- Ost, David (1990) *Solidarity and the Politics of Anti-Politics*.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Ost, David (1993) 'The Politics of Interest in Post-Communist East Europe'. *Theory and Society* 22(4): 453-86.
- Palous, Martin (1989) 'The Parallel Polis after 12 Years'. *Uncaptive Minds* 2(5): 36-40.
- Parkin, Frank (1979) *Marxism and Class Theory: A Bourgeois Critiqu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Passin, Herbert (1965) *Society and Education in Jap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Patocka, Jan (1993-94) 'Wars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the 20th Century as War'. *Telos* 94(Winter): 116-26.
- Patterson, Perry L. (ed.) (1993) *Capitalist Goals, Socialist Past: The Rise of the Private Sector in Command Economies*.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Paul, C. Edward (1997) 'Toward an Explanation of Variation in the Reproduction and Circulation of Elites Both Within and Between Countrie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in Eastern Europe'.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Sociology*, June.
- Pithart, Petr (1989-90)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zechoslovakia in the 1980s (part I)'. *East European Reporter* 4(1): 42-5.
- Pithart, Petr (1990)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zechoslovakia in the 1980s (part II)'. *East European Reporter* 4(2): 4-7.
- Pithart, Petr (1995) 'Towards a Shared Freedom'. pp. 201-22 in *The End of Czechoslovakia*, ed. Jiri Musil.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 Przeworski, Adam (1991)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rzeworski, Adam (1992) 'The Neoliberal Fall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3(3): 45–59.
- Puhle, Hans-Jürgen (ed.) (1991) *Bürger in der Gesellschaft der Neuzeit*.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 Puhle, Hans-Jürgen (1991) 'Einleitung'. pp. 7–13 in *Bürger in der Gesellschaft der Neuzeit*, ed. H.-J. Puhle.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 Ray, Larry J. (1996) *Social Theory and the Crisis of State Socialism*.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 Rigby, T.H. and Ferenc Fehér (eds) (1992) *Political Legitimation in Communist Societies*. London: Macmillan.
- Ringer, Fritz (1969) *The Decline of the German Mandari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Robert, Péter (1996) 'Vállalkozók és vállalkozások' (Entrepreneurs and firms) *Társadalmi Ríport 1996* (Social Report 1996), ed. Rudolf Andorka, Tamás Kolosi and György Vukovics. Budapest: TARKI.
- Rona-Tas, Ákos (1994) 'The First Shall Be the Last? Entrepreneurship and Communist Cadre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0(1): 40–69.
- Rona-Tas, Ákos (1997) *The Great Surprise of the Small Transformation: The Demise of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the Private Sector in Hungar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Rona-Tas, Ákos and József Böröcz (1995) 'Small Leap Forward: Emergence of the New Economic Elites'. *Theory and Society* 24(5): 751–81.
- Rondinelli, Denis A. (ed.) (1994) *Privatization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entral Europe. The Changing Business Climate*. London: Quorum.
- Runciman, Walter G. (1983) *A Treatise on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utland, P. (1992–93) 'Thatcherism Czech-Style: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 in the Czech Republic'. *Telos* 94(Winter): 103–30.
- Sachs, Jeffrey (1995) 'Postcommunist Parties and the Politics of Entitlements'. *Transitions* 6 (3).
- Sachs, Jeffrey and Wing Thye Woo (1996) 'China's Transition Experience, Reexamined'. *Transitions* 7(3–4): 1–5.
- Sági, Matilda (1994) 'Menedzserek. Az új gazdasági elit rekrutációja' (Managers. Recruitment into the new economic elite) pp. 334–50 in *Társadalmi Ríport, 1994* (Social Indicators), ed. Rudolf Andorka, Tamás Kolosi and György Vukovics. Budapest: TARKI.
- Scruton, Roger (1988) 'The New Right in Central Europe (I): Czechoslovakia'. *Political Studies* 36(September): 449–62.
- Siegrist, Hannes (ed.) (1988) *Bürgerliche Berufe – zur Sozialgeschichte der freien und akademischen Berufe in internationalen Vergleich* (Vorwort von Jürgen Kocka)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 Siklova, Jirina (1996) 'Lustration, or the Czech Way of Screening'. *East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Review* 5(1): 57–62.
- Silberman, Bernard S. and H. D. Harootunian (eds) (1966) *Modern Japanese Leadership: Transition and Change*.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 Skilling, Gordon and Paul Wilson (eds) (1991) *Civic Freedom in Central Europe*. London: Macmillan.
- Słomczynski, Kazimierz M. and Goldie Shabad (1997) 'Systemic Transformation and the Salience of Class Structure in East Central Europe'.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11(1): 1-26.
- Smith, Adam ((1779)1976) *An E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taniszki, Jadwiga (1991a) *The Dynamics of Breakthroug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taniszki, Jadwiga (1991b) 'Political Capitalism in Poland'.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5(1): 127-41.
- Staniszki, Jadwiga (1992) *The Ontology of Soci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tark, David (1986) 'Rethinking Internal Labor Markets: New Insights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4): 492-504.
- Stark, David (1989) 'Coexisting Organizational Forms in Hungary's Emerging Mixed Economy'. pp. 137-68 in *Remaking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Socialism: China and Eastern Europe*, ed. David Stark and Victor Ne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Stark, David (1990) 'Privatization in Hungary: From Plan to Market or from Plan to Clan?'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4(3): 351-92.
- Stark, David (1992) 'Path Dependence and Privatization Strategies in East Central Europe'.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6(1): 17-51.
- Stark, David (1996) 'Recombinant Property in East European Capital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4): 993-1027.
- Szalai, Erzsébet (1981) *Kiemelt vállalat - beruházás - érdek* (Privileged firms, investments, interests).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 Szalai, Erzsébet (1989a) *Gazdasági mechanizmus, reformtörékvések és nagyvállalati érdekek* (Economic mechanism, reform scenarios and the interests of large firms).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 Szalai, Erzsébet (1989b) 'The New Elite'. *Across Frontiers* 5(Fall-Winter):25-31. [In Hungarian: Beszélő, No. 26, 1989.]
- Szalai, Erzsébet (1991) 'Integration of Special Interests in the Hungarian Economy: the Struggle Between Large Companies, the Party and State Bureaucracy'.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5(June): 304-24.
- Szalai, Erzsébet (1992) *Gazdaság és hatalom* (Economy and power). Budapest: Aula.
- Szalai, Erzsébet (1994a) 'The Power Structure in Hungary after the Political Transition'. pp. 120-43 in *The New Great Transformation*, ed. Christopher G.A. Bryant and Edmund Mokrzycki.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Szalai, Erzsébet (1994b) *Uttagazás. Hatalom és értelmiség az államszocializmus után* (At the cross-roads: power and intellectuals after state socialism). Budapest: Pesti Szalon Kiadó.
- Szalai, Erzsébet (1996) *Az elitek átváltozása* (Transformation of elites). Budapest: Cserépfalvi Kiadó.
- Szelényi, Iván (1978) 'Social Inequalities in State Socialist Redistributive Econom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19: 63-87.
- Szelényi, Iván (1986-87) 'Prospects and Limits of the East European New Class Project'. *Politics and Society* 15(2): 103-44.
- Szelényi, Iván (1988a) 'Socialism in an Epoch of Crisis'. pp. 208-32 in *Remaking the*

-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Socialism*, ed. David Stark and Victor Ne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Szelényi, Iván (1988b) *Socialist Entrepreneur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Szelényi, Iván, Eva Fodor and Eric Hanley (1997) 'The Left-turn in Post-Communist Politics: The Hungarian and Polish Elections, 1990–1994'.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11(1): 190–224.
- Szelényi, Iván and Eric Kostello (1996) 'The Market Transition Debate: Toward a Synthe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4): 1082–96.
- Szelényi, Iván and Bill Martin (1988) 'The Three Waves of New Class Theories'. *Theory and Society* 17(4): 645–67.
- Szelényi, Iván and Bill Martin (1989) 'The Legal Profession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New Class'. pp. 256–88 in *Lawyers in Society*, vol. 3, ed. Richard L. Abel and Philip S.C. Lewi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zelényi, Iván and Szonja Szelényi (1990) 'Az elite cirkulációja?' (Circulation of elites?) *Kritika* 10(October): 8–10.
- Szelényi, Iván and Szonja Szelényi (1995) 'Circula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Elites in Post-Communist Transformation'. *Theory and Society* 24(5): 615–38
- Szelényi, Szonja (1987) 'Social Inequality and Party Membership'.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2(5): 559–73.
- Szelényi, Szonja (1997) *Equality by Design: The Grand Experiment in Destratification in Socialist Hungar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Szelényi, Szonja, Iván Szelényi and Imre Kovach (1995) 'The Making of the Hungarian Post-Communist Elites: Circulation in Politics and Reproduction in the Economy'. *Theory and Society* 24(5): 697–722.
- Szelényi, Szonja, Iván Szelényi and Winifred R. Poster (1996) 'Interests and Symbols in Post-Communist Political Culture: The Case of Hungar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3): 466–77.
- Szomolanyi, Sona (1994) 'Old Elites in the New Slovak State and their Current Transformation'. pp. 63–82 in *The Slovak Path of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ed. Grigorij Meseznikov and Sona Szomolanyi. Bratislava: Interlingua.
- Tardos, Márton (1989) 'Economic Organizations and Ownership'. *Acta Oeconomica* 40(1–2): 17–37.
- Taylor, George V. (1975) 'Capit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pp. 150–9 in *The Soci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Debate on the Role of the Middle Classes*, ed. Ralph W. Greenlaw. Lexington, MA: D.C. Heath.
- Thygesen, Niels (1984) 'Milton Friedman'. pp. 217–50 in *Contemporary Economists in Perspective*, ed. Henry W. Spiegel and Warren J. Samuels. Grenage, CT: JAI Press.
- Tucker, Aviezer (1993–4) 'Waiting for Meciar'. *Telos* 94(Winter): 167–82.
- Useem, Michael (1980) 'Corporations and the Corporate Elit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6: 41–77.
- Useem, Michael (1984) *The Inner Circle: Large Corporations and the Rise of Business Political Activity in the U.S. and U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Veblen, Thorstein ([1919]1963) *The Engineers and the Price System*. New York: Harcourt & Brace.
- Vladislav, Jan (1986) *Václav Havel or Living in Truth*. London: Faber & Faber.
- Vondung, Klaus (ed.) (1976) *Das Wilhelmische Bildungsbürgertum*.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 Voslensky, Michael (1984) *Nomenklatura: The Soviet Ruling Class. An Insider's Report*. New York: Doubleday.
- Voszka, Éva (1993) 'Spontaneous Privatization in Hungary'. pp. 89–107 in *Privatization in the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Studies of Preconditions and Policies in Eastern Europe*, ed. John S. Earle, Roman Frydman, and Andrzej Rapaczynski.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Voszka, Éva (1994) *Centralization, Renationalization, Redistribution*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Changing Ownership Structure in Hungary, 1989–1993) Budapest: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Discussion Papers, Series No. 916.
- Walder, Andrew (1986)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alder, Andrew (1995) 'Career Mobility and the Communist Political Orde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0(3): 309–28.
- Walder, Andrew (1996) 'Market and Inequality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 Toward Testable Theor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4): 1060–73.
- Wasilewski, Jacek (1995a) 'The Crystallization of the Post-Communist and Post-Solidarity Political Elite'. pp. 117–33 in *After Communism: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Radical Social Change*, ed. Edmund Wnuk-Lipinski. Warsaw: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tudies.
- Wasilewski, Jacek (1995b) 'The Forming of the New Elite: How Much Nomenklatura is Left?' *Polish Sociological Review* 110(2): 113–23.
- Wasilewski, Jacek and Edmund Wnuk-Lipinski (1995) 'Poland: Winding Road from the Communist to the Post-Solidarity Elite'. *Theory and Society* 24(5): 69–96.
- Weber, Max ([1904–05]1958)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 Weber, Max ([1906]1958) 'Capitalism and Rural Society in Germany'. pp. 363–85 in *From Max Weber*, ed.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eber, Max ([1915–21]1978) *Economy and Society*. New York: The Bedminster Press.
- Whipple, Tim D. (ed.) (1991) *After the Velvet Revolution: Václav Havel and the New Leaders of Czechoslovakia Speak Out*. New York: Freedom House.
- Windolf, Paul (1996)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ast German Econom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Territoriality and Modern Society', UNC, Chapel Hill, March 29–30.
- Xie, Yu and Emily Hannum (1996) 'Regional Variation of Earning Inequality in Reform-Era Urba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4): 950–92.
- Zaslavsky, Victor (1982) *The Neo-Stalinist State: Class, Ethnicity and Consensus in Soviet Society*. Armonk, NY: M.E. Sharpe.
- Zeitlin, Maurice (1974) 'Corporate Ownership and Control: The Large Corporation and the Capitalist Cla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9(5): 1073–1119.
- Zubek, Voytek (1991) 'The Polish Communist Elite and the Petty Entrepreneurs'. *East European Quarterly* 25(3): 339–62.
- Zweifelhaft, Richard (1992) 'The Application of Cultural and Social Capital: A Study of the 25th Year Reunion Entries of Prep School and Public School Graduates of Yale College'. *Higher Education* 23(3): 311–20.

译后记

经过近半年的紧张翻译,《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中译本终于和读者见面了。虽然时隔该书写作完成十年之后才有中译本问世,不得不有点姗姗来迟的感觉,但是,对希望更全面地了解和反思该书主旨的读者而言,又未尝不是好事。十年来,围绕这本社会转型研究领域里的“经典”著作,产生了一系列的学术讨论,书中所预测的现象,也有了许多新的进展。我们的这个中译本,就收集了作者在后来对该议题进一步阐发的文章,并邀请作者撰写了专门的中文版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该译本颇有点“纪念版”的味道。当然,鉴于国内已经有很多文章对该书的内容做出过介绍和评议,我们打算在这里重复这项工作。倒是由于这些评介对关键术语的译法各不相同,所以,交代一下若干术语的翻译问题显得很有必要。

首先是 *bourgeoisie* 和 *capitalist* 的区别。这两个词的关系非常复杂,在有的学者那里它们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在本书中,它们之间的区别至关重要。*capitalist* 在书中指的是掌握物质资料所有权的人,我们将其译为“资本家”,这是一个严格遵守“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相应的,*capitalist class* 被译为“资本家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在作者那里,它事实上等同于 *propertied bourgeoisie* (持有恒产的资产阶级)。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capitalist class* 其实是 *bourgeoisie* 的一个“子集”。*bourgeoisie* 在书中,既包括掌握文化资本的人,也包括掌握经济资本的人。在绝大多数的时候,我们将其译为中性的“资产者”,只有在明确表示贬义的时候,才译为“布尔乔亚”;在作者特别强调单数的时候 (*a bourgeoisie*) 译为“资产阶级分子”,复数形式 (*bourgeoisies*) 则译为“资产阶级”。相应的,*bourgeoisie society* 被我们译为“资产阶级社会”,它的意涵与马克思本人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基本相同,而 *capitalism* 则对应的是“资本主义”。为了



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

更清楚地让读者理顺这些术语的关系，我们自己绘制了一幅关系图，该图也获得了作者的首肯。更详细的词源学考察，请参见本书第二章中的相关论述。

其次是 post-communism。这个术语国内通译为“后共产主义”，而 post-communist 则被译为“后共产主义的”；在某些地方，尤其是这个术语做定语的时候，我们也采用了“共产主义之后的……”的译法，希望能在表意上更加清晰，避免将其理解为“共产主义晚期”。另外，必须指出的是，communism 在本书中实际上指的是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是西方学术界长期以来约定俗成的叫法——更准确的说法，也许应该是“国家社会主义”（state-socialism）——与国内教科书中所说的作为社会发展最高境界的共产主义社会无关。

nomenklatura 是一个比较难译的关键术语。它本是苏联时代出现的一个俄文名词，在本书中，这个词指的是：由党的中央委员会或中央委员会某一机构任命的各党群组织、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的“在职者”。在作者提供的 nomenklatura 总体名单中（详见附录 II），它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既有党的总书记、部长、议员，也有大学校长、院士、作协主席、大型国有企业的老总。遍查各种资料，nomenklatura 的译法很多，未有统一。韩莉博士将其译为“党任命的干部”，突出了“党管干部”的特征，但稍嫌拖沓，而且级别不清楚，县委书记也可以说是“党任命的干部”或“党的干部”；日本学者的译法则比较形象——“红色贵族”，但容易让人将对象局限于高级领导干部和官僚资本家，而且一个普通厅长或者大学校长自然够不上“贵族”，甚至“高干”都算不上。杨开云博士曾将其译为“有头衔者”，倒是突出了“职位”，可我们觉得未能突出“党”的作用。事实上，在我们看来，nomenklatura 其实要突出的有两点：第一，“党”的因素，尤其要突出他们是 1989 年之前各类或有权、或有势、或至少也有个“头衔”的人。第二，“级别”的因素，亦即享受一定的政治待遇。综合考虑各种因素，译者只好生造了“党国精英”一词，虽然可能比较模糊，但也许这反而是个优点。

Transition 和 transformation 分别被译为“转型”和“转变”，这两个词在本书中并没有特别的区别：凡是社会中占据支配地位的资本形式发生了改变，就可以称之为“转型”。在本书中，作者分析了在中欧历史上发生过的三种转型：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型，从资本主义到国家社会主义的转型，从国家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型。而作者也明显指出，第一

和第三种转型都是向现代性的转型。当然，作者所认为的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观点，显然是过于简化了。

最后，外国人名，一般姓在后，名在前。但是匈牙利人和芬兰人的名字是姓在前，名在后，比如，Miklós Németh 就应该翻译为内梅特·米克洛什。但是，对于 Iván Szelényi 这样的“姓名英语化”的匈牙利人，我们翻译为伊万·塞勒尼。本书中英文人名的翻译，除学界约定俗成的人名外，均参考了外研社出版的《英语姓名词典》，匈牙利、波兰、保加利亚人名的翻译，参考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匈牙利哲学社会科学人名录》、《波兰哲学社会科学人名录》、《保加利亚哲学社会科学人名录》以及网络上搜索到的译法，其他语种（法语、德语、罗马尼亚语和俄语）的人名，参考了新华社为驻外记者编写的各语种《人名译名手册》。对于一些特殊人物和事件，我们加上了译者注，希望不会引起博学者的厌烦。

这本书中文版的出版，首先应该感谢我们的导师孙立平教授，以及沈原、郭于华两位教授，他们可能是最早在大陆学术界批判性地推介这本书的学者；而且，正是这三位老师，将我们带入“转型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并对我们翻译该书给予了精神上的支持和智力上的指导。沈原教授以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谢寿光社长是本书的直接促成者，没有他们的眼光和决策，以及本书责任编辑童根兴的督促，这个译本的面试可能还会拖延很久。

其次，我们要特别感谢原书的三位作者。他们不仅通过电子邮件，热心细致地回答了译者提出的各种问题，而且还欣然允许我们加译《论反讽》一文。伊万·塞勒尼教授更是为该书撰写了专门的“中文版序”。读者将会看到，这篇序言不仅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倾注了他对中国转型实践的关注和良好祝愿。当然，我们建议读者在阅读中先读完《论反讽》，再读《中文版序》，这样的效果可能更好。

此外，在翻译的过程中，塞勒尼教授的高徒杨开云博士不仅奉献了他先前译出的《导言》部分供我们参考，而且仔细校对了《中文版序》；北京大学的李康博士则欣然校对了附录 IV《论反讽》一文，从而在事先和事后两个环节上纠正了我们的某些“系统偏差”。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转型社会学读书小组”的部分成员，阅读了该书译稿的部分章节，并提出了中肯的建议，我们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该书的翻译是分工合作的产物（本书的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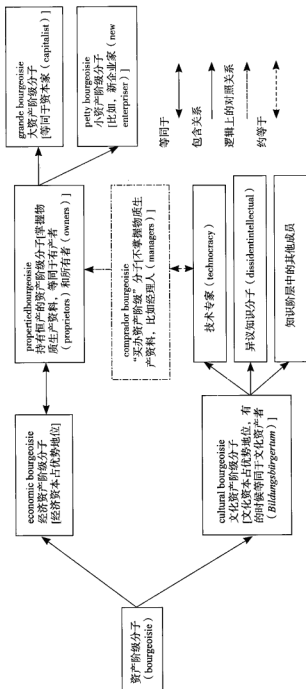


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

一、二章全文及第三章正文由吕佳龄翻译，其余部分由吕鹏翻译或编纂，并统校全书），但是，作为本书的译者，对于译本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我们俩负有不可推卸的全部责任。译文中的错误与不当之处，也在所难免，故恳请各方专业人士、广大热心读者不吝批评指正，以便于在将来有机会对这个译本做进一步地修订完善（如方便，可来信至 great-transformation@126.com）。

吕鹏、吕佳龄

二〇〇七年二月十日于清华园



* 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 通过他们各自占据的职位或部门的性质而得以界定。所以, 后共产主义时期的经理人, 虽然是“经济精英”, 但他们掌握的支配性资本类型是文化资本 (见附录 II)。此外, 本图并未暗示任何意义上的阶级结构或等级秩序, 而只是提供一种静态的分类学, 或者更准确地说是, 各个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

本书提供了一种向资本主义转型的新理论。通过讲述资本主义如何在资本家缺席的后共产主义中欧被打造的故事，它引导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现代资本主义起源的问题。

本书通过深入研究，深刻描绘了由中欧前共产党技术专家以及异议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体制废墟上构建的资本主义的显著特征。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这是由三位美国社会学家做出的开创性研究，它主要研究了匈牙利、波兰和捷克共和国从国家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问题。

Tribune

上架建议：社会学

ISBN 978-7-5097-0247-5



9 787509 702475 >

ISBN 978-7-5097-0247-5/D · 0100

定价：49.00元